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料选编

下册

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
密云县档案局
密云县关心下一代协会

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料选编

下册

谨以此书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
密　云　县　档　案　局　编
密云县关心下一代协会

二〇〇五年七月

编辑小组：

张凤海　林振洪　赵炳森

李东明　李兰瑞　杜长德

曹荣贵　霍冬梅

三、八路军在密云地区的光辉战绩

首战达峪毙敌酋

鲍星时

1940年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开辟后，遂成为冀东至晋察冀边区各地的必经之路。10月初，晋察冀步兵第十团一营营长王亢率部护送冀东100多名干部去晋察冀边区学习。他们从盘山出发，西行至土门，即与日军遭遇，激战一昼夜，拂晓突出重围。10月12日下午3时，进抵密云潮河东岸的达峪村，又被从密云县城出发的三路日军包围。王亢命一营一部迎击东北高山之敌，其余部队抢占西山梁，迎击西南高山之敌，同行的冀东三支队抢占东南山，负责迎击东南之敌。战斗形势非常严峻，王亢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思考着保护干部安全突围的方案。战斗至黄昏，从望远镜里看到，西北小山顶日军旗语兵不时向他们所在方向摇动日本旗，迹象表明，日军把他们误认为是自已人了。王亢心中忽然一亮，急令通讯员把过去缴获的日本旗拿出来，也向着西北小山摇动。日军见到摇动的日本旗，便走下山来，一名骑马军官走在前面，后跟一小队日本兵。王亢急将战士埋伏在村口，待日军到达村口，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跃起冲向日军，几分钟就将20多名日军全部消灭。日军战场指挥官石井少佐被击毙，翻译官海健被活捉，日军指挥所被摧毁。另两路日军失去指挥，也急忙撤走。王亢率一营保护着干部安全渡过潮河，胜利完成任务。

冯家峪战斗

曹友林

冯家峪战斗，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来，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一次空前重大的军事胜利。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日伪以消灭我十团、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为目的的七十八天大“扫荡”，在丰滦密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以失败告终，被迫开始分途撤兵。十二月初，十团一营接到下营村自卫军的情报，得知驻下营的日军铃木大队哲田中队及一批日军官将于近日内沿白马关河川向密云撤退，营长王亢决定抓住战机歼灭这股敌人，随即率部埋伏在敌人撤退必然要经过的西白莲峪以北一带山上。然而，一连等了两天也没见敌人到来。十二月十四日，我军又接到敌人正抓伕要牲口的情报，根据这一情报判断，敌人即将动身。王营长立即率一、三连和四连一部共二百五十余人，连夜赶至冯家峪南湾子埋伏下来。

南湾子在冯家峪村南面一里之遥，白马关河自北向东南穿过冯家峪村，在这里被一座山峰拦住，河水绕山转了半个圈儿又向西流去。河东南岸，一道几十米高的月牙形峭壁环抱着清澈的河水，与西岸凸出的山峰隔河相峙，形成了一条环形河谷。这一地形对我伏击敌人极为有利。王营长命令一连埋伏在河西山峰的南侧，负责堵死山湾的出口；四连埋伏在西山北侧，负责卡断敌人的退路；三连埋伏在河东梯子峪沟口南侧峭壁上，负责拦腰截击敌人；布下了三面夹击的“口袋阵”。河东岸峭壁上有一棵松树，站在这里可看到整个阵地，营指挥所就设在这棵松树下。时值大雪节气，被冻僵的

白马关河静静地躺卧在山谷里，黎明前的山湾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山风沿着河谷吹来。寒风吹透了我军指战员单薄的衣衫，但他们不怕寒冷，毅然警惕地坚守在阵地上，等候着敌人。

十五日清晨，日军哲田中队列队从下营出发了。前面是六名鬼子尖兵，相距约五十米，是鬼子的大队人马，十多个骑马的军官走在队伍的中间，后面还有四十八个牲畜驮子，驮着辎重。这股敌人都是老兵，在战场上从未遇过劲敌，因此极为骄狂，自诩为“常胜部队”。敌人进入冯家峪村，稍事休息，又按原序列出村，朝我军阵地走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正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坟墓。

敌人越来越近了，我军指战员精神抖擞，刀出鞘，弹上膛，屏住呼吸，等待着攻击的命令。九时许，敌人开始进入山湾。放过敌人的尖兵，等鬼子全部钻进“口袋”，王营长举起手枪，“呯”的一声，一个军官从马上倒栽下来。枪声就是预定的战斗命令，顿时我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仇恨的子弹疾风暴雨般的射向敌群……。

鬼子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死的死，伤的伤，队形大乱，慌作一团。但他们都是老兵，惊魂稍定，便开始进行顽抗：一部分敌人钻到河东岸峭壁下，借陡峭的崖壁躲过我军东面火力，以河边坝坎作掩体，架起轻重机枪向西山我军狂扫；另一部分敌人缩在西山北侧山根下，避开我军西面火力，用掷弹筒向河东岸峭壁上的我军猛轰。在凶猛火力掩护下，一群鬼子向我西山阵地冲来，妄图抢占西山制高点，以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我扼守西山的一连战士等日军靠近了阵地，数十枚手榴弹一齐飞向敌人，炸得鬼子血肉横飞，倒下了一片，其余敌人慌忙滚下山去。敌人为了夺取制高点，不惜孤注一掷，组织残敌再次扑向西山。西山头一时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我军战士英勇顽强地坚守西山阵地，手榴弹用光了，子弹打尽了，眼看敌人就要登上山顶，在这紧要关头，战士们一个个跃出战壕，冲向敌人白刃格斗。尽管这些老兵十分凶顽，还是一个接一个

地死在了我军战士的刺刀下。日军终于支持不住，又抛下了一片尸体狼狈地逃下山去。经过这次打击，敌人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只得龟缩在坝坎下固守待援。

这时，我军吹响了冲锋号。三连首先沿梯子峪沟冲下山来，发现敌人的辎重驮子隐藏在沟口，三连战士一阵扫射即将押驮的十几个日军全部消灭了。驮伕们乘机把十几个牲口驮子赶进沟里，这批辎重便成了我军的战利品。三连战士冲出沟口，向西山根下的敌人冲去，但敌人的机枪封锁了沟口外的开阔地，冲锋受阻。

与此同时，一连也沿西南山坡冲向河东峭壁下的敌人。敌重机枪隐蔽在一座土桥下疯狂扫射，冲在前面的一连战士相继中弹倒下，后边的战士也被压制在山坡上。面对敌人重机枪火舌，指战员的眼睛都气红了。突然，一连连长鲁志华冒着弹雨奋不顾身滚下山坡，迅速接近土桥，猛然跃起一把抓住了敌人灼热的机枪管，大吼一声踢倒了敌射手。但鲁连长也于同时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胸膛，壮烈牺牲。

战斗进行到下午四点多钟，只剩下二十多名敌人仍在负隅顽抗。我军正要发起最后的攻击，不料，石匣、董各庄等据点千余日伪军赶来增援，我军未及全歼残敌和打扫战场，即主动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官兵九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及辎重一批。我军亦付出了巨大代价，一连连长鲁志华、指导员冯汝霖、三连连长刘若海等六十七名指战员光荣牺牲。

冯家峪战斗一举消灭日军近一个中队，它充分显示了我军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一胜利，震惊了敌人，坚定了丰滦密人民的抗日信心，使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为纪念这一重大胜利，一九四四年五月，丰滦密联合县和冀东第五地区队为冯家峪战斗树立了“还我河山”纪念碑。碑文如下：

“冯家峪战斗是民国二十九年秋（注①）的战绩，此次战斗是

王团长（注②）亲手指挥的。歼灭敌寇一个中队——奥村中队（注③）计九十余人，我们也付了最大血的代价，鲁连长（志华）、冯政指（汝霖）、张副政指（君廉）曹支书（安德）等均壮烈牺牲。

冯家峪战斗，敌寇惊魂丧胆，奠定了人民胜利信心，这是开辟丰滦密划阶段的一个伟大辉煌战绩。

倪蔚庭、师军、胡毅（注④）敬立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块丰碑至今仍屹立在冯家峪的山上。十团指战员杀敌报国的献身精神将永远为密云人民所崇敬。

注释

注①：据当年参加战斗的十团王亢等同志回忆，准确战斗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②：王亢同志指挥冯家峪战斗时为十团一营营长，一九四一年二月以后才接任十团团长。

注③：据当年参加战斗的十团同志回忆和历史文献记载，敌中队长为哲田，碑文中的奥村为误。

注④：倪蔚庭时任丰滦密联合县县长，师军任冀东第五区队区队长，胡毅任中共丰滦密县委书记兼五区队政委。



冯家峪战斗纪念碑

两分钟内歼敌记

王 亢

在整个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敌我之间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状态。尤其在武器装备上，我们远远落后于敌人。可是，在我们经过与日本侵略者的多次较量后，终于认识到：对日军作战，在敢于刺刀见红，不怕流血牺牲的同时，还要多动脑筋，力求智与勇互相结合，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方能实现我们损失最小，而收获最大的目的。如1941年春，我军在东（西）白莲峪沟口的伏击战，就是一次成功的战例。

这年4月中旬，春风吹绿了古长城内的树木和野草。在密云县城北面的白马关、下营一线，日本关东军铃木部队，除了凭借古长城天险对我军实行封锁外，又沿白马关川设了几个据点。据点内的敌人，经常窜到附近村庄抢劫敲诈勒索，当地人民恨透了这群野兽。我们十团曾几次要收拾他们，都因敌我力量强弱悬殊，而未能下手。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给予这群野兽一个狠狠地打击。终于想到了最好的歼灭敌人之处，其具体位置在白马关川东白莲峪沟口。这里东西两侧高峰耸峙，中间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是白马关、下营的日军通往密云的必经之道。只要敌人行经此处，我军将两面的山头控制好，敌人是很难逃脱的。按照一般情况，敌人是不会往这里钻的。但日军骄横成性，竟把这里也当成了他们的“王道乐土”，进进出出毫不在乎。因此，我们便决定把这里作为埋葬侵略者的坟墓。而这一时机终于来到了。

4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我侦察员发现，驻下营的日军铃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约20多人，沿白马关川公路向冯家峪方向走来。这一

情况，很快地由各山头的瞭望哨用暗号传到我团团部，我立即命令我团一营跑步进入预先勘察好的埋伏阵地，将一连的两个排置于公路两侧小山上，另一个排放在西侧山脚下的拐弯处；将二连放在公路东侧的台地上；三连则作为预备队，隐蔽在东白莲峪沟口内，以便战斗打响时，断敌退路。并抽出一个排向下营方向警戒，阻击敌军增援。我在公路东侧的一个小山头上的营指挥所指挥作战。上午十点钟左右，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地闯进来了。距我伏击部队最近的只有10多米远，日军的骄横样子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早就可以动手歼敌，但我们吸取了去年冬天在冯家峪设伏的教训，那次因下令歼敌时枪声太早，致使敌人得以迅速展开，据险顽抗，未能全歼。这次我们则把枪响为令改为信号旗语行事。战前已通告各轻机枪射手分段扫射，步枪射手几个人瞄准一个敌人，分工包干。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阵地，一连连长周德礼接到我的信号后，随即传令机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尚未来得及散开就被歼灭了。这次战斗，除一名穿便衣的翻译官和一名被强拉来做向导的老乡得以活命，其余21人全部击毙。这里事先曾命令不准向两便衣开枪。整个战斗只用了两分钟。缴获机枪两挺，掷弹筒一具，步枪十余支，手枪一支和数百发子弹。我军无一伤亡。当下营据点内的日军闻声赶来增援时，我已打扫完战场，安全转移了。他们只能收拾21具横躺竖卧的同伙的尸体。

这一光辉胜利的获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群众的支持。敌人尚未出据点，早就为我们掌握的伪自卫队员就把情报送来了。我设伏期间，当地群众帮助封锁消息，以致使敌人完全变成瞎子、聋子，而瞎子、聋子打起仗来只有被彻底歼灭的份。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真是古今之至理啊！

十团巧设“双簧戏”

王　亢

事情发生于1941年4月中旬。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为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奉命来到了密云县境内，沦陷已久的劳苦大众如同黑夜里见到启明星，热烈欢迎八路军的来到。可是也有极少数人反对，康各庄的地主分子、伪大乡长赵庆祥就是其中一个。他反对减租减息，反对八路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发动人民抗日。为了争取广泛的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十团的同志对他宽大为怀，晓之以民族大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起初他不愿听，也不想听，后来担心胳膊拧不过大腿，就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对我军宣传的抗日救国道理装作“洗耳恭听”，甚至对动员他减租减息也作了些让步。俗话说：强装的笑脸不生动。赵庆祥表面上一见到十团的人就笑脸相迎，可是暗地里却两拳紧攥，恨不得一口吃掉十团。我军筹粮筹款，他带头发难，而日本人来催讨捐款粮秣时，他却竭尽全力，一文不少。十团同志找他并指出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却假装没奈何；我们要求他至少不应与八路军作对，可他却时时刻刻暗中窥伺我军的行动，给驻康各庄据点的日本侵略者刺探和传递情报。他就象坐山雕一样，阻挠破坏我在此开展工作，扩大游击根据地，暗中恫吓老百姓：“谁敢避着我赵某与八路军来往，我就叫皇军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竟发展到只要我们的人到康各庄活动，他马上就会报告据点里的日本鬼子，致使我们不少同志流血和牺牲。同志们都气愤地骂他是“三国演义”中的蒋干，并决心给这个铁心当汉奸的赵庆祥以打击。在当时，除掉个铁杆汉奸，并不算什么难，但我和政委吴涛、政治处主任彭

烈、一营营长冯克武和教导员方城感到，这样做太便宜了敌人。我们详细分析已掌握到的材料，认为赵庆祥已完全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每次他送情报，日本人都亲自行动。于是，我们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这个铁杆汉奸再给日本鬼子送一次“情报”，演一出“双簧戏”。

4月15日，我们授意我地方工作人员来到了赵乡长家，一番寒喧应酬，我工作人员遂将谈话转入正题，悄声道：“明天拂晓，区领导人在白道峪村召集各乡、保长开会，布置有关工作。”并一再嘱咐他，白道峪村在他的辖区，必须保证会议和区领导人安全，千万不可走漏一丝一毫风声，而且特别提醒他：“万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了”。赵乡长此时可真够恭顺的啦，一口一个“是是……”，一口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可心里头却暗暗拨拉起他的小九九。因为这些日子，皇军正为他送不了情报不满意呢，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再也不象过去那般对待他了，凡事都避着他。为了讨得皇军欢心，自己也煞是费了不少苦心，可终不能如愿，这些日子里正愁得慌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可不，“情报”这不是自己送上门了吗？真是“想吃肥肉无处寻，大肥猪一头自拱门”。这一下向皇军讨好卖乖的机会来了，闹得好，说不定皇军还能委他个一官半职呢，自己不是早就看上了那个伪军小队长的“肥缺”了吗？……对，事成之后，我就向皇军明提出来，……。这个家伙完全沉浸在黄粱美梦之中，以至于我工作人员起身告辞的时候，他还一口一个“是，是……”，一口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当我工作人员离开他家后，这个小子拉开后门，拔腿就朝鬼子的据点走去，一字不拉地把刚才知道的统统告诉了日本鬼子。

话说日本鬼子这些天不断挨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袭扰，死伤常发生，整日里不得安宁，虽说几次进行出剿，可部队刚一出动，八路军和游击认就全没了踪影，真是欲战不得，欲忍不能。日本鬼子

也正在挖空心思，寻机对我抗日军民来一次报复呢。此时康各庄大乡长送来了如此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直把据点里的鬼子小队长高兴得合不拢嘴，竟开天辟地第一回起身为赵乡长亲自倒上了一杯水，连连拍着他的肩膀夸赞说："你的，良心大大地好！"并许诺战斗胜利后大大地犒赏他。赵大乡长这时真是受宠若惊，差一点忘了自己祖宗八代姓什么。在他告别鬼子离开据点后还放不下心，于是又一次踅回身来，一再提醒日本鬼子："太君，千万不能忘记了，一定抓紧点……"

白道峪村是一个有着 100 户人家的村庄，十团自来到密云后，这里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再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三面矗立着孟梁山、北山和东山．看上去，颇有点象倒扣着的鼎足。山上长满了荆丛和一簇簇野花椒树，此时，已泛上了层层绿色。白道峪村就座落在鼎足中间部位。爬上这三座山的任何一个山头，村中景物就会一览无遗，倘若分别在这三个山头各架上一挺机关枪，就怕连只耗子也休想逃掉。我们十团所以要选择白道峪村作为诱敌上钩的场所，用我当年的话说："就是因为他具备着以上这些优越条件。"

约摸半夜时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见 20 多个日本鬼子和 30 多个伪军幽灵似的悄悄地从康各庄据点爬出来，急速地径向白道峪村扑来。但是狡猾的敌人没有马上进入村庄，而是在村子的四周埋伏起来了。看来他们也是张网捕黄雀，专等着我区领导人进村后再动手了。可是，天拂晓了，天亮了，太阳快要升起来，农户房上飘起了袅袅炊烟，也没见到区领导人的影子。大概敌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也可能是在春寒料峭时节经不住这大半夜的折腾，于是纷纷从蜷伏着的地方爬起身来，一路哈欠进了村子里，将满肚子气使向老百姓，挨门逐户死劲地踢门，把全村大人小孩，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中央一块较大的平地上，由日军的小队长通过翻译给他们训话，进行反共宣传。其余的敌人，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在打瞌睡。

就在敌人扑向白道峪村的时候，我和冯克武、方城等人带着四

个连，分别埋伏于孟梁山、北山和东山。就在敌人冲进村子给老乡训话的时候，我用旗帜发出一个“打”的信号，就听那机关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为了不伤着老乡，我和吴涛指挥4个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来。敌人遭到如此突然猛烈地打击，不知所措，乱作一团。有的刚要反抗，我们的战士手起枪响，就一命呜乎了。二连副指导员尉贵福冲下山时，看到日本鬼子的机枪射手正欲瞄准我们部队射击，他飞脚踢翻敌人举枪毙敌，并缴获了机枪。战斗，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23个日本鬼子全部击毙，30多个伪军除了几名溜得比较早的外，3个被生俘，21名被击毙，我方则无一伤亡。

当太阳爬上山头的时候，我们组织部队打扫好战场，扛着刚缴获的两挺机枪，30多支步枪，两支短枪等一批战利品凯旋了。

敌人偷鸡未成，反蚀一把米。留在家里的日本指挥官暴跳如雷，指挥他的部下放火烧了白道峪村庄的所有房屋，并前往康各庄捉拿赵庆祥。正在家里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赵庆祥听说到白道峪村的鬼子全被八路军报销了，知道日本人轻饶不了他，于是鞋底抹油——溜了。

从此，我军在康各庄地区的工作异常活跃地开展起来了。

“一撮毛”山梁的围歼战

王 亢

在古长城以南，白河以东，有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梁，名叫驼骨梁。这架山梁顶部相当贫瘠，它浑身板结着一层硬硬的雨砂石，远远看去，就象钢铁炉里燃烧过了的炭屎，光秃秃的，不但没有树木，甚至连棵野蒿子都不长。偏偏在这架山梁的至高处出人意外地生长着一大丛荆条。于是，我们部队的同志就称它为“一撮毛”山。在这架山梁的北部西侧的山脚下，有一个近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名由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定，叫西驼骨村。由白马关通往密云县城的一条公路，蜿蜒曲折地从村子的西边而过。日本侵略军铃本部队朱狩中队的据点就设在这里。从西驼骨村爬上这架山梁，向南行走约摸三十来里下了南坡，再走不多远，就到了董各庄。这也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一个据点就设在这里。

朱狩中队与董各庄据点的敌人联系相当频繁，几乎是每隔三、四天就要去董各庄据点一次。朱狩中队在历次骚扰窜犯我根据地中心区时，虽没有遭到像哲田中队那种彻底覆灭的悲惨下场，但也迭遭我伏击，吃尽了苦头。以往它们去董各庄都是在大白天，从白马关通往密云县城的那条公路上走的，由于吃过我几次伏击的亏，不再走那条公路了，而是从驼骨梁翻上翻下。虽说苦些，但他们的心总感到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时间也都选在拂晓时出发，在董各庄吃过中午饭后，又沿着原路线返回。回到据点时，刚好夕阳衔山。朱狩中队的这一活动规律被我们掌握到了，于是，我们下决心吃掉它。为了不至于打草惊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识地减少在该地域活动，以使敌产生一种此地无八路军的错觉。

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和敌人活动的规律，断定，第二天朱狩中队又该到董各庄据点去了。我们决定就在这天吃掉它，地点就放在“一撮毛”南面不远处。这里的好处是大大小小的山丘星罗棋布，虽都低于驼骨梁，但便于机动。如择其几个主要的山丘设下伏兵，不但不会引起敌人怀疑，而且也易于我发扬火力，有效控制驼骨梁。于是，当晚我们召开了营连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先介绍敌情、地形等情况。周密地作出了合击朱狩中队的计划，指定了参战连队的位置，授予了战斗任务。

受领战斗任务的连队，情绪相当高昂。他们曾多次同日军较量，那种“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谁也不再相信了。而且在长期战斗中，大家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打仗，对手越硬，越有打头，胜了才有意思，才光荣。因此，当时就有人这样说十团“专拣鬼子打”。午夜刚过，同志们就已进入到各指定位置并严密地隐蔽好了。一连和三连隐蔽于驼骨梁西南的东白莲峪；特务连隐蔽于头道甸子，位于驼骨梁的“一撮毛”高峰不远的正南面；二连隐蔽于驼骨梁东侧的古石峪，构成了三面合击敌人之态势。为了防止战斗中残敌漏网逃跑，我又派出了特别小分队在战斗打响后机动于主要要道口。当地人民群众和自卫军紧密配合，自动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一切布置就绪，单等朱狩中队前来自投罗网。

第二天，狡猾的敌人似乎察觉到我们要收拾它似的，出发时间竟较以往提前了。待我侦察员爬上“一撮毛”山头时，敌已通过，直奔董各庄而去。天刚微亮，敌人就已进抵至头道甸子，刚好与隐蔽在这里的特务连顶了个正面。战斗首先在头道甸子打响了。在东白莲峪的一连和三连，也迅速投入战斗。二连也赶了上来。这样，特务连顶头截堵，一、三连和二连从左右两侧猛烈射击。慌乱中的敌人拼全力只顾对付正面的特务连和西面的一、三连。但也有十几名敌人一看形势不对头，早把“武运长久”的鬼话抛到九霄云外，趁混乱之际溜之乎也。恰逢我二连趁机从敌之东侧包抄上来，断其

退路，并组织人对逃跑之敌追歼，与敌激战。敌人极力寻找依托和隐蔽物，企图继续顽抗，怎奈这山梁光秃秃地啥也没有，他们完全暴露于我枪口之下。不多久多半被我击毙。朱狩中队长像条被打急了的疯狗，左蹦右跳，带着七个人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可是，当他们刚逃出了东白莲峪沟口，转身向白马关逃窜时，脚还没有踏上公路，恰逢我团政治处主任吴涛率三营八连前来接应，封住了他们的逃路，经过一阵激烈的交锋，朱狩及其残部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被击毙。

太阳当午时，战斗胜利结束。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五十六具尸体，我缴获敌轻机枪四挺，步枪数十支，手枪三支，望远镜三架及掷弹筒、战刀和弹药等。我牺牲参谋李瑞徵以下十五人，伤副连长以下三十七人。被我生俘的一名敌掷弹筒兵，在我军释放他时，他怕空手回去被杀头，求我交还他的掷弹筒，以表明他是突围出来的。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使他非常感谢，临走时特地深度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

转变局面的两场战斗

——忆夜袭敌帐篷群和古石峪战斗

王　亢

1942 年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也是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自 1940 年开创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作为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丰（宁）滦（平）密（云）地区，这时也从 1941 年的发展、巩固的“黄金时期”进入到异常艰难的时期。敌人采取“集家并村”和“三光政策”把当地老百姓逼进“人圈”之后，在军事上又调兵遣将，不断袭击十团部队，企图分割我十团部队与当地老百姓已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从 1941 年底开始，我们十团不得不化整为零，除留一小部分坚持丰滦密游击根据地，支持和配合丰滦密联合县政府领导当地人民群众斗争外，主力跳到外线去作战。在此情形下，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丰滦密联合县政府不得不把办公地点搬进深山，住在密云县白河西岸黄花顶山的牛盆峪村西北方，属东西走向的一架山梁的阳坡处即臭水坑。

1942 年 4 月 8 日，伪满洲军三十四团集结大水峪、琉璃庙等处据点约 600 名兵力，也有人说有 1000 多人，其中还有日本鬼子 100 多人，对驻于臭水坑的我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和十团的后勤机关，进行长途奔袭，使我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敌人以为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已经被消灭，十团已经被打垮，丰滦密地区抗日游击力量已不足为道了，只要再稍加“清剿”一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除心头之患。于是伪满洲军、讨伐队，现在也突然神气十足起来了。“臭水坑事件”之后，又由于我跳到外线活动的部队一时未能收拢，未能给敌以沉重打击，于是它们便大摇大摆地搭起帐篷群住进山区。对我坚持内

线斗争的十团部队、游击队不分昼夜地实行驻剿，杀害我无辜群众。敌人这一举动不但给我恢复地区的斗争造成了极大妨碍，而且对当地群众的心理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

为激发军队和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我们除了积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不要被敌人一时的、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同时也在认真考虑必须给敌以沉痛教训，打击它们的嚣张气焰，给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的人民群众以鼓舞。

于是，8 月中旬的一天凌晨两点，我们在完成护送去冀东干部的任务后，我指挥团侦察连，请当地老乡当向导，在树木、荆蒿掩护下，顺着山沟悄悄摸向驻于二道沟西北平台的敌伪帐篷群。在行动前，我一再提醒大家，如果碰到敌哨兵问话，就说是自己人。假如敌哨兵开枪，我们不准开枪，以最快的动作迅速接近敌帐篷群后再猛烈开火。敌人前卫哨发现我军竟然连枪也未敢放就吓得抱头鼠窜了。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同志们更是格外振奋，按预定计划迅速扑向了敌人帐篷群，以集束手榴弹和猛烈的射击打向敌帐篷群。

睡在帐篷内的敌人一听枪响，早把白天欺辱老百姓的那份神气吓到“爪哇国”里去了。混乱之敌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被击伤，哭爹叫娘，如惊鸟兽散，跌跌撞撞四散逃命。

敌人遭此夜袭之后，便撤除在山里实行驻剿的帐篷群，而且从那以后，敌人也不轻易进山“搜剿”和出袭我军了。而我们却针对敌人烧房和“集家并村”的恶毒手段，从北平城买来花旗布，制作成帐篷，住到深山里，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敌人见此，知道已无法奈何十团了。当地人民群众更相信，黑暗只是暂时的，从而也进一步坚定了胜利信心。

10 月 14 日，我和吴涛政委又得到一个确实的情报：密云县的半城子和石匣两个据点的日军计 100 多人，“扫荡”到古石峪村，正丧心病狂地放火烧民房。接到情报后，我和吴政委立即决定以最快速度收拢活动在附近的一、三连和侦察连，扑向古石峪村，对“扫

荡”烧房之敌狠狠打击。

古石峪村座落于密云县城东北面的群山之间，有50来户人家，村前有一条小河，其源头由七山顶、驼古梁两座大山渗出的泉水汇合而成，经古石峪径向半城子、兵马营方向流去。这里的土地虽然不多，好在山不秃，又有水源，群众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房子也大都是由砖瓦盖成。在那兵慌马乱的年月，这里的人不能不算是一种幸运了。可是凶残的日本强盗却将它付之一炬。

当我和吴涛政委率领部队分别由北面、南面和西面赶到古石峪时，远远就听到村民们一片凄惨的哭叫声。此时此刻，干部战士真是怒火满胸膛。根据地形、敌情，我与吴政委当即向各连下达了作战任务：一连和三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面扑向敌人，侦察连迅即占领村南山的制高点并担任警戒和打援。

战斗打响了，一连和三连与日寇进行激战，狡猾的敌人边战边从村内向村外的东南山退去，抢占有利地形与我顽抗。见此，我立即命令一连长周德礼抢占东南山，周连长即令一排抢占东南山，二排以强火力压制并迟滞敌人行动。三连在连长王金玉率领下勇猛地冲向敌人，王连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一连一排抢占东南山时，由于道路选择不当，绕道太远，再加上那天刮着东南风，烧房子的浓烟遮住了我在西面和北面的一连、三连视线，敌人趁机抢占有利地形，与我作拼死顽抗。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敌人于黄昏时被迫撤走。

此战我共击毙日军南岛中队长以下80余人，截获敌人抢来的粮食70余驮，缴获机枪一挺，步枪50余支，战刀一把，望远镜和照相机各一架。我牺牲连长王金玉以下10多人，伤10多人。

此战虽未能将敌人彻底消灭，但歼来犯之敌大部。胜利消息传出，丰滦密地区的人民群众舒心地笑了。他们看到，尽管敌人眼下还很凶狂，但我八路军照样还在游击根据地，照样消灭敌人。

打这以后，斗争虽依然残酷，但是人民群众已从悲观失望的情

绪中振作起来了。他们决心和十团一起，以更加英勇的斗争去改变目前的不利形势。



古石峪战斗纪念碑

“老十团”歼灭特务队

郑伯仑

十团歼灭日本特务队，是刘勇侯带队执行的战斗任务。

刘勇侯，人称“刘疤瘌”，他是当年冀东大暴动组织发动人之一，曾任冀东抗日联军大队长，后来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来到平北，任八路军十团供给处主任。

1943年夏天，日本特务队四十多人到走马庄村抢粮食。这彩敌人是手枪队，一水骑着自行车。进庄后，又打枪，又吆三呼四，气势汹汹，翻箱倒柜，牵牛赶羊，抓鸡撵鸭子，要吃要喝，用枪逼村干部为这彩匪徒准备了好几桌酒菜，他们胡吃海喝。

这些汉奸特务，多次下乡抢劫，害得乡亲苦不堪言，十团决心彻底消灭他们。这次他们去走马庄抢劫，十团事前得到了情报。当时十团住在北白岩和尖岩村一带，消灭这彩特务是个好机会，团首长把任务交给“刘疤瘌”。

老刘接受任务后，到各连队借来30支手枪，挑选出30名精壮战士，组成临时战斗队。这些战士化装成老百姓，腰别短枪，悄悄地赶到了走马庄村头。

特务队到走马庄才一个多钟头，村外就出现不少本村不常见的人，有的挎着粪箕子捡粪，有的拿着镰刀给牲口割草，还有的蹲在地边子上割草，眼睛却不时往村里看。

特务队岗哨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就跑回村去报告。特务队长三盅酒还没下肚，听到报告当即就警觉起来，马上下令撤退。特务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跨上车就跑。一出村头，被十团战士打个正着。

乒、乓两声枪响，先撂倒的是两个车后坐子上绑着鸡鸭的特务。接着青纱帐里射出了密集的子弹，特务倒下一片。有十几个特务跑得最快，领头的是特务队长，转眼间出去一里多地了。

这些特务要漏网，情况十分紧急。

“刘疤瘌”钻出庄稼地，登上一个土包，乒地一枪，特务队长一个狗抢屎栽下了车。接着举起两只大肚匣子枪，左右开弓，啪、啪、啪，十多个特务都毙了命，一个也没跑了。

不足五分钟，战斗就胜利结束了。“刘疤拉”把两只手枪往腰里一插，命令战士们去打扫战场。这次战斗缴获 41 只手枪、41 辆自行车，八百多发子弹。之后，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骑着自行车，转移到了五区溪翁庄村。

南香峪伏击战

吴广祥口述　孙明舜整理

吴广祥是1942年11月参加革命的，原在八路军老十团当战士。他向笔者介绍了南香峪伏击战的情况。

他说：1944年日本鬼子已成为秋后的蚂蚱，但仍负隅顽抗，日本讨伐队对我丰滦密根据地仍进行疯狂的扫荡。

1944年早秋，日伪讨伐队共200多人，从半城子扫荡归来。我十团事先得到情报，便派一连和四连在扫荡归来必经之路南香峪村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设下埋伏。上午10时左右，日伪军带着从根据地抢来的粮食和牲畜，大摇大摆地走在公路上，有的伪军手里还提着包袱。我十团战士见敌人进了伏击圈，便要开火，细心的一连长忙制止了大家。原来狡猾的日本鬼子令伪军和抓来的驮伕在前面给他们蹚雷。我军根据情况放过了伪军和驮伕，等鬼子进了伏击圈后一齐开火，机枪步枪子弹象雨点般扫向敌人，手档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侥幸没挨着子弹的便拼命逃跑。这一仗，我军仅用20多分钟便结束了战斗，打死打伤敌军6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40多支，而我军无一伤亡。

最后他说“此战虽未能全歼敌人，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平北丰滦密的抗日功臣王振东

曹友林

密云西部山区，是平北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为坚持和发展丰滦密地区抗日斗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王振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原丰滦密五区队参谋长王振东

王振东，河北省饶阳县人，出身于雇农家庭。1938 年从北平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平西，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丰滦密之前，历任宣涿怀联合县游击大队长、平西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冀热察挺进军九团五连连长、挺进军司令部参谋等职。1941 年 8 月，由于原丰滦密联合县游击大队已升编为十团二营，王振东遂奉命来丰滦密重建县游击队。9 月，王振东来到密云，将区级的白河游击队、汤河口游击队和县政府警卫队合编为新的丰滦密游击大队，番号为平北游击总队第四大队，王振东任大队长，下辖一个中队，共 80 多人。

第四大队刚组建起来，丰滦密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就开始急剧恶化。1941 年 10 月 4 日，伪满洲国和华北地区的日伪军联合对丰滦

密发动了持续60天的万人大“扫荡”。他们采用“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等各种新战术，反复对山地进行“清剿”。在险恶的环境里，王振东带着四大队利用山地巧妙地与敌周旋，每天几乎都要与日伪军遭遇多次，先后被包围过20余次，每次都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化险为夷。一天晚上，他带领游击队摆脱敌人追击，来到骆驼南沟这个仅有3户人家的深山小村，准备睡上一觉，解解多日的劳乏。刚睡下，突然又被一阵枪声惊醒。王振东借着月光向外观察，只见门口的岗哨已倒在血泊里，日军和伪满军形成左右两个扇子面正向小屋逼近。王振东临危不乱，抽出匣枪一阵点射，吓得敌人都趴在地上。乘此机会，他指挥战士奋勇冲出门去，首先向左边的日军投掷手榴弹，当敌人纷纷伏身躲蔽时，又突然向右边的伪满军冲去，杀开一条血路，突出包围。就这样，尽管敌人的万人“扫荡”给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造成很大损失，但第四大队却由于王振东的灵活指挥而顽强生存了下来，成为以后坚持和恢复丰滦密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万人大“扫荡”，给丰滦密根据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日伪通过实施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和烧光、杀光、抢光、片光的“四光政策”，制造了面积达3600平方公里的山地“无人区”，用一道长180华里、宽3.6丈、深1.6丈的“治安沟”和碉堡线切断了山地与平原的联系，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并继续以6000兵力频繁对山地进行“肃清扫荡”，妄图彻底摧毁丰滦密，困死抗日军民，肃清“无人区”。面对如此艰难险恶的环境，王振东毫不动摇，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坚贞气节。他带头响应丰滦密县委发出的“坚持下来就是胜利”的号召，带领四大队誓死不离山，咬牙坚持“无人区”斗争。没有吃的，就吃野菜树叶；没有房住，就住窝棚、山洞和长城楼子；缺乏弹药就通过战斗去夺敌人的。1942年4月8日臭水坑事件发生后，由于沈爽县长等许多军政干部牺牲或被捕，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到处宣传“抗日政府被消灭了”，山地群众不

明真相，情绪受到打击，许多人发生动摇。王振东执行县委指示，立即带四大队走村串户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到处张贴政府布告安定民心，对稳定山地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平原地区的日伪汉奸活动猖獗。以康各庄大编乡的伪联庄会和警察特务为例，他们倚仗村里有日军和伪警备队据点，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疯狂残害我抗日人员家属，害得百姓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王振东闻知怒火万丈，决心突袭康各庄，把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抓来惩治，杀一儆百，煞一煞平原日伪的嚣张气焰。1942 年 8 月 26 日夜里，王振东以青纱帐作掩护，带着四大队偷偷越过封锁沟，潜入康各庄村外。派两个班分别看住日军和伪警备队炮楼，然后指挥部队分成几个组悄无声息地跃进护村土墙，向各自的预定抓捕目标摸去。王振东亲自负责打开南栅栏门，准备退路。他带着一名通讯员向南门摸去，突然有一个人迎面走来，见到他们后扭头就跑，通讯员立刻追了上去。王振东独自摸到南门，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头劈开栅栏门，进入村内。刚走不远，旁边院门一响，从一家民宅里走出一个伪军，冲着王振东嘻嘻直笑。王振东明白，这是敌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了，他毫不犹豫，一把揪住敌人的脖领，低声喝道："别喊，我是八路军！"伪军吓得直哆嗦。王振东又问："院里还有谁?"伪军结结巴巴地说："有……有我们小队长。"王振东以伪军的身体作掩护闯进院子，听屋里有敌人的吵嚷声，他放了手中的伪军，一脚踹开了屋门。屋里烟气腾腾，共有 7 个伪军或站或坐的盯着一副麻将牌，几杆大枪立在墙角。王振东大吼一声："不许动！我是八路军！"就象晴空响个霹雳，把敌人全吓呆了。忽然，伪军小队长偷偷把手伸向身旁的手枪。王振东眼急手快，举枪就打，将敌人挨个点了名，又顺手抄起 4 杆大枪，出了院门。枪声一响，康各庄的敌人炸了营。伪警备队想出炮楼看看，被我战士一顿排枪打了回去。鬼子因不明虚实，没敢出炮楼，只是胡乱打枪。顿时，机枪步枪响成一片，子弹曳着又长又亮的尾巴在夜空中乱

窜。乘着混乱，我军分别抓了伪大乡长、伪警察分局长等几个汉奸，从南门安全撤出，回到山里。这次夜摸，有效地震慑了日伪汉奸，平原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奔走相告：“八路军又回来了！”

1942年秋，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缓解根据地的严重生活困难，丰滦密联合县抽调40多名地方干部和两个加强排的兵力组成武装征粮队，由王振东带领，到平原区征收秋粮。王振东虽深知孤军深入平原区征粮危险很大，困难重重，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充分准备，一天夜里，王振东率队出发了。他们从白道峪越过封锁沟，绕过康各庄、西田各庄等几个据点，跨过平古铁路，午夜时进入距密云县城仅10华里的河漕村。先封锁住村庄，然后找来伪保长，召集百姓进行宣传动员。平原百姓身在敌占区，心向八路军，纷纷把最好的粮食拿出来，很快装满了几十个牲口驮子。拂晓时，忽然发现200多伪警备队从密云向这里奔袭而来。王振东当即命令地方干部押着牲口驮子先走，亲率两个排埋伏在村西南的玉米地里，待追敌到跟前，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扔下一片尸体狼狈逃回县城。随后，征粮队又进入疃里村和西田各庄村征收公粮，到中午，共征粮200余驮。这么多牲口驮子，排起来足有一公里长，要在白天通过平原敌占区，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征粮行动已被敌人发觉，不马上运回山里，危险将更大。王振东当机立断，以一个排断后，亲率一个排在前开路，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闯过敌占区，把粮食运进山里。行至卸甲山附近，果然遇到西康各庄据点日军的拦截。王振东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勇猛地扑向敌人，经过一阵激战，终于将日军击溃，打开了道路。征粮队继续向北疾行，黄昏时在十团的接应下越过封锁沟，安全回到山里。

1942年底，鉴于丰滦密的平原区工作已被敌摧毁，地区干部有的被捕被杀，有的叛变投敌，为恢复这一地区，决定由王振东兼任平原六、十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王振东化名晨钟和王奇，带领一

支16个人的精干的武工队，每人都配备步枪、手枪、手榴弹三种武器，深入平原区活动。这时的平原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日伪为防止八路军到平原活动，不仅组织了遍及各村的情报网，强令各村保甲自卫团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我军就鸣锣呐喊，而且强迫百姓领取“良民证”，在各路口设哨卡，严查过往行人。针对这种形势，王振东采取白天隐蔽夜晚活动的办法，他们白天专门到伪乡保长家里吃住，这样既免得连累百姓，又控制了伪乡保长使之不敢告密。王振东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努力争取伪职人员和上层分子，同时采取果断行动，连续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警察特务和忠心事敌的伪保甲长，对敌伪震动很大。从此，三三两两的特务不敢单独公开活动了，伪保甲长纷纷要求与我重建联系。在此基础上，王振东在许多村建立了秘密联络点，进而又建起两面政权，并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王振东还通过工作，争取和控制了许多村的伪保甲自卫团，使之为我办事。由于自卫团成份复杂，不太可靠，王振东又在一些村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其成员都是从伪自卫团中挑选出的真心抗日、胆大、可靠的青年，负责为我送情报，监视敌人，秘密站岗带路等。其后，又在山边和平古路北的平原村建立了秘密爆炸组，开展隐蔽地武装斗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平原六、十区的工作得到恢复，敌一面村大部分变成了两面村，我工作人员不仅能开展工作，而且又可以住在平原村庄了。

1943年5月，为适应反蚕食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丰滦密地区队，王振东任参谋长。11月，丰滦密由平北划归冀东，丰滦密区队也改名为冀东第五地区队（简称五区队），王振东仍任参谋长。这期间，王振东运用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协助区队长师军策划和指挥了多次战斗，均取得胜利。1943年底的一天，伪满刘翰讨伐大队进犯丰滦密中心区，烧杀抢掠，破坏我地区恢复工作，当夜宿于赶河厂村。师军和王振东经过研究，决定吃掉敌人。当晚五区队三个连隐蔽运动到赶河厂村外，王振东亲率一连从北面担任主攻。为保

证进攻顺利，首先必须夺下由一小队敌人据守的北山制高点。王振东脱掉鞋，命令尖刀排也都脱掉鞋，上好刺刀，握着手榴弹，随着他迅速向北山上摸去。敌哨兵在山头上瞎咋呼，王振东示意战士们别上当，继续在夜幕掩护下向上摸。直到接近山顶时，敌哨兵才发觉，刚要鸣枪报警，被王振东抬手一枪打倒。枪声就是命令，我军机枪突然开火，紧接着一排手榴弹又投上山头，山上敌人未打一枪即死伤大半，残敌也全部死在我军刺刀下。攻下北山后，王振东派一个班守卫制高点，又率领一连分两路杀进村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北面枪声一响，二连从村西北角插进村里，三连也顺着村东北的山沟向村内冲来。敌人顶不住我三路冲击，刘翰带残兵仓惶向东北突围，遭我三连迎头痛击，又掉头向东南逃窜，被我军斜插包抄过来截获大部，刘翰仅带少量残兵抢渡白河逃脱。这一仗，共毙俘敌170余人，缴轻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

1944年，丰滦密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抗日力量越战越强，日伪兵力却更为不足。这年麦收，由于五区队和游击队自卫军加紧围困敌人，大多数村庄也拒绝向敌人送小麦，敌人得不到粮食，又恨又急。7月14日，密、怀、顺三县日籍顾问犬养毅和密云县伪督察长张晓舟亲自带领一小队日军、一中队伪军及密云伪县政府官员等共120余敌人，携九二式重机枪一挺，前往董各庄一带抢麦。师军和王振东闻讯后立即研究制定了一个伏击计划，率3个连急行军赶到董各庄村南埋伏下来。但是，狡猾的敌人行至半路突然改变计划，转头奔向大清水潭村。师军和王振东又立即带五区队变伏击为奔袭，傍晚时追至清水潭村，兵分三路，乘敌不备从村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王振东亲率二连由村西南冲入村内，正遇上伪督察长张晓舟带着部分伪军、伪官员向村西逃窜，当即将他们截住，王振东亲手擒获了张晓舟这个作恶多端，人人痛恨的大汉奸。中午，战斗胜利结束，除少量日伪军逃脱外，共毙日伪

军 50 多人，俘三县日本顾问、伪县督察长、伪县警备队长等共 26 人。这一仗不但粉碎了敌人的抢麦阴谋，而且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密云县日伪政权组织，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此后，敌人再不敢贸然出外抢粮，只好靠从其他地区运粮以维持供给。王振东又带着部队寻机打击敌人的运粮队。8 月的一天，王振东获悉大水峪据点伪满军押着几辆马车去怀柔县城取粮，便带着两个连埋伏在大水峪村南公路两侧的高粱地里，等侯敌人。下午三时，敌人从怀柔回来了，但情况有变，不是押着马车，而是开着三辆汽车回来的。汽车来得太快太突然，还没容我军反应，便迅速穿过伏击线，来到王振东的指挥位置前。王振东深知战机稍纵即失，虽然身边只有一挺机枪和几个通讯员，他还是果断地命令机枪手："打，截住敌人!"机枪开火了，但只响了两下竟卡了壳。王振东急了，挺身站起，左右手同时扔出了两颗手榴弹，通讯员也跟着站起投弹，相继在第一辆汽车前面炸响。头辆车一打横停了下来，堵住了路。押车的伪满军作梦也没想到会在家门口遭到袭击，吓得魂飞天外，争相跳车向大水峪逃跑，又被王振东指挥机枪迎头截住。这就争取了时间，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战士们迅速冲出来追击敌人，仅 10 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毙日本教官一名，俘伪满军 20 余人。由于这里西距汤河口据点、东距康各庄据点都不足 4 华里，又在大水峪据点的眼皮底下，所以王振东命令战士烧毁了 3 辆汽车和粮食，而后迅速消失在青纱帐里。经过这次打击，敌人更加恐慌，只得派重兵保护运粮。

1945 年 1 月，王振东调到八路军十三团，任副团长兼参谋长，继续战斗在密云和平谷一带，直至日本投降。

学习刘勇侯

——十团大破“无人区”

王　亢

丰滦密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迅猛发展，广大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杀倭寇的大好形势，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该地区的敌伪统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扫荡”，不但未能扑灭该地区人民的抗日烈火，反而越烧越旺。于是，日本侵略者使出了更其凶残毒辣的一手，即对伪满洲国的边沿地区和大片靠近河北平原、山丘地带制造“无人区”。就是强迫群众集家并村，住到敌人认为便于控制的指定地点，然后又强迫群众在四周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两个或三个小门供限时出入，而每次出入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和搜身。每个门上都设有岗楼，围墙的四角设有四座炮楼，这样，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都完全置于敌人的



原八路军十团供给处处长刘勇侯

枪口之下。人，一旦进入到这里后，即失去了生产、生活、交往、言论和一切行动的自由，只能像畜牲一样任敌人役使和宰割。又由于这里的居住条件极差，住房都是用树棒支搭的草棚，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草棚里全家七、八口人或儿家人吃住在里面，冬天寒风满屋，夏天蚊蝇纷飞，不少人被冻死或生传染病而死。因此，老百姓都痛恨地叫它为“人圈”。

一九四一年十月以后，日本侵略者集中重兵，多层次、多梯队、接连不断地不分昼夜对我根据地和八路军经常出入活动的地区进行了所谓“穿梭式”的极端凶残、野蛮的“扫荡”后，随即在几个主要的据点，诸如古北口据点、密云城据点、南口据点、四海据点等十多个地方增派兵力，紧接着就用刺刀和大炮强迫群众集中到东起半城子，西到渤海所，南自白道峪，北到于营子，方圆一百二十里内，包括十五个村镇在内的“无人区”。继则又从北起雕鹗山，南至北山边，西至长安岭，东至白河堡这一片地区也挖了封锁沟，垒起了封锁墙，用刺刀逼迫老百姓从世代居住和生活的村庄迁进“人圈”。把原先的村庄放火烧掉，墙推倒，变为平地，形成“无人区”。倘若有谁胆敢违拗，“格杀勿论”！仅二十七日一天的工夫，日本侵略者就把半城子、阳坡地、西驼古、栗树园等村庄全都变成了废墟，好几百名男女老幼像羔羊一样被驱赶进“人圈”。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可是却遭到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杀害。井儿峪、朱家峪、石湖根等村，先后就有三十七人被敌人捉住后，推入地窖用手榴弹炸死和用机关枪扫死。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敌人推行的“无人区”计划完成后，宣布“人圈”之外十里范围内允许耕种，但不准许居住，即为“无住地带”。“无住地带”十里之外，既不准许居住也不准许耕种，即为“无住禁作地带”。妄图以此实现其“民匪分离”的险恶用心。敌人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大片田园、耕地荒芜，而且初始也确实给我们军队的活动造成了相当的困难。我们那时常说：八路军缺什么都不

怕，就怕缺群众。有了群众这样的水，我们方能够像鱼一样自由活动。群众被敌人“围”起来，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白天黑夜都不得与他们接触。与此同时，敌人又经常进山“搜剿”我们，常常搞得我们吃不好、休息不好。敌人还在通往山地的各主要交通线上设置关卡，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停止口内口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一切出城物资不经伪县长、伪警察局长批准，发给“出入物资搬运证”者，轻则罚款，重则以“通匪”罪予以杀害。在山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和不愿进“人圈”逃进深山里的群众，失去了衣食来源，还得天天跟敌人周旋、躲藏。因此，已经开辟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要想坚持住，部队在丰滦密这个地方，要站得住脚跟，就非得掘开“堤坝”放“水”，将“无人区”变为有人区不可，就非得有人进入敌占平原区之村乡镇筹措粮秣和生活必需品送进山里来不可，就非得总结并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与敌斗争的新经验、新办法不可。而在这一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应该首推十团供给处刘勇侯同志。

刘勇侯是有名的冀东大暴动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是王仲华同志领导下的冀东抗日联军中的一名大队长。后来，由于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他随王仲华同志来到平西，当了十团供给处主任。他勇猛过人，每次打仗，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冀东大暴动后的一次战斗中，他只带着少数几个人向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发起冲锋，打败了敌人，可自己脸上却挨了敌人一刀，留下了一块很大的伤疤。与刘勇侯常来往较为熟悉亲热的同志都半开玩笑地称他“刘疤瘌”。他来到丰滦密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他英勇无畏，足智多谋，常常手使双枪活动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尤其是他活捉了甘为日寇鹰犬的汉奸武装特务、被当地人称为土匪李小五，并将其绑于密云县城附近的电线杆上枪毙后，刘勇侯在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中更富于传奇色彩。身为十团供给处主任的刘勇侯看到同志们在瑟瑟寒风中穿不上衣服，住不上房屋，吃不上饭，空着肚子与敌人作战，一些伤病员由于没有药品得不到治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伤口在

流血、溃烂，看着他们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直至死去，他的心难受极了。这个刚强的汉子常常为此着急。是啊，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骁勇顽强，可是，他们却不是倒在血与火的冲杀中，而是倒在没有药品保证的病床上，对于一个负责物资保障的人来说，难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为痛苦吗？为了迅速改变这一局面，他决心闯到敌人的心脏里面去，到敌人最放心的“模范治安村”里去，到密云县城附近的平原区的几个较为富裕的乡村里去。于是他向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的方案。

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这在当时敌人实行的白色恐怖活动异常严重的时刻，领导上不能不为他的安全担忧，可是刘勇侯却坚定地表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关系到根据地和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军民生死存亡的时刻，个人担一些风险算啥呢？不入虎穴，抓不住虎仔，我即便不成功，也要为以后的斗争留下经验教训。面对着这样一位久经锻炼和考验的老战士，领导上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专门在十团里挑选了四、五名精明强干的同志配合他一起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身佩长短枪两至三支，腰上藏着四枚手榴弹，经过了一番化装，出发了。

在密云城外西北不远处，有一个村庄叫大唐庄，既靠近平古铁路，又靠近密云县城。这里的乡、保长历来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死心塌地甘为敌人效劳。敌人对他们也格外信任。刘勇侯一行首先冷不防来到了这个村的乡长和保长家里，公开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并严肃地声明（其中不乏威胁）：如果不肯帮忙，可以去报告敌人，不过那样一来人民将来不同意，二来他们的家眼下也就只好做为战场和坟场了。一看这阵势，这些乡、保长们，欲反抗不能，欲报告，又怕真的毁了全家，万般无奈，只得接受条件。就这样，刘勇侯等人不但解决了吃住问题，而且得到了较为稳妥可靠的“保护”。他们在乡、保长家住下后，乡、保长惟恐有人走漏风声，株连自己，威胁群众不得乱传，同时每当遇到敌人突然闯来时，乡、保长

及其家人也都想尽一切办法支应敌人。就在刘勇侯在大唐庄乡长家住下不几天的一个中午，刘勇侯与大乡长正在商量筹粮和医药品时，冷不防来了几个串门子的敌人。大乡长一时吓得六神无主，可刘勇侯却谈笑如常，镇定自若（但暗地里已作了应变的准备）。看到刘勇侯这样，惊慌中的大乡长也渐渐地镇静下来了。支应敌人走了后，这位大乡长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刘先生大智大勇，大勇大智，了不起！了不起！”不多久，大乡长和保长们按照刘勇侯的要求，很快就筹集到了一批粮食、布匹、棉花和医药品，连夜送到了山里。刘勇侯还让乡长和保长们尽快为山里部队和群众做鞋子和棉衣，他们也都极快地做好了。冬天，我山里部队和群众睡觉，要搭草棚、垒炕。由于天冷，不得不用烧饭的大锅烧热水和泥巴，可是，房子这边垒好了，那边敌人进山搜剿时就将其烧掉、毁坏，刘勇侯就叫乡长和保长们派人去北平城和天津购买花旗布，送到山里，用这些布做帐篷。有了帐篷可就方便多了，晚上睡觉时，将帐篷一支，下面挖个地炕就行了，敌人来搜剿，帐篷一收就转移，他们什么也捞不着。弄得当时日本侵略军莫名其妙：“八路军的帐篷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刘勇侯以大唐庄为基点，又逐步向周围活动和发展，都获得了成功。当时，刘勇侯不但让这些乡长、保长们为山里部队搞到了粮食、布匹、食盐、医药用品等，还搞了不少子弹。由于经常要同敌人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很大，这些乡、保长们就通过平、津城里的掏粪夫，将买到的子弹用油布包好，放进粪篓里，躲过敌人层层检查，送到山里。在山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和群众困难局面好转了。但是，刘勇侯等人并不满足于这些，他们在利用乡、保长为我筹措粮秣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民族气节教育，尽量争取这些人转变立场、感情，由被动地为我们做事变为主动地为我们办事。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好些乡、保长都被争取过来了，原先不少倾向敌人的一面政权，逐渐变为两面政权直至完全变成倾向于我的一面政权。日本侵略者挖空心思制造的那道所谓

"民匪分离"的藩篱被逐步摧毁了，侵略者做梦也不曾想到，就在它的眼皮子底下，多年来精心培植起来的人正在披着他所给予的那张"皮"较为顺利地为八路军和游击队办事情。

刘勇侯同志创造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为了打破"无人区"，我们就采取了刘勇侯同志的做法，把就地坚持斗争的几个连队化整为零，组成三、五个人一个小组，配合地方干部，化装成下田劳动的农民，于每天拂晓前住进大乡长或保长家里，晚三、四点钟时出来，走村串户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筹粮筹款活动。这时即使敌人知道了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因为天快黑了，夜晚是我们的天下，敌人怕吃亏，所以一般不敢轻易下乡。开始工作也并不那么好做，由于斗争太残酷，原先的不少区干部和村干部惨遭敌人杀害，一些当地基层干部经受不住长期恐怖生活煎熬，失节自首了，不少"人圈"的村政权性质发生变化，不少群众感到前途渺茫，对斗争失去了信心，因此，当我们开始与群众接触时，一些人冷淡，一些人回避，那些乡村干部（大都自首了的）虽不去报告敌人，但远远地躲着我们。此时此刻，我们非常理解群众的心情和一些村干部（包括不得不自首者）的苦衷和处境，觉得不应该难为他们。可是，"人圈"里群众那一张张焦黄憔悴的面孔，那一个个衣不蔽体的身影，却使我们心痛难忍。

原来，敌人为了牢牢控制老百姓，"人圈"里完全实行配给制，说是每人每月食盐半斤，火柴一盒，布三尺，煤油每月每户半斤……。但由于各级层层尅扣、扒皮，实际上到老百姓手里时已经微乎其微了。有的人实际上只拿到九寸布，不少人家几口人合穿一条裤子，偌大的姑娘衣不遮体，许多人常年吃不饱饭，吃不上食盐，生了浮肿病，饮恨而亡。"人圈"里的老百姓真是苦到了极点，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人圈"里的老百姓比黄连还要苦三分。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部队下去的工作人员常常给"人圈"里的老百姓捎上一些食盐、布匹和治病的药品，不少老乡拉着工作组人员的手，

泣不成声地哭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并说：“八路军没忘记我们哪！”从此，老百姓中悄悄地传开了：“八路军没走，十团就在我们中间呢！”于是，苦难中的人们脸上有了笑容，死气沉沉的“人圈”里的老百姓们开始雀跃了，他们高兴地说：“我们重见天日，又有希望了。”

为了解除“人圈”里老百姓们的苦难，为了打破敌人制造的“无人区”的阴谋，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就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人圈”里的群众逃离“人圈”，动员他们回归山里，回归乡土。回来的人缺吃少穿，就以政府名义对他们实行救济，并发给他们种籽，号召他们多种地。还向群众明确宣布：归山种地“既不向敌人纳捐税，也免抗战粮款负担。”逃离“人圈”进山后的群众，政治上自由，生活上比“人圈”里强多了，冷暖安危有人问，人人心情舒畅，这么一来，吸引了更多“人圈”里的人逃离了“人圈”。虽然敌人采取了不少措施，甚至用枪毙和杀头来阻止老百姓逃离“人圈”，但人们仍然像山洪爆发一样，纷纷逃进山里。进山的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抢种了大片庄稼。可是，正当庄稼刚要成熟时，敌人又进山“割青”。但是，群众并不气馁，割了“夏季”种“秋季”，割了“庄稼”（指没成熟的谷物）就种蔬菜。敌人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我抗日政府对回归山里的农民同八路军一样，只要部队有吃的，这些农民就饿不着。那时老百姓都说：我们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一家子。

制造“无人区”，这是日本侵略军侵入中国屡遭失败后“发明”的一大绝招，它把这一绝招从当时的伪满洲国搬到平北，搬到丰滦密地区，可是却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们将“无人区”变成有人区，这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工作。在我丰滦密地区，在我十团，在打破敌人这一阴谋的斗争中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常说这是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而在我们丰滦密地区担任活剧导演的，是刘勇侯同志。今天，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历史，理当由当初做出过巨

大贡献、且在人民群众中流为美谈且有传奇色彩的刘勇侯同志来完成，可是，他已经于一九八〇年因病溘然长逝了。因此仅就我所知道的，把它写出来，一方面了却多年宿愿，另一方面，也算作为对刘勇侯同志英灵的告慰。

“崔瞪眼”三进密云县城

佟启兴

“崔瞪眼”，名叫崔如海，是密云县番字牌乡离休干部。要知道这个绰号的来历，还得从1942年说起。那时，他在八路军老十团当侦察排长，经常孤身一人，入敌营，查敌情，除汉奸，抓特务。见人说话多会儿也是瞪着两只大眼睛。从此，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崔瞪眼”。

崔如海同志目前在密云县光荣院安度晚年。他是1940年2月参加革命，1982年离休。他虽然年迈体弱多病，记忆力差，但提起三进密云县城的事，却记忆犹新。

一进县城要“大洋”。1941年秋，他所在部队在密云北部山区张家坟一带活动，缺少给养。部队派他出外“化缘”。老崔接受任务后，心里想：现在老百姓经常饿着肚子过日子，哪来的钱呀？他在发愁之中，忽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伪县长有钱，找他去。于是，他化装成农民，把手枪揣在怀里，爬山涉水，走了70多里路，直奔密云县城去了。走到城东门，日本特务站岗把守得很严，他混在赶集的人群里溜进了城。

他大步流星地来到县衙门口。“你是干什么的？”门岗拦住他。“我有重要事，要与你们太爷面谈。”老崔这样说着，就往门口里边挤。“有事和我们说，不准进去！”“跟你说没用，误了大事你小子兜着？“这两个门卫看这个人说话瞪眼，口气很大，不是等闲之辈，怕惹出事来自找苦吃，便互相使个眼色放他进去了。伪县长正低头办公事。抬头一看，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蹭地站起来忙问：“你是什么人？”“我是八路军侦察员，找你要六千大洋！”老崔话音刚

落，伪县长听到“八路军”三个字，吓得浑身打哆嗦，吱吱唔唔地说：“要这么多钱，恐怕一时没……”伪县长没有的“有”字没出口，只听“拍”的一声响，老崔把手枪拍在桌子上，瞪着两只大眼睛逼进一步说：“没钱也好，你跟我走吧。”伪县长不知道这个八路军怎么进来的，不了解外面有多少八路军，但跟他走的含义他心里明白，凶多吉少。时间不允许他想得太多，吓的面色如土，皮笑肉不笑地连连点头说：“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要钱，有，有！”老崔把大洋拿到手说：“送我出城！”“一定照办。”伪县长派心腹人送老崔安全地出了城。

二进县城抓叛徒。一次，一名战士同一名副连长到河北庄执行任务，在途中副连长把战士给打死了，他带枪携款逃进县城投敌了。上级派崔如海除掉这个叛徒。他冒着生命危险，几次进城查找这个叛徒，都没能如愿。后来他到西田各庄探敌情时，巧遇这个叛徒。“我找你多日了，没见到你。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这个叛徒听到崔如海的话，如老鼠见猫，一句话没说，撒腿就跑。神枪手老崔举起手枪，“当”的一声，为死去的战友报了仇，为人民除掉一个害人虫。

三进县城要军鞋。1942 年秋，八路军老十团在昌平、延庆、怀柔、密云一带的北部山区活动，许多战士没鞋穿。团部决定派他到县城附近找“刘疤痢”（八路军老十团供给处处长刘勇侯）联系，弄点军鞋。他扮成山里庄稼人模样，刚走近县城东门，一个特务便认出他是“崔瞪眼”。“抓住他！”老崔随着特务的喊声，砰砰打两枪，日本、特务、赶集的、卖柴禾的乱成一锅粥。老崔穿人群，钻胡同，拐弯抹角躲进一铺家，藏起来了。等到街上平息后，他与“刘疤痢”终于接上头，找两头毛驴驮运 100 双军鞋又出县城了。

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长张万福

鲍星时



抗日时期白马关游击队队长张万福

张万福1916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二）出生于密云县赶河厂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小时只读过两年私塾，由于家境贫寒，十多岁就被迫辍学，给地主放羊当伴伙。艰辛的生活，苦难的磨练，从幼年起，他脑子里就对旧社会不平等现象产生了不满。1940年5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挺进平北，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到达张万福的家乡。一天十团找张万福当向导，他愉快的去了，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通过这次接触，使他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一个初步的良好印象。丰滦密联合县建立后，8月初，十团作战参谋师军奉命到赶河厂村协助丰滦密三区组建游击队，张万福率先报名参加，从此他成了一名抗日游击队员，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8月13日，游击队正式宣布建立，张万福被任命为游击队长。丰滦密三区位于白马关河川一带，因而这支初建的游击队便被命名为白马关游击队。为了协助张万福工作，师军暂以党代表的身份留在游击队里。

张万福在党代表师军的协助和支持下，游击队建立伊始，就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机动灵活地四处打击敌人。一天，张万福听到群众报告冯家峪村来了几个伪军，他亲自带上两名游击队员，悄悄摸进村去。当他们逼近伪军，在其背后举起手榴弹高喊"放下武器"时，伪军才发觉八路军游击队已来到自己跟前，未敢反抗，乖乖举手投降。还有一次，外出骚扰的伪军，夜宿于陈家峪村，张万福知道后，又带领游击队员，乘着夜间天黑摸进村去，他们先端了敌人的岗哨，然后又悄悄地进入敌人居住的院里，摸到敌人睡觉的房间用枪逼住敌人，缴获了30多支步枪。连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员的战斗信心，赢得了抗日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当地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白马关游击队，仅冯家峪中心村，一次就有26名青年参加，10月底，白马关游击队迅速发展到80多人。12月15日，张万福又率领白马关游击队配合十团一营取得了冯家峪战斗的胜利。14日晚，张万福率游击队埋伏在南湾子西山北侧，任务是截断敌人的后路。15日，十团一营与敌人的战斗打响以后，张万福迅速出击，封住了敌人后撤必经之路，与一营一起将"78天大扫荡"后撤之敌铃木大队哲田中队紧紧包围在白马关河湾里，予以歼灭性打击，此战共击毙日军90余人，取得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胜利，并对丰滦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张万福抗击日寇屡建战功，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因而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一个普通农民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40年12月，白马关游击队和其他几支游击队合编组成丰滦密游击大队，白马关游击队编为一中队，张万福被任命为一中队队长。1941年1月底春节期间，为使抗日群众过好春节，张万福带领一中队和其他中队一起来到长城外的张家坟村严密监视日伪军的动向，以防白河上游的日伪军对我军民进行偷袭。2月4日，伪满道田讨伐队从滦平琉璃庙据点出发进犯抗日根据地，刚到张家坟村就遭到一中队和其他游击队的阻击。按照战斗布署，他们牵着这股敌

人一步步退到鹿皮关附近，诱使敌人陷进十团已埋伏好的口袋阵，被十团一营击溃。这次战斗，张万福等游击队不避艰险，诱敌深入，配合十团一举歼敌117人，为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经过几个月的实战锻炼，丰滦密游击大队的战斗素质得到提高，1941年6月正式升编为十团二营，张万福被任命为十团二营四连连长。7月，十团在赶河厂村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张万福被命名为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长，受到十团团部的嘉奖。

1941年秋，日寇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万人大扫荡”，为保存抗日力量，十团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只留二营坚持内线斗争。二营又以连为单位分散开展游击活动，与敌周旋。张万福带着四连在白马河川一带辗转游击，和“扫荡”之敌进行较量。他们常常在敌军缝隙中钻来钻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一次，他们乘敌人后方空虚，突然进入长城以北的滦平境内，连打于营子和巴克什营两个据点，为预防敌人的报复行动，打完据点后张万福马上带领四连转移，并隐蔽在窄岭西沟榆树蒋村。第二天清晨，部队要开早饭，300多敌人已发现他们的行踪赶来。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对四连极为不利，张万福立即带上部队，从敌人未及合拢的包围圈缺口冲出。他命令大队先走，自己带一个班断后，在这十分危急时刻，张万福英勇果断，他们连续击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张万福身上3处挂花，仍带领战士坚持战斗，终于阻滞了敌人，使部队安全转移。敌“万人大扫荡”后期，张万福率领四连在内线坚持更加困难，有时他们连村庄都进不了，只能蹲在山上，没有饭吃就吃生玉米，有时连生玉米都找不到，只好以草根树皮果腹。日本侵略者派出特工人员四处打探张万福的情况，后来终于获得了他的家庭住址。日本侵略者派人烧掉了他家的6间房，抓走了他的父亲和哥哥，并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妄图以此来动摇张万福的抗日决心。张万福听到这些不幸消息后，虽然心中十分悲痛，但也没有动摇。以后他对日寇的残暴行为更加仇恨，作战也更加坚强，终

于用抗日战斗的行动，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恶毒阴谋。

1942年，丰滦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十团进行缩编，张万福率领的四连被解散，战士编入其他各连，张万福改任侦察连长，同时随十团离开丰滦密地区转移到平北西部昌延一带。张万福率领侦察连于1943年2月参加了延庆川破袭战，他们保护着民兵，将延庆县城通往各地的公路挖断，电话线剪断运走，电线杆锯断烧掉，敌人修复一次，他们就再破坏一次，终使延庆县城的敌人无法与外界联系，困守孤城。当时抗日群众曾经嘲笑这里的敌人是“缺腿少耳朵的驴”。3月，张万福率侦察连与一、四连攻打柳河沟伪军据点，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后因延庆城敌人派兵接应，据点未攻克，但仍毙伤伪军30多人。4月，张万福又率侦察连和四连一起攻打黑山寨敌据点，黑山寨据点炮楼建在高台上，易守难攻。黄昏后他们就把据点包围了，半夜时开始猛攻，据点敌人拚死顽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他们一次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后来又用木柴烧炮楼，也未奏效，战斗一直打到天亮。伪军虽死伤达50多人，但张万福却不幸在战斗中腿部受重伤。后虽经医生精心治疗，保住了伤腿，由于肌肉萎缩，一时上不了战场，只好服从组织安排回家休养。

经过几个月的休息，张万福刚刚恢复健康，就又来到部队报到。这时十团侦察连已编入丰滦密地区队，为一连，张万福也就跟着进了丰滦密区队。此时正值伪满刘翰讨伐大队200多人在密云西部地区“扫荡”，区队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股敌人。1943年12月，敌人住在赶河厂村，这里正是张万福的家乡，人熟地熟，所以区队领导让他当向导，带一连偷袭赶河厂村北山制高点上的敌哨所。他带着一连悄悄摸向北山，直达哨兵跟前，突然开火，将一小队敌人全部消灭或俘虏。接着他们从北山上直冲下来，势如猛虎。这时二连从西面，三连从东北面也都包抄过来。敌人失去哨所，没有了“眼睛”，突遭三面夹击，惊慌失措，四散逃命，最后刘翰只带着几

十名残兵败将渡过白河逃脱。此仗共毙俘敌170多人，张万福为胜利立了头功。

1943年11月，丰滦密区队划归冀东领导改称第五区队，区队一、二连又调回十团，张万福也随着回到了十团。抗战胜利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察东独立团任副营长。1945年10月25日又调任丰宁县大队任大队长。张万福率领县大队配合党政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清查敌伪人员运动，打击封建统治势力，组建了农会、妇女会、武委会和民兵等群众组织。丰宁县被日寇统治20多年，农村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因此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斗争也格外激烈。张万福为保护地方干部顺利工作，把县大队划分成几个小队，随同地方干部一起深入农村和山区。每当与土匪、伙会遭遇，他都让地方干部首先转移，自己则率领战士和敌人战斗。一次在窟窿山突遭多伦骑兵的追袭，张万福只身断后，阻挡敌人，直到地方干部脱离了险境，他才撤出战斗。1946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阁召开整编大会，准备对丰宁县最大的一股土匪李二麻子部实行整编。由于李二麻子首鼠两端，大会进行前，张万福受命率领县大队与察东独立团一起埋伏在会场四周，暗中监视，以防不测。果然大会进行中，土匪突然开枪搅乱大会，张万福遂命令县大队还击，将搅乱会场的土匪击毙，余匪也被缴械，匪首李二麻子被逮捕后处极刑。1946年5月，东西丰宁县大队合并，张万福又调回察东独立团，任团参谋长。这时他会同团内其他领导一起，带领全团战士，一直转战于黑河川一带，并把黑河川一带地区建成了坚持丰宁解放斗争的后方基地。

1948年3月滦河县建立，张万福又出任滦河县大队大队长。滦河县建立初期，政局极不稳定，土匪、伙会活动相当猖獗。张万福率领县大队，积极配合县委开展对敌斗争。他曾亲自带领县大队到环境极端复杂的对山梁一带开展工作，并很快打开了滦河川和正北川一带地区的工作局面。他还在主力部队配合下，消灭了全县境内

的主要土匪和伙会，使滦河县的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使滦河县成为解放军来往于华北和东北的重要通道及战略物资转运站。

1948 年 5 月，张万福率滦河县大队配合晋察冀解放军四旅攻打凤山，在扫除外围据点朱首营时不幸受重伤，被抬回郭家屯后方医院进行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牺牲，年仅 31 岁，后葬在西屯。

张万福光荣牺牲已经 40 多年了，但他与日寇、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英勇搏斗的事迹，仍然被到处传颂。他的模范事迹依然激励着后人。张万福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密云东部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李满盈


原八路军冀东十六团政委李满盈

一、从三十六大队到十六团

1938年，四纵挺进冀东。挺进的部队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就是一个大团。邓华带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大队，宋时轮带三十四大队，伍晋南带三十六大队。单德贵、赵立业是三十四大队的，我在三十六大队。

三十六大队有1000多人，最初任务是在热察之间开辟根据地，主要在怀柔北部、滦平西部、昌平、延庆一部。宋时轮、邓华带的部队先到了冀东。两个月后我们离开怀柔、滦平地区，到雾灵山以北开辟根据地。

我们走白马关、滦平西部、古北口北、曹家路到雾灵山，主要活动在曹家路以东、以南，包括雾灵山的西南、西部和北部，即滦、兴、密、承几县之间。当时曹家路、双洞子都没有敌人据点。我们打过小白旗、长山峪，在返回平西的路上，还打了滦平县的张百湾和金沟屯，丰宁县的大阁镇。

1938年10月底，我随宋时轮、伍晋南回平西，单、赵留下率

一部分武装坚持冀东西部地区，这部分队伍番号为第三支队。

1939年8月底，伍晋南又一次到冀东，我和其他六名同志随伍晋南到密云。当时我已不属三十六大队，到密云的任务是到单支队二营任教导员，营长是果玉春。

1940年6月，单德贵去平西整训回来，带来两个大队：一大队和三大队。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每一个大队有一个主力连。三大队队长周家美。他们在八家庄找到我们，让我任三大队教导员，从此我就离开二营，原来跟着我的那些人也归三大队了。单德贵支队以前有多少人我不清楚，1940年6月我去三大队时，支队有一、三两个大队和二营，每个大队有200多人，二营150多人，共计有600多人。一大队队长姓韩，教导员杨思禄。三大队队长周家美，教导员王公民，后来我接任。

1940年11月，三支队与包森的二支队合编为十三团，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兼十三团团长，副团长单德贵。十三团分三个营，每营四个连。一营营长苏然，教导员郑维宗，我任副教导员。这个营一连连长姓沈，二连连长何自桥，三连连长陶永忠，贺明登可能是副连长，四连连长张俊岚。二营营长钟奇，教导员王文。三营营长耿玉辉，当时没有教导员，后来我从一营调到三营任教导员。到1941年8月，我从三营回到一营任教导员，郑维宗到三营任教导员。这一段时间，十三团一营主要活动在西部，有时到密云。1942年下半年平原环境紧张，冀东西部的领导机关和十三团主要转移到密云东部、兴隆西部活动。主要在木河川、大小黄岩、清水河川活动。

1942年冬到1943年2月，我任平三密联合县游击总队长。平三密联合县游击总队管几个县大队，密云县没有县大队，只有区小队。平三密中的密云，包括潮河东的所有地区，这个地区后来成立了承兴密。

1943年3月初，成立了二区队，我任区队长，谭志诚任政委。

二区队开始三个连，一连连长刘继抗，指导员蔚章；二连连长张风生，副连长张连，指导员李振祥；三连连长马振风（蓟县人），指导员吴祝三。1944年又成立了四连，连长张风生，指导员宋应奎。

1944年底，二区队与平北的五区队合编为十六团。团长师军，我任政委，直到日本投降。十六团在三河、顺义、平谷、密云等县活动。

二、改造处决果玉春

果玉春是后牛角峪人，可能是冀东暴动时打着抗日旗号起来的土匪队伍。约在1939年上半年，单德贵收编了他的队伍，任命他为二营营长。二营实际只有一个连（七连），加上营部的人，总共有100余人。到12月，果玉春消灭了土匪门长春几十人，才又建立了一个八连，全营还是不过200人。

土匪门长春原籍不详，在黄各庄娶个老婆，活动在四竿顶一带，有平西自动来的12名同志，在门长春的队伍里进行改造工作。12月，果玉春和门长春因为争地盘冲突起来，在黄各庄东山果玉春把门长春抓住就弄死了。门长春手下的几十人归了果玉春。

我到二营任教导员后，果玉春匪性不改，到处搞筹款，写条子向人要钱，人家不敢不给。他手下的人有许多是兵痞、流氓、抽大烟的。七连连长曹××，后来的七连连长关××，八连连长齐玉宝，都是兵痞还抽大烟。这些人根本不抗日，我多次劝果玉春让他抗日，守纪律，他不听，而且还说队伍是他的，谁也管不着。

果玉春哪儿也不去，只在大岭、河下、黑土湾、大龙门、椴洼寺、黄土梁、黄各庄东山、塔寺会东山一带，我们只好单走。

平西来的6个人，蓟县支队的12个人，还有果玉春手下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后来这部分人员发展到40名左右，属二营一部分，由我带着，到清水河川北、大小黄岩、木河川的新城子、令公一带进行活动。

1939年11月，伍晋南带三十六大队和一部分干部回平西整顿，单德贵、赵立业都走了。伍晋南给我和果玉春来封信，让我们带队伍走，果玉春不愿去，怕受约束，过了一个星期才把信拿出来，并说，去平西赶不上了，单独往平西走有危险。结果，我们没有去成。

1940年6月，我离开二营到三大队去，果玉春与我在龙潭沟分别，把一支二十响的手枪要回去，把我从平西带来的三号手枪还给我，说："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他表面上没表现出要害我，但实际上是存心要害我的。1940年3月，朱家湾的王汉阁（与果玉春、与我都有来往）在他家里劝我说："这里很危险，王厚存原来跟着你，现在也向果玉春动摇了，你还是弄点钱，换上便衣回平西吧，这里太危险了！"

看来果玉春的土匪习性是改造不过来了，而他和其他几个坏头头在，部队也就无法改造，于是我们就下了消灭这几个坏头头的决心。

果玉春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的，只有单德贵因任命他当营长，他认为有恩，对他还有点号召力。于是单德贵通知果玉春，说部队要集中打仗，把果玉春调到白龙潭，就在白龙潭把果玉春和八连缴了械。七连被调到流河峪，周家美我们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大院里，先喊了话，然后全部缴械。在黄土梁把果玉春、七连长关××（外号瞎关)、副连长胡念昆、八连长齐玉宝、一个司务长、一个果玉春的警卫员都处死了。二营除死的外，还有少数人走了，大多数编入了三大队。从此，三支队取消了二营。

果玉春被消灭以后，还有一伙土匪，有几十人，在清水河川大、小黄岩一带从事土匪活动，头子叫赵德辉。我们要消灭他没有找到，以后听说他跑到石匣投敌当伪军了。果玉春手下也有几个跑到他那里去了。

三、在密云地区的战斗

1939 年 9 月到 1940 年 6 月，我们主要活动在大小黄岩一带，以后也到密云活动。由于人数不多，并未引起敌人多大注意，也没有打大仗。

1939 年 8 月，从平西回来的三十四大队，从祖各庄附近过河，住在八家庄。第二天与石匣警防队发生战斗，激战一小时，消灭敌人 100 多名，我军伤亡很轻。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1—2 月间，我带的部队打了三仗，把曹家路、新城子、南台三个派出所的几十名伪警察全部缴械，缴枪 20 多支。

1940 年 1 月，我单支队二营近 200 人，在车道峪正上操时，古北口敌人 100 多，从黑古沿过来，突然袭击我军。我们很被动，赶紧上了南山，这次双方都没有多大损失，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

1940 年 3—4 月间，在北庄附近的河南营子村，石匣来的 200 多伪军袭击我们，我们只有 40 多人，牺牲了几个同志，主动撤走了。

1940 年 8 月初的一天，单支队一、三大队 300 余人住在达峪村，来了 100 多日蒙军，想袭击我们，但他们对我方情况不了解。等他们走到山沟里，我们占了有利地形，把敌人几乎全歼。

1940 年夏天，我们三大队 100 多人，在密云飞地侉子营住着。龙湾屯人朱 × × 带密云民团 50 多人来到这里，我们把他们围住，打了一个多小时，把他们全部缴械。

1941 年夏，我们十三团一、二连 100 多人，在南庄南山上埋伏，我们用几个人引诱敌人。北庄据点出动了 20 来个鬼子，一直追到南山。我们的伏兵一冲，把敌人全消灭了。炮楼里的敌人也跑了，我们把炮楼给烧了。

1942 年 3 月，一天下午，我带十三团四连住在椴洼寺。日本兵

100多人，从墙子路过来，打了几小时。天黑后我们撤到东田各庄上面的流河峪，吃饭时派人侦察，说日军来到芦头。我们抢先占了芦头上边的头道庄子，敌人晚来几分钟，我们居高临下，一阵扫射，打死了巴仲兼。巴仲兼是日本中尉，可能管石匣、密云一带日军。打一阵天亮了，我们撤到黄土梁、碱厂一带。这时北庄敌人又来了，我们在黄土梁和北庄之间又打一仗，打死两个鬼子，我们就赶快撤了。后来墙子路的敌人与北庄敌人都把对方当做八路军，互相打了一阵。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打了三仗，边打边走。敌人打算把我们这个连包围在大岭一带，但没有围住，我们胜利地突围了。

1944年，十三团的两个营在土门、熊儿寨作战，我们二区队的一个连，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赶到，只赶上一个收尾。这次战斗主要打的是伪满讨伐队。

一次漂亮的围歼战

齐显富

八路军十三团于1944年夏，配合冀东对敌夏季攻势，开始出击，牵制敌人，打击日伪嚣张气焰。

六月二日，敌人刘奇、石振、程彬和孙德四个伪满讨伐大队，协同两个日军小队以及四个特务队共一千一百多人，他们拥有迫击炮九门，轻重机枪四十二挺，由南向北沿长城一线进行“扫荡”。敌人进入我承兴密地区，当夜宿于六区的土门和熊儿寨。

我十三团认为这是歼敌的良机。于六月三日凌晨七八点钟，悄悄地包围了土门和熊儿寨。二连和警卫连首先袭击土门敌人。敌人正在酣睡，被我军一通手榴弹、枪弹猛轰，炸死许多，剩下残敌争相逃窜。我趁势追杀，又击伤击毙一批。逃敌一部分遁入敌司令部院内。

大院内的敌人慌作一团，他们在一座大间屋内用十二挺机枪封锁院门口，妄图避免遭到覆灭下场。其时，二连战士已爬至屋顶，他们揭下瓦片，将集束手榴弹塞进屋内。一声轰鸣，敌人的机枪哑叭了。一名指挥官当场被炸死。

在战斗过程中，一部分敌人企图抢占北面小山，被我预先埋伏在山上的兵力击退。敌人见大势已去，逃奔熊儿寨。

熊儿寨那边的战斗也十分激烈。守敌被我军压到民房院墙之内。战斗到中午时分，二区队的一连又赶来助战，我军士气大振。下午两点左右，敌机数架来空投弹药，有迹象表明敌援军已然出动。我军领导认为，已经取得辉煌战果，不能与敌人硬拼，决定撤出战斗。下午四点左右，我军按部署撤离熊儿寨。

这次战斗我们击毙日、伪军五百余人，缴获机枪两挺和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分。我军伤亡百余人。

土门、熊儿寨一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密东地区（潮河东）规模最大的一次歼敌战斗，它粉碎了敌人对长城一带的“扫荡”，有力地配合了冀东夏季攻势，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争勇气。

东庄伏击战

陈宿阁口述　陈万荣整理

东庄是北庄的辖村。1940年，八路军将这一地区开辟为抗日根据地。1942年初，日本侵略军为了消灭抗日武装，在北庄增设据点，派驻一个日军中队。随后便将大片地区强行划为“无人区”。日伪随时四出“扫荡”，妄图隔绝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敌人在“无人区”内疯狂地实施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在一次“扫荡”中，仅上庄子一个村就有3名自卫军被杀害，6名百姓被押到据点，经过严刑拷打后杀害。但是，北庄人民不甘做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坚持斗争。党支部选派抗日坚定分子打入伪政权内部，随时为抗日军政秘密传递情报，配合八路军寻机消灭敌人。以后随着抗日力量日益壮大，到1943年，敌据点的兵力迅速减少到只剩岗岛小队长率领的十几个鬼子和十几个警备队员了。但为了执行上级命令，还要硬着头皮出外讨伐。他们讨伐时，既不敢走大路也不敢到较远的大村去，只是捡小道到据点附近小村抢夺些吃的、用的，便匆匆返回。敌人的这一活动规律和兵力情况很快被党组织掌握。党支部立即派陈宿阁和果久德两名党员去找部队，研究对敌策略。二人展转两天两夜，第三天终于在柏崖山区与八路军第十三团的五连取得了联系。五连长贺明登得知情况后，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消灭这股顽敌。1944年初的一天夜里，贺连长率领全连战士，借助星光悄悄向北庄敌据点靠近。此时，又得到情报：第二天鬼子准备到东庄村去讨伐。大家简单分析了一下形势：东庄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开阔地，是打伏击战的极好地点；敌我力量对比，敌弱我强，我们有很大胜算；伏击地点距东庄最近

的葡萄园敌伪据点也有20多里，敌人的援军还没赶到我们就可以结束战斗了。各方面条件对我们都十分有利。贺连长遂带队连夜转移到东庄布阵。清晨布阵完毕，只等敌人自投罗网。上午，太阳都满川了，鬼子们才懒洋洋地钻出岗楼，向东庄进发。他们万没想到今天就是他们的末日。10个鬼子兵刚进村还没来得及抢东西即遭到早已埋伏好的我一排战士的迎头痛击。一阵机枪扫射，当时就撂倒了三四个鬼子。剩下的几个鬼子摸不清我军兵力多少，不敢恋战，只是打了几枪，调头就往回跑，企图躲进炮楼反击。可是刚跑到东庄口，又与我二排战士遭遇。无奈，又往西逃，企图过清水河抢占西山高地顽抗。但是刚趟过河，高地上我三排战士们的手榴弹又猛烈砸了过来。鬼子们再也无路可逃，只有就地应战。后有我一、二排追击，前有我三排拦截，前后不到一刻钟，战斗就结束了。10个鬼子，被击毙9个，另一个满脸稚气的学生兵当了八路军的俘虏。缴获大枪10支，子弹一批。战斗打响后，驻守岗楼的敌人，开始还打一阵枪，给同伙助威。一会儿，见外出的鬼子都完了，岗楼也哑巴了。这一仗严重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士气。

锥峰山下伏击敌汽车

杜长德

一九四三年农历四月二十七、八日，墙子路的日本矿警去密云县城，弄回一汽车准备过端阳节用的物资，在程各庄村被我十三团的一个连打了伏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十三团预先得到墙子路日伪矿警要去密云县城的情报，就在他们出发前一天下午（四月二十七日），由刘治龙带领十三团的一个连到达了庄户峪村（该村在程各庄南面，只有一小山之隔），部队吃过晚饭，为了不走漏消息，从庄户峪村出发往南开走了（与去程各庄方向相反）。后又改道折绕回来，夜里悄悄的埋伏于程各庄村公路两边的几户人家中（不准这几户人外出）。第二天早上，汽车从墙子路方向开过来，没有理会他。汽车过后，我军民在公路上堆放了高桌、板凳、椅子等杂物，阻挡了公路的通行，并在临街杨殿荣家的墙上凿开射击孔，两挺机枪正对公路，埋伏人员各就各位占据了有利地形。一切准备就绪，静等鬼子的汽车返回。

下午四点钟左右，鬼子的汽车从密云开回来了。他们看到公路上堆了许多杂物挡住了去路，就将汽车停了下来。这时，我军从墙里扔出了密集的手榴弹，接着两挺机枪也打响了。日本鬼子和伪矿警被打得措手不及，十个矿警当场被打死。一个鬼子跑到村西头负伤后，仍想顽抗，被我用机枪射死。一个跑到杨各庄东边后山坡上也被我军击毙。另一个负伤当了俘虏；汽车司机一个手指被断，也被俘获。

这次伏击战，击毙日本鬼子二人，俘虏一人；击毙矿警十人，俘虏一人；缴长短枪十三枝，面粉四十三袋（每袋约20公斤），汽

油两桶，以及蔬菜、食盐等物资。把汽车轮胎卸下运走后，车就给烧掉了。

这次漂亮的伏击战，我军无一伤亡，大长了我军的声威。

八路军在墙子路严惩特务、讨伐队

刘占发口述　蔡世文整理

特务、讨伐队借日本主子势力，为虎作伥，欺压百姓，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

一次有两个特务，一个人称魏阎王，一个群众给起的外号叫宋（送）命，到墙子路南门外王奉义肉铺，白吃白喝不算，还假装和王奉义套近乎。这两个特务说："当特务真不好，伤天害理，不干吧，日本人不答应；干吧，太伤人。"王奉义没看透这两个家伙的用意，便说："你们怎不投八路军呢?"这两个坏蛋说："想投八路人家不信任怎办呢?"王奉义说："你们要投八路，我给你们引见。"那两个特务当时答应并表示谢意。第二天，就把王奉义逮去交给了日本兵，日本兵把他的耳朵割下，用刺刀挑，活活被折磨死了。自此，群众见特务就躲，躲不及的，他们要什么就得给什么，群众对这些坏蛋恨得咬牙切齿，不少人把他们的暴行偷偷告诉给八路军。一次，特务殷长明要从三道河到墙子路来，有人报信后，区长张少华（化名盛斋）带领郭占恒及民兵前去截击。民兵隐藏在北山小庙内，郭占恒头戴大草帽，肩披稍马子，右手握块石头，左手持手枪，藏在关门路旁。中午殷特务单人骑自行车过来了，北山小庙一声枪响，郭占恒从土坎跳出，殷特务停车掏枪时，郭占恒右手飞出石块，正中殷特务头部，然后一搂枪机，就把特务的头打得脑浆迸流，死于路旁。郭占恒拾起了殷特务的手枪，骑上殷特务的自行车朝家堂沟方向驶去。

墙子路南山有个伪警察所，警官叫王英宾，群众叫他"小王官"。为了抖他的威风，强迫二百多劳力，从三里之外的长城上，

把六门大铁炮抬到马号广场，又在场内筑小台架在上边，群众非常气愤。1943 年正月十五日，他让群众给他搭灯棚挂灯笼，又找人给他说书唱戏，然后打牌取乐。消息早有人报告给张少华区长。张区长带领民兵当夜赶来，向警察所狠狠射击一阵子，日本兵听到枪声向南山放了一阵空炮，小王官胆战心惊，在一阵混乱中逃跑了。

1944 年农历五月初四，宋清讨伐队去苍术会抢掠，准备用抢来的东西过端午节。群众把这情况密报给驻吴家峪的八路军郭子忠部。郭部立刻从娘娘庙过沙岭梁，经西梁过河，直奔下圈北山。下圈在墙子路村西三里，地势险要，又是通往墙子路的必经之路。当敌人满载抢来的东西到下圈时，伏击打响了。敌人大乱，狼狈逃窜。墙子路的日本兵出来支援时，八路军早已无影无踪了，敌人只好拉回十二具死尸。八路军大获全胜，群众拍手称快。

痛击伪军宋清队

杜长德

一九四五年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六道河据点的日本鬼子五十多人和三道河的伪军宋清队一百二十多人，在当地抓了几十人的驮伕进关讨伐。目标是墙子路以西程各庄以东的苍术会、孝女台、柏崖、前后沙岭一带村庄。这天敌人经过墙子路、下圈、朝岭子，到了苍术会村，苍术会遭了劫难，老百姓的牲畜、衣物、粮食、日用品甚至连锅盖都被掠走，不能抢走的物件全被捣毁。老百姓闻讯敌人来讨伐的消息纷纷逃离了家园，向南面的东草茨、孝女台、柏崖方向跑去，这个方向正是我军预设的埋伏圈。

原来，前一天由团长苏星、政委李子光率领的八路军十三团特务连、老五连、十六团的一个连和县支队共六百左右人，由潮河方向开过来，准备去平谷执行任务，正驻在孝女台、柏崖、黄门庙、前后沙岭一带。这一带的老百姓对宋清队恨之人骨，迫切要求苏团长消灭这股万恶的伪军。后沙岭村的马广清把村民的请求信直接送到了团长苏星手里。应当地老乡的要求，团长决定设伏在柏崖歼灭这股讨伐的日伪军。将一个连埋伏在东西草茨西面山梁上，十六团的那个连隐蔽在黄门庙，特务连埋伏在柏崖背面的西头山梁上。县支队在柏崖北面的东头山梁上。一切部署停当，就等待敌人进入柏崖村时将其歼灭。

日伪军在苍术会抢掠后向东草茨方向开进，同时不断地用机枪扫射追赶向南逃跑的老百姓。有的老百姓就大声的喊起来“八路军快开枪打呀！敌人追上来了！”这一喊敌人发现了我们埋伏的军队，掉头就往回跑，没有进入埋伏圈。这时我军埋伏在柏崖北山西头的

冲锋号吹响了，开始追歼敌人。伪军从苍术会村南向下圈方向逃窜。这时埋伏在柏崖北山梁头的县支队急赶到下圈对面的山梁上堵击敌人，由于机枪出了故障，没打响，伪军跑掉了大部分，日本鬼子从小梯子峪方向全部跑掉了。

这次战斗击毙伪军十一人，俘虏伪宋清队副队长、中队长、日本梅翻译官等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三挺，大枪十多支和几支手枪。

经过这次打击，伪宋清队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逃回去的部分伪军为了保全性命也不敢再干了，从此伪宋清队就垮台了。

北进敌后武工队

王泽民

（一）

我们这支北进敌后武工队是一九四四年六月组建的。

当时，日寇的侵华战争已成败局，正在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为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割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调集数万兵力，轮番对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线”进行“扫荡”、“清剿”，继续进行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扩大“无人区”。为此，这个地区进入了更加残酷的斗争阶段。人民群众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陷入了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苦难深渊里。为粉碎日寇的阴谋，冀热边特委下辖的第一地区委决定组织精干的武工队，进入“无人区”，坚持斗争。

一天，地区委书记李子光同志把我找到小黄岩的黄土坡，对我说：“泽民同志，给你一个排，让你与十三团的郭子忠、高原同志向北边敌占区开辟。能开辟多少是多少，北边都是你们的。你们这支队伍叫北进敌后武工队。”子光同志强调说：“你们这支队伍远离地区委，战斗在敌人心脏，要特别注意：第一，不要吸大烟；第二，不要搞女人；第三，不要投敌叛变；第四，要千方百计在‘无人区’站住脚，保存和扩大队伍。”

当时，我同郭子忠、高原同志还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我早有耳闻。郭子忠同志是十三团的一个英雄连长，以能攻善打而著称。高原同志是个老革命，曾参加过著名的冀东大暴动，雾灵山东侧花园人。他参加革命后，老婆让敌人配给了，女儿让人抢走

了，所以，他与日伪有刻骨的仇恨，革命立场十分坚定。能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

我们这支武工队是在密云县木河川的北东洼建的队。郭子忠任队长，高原任副队长，我任政委，原承兴密五区副区长张振东任政治部主任。、地区委给我们从地方上抽调了二十多名干部，大部分是各区的副区长、副书记、助理员等。十三团给我们抽的那个排，排长王华荣是个老八路，三十几名战士个个身强力壮，一式三八枪。大家见面后，不论是地方干部，还是部队战士，情绪都很高涨。为便于活动，我同郭子忠、高原、张振东等几位同志商量，决定把队伍化整为零，地方干部划为四个组，部队四个班分别随各组一起活动。后来，武工队活动起来了，四个组变为四个分队，由我们委任了分队长、副分队长。

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主要以雾灵山为基地，活动在雾灵山以东和以北的承德县柴河川、兴隆县的柳河川、滦平县的承（德）古（北口）路南，也就是以原承滦兴办事处失去的地区为基地的长城外线。后来，郭子忠同志调走了，高原同志当了队长，王华荣被提为副队长。我们这支队伍逐步向外活动，有时活动到滦平县的滦河镇以北的伊逊河川，大庙附近的红旗、小营、通沟、三岔口，古北口以东的长山峪、黄木局子、靳家沟、王营子等，再就是承德县鞍匠、新杖子、夹马石、潘家店和上板城。去这些地区活动都是在夜间，白天要返回窄道沟等地的树林里隐蔽。当然，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还是兴隆县以北的柳河川、鹰手营子、马圈子和寿王坟一带以及盘道梁以北的柴河川上游。这些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是老区。

在日伪残酷统治下的“人圈”里，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一家子抻一条破被，夫妇轮穿一条破裤子，兄弟轮穿一件破羊皮筒的，到处皆是。我们这支队伍出关时带了些土布，作为菜金。进敌占区后，我们每到一个“人圈”，就直奔大

房子，不用问，那里边住的不是地主就是甲长，有的还是双料货，让他们给我们派饭吃。开始，我们把吃饭的人数加在一起，一次付给土布，让这些地主或甲长把布分给我们吃饭的人家。后来，我们发现有的地主或甲长从中贪污，老百姓说他们“骑驴”。因此，我们改变了作法，饭前我们把布分给队员，饭后由队员当场把布留给群众，群众十分高兴。由于当时布匹奇缺，老百姓都欢迎我们到家中吃饭。

越往北开辟，离地区委越远，时间一长，我们带的布用光了，派人进关去取，有时来不及。这样一来，吃饭就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派粮的办法：通知“人圈”里的甲长，让他派人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给我们送，我们打收条。那时，我们派的粮主要是些煮土豆、炒米。为防备万一，我们有时还搞些储备，把这些东西放在雾灵山的山洞里，还在山里挖些野菜存起来，以防断顿。冬天，我们主要征派一些小米、玉米、土豆等生食及一些必要的炊具。大雪封山，我们怕敌人捯脚印“围剿”，就在山上自己生火做饭。

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在日本投降前，武工队已经扩大到十个分队，共五六百人。这么多人的吃用，光凭向群众征派也是个问题，何况群众又十分困苦呢？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在雾灵山的森林里开荒种地。那时，雾灵山的大森林经常起火。这火有时是日寇放的，有时是自然起火。被火烧过的土地，黑乎乎的，肥得冒油。我们在这黑乎乎的土地上种上了一片片的玉米、土豆。隔个十天半月的，我们派些人去打树芽子、锄草。一九四五年春，我们种的土豆获得了大丰收，有的一块就有斤八两重。这些土豆，我们除了自食以外，还组织队员磨粉，用粉向老百姓换粮吃。一直到日本投降时，我们做的粉条还没有吃完呢。

雾灵山中，有一种榆树，树干是扁的，皮特别粘。我们组织队

员们剥树皮，把剥下的树皮晒干。下山时，我们把这些树皮背给老百姓，群众很欢迎。因为当时老百姓喜欢吃轧饸饹。榆树皮轧的面是吃轧饸饹必备的原料，没有它，饸饹就轧不出条来。此外，我们还从群众手里借一部分工具，在深山老林里砍明子，有时背下山同老百姓换些吃的，有时背下山救济穷苦百姓。

在雾灵山的深山里，武工队还开出菜园。当时，雾灵山下有个叫贺龙的，还有于朝义夫妇及于朝义的一个哑巴哥哥。他们坚持山地斗争，至死不进“人圈”。日伪越圈，他们越往山里跑。到山里，他们几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为武工队收拾菜园子、养猪。哑巴还种些大烟，队员们有了病，他就拿出大烟为队员治病。在深山里，我们住的是自己动手搭的马架子，炕是我们开石板搭的。没有炕席，我们就剥桦树皮，桦树皮这东西真好，铺在身下暖和极了。大雪封山，队员们就在马架里，把桦树皮订成本，写字学文化。

我们这支武工队不断扩大，队员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密云县的木河川、曹家路、蔡家店、大沟等老区的青壮年，他们觉悟高，对共产党、八路军有感情，死活不进“人圈”。为避免敌人抓捕，他们找到我们，同我们一起活动，结果参加了武工队。二是一些坚持山地斗争的民兵。过去，他们三三两两地活动，势单力孤，与我们合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再就是原来的一些村干部。这个地区沦陷后，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员和村干部成了无娘的孩子。我们过来后，他们找上来，参加了武工队。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发展比较迅速，但由于成份较纯，觉悟较高，所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叫苦的，更没发现一个逃跑或投敌的。一九四五年春，我们路过长山峪附近的小平台，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说什么也要跟着走，当八路军，打日寇。他说他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了，已经没家了。我把他留在身边，让他给我背包儿，当通讯员。这个小伙子高兴极了。当晚，我们破坏由长山峪至古北口的电线时，敌人发现了，派队伍打我们。仗打起来后，这个小伙子被敌

人一枪打倒。我趴在他身边一摸，满脑袋是血，已经死了。因为情况紧急，我从他身上解下背包就同部队一起撤了，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长城附近才摆脱了敌人。我们就在一个靠城墙的小村子住了下来。第二天下午，这个小伙子找来了。原来是敌人一枪把他的太阳穴打穿了，当时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一看，部队撤走了。他忍着巨大的疼痛，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们。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只是在他伤口上撒了点儿牙粉。想不到他的伤很快好了，但在太阳穴两边留下了两个肉阄阄，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带豆的”。可惜的是，我已记不起这位可敬可爱的小战士的名字了。

（二）

敌后武工队，顾名思义，就是战斗在敌占区的武装工作队。它的中心任务是在敌后开展工作。我们这支武工队也是这样。它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伪政权。我们活动的规律是昼伏夜出。我们白天躲在深山老林中，黄昏下山，傍晚进入“人圈”。进“人圈”前，我们放好哨，只许进不许出；进“人圈”后，直奔甲长家，让他召集群众开会。队员们兵分两路：一路刷标语，我们身背石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另一路向群众讲演，宣传党的主张，讲解抗日道理，教唱革命歌。我们教的歌子，有描写“九·一八”事变的《流亡三部曲》，有描写卢沟桥事变的“七月的太阳似火烧，日寇进攻卢沟桥”和“小日本，心不公，一心要把中国征”。还有的歌子是我们根据形势自己动手编的。如希特勒垮台前，我们用东北秧歌调编了“打起鼓来敲起锣，咱们大家齐唱胜利歌。胜利歌儿年年有，今年更比往年多。墨索里尼、希特勒，骨碌骨碌滚下坡。”这些歌子确实起到了教育群众，鼓动群众，激发群众抗日热情的作用。向群众讲演主要是针对日寇搞的“奴化”教育进行民族教育，如日本为什么来

中国，怎样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等等。同时，我们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当时，第一地区委（后为十四地委）有个《救国报》社滦西分社，办了张油印小报，上面经常刊登些抗日捷报。我们以此为依据，广泛宣传。

在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的基础上，我们注意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骨干，积极而谨慎地进行组织建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首先在一些村庄（“人圈”）发展和建立联络员、办事员。这些联络员、办事员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情报，秘密地帮助武工队办些事情。如盘道梁北陈家庄的联络员贾彬，他不但为我们提供情报，还秘密地为武工队征粮。在发展联络员、办事员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地开展建党工作，首先把经过考验的联络员、办事员发展成为党员。我们当时发展的第一个单线党员就是贾彬．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我们还没能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的组织，所以，对党员采取的是单线联系，联络方法主要是靠关里流行的那种“鸡毛信”。

在政权建设上，我们主要是把原来垮下来的抗日政权恢复起来，在“人圈”里建立起地下抗日村政权，秘密地组织群众跟甲长斗，发动群众反对伪满，对抗日寇。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在一些“人圈”里建立起抗日的两面政权。所谓抗日的两面政权，就是公开身份是日伪的甲长，秘密身份是我们的干部，但归根到底是为我们服务的。如狐狸窝的于甲长，他家虽然是个大地主，但由于我们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所以，他秘密地为我武工队做了大量工作。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特别是活动在敌后，知己知彼十分重要。要知彼，就必须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普遍撒网、重点联络”的方法。所谓“普遍撒网”，就是向各甲长要情报，强制他们提供。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及时给予表扬。对于个别向我们提供假情报的，就及时向他们警告，直至惩罚。“重点联络”，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同

情报员的联络上。在发展情报员时，我们花大气力，把工作放在敌伪村公所、警察所上，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针对村公所、警察所的伪职人员大都是当地人这个特点，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家属、朋友，千方百计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把他们拉过来为我们服务。如曹家路大沟伪村公所副所长叫魏福生（后改名为张建民），是曹家路本村人，高小毕业，中农家庭出身。我们通过他的家属把他争取过来后，他给我们送了许多情报。后来，他在给我们送情报途中，被我冀东十二团误抓，送到十四地委。魏福生向地委书记李子光说明真相，李子光便派人把他送给我们。从此，魏福生当了武工队的文书，后来当了滦平县政府的秘书。还有大沟警察分驻所一个姓马的警察，绰号“大金牙”，也是我们的情报员，后来正式参加了革命。

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交朋友、攀老乡等方式发展小商小贩和走村串户的手艺人为情报员。这些人消息灵通，便于联络。一九四五年夏，我们在遥桥峪碰见一个张马尾箩的，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走上前一盘问，这个人是我们县人，和我一个村，叫杨玉山，论乡亲我还得管他叫叔叔。他早年逃荒口外，所以我们互不相识。拉上乡亲后，分外亲热，他主动给武工队传递情报。他家在曹家路住，日寇投降时，当了我们的村长，为革命做了不少的工作。

我们这支队伍十分注意群众的疾苦，努力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当时，武工队活动的这些地区，老百姓穿衣十分困难。开始，还有些老百姓背些粮食，翻山越岭进关，换些土布回来。后来，日伪把群众这种交易列为“经济犯”之内，一经发现，就给戴顶“走私犯”的帽子，东西充“公”，人还要受皮肉之苦。因此，老百姓就不这么干了。这样，成千上万的群众没衣穿。一些穷人居住的“人圈”马架子里，靠墙旮旯儿都挖有一个容下一个人蹲着的深坑。我们进马架子前，必须先打招呼，等穿不上裤子的女主人蹲到坑里后才能进去。派饭时，队员们要先在马架子

外边等着，等女主人光着身子做好饭，蹲在坑里，才能进去吃。冬天，一些群众冷得挺不住了，就钻到柴堆里取暖，或是笼火烤。许多人大腿上、胸前和背后都烤出硬皮茧。这惨状真是让人听了心酸，见了掉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帮助群众"走私"，还派武工队队员护送。在"走私"途中，遇到大股敌人，就掩护群众疏散；遇到小股敌人，就对抗它。为了方便群众，地委根据我们的建议，在关里令公、吉家营、新城子等地设立粮食兑换接待站，专门收购口外群众的粮食，根据卖者的需要，付给钱、布、盐。后来，地委还印了一些粮票，我们在群众家里吃饭或向群众征粮，都付给粮票。然后，我们组织一些商贩到各"人圈"（村）用布、盐、钱等秘密收购粮票，把粮票集中起来，再进关换钱、布、盐。这样，"走私"更轻便了。我们这种作法很受群众欢迎，确实解决了一部分群众的穿衣问题，同时也便利了情报工作，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对于极端困难的孤老病残，我们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鞋袜无偿地救济给他们。许多人穿上衣服后，热泪滚滚，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表示坚决打日寇、救中国。

（三）

我们武工队要在敌占区站得住脚，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手中武器的威力，狠狠打击灭绝人性的敌人。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村长、甲长及其他坏人，虽然要立足于争取、教育，但也必须用武装作后盾，使他们有所惧、有所从。此外，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必须靠消灭敌人来补充。

一九四四年夏，我们武工队成立后，刚一出关就损兵折将，受到了挫折。当时，我们听说曹家路附近大沟据点里的敌情有变化，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振东带原五区公安助理刘亚如和警卫员张珍去侦察。他们走到雾灵山西南侧莲花池的白草洼，直奔搬橛梁。这个搬橛梁既高又陡，下面是龙潭湖。当他们三人刚刚爬上搬橛梁时，

就与从大沟出来“扫荡”的敌人遭遇了。一阵枪响，张振东、刘亚如就被敌人打死，掉到龙潭湖里，张珍负了伤。当时，我们武工队正在大安峪沟西侧。听到枪响，我们知道发生了情况，就向响枪的地方奔去。我们赶到搬橛梁西侧，向敌人开了火，敌人跑了。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张振东、刘亚如牺牲，也没有找到张珍。所以，敌人跑后，我们也就撤回大安峪。第二天，张珍找到部队。当大家听到张振东、刘亚如牺牲的消息时，都十分悲痛，立即从遥桥峪、大安峪找来一部分群众，同我们一起从龙潭湖里找到张振东、刘亚如的尸体，抬到小关梆梆石下的河南边安葬了。

张振东、刘亚如的牺牲，更激起队员们对敌人的仇恨。大家咬牙切齿，磨拳擦掌，决心报仇。郭子忠、高原、王华荣我们几个领导一商量，决定乘大沟的敌人“扫荡”之机，半路打个伏击。伏击地点选在大安峪沟西侧。那个地方不但山高路窄，崖悬壁峭，而且灌木丛生，便于隐蔽。几天后，我们获得了大沟敌人出来“扫荡”必经此地的情报，就在大安峪沟西侧埋了几颗地雷。原计划地雷一响，排子枪一打，我们趁机一冲，捡个便宜。这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曹家路和大沟的敌人“扫荡”队路经这里。这时，我们早已埋伏在大沟西侧的南山上监视着敌人。眼看敌人接近埋伏区，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在这时，狡猾的敌人停止了前进。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不一会儿，从敌群中走出几个士兵，看来是探路侦察的。这几个士兵把我们埋的地雷都给起了出来。计划落空了，我们心里十分气恼。敌人起出地雷后，就上了西梁。上梁后，他们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就大摇大摆地下了梁。西梁下边是夹沟的一个平台，这个地方下不好下，上不好上。我们一看敌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心里又是一阵高兴，觉得在这个地方打也不错。队长郭子忠一声令下，我们五六十支长短枪一齐开火，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群。顿时，夹沟的平台上狼嚎鬼叫，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还没等敌人清醒过来，我们就迅速撤走了。隔了一天，我们来到夹

沟的平台上，看到这个地方还残留着一滩滩的血迹和一盘盘的子弹，稍一收拾，就捡了一千多发子弹。这一下我们不但报了仇，而且补充了给养，发了“财”，真是高兴极了。从此，大沟的敌人再也不象过去那样猖狂了。

盘道梁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它是兴隆通往承德的必经之路。盘道梁的陈家庄是我们的“堡垒村”，群众基础好。所以，我们经常以陈家庄为基地，在盘道梁与敌人周旋，趁机打击敌人，还经常埋地雷，截炸敌人的运输车辆，切断敌人的给养。有一次，我们发现从承德方向来了三辆卡车，正由梁下驶来，便马上派出队员，在大路的拐弯处埋好地雷，并把队伍埋伏在大路两旁。刚埋伏好，汽车来了。“轰轰”几声地雷响，汽车轮不转了。指挥员一挥手，队员们个个象离弦的箭，奔向了汽车。三辆汽车上六个押车的伪军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他们手中那六支三八枪也同时换了主人。这三辆汽车装的都是粮食。我们把粮食带走一部分，其余分给了群众。之后，队员们还用刺刀把汽车轮胎挑坏。类似这样的拦截活动，我们这支武工队常干，所以，敌人一提盘道梁就胆战心惊。

当时，在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流行这样两句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碰见武工队。”的确，我们这支武工队对锄奸、反特、打击卖国贼、惩办为非作歹的坏分子抓得很紧，从来不心慈手软。对于那些欺压百姓的坏人，除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外，我们始终立足于教育，争取他们改恶从善，重新作人。当时，日伪在北马圈子有个煤矿，矿当局盘剥工人十分厉害。特别是有个管帐先生，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矿里，尅扣工人，工人们怨声载道。一九四五年夏季的一个雨夜，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冒雨摸到矿上，从热被窝里拉出这个管帐先生，让他带着到矿上的牲口棚里牵出几匹骡子。之后，我们连夜把他和几匹骡子押到盘道梁东边的“气不忿”山下。这下子那个管帐先生吓坏了，磕头作揖地求饶。我们教育了

他一顿，让他立下保证后，就放了他。后来据了解，这个管帐先生老实多了，矿上其他伪职人员的气焰也都有很大的收敛。

一九四五年八月末，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到处沟满河平。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但由于我们远离地委，耳目闭塞，所以还未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只觉得据点里的敌人不出来“扫荡”了。许多情报员反映，几个小据点里的伪军人心惶惶，有的没粮食，断了顿，接二连三地开小差，大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也好似丢了魂。根据这个情况，我同高原、王华荣商量后，集中了武工队所属的十个分队，五六百人，去攻打新杖子大据点。这个据点驻着几百名伪军和日本鬼子，炮楼修得十分坚固，四周的山上还修了不少瞭望台，各瞭望台都由伪军站岗。我们这支武工队，由于不断接受日伪“运输队”送来的“礼品”，因而装备比较强，每个分队都配备了轻机枪、掷弹筒，但还没有炮。一听说要打新杖子，队员们劲头都很足，四周坚持山地斗争的民兵也自动参战，许多老百姓也持棒拿刀前来助战。所以，参战人员一下子达两三千人之多，把整个据点围了个风雨不透。我们围攻了三天，虽然炮楼还没拿下来，但敌人“麻爪儿”了，再也吃不住劲了。他们打出白旗，要求谈判。我们同意后，一个伪满军官打着白旗前来和我们谈判。当时，我们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可这个军官却讨价还价。第五天，我们正在谈判中，看见从东面来了一队大鼻子兵。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新杖子炮楼打炮，几炮就把炮楼给端了，接着他们“哇啦哇啦”地冲过来。我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赶紧命令队伍撤。结果，我们还有三十余人没来得及撤下，也被大鼻子俘虏了。他们把我们这三十余人同日伪军押在一起，奔向承德。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日本鬼子投降了，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了承德。因我们穿的衣服也是黄色的，苏联红军把我们当成伪军，所以把我们和真正的伪军押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片狂欢，尾随着苏联红军到承德市牛圈子沟。进承德后，找到热西办事处，接待我的是办事处主任郑旭。

我向郑旭汇报了新杖子事件的经过。郑旭派人同苏联红军交涉，要回了我们被俘人员。但有两个战士因负伤过重，死在医院里。

在同苏联红军办交涉中，郑旭同志还通知我，说上级决定让我带队接收滦平县，任命我为滦平县委书记兼县长，并出了个告示。行前，郑旭还送给我一支崭新的手枪作纪念。之后，我们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开进滦平县城，以后改编为滦平县大队，我仍兼任政委。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王继明整理）



“抗日英烈血洒雾灵”——雾灵山龙潭沿摩崖石刻

夜闯敌穴

阎秉哲　鲍星时



原承兴密联合县政府警卫班班长郭占恒

一九四四年夏季，抗日斗争形势已经明显好转。由于兵力不足，密云地区的敌人不得不放弃一些边缘地区和次要据点，退守交通线和重要村镇，而我则已恢复了一九四二年斗争最困难时期被敌人蚕食掉的区域。尤其是密云河东地区，取得土门、熊儿寨重大战斗胜利后，日伪军再不敢轻易进山“扫荡”，大部村庄与敌人断绝了关系，也不再给敌人交粮交款，变成我一面村。唯独墙子路据点的敌人，反动气焰还十分嚣张，他们不仅继续出扰附近的村庄，残害我抗日人民，而且还极力阻挠墙子路地区人民向我抗日政府交纳粮款和鞋袜。墙子路是长城线上的重要关口，它扼守着密云至兴隆的交通要道，原有一座高三丈六尺的砖石城，自从日军占据它以后，又加以维修，并在城墙上加了一道带刺的铁丝网，使它更加易守难攻。那时城内驻有日军、伪满军、伪警察、伪矿警、伪自卫团等，因此据点敌人有恃无恐。在当时条件下，虽然我军一举拔掉这个据点还相当困难，但是如果派出武装工作人员进入

城内教训教训敌人，不仅可以做到，而且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承兴密联合县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承兴密联合县政府警卫班班长郭占恒挑选几名机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组成一个突击组，黑夜摸进墙子路，将我警告信送交日军小队长，从而煞一煞敌人的猖狂气焰，并迫使敌人放松对人民群众给我八路军送交公粮的控制。

经过充分准备，八月初的一个夜晚，郭占恒带领突击组进到墙子路城西南壕沟外埋伏下来。参加这次行动的除郭占恒外，还有三名游击队员及苍术会村民兵中队长马如才，共五个人。郭占恒是平谷县云峰寺人，跟随父亲在墙子路开肉铺多年，因给八路军传递情报被日伪发觉后，逃出墙子路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马如才是当地人，他俩对墙子路城内的情况非常熟悉，因此决定郭占恒与马如才二人进城，其他队员留在城外做接应。

夜半过后，万籁俱寂，郭占恒和马如才开始行动了。他们越过壕沟从西南部悄悄向城墙上爬，刚要爬到城墙顶，忽然远处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是游动哨，他俩赶紧把身子贴在城墙的棱坎上。游动哨愈走愈近了。到达他们头上面的城墙，他俩屏住呼吸，一动都不敢动，幸好敌人未发现他们。待敌人走远，他们才爬上城墙顶，钻过铁丝网，沿着城墙上的甬道，由南往北向西门方向摸去。

西门是伪警察的防区，他们走到西门附近时发现前边有警察站岗，但这个警察正抱着大枪打盹。若是平时他们早就上去结果了他，今天不行，他们还有重要任务，如果弄不好惊动了敌人就会完不成预定任务。假若从警察身旁悄悄地绕过去，又怕把警察惊醒。郭占恒忽然心生一计，他伪装成查哨人员，走上前去恶狠狠地将警察训斥了一顿。那位警察懵懵懂懂，不辨真假，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郭占恒也不和他纠缠，大摇大摆地从西门走下城墙。此时城内家家关门闭户，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他俩从西门迅速到达城中心丁字街，又拐入南街，直奔日军小队长的住处。日军小队长泽滕住在

南街路西一家地主的宅院里。他们来到门前，不禁一楞，大门还没有关，门口连个岗哨都未设，只有几条装满沙子的麻袋堆在那里，这大概是敌人觉得城内很保险才这样放心。虽然如此，郭占恒还是仔细观察了四周，确认没有敌人以后，才决定由他一人进入院内，马如才则留在门外，隐蔽到路东一座破房子里，监视敌人。

郭占恒闪身进入大门，在院里也没有遇上人，他轻轻走到西屋窗下，发现屋内有几个日军正在睡觉。日军小队长居住的东屋还点着灯，但没有人，不知日军小队长到哪里去了。事不宜迟，郭占恒立即进入房内把警告信放在桌上，又从墙上摘下一架望远镜做为进入室内的证物，未敢惊动其他日军即悄悄退回大门，这一进一出前后不到十分钟。和马如才汇合后，速返丁字街，这时突然听到前面有脚步声，他俩躲到路北一棵大树旁，细细观察，原来是从西门方向来了一个持枪的伪警察。他们觉到这是一个捉俘虏的好机会，待警察走到面前，他俩飞速地跳出来用枪顶住伪警察的脑袋，低声命令“不许动!”伪警察开始还认为郭占恒、马如才是自己人，等弄清他俩是八路军游击队以后，腿便软了下来。郭占恒缴了伪警察的大枪，押着俘虏继续往西门方向撤去，并准备在西门附近越过城墙，撤出城外，但只往城墙上爬了几步，伪警察乘他们一时疏忽蹭的跳了下去，撒腿就跑。情况突变，“八路军进城了”的声音很快传到敌人的岗楼和哨所，接着便响起了激烈枪声。

郭占恒被人称之为“郭大胆儿”，敌人已知道八路军进城了，他不仅不急忙往城外撤，而且倒想乘敌人混乱之机，来个混水摸鱼，捞点外快。经过商议，让马如才去三堂庙袭扰伪警察，乘便夺取巡官的手枪；郭占恒到北炮楼袭击伪满军，乘乱夺取枪支。分手前还商定了撤退信号，并确定到城外集合。

敌人弄不清八路军进城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有多少八路军进城，所以都龟缩在炮楼内或哨所里不敢出动，只是乱打枪，这就给郭占恒和马如才继续在城内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一个人单独去

夺取敌人枪支毕竟是件不容易的事，郭占恒摸到北炮楼，观察了一回无法下手，便放弃夺枪打算，迅速撤到西城墙，并向马如才传出了撤退信号。马如才直奔三堂庙，刚要进庙门就听到了撤退信号，他撤到城西北角，为了安全，先往城墙上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火光四射，烟尘飞扬，乘着烟尘立即爬上城墙跳了下去，也安全撤出城外。马如才从地上爬起来嘴里还骂道："妈的，老子出来啦!"郭占恒在城外正在寻找他，听到骂声迎了过去，然后五个人汇合在一起，在敌人送行的枪声中返回驻地。

一夜折腾，墙子路的敌人个个恐慌不安，日军小队长泽滕更是胆战心惊，越想越害怕。第二天我抗日政府又派人给伪大乡长送去了一封信，要他转告泽滕：八路军游击队这次进城只是一次警告，如再阻挠人民向抗日政府交粮交款，今后就不会再客气了。泽滕看了伪乡长交给他的信更加害怕，连忙讲道："八路军要的粮款，小小的秘密的给。"就这样，墙子路伪大乡所属村庄，所欠三年公粮和鞋袜，时间不长都如数送到了抗日根据地。

“郭大胆儿”的故事

马骏良

密云县潮河东至今还流传着“郭大胆儿”的故事。老人们一提起他就挑大拇指。这人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打仗英勇善战，不怕死，人们全佩服他。

他叫郭占桓，从小跟父亲在墙子路开肉铺。日本鬼子来了，打人，抓人，买肉不给钱，郭占恒对这群豺狼恨之入骨。1942 年春，他偷偷地从家出走，参加了八路军，在县支队突击组当一名战士。抗日打敌人得有武器，可当时支队里的枪支弹药奇缺，怎么办？战友间常常谈论这个话题。“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歌启发了他，他找队友吴长营、马如才商量，经支队首长批准，他们要爬城墙，夜袭敌人搞枪。

墙子路驻有日本关东军、矿警队和伪警察所，共约百余人。城墙建有坚固的城堡，有三个城门，东西两门堵死，只留南门出入。老百姓出城种地要经过严格盘查。晚上关上城门，大街上不准有行人走动。城墙上岗哨林立，有人穿梭巡逻。

郭占恒先潜入南关隐蔽起采，天黑后，找到过去邻居宋进增家。据姓宋的谈，伪警察龚得一常来他家打麻将。于是，核计假说打麻将，让宋去找龚得一。龚真的来了。一进门他就喊：“人齐了吗?”可进门后看到屋里有陌生人，先是一愣，忙问：“这几位是干什么的?”郭占恒趁势说：“我是八路军除奸队的，今天找你来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给日本人干事，没干多少坏事，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要你如实地把城内敌人情况详细说说。如不愿意说，下场是什么，你知道，不用我多说!”这个警察一下子脸刷白，额头冒

大汗。他哆里哆嗦地说：“长官，你只要不把我弄走，我什么都说。”

据龚得一交待：日本关东军驻在南门城楼上；十字街西南角红大门大院内住有华北矿山日本教官；警察所和自卫团驻在大街北三圣庙和观音洞；东西城门和北城各设一岗楼，警察和自卫团站岗；日本有两人夜10点钟左右巡逻查岗。郭占恒把情况弄清，向警察交待了政策，放他回去。然后跟吴、马两人研究办法。他们觉得事不宜迟，要连夜翻城突袭敌人，搞到枪支。夜12点，他三人带上爬城工具，选择城墙最坚固、敌人不注意地方，爬上城去。到了城上，一人留在暗处放哨，两人悄悄来到十字街。街上寂静得很，忽然从东边过来一个扛枪的黑影，两人急忙躲在墙根暗处。眼看黑影近了，郭吴两人一个箭步蹿上前去，将扛枪人按在地上。“不准动！喊就打死你！”这是个伪警，他乖乖地把枪交了。郭占恒问他矿警日本教官住在哪里？伪警指着西边的大门，说住在大院内。郭占恒厉声说道：“前边带路、叫门，不老实，让你知道八路军的厉害！”伪警鞠躬哈腰，直说愿意效劳。

门开了，开门人名叫丁秀和，他见警察领着两个人，说找教官有急事，不敢怠慢就把他们领进教官屋子。到屋一看，教官不在屋内，墙上挂着“14年式手枪”和望镜远，郭占恒顺手摘下插在腰间，把望远镜回身交给了吴长营。

看门人知道事情不妙，等到郭占恒问他教官去向，他已语无伦次：“不知道……。”

郭占恒说：“你先委屈一会吧。”用绳子将丁秀和捆上，嘴也用布堵上，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大院。出门前，照方吃药把警察也捆上放在大门洞内。

由进城到出城，一共不到两小时，干得干净利落。从此“郭大胆儿”便叫开了。墙子路一带，日伪人员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一两个人不敢出门。从此，他们干坏事的也少了，广大群众都为八路军

叫好。

郭占恒于1951年赴朝作战，后来当了团长。不幸，在与美国鬼子作战中英勇牺牲，这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

苏蒙联军与日寇投降

白 天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亲眼目睹了古北口日寇投降前后的全过程。

1945年5月，古北口火车站的“南满铁路警护团”——名义上是往来押车的铁路警察，实际上是日寇的一种军事组织，开始把日本长官的家属遣送回国。6月，每天晚上下了班，不许团员（警察）回家，而是由日寇的长官训话，内容是美国的B52型飞机十分可怕等，要团员参加义务劳动。7月，把团内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一律造册封存。8月初，日本长官带领全团人乘火车向北逃跑，说是把古北口放弃了，要到奉山线（沈阳～山海关）去。车到滦平县的拉海沟脱轨，又返回古北口，从北京（当时叫北平）走，在天津被国民党24军接收。

其它的日寇机关，也人心慌惶，不可终日。7月下旬，由唐山、津、京一带涌来了大量的日寇，住满了各家各户、学校、庙宇、长城的楼子、旅店、商店，只要有一点能蔽风雨的地方，就全住上了。他们不再耀武扬威，从长官到士兵，一个个无精打彩，像几天没吃饭的样子，见了老百姓，也假门假事地表示亲近。有一个大尉，住在笔者的家。那天他弄来个翻译，对笔者的父亲说：

“老先生，你们这些年吃苦啦！”“哎！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怕日本宪兵和特务打人、抓人。”

“这回放心吧！不再打人、抓人了。”

“为什么？”

“我们日本人在太平洋的战争失利；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垮台

了；我们在中国的日子也不会是很长了。”

“老先生，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就要当俘虏了，我这块手表，会被人夺去，我想送给老先生，请您收下，我们交个朋友吧！”

“谢谢您的心意，我不要，您还是先带着吧，好看时间。”

“……”

其实，古北口人早就看出他们已经成了困兽，只是不知道在他们将死的时候，会怎样挣扎。

8月21日上午10点，有五名苏蒙联军的军官，骑着马由北面来到古北口日寇的兵营。半小时后，山上、长城上、兵营里的日寇，都挂出了白旗。下午，苏蒙联军的军车、炮车、坦克，一辆接着一辆涌进古北口大街，有的停下来，有的经北门坡向石匣开去。

在古北口停下来的苏蒙军人，纵马上山，登上长城，把一群群的日寇，像赶绵羊似的赶下山来，集中到兵营的广场上。驻在河西的日寇不愿向苏联人投降，把许多笨重的东西都扔到潮河里。当时潮河正发大水，波浪滚滚，像炮车、子弹箱、摩托车等等，都交给了“河神”。把所有能烧的东西都堆在宽阔的大街上，如备用的军装、文件、汽车、木器、书籍等等，都交给了“火神”。于是轻装逃跑，奔向西山，走小路去石匣了。驻在东、南关一带的日寇，也是轻装上路，有的乘车，有的凫水，向石匣逃去。绝大部分的日寇军队和驻古北口的许多行政人员及家属，都被赶入兵营。而后，由日寇海军陆战队少将本野，率领全部日寇向受降的苏军敬礼，递交黄色的投降书和战刀，接着全体缴械、脱帽，都跪倒在广场上。

这时，兵营墙外的大街上，站满了老百姓，他们大声地喊：

“快来看呀，日本投降啦！都跪下啦！”

许多老百姓都笑得合不上嘴，老年人激动得泪水直流，颤颤地说：“真不容易盼呀！现在咱们总算是活过来啦！”

杀人如麻，不可一世的日寇，也会跪地投降啊！古北口人兴高彩烈，年轻人又跳又笑，到处欢欣鼓舞，从此不再是亡国奴了，自

由了，是自己祖国的主人了！

11月，苏蒙联军带着投降的日伪人员返回东北，八路军正式接管了古北口防地，当地人民这才兴高彩烈地真正回归到自己的家园。

从日军手里接收古北口

孙福明

古北口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解放，已经五十多年了，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文字记载不多。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人，多数已经作古，发生在那个时候的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鲜为人知。作为亲身经历这一幕历史壮举的我，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讲给后人听。

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我回忆的只是我随同当时承兴密县委书记李守善去古北口接受日军投降的一个片断。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军对日开战。迅速击溃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浩浩荡荡地推进到承德。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中。因此最后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反攻，自然要由敌后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进攻。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6 日，日军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的命令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又不放下武器，各根据地接受日本投降还要按军事从事。

9 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 128 万人向中国投降。

这时，盘据在古北口的日本侵略军还没缴械投降。冀热辽边区

所属十四分区命令承（德）兴（隆）密（云）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李守善去接管墙子路和六道河子两个敌人据点。

9月11日，李守善政委带领我们来到墙子路。日本兵有8人，日军官叫斋腾。在墙子路城南门内的钨矿选矿场上，日本军官斋腾命令交出所有枪支、弹药、掷弹筒等武器。其中有三八大盖、七九枪、歪把子机枪等50多支。李政委命令把枪支等武器交给当地民兵组织。

六道河村有日军20多人，日军官叫小野。在接收墙子路后立即来到六道河村日军炮楼旁，缴收了日军枪支60多支，掷弹筒五、六个，李政委命令放火烧了日军炮楼，把接收武器同样交给当地民兵。此后上级又命令李守善去接管古北口。

我当时是警卫班战士，时时守候在他身边。他接到命令后，召集县支队干部战士传达了上级命令，分析古北口的形势：古北口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是军事战略要地，伪“满洲国”进入华北的“海关”，不仅有日军把守，而且还有许多日、伪的宪兵队、华北汉奸政府的宪兵队、伪满洲警察署等等。还要与苏联红军打交道。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一点不能马虎。

李守善政委做了全面的布置安排。留下一部分同志做墙子路、六道河的善后工作；一部分同志随他去古北口。我记得这部分人里有县长项一、科长安林、秘书苏仁、民政科的林田……

我被从警卫班抽调出来，做李守善政委的勤务员。

郭占恒带领警卫班先头出发，负责了解情况，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李政委率领其余同志随后出发。

我们连夜急行军，第二天清晨赶到古北口南天门时，郭占恒已等候在那里了。他向李政委报告了情况，并和苏军取得了联系。因为国民党反动分子关伟臣抢先和苏军接上了关系，还建立了“区自治政府”，苏军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他们要证件和毛泽东的像片。

李政委听完郭占恒的汇报，立即命令通讯员张爱国赶到军分区（平谷县），取来一封信和一张毛泽东的照片。

李政委带领我们一班人进了古北口城内苏军驻地，会见苏军首长乌里涅夫，这位苏军首长是个师长，高大的身材，魁梧雄壮，褐红色脸膛，络腮胡子。他接过李政委递给他的信和毛泽东像片显得很高兴。虽然彼此语言不通，但他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承德人宋），双方还是能进行交谈。李政委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援，希望我们今后密切合作！"苏军首长不住地点头说："共产党是一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一家人，是兄弟。"

接着，双方讨论接受日本投降的工作，制定了受降方案。

9月13日下午，在日本兵营的广场上举行受降仪式。

几百名苏蒙联军的士兵围在广场四周，外围还有很多老百姓。48名日军官兵被苏军从马棚里赶出来，站到广场里。

李政委首先代表抗日政府讲了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仪式。这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苏联红军参战，为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让我们表示感谢！

广场内外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苏军首长也讲了话。

然后，由日本在古北口的最高军官向受降的中、苏军队首长行军礼，调转身去，用日语对日军喊了几句话，日军掌旗的士兵将旗子摆了几摆，翻了几翻，将日军旗放倒在地，他又指挥日军将手里的退了子弹的三八枪双手举过头顶，一齐跪在地上，而后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战刀。

苏军拍了照片，苏军师长举起手枪朝天连放数枪。日军发出一片悲哀的哭泣。

李守善政委在受降书上签了字，苏军师长也签了字。

郭占恒率领地方民兵收缴了日军的枪支，由苏军将缴械的日军

赶回马棚。

日本投降了！古北口解放了！

苏蒙联军于9月19日把古北口移交给承兴密县政府接管。

从193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统治古北口十二年，以彻底失败告终。

四、抗日英烈　丰碑永存

帽儿山七勇士

白　天

1933年3月初，日本侵略军逼近古北口长城，遭到我爱国将士的奋勇抵抗。帽儿山七勇士的事迹，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央军第17军25师，师长关麟征和73旅旅长杜聿明率军于10日早晨赶到古北口，占据古北口城、龙王峪口及其左右阵地，以北门坡顶的小老爷庙为抗战指挥部，立即进入战斗。

在由古北口城至龙王峪口这一段长十多里的道路上，有一座山峰，山峰的上部和北山相连，周围有高不可攀的黑色山崖；山崖上面，东西长15米，南北宽3—5米，是凹凸不平的峰顶。峰的上部从周围看，像是一顶黑色的帽子，所以从很早以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帽儿山”。它的北面靠东有一个60°斜坡，人们可以从这里绕着山石攀上山顶。此山距古北口东关一公里。

人们站在帽儿山山顶，往东直望到大岭梁、龙王峪；往西可俯瞰古北口城、河东、河西；往北可看到古北口的战略要地——将军楼、炮筒子沟口；往南可控制北甸子沟这一条古道，原是北齐长城的红门口，所以帽儿山的位置和地势险扼、重要。杜聿明旅长很重视帽儿山这一高地的战略价值，派了145团的一个班7名战士（兵源不足）在山顶上建立军事哨所，用电话传递周围的战斗信息和保卫古北口城右翼的军事行动。

11日10时，日寇攻破将军楼，占领长城以后，即乘胜以主力

向古北口城和龙王峪包围、猛攻。古北口东关外的北山，逐步被敌人占领。12日午时，帽儿山哨所和北门坡指挥部的电话线已被敌人的飞机炸断。龙王峪口的第一线部队由五里坨沟门儿溃退下来；高山间口、八士沟口（龙王峪的左翼）的官兵，由二寨沟溃退下来；原来守炮筒沟口又退守二寨沟的官兵也溃退下来。这时，帽儿山下的东、西、南三面人流滚滚，慌不择路。于是，敌人的飞机，三架、五架来回不停地向帽儿山下投弹；占领将军楼的敌人，用几门炮向这里轰击；八士沟口高山上的敌人，用机枪向这里扫射；北面山上的敌人，也向这里狙击。帽儿山上的七位战士，为了掩护撤退，向北面的敌人射击。帽儿山上、下和周围的硝烟与尘土，遮天蔽日。我方将士伤亡得十分惨重。下午，我方的官兵除死、伤的以外，已经撤到南关和南天门。帽儿山下的硝烟与尘土，渐渐飞散和落下去了，而哨所的七位战士却没有得到命令未能撤离。

日寇发现帽儿山顶上还有人继续抵抗，又见山势陡峭难攻，就用飞机投弹轰炸。炸弹在山顶周围不停地炸起烟尘、石块，山顶上沉寂了，一排排的日寇就从四面向上爬。当他们爬到不好向下退的地方，山顶上的机枪和步枪齐发，敌人就全被打死打伤，滚下山来。继而敌人又用大炮向山顶轰击，山上硝烟弥漫，山顶又沉寂了。敌人认为山顶上的人，一定都被炸死，又由四面向上爬，于是又都被山顶上的射击打倒滚下山来。这时班长发现有两名战士被飞上来的弹片炸伤，一个满脸是血，另一个的一条腿被炸断。班长正要解下裹腿去为他们包扎，东北角上有几个在大石块后面的日寇向上爬来，为了节约子弹，班长叫另外四名战士举起大石块向敌人砸去。一个敌人扔到山顶上一颗手榴弹，我们的战士那时不知道这像甜瓜一样的铁球是什么东西，但知道绝不是好东西，就给踢了下去，在敌人的身边爆炸了。

日寇接着用飞机、炮火和步兵联合总攻这个山顶。战士有的阵亡了，只剩四个人，顾东又顾西。那位断了腿的战士爬过来对班长

说："给我机枪！"让班长一边指挥一边战斗。机枪打红了，没有水，班长跑来往枪管子上撒了尿，继续射击。

敌人接近山顶了。战士们把最后的子弹打光，又搬石块向敌人的头上砸。石块也搬没了，敌人冲上来，战士用刺刀，用枪管拼杀，直到全部牺牲，帽儿山失陷。敌人先后死160多人，伤200多人。

日寇的长官原来认为山顶上有几十甚至上百人，这时一看只有七个人，对他们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派人把这七个人的尸体背下山来，在山阳面的黄土地上挖了一个深80厘米，长3米多，宽2米的平底坑，把这七具尸体一个挨一个地摆好，埋上土，堆成坟，前面立了一个高1.8米，宽18厘米的方棱木牌，上面写着"支那七勇士之墓"，然后集合全体官兵在墓前排好，由长官率领向勇士墓鞠躬。

1983年3月，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承德电视台、密云电视台等都先后来到帽儿山前进行纪念活动。

古北口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李大儒

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俗称肉丘坟），在古北口南关外公路（京承公路）的西侧。此墓规模较大，墓顶系用黄沙土堆积而成，高5米，底部直径10米。墓的四周，用砖砌着1.6米高的花墙，东面留有一门，门口两边筑有2米高的门垛，门垛上写着一副挽联，为何佩珩先生手笔。上联是："大好男儿光争日月"，下联是："精忠魂魄气壮山河"。门顶上有四块铁方，上面写着"铁血精神"四个大字。墓的前方还竖立着一座2.5米高的墓碑，碑额中镌刻着的几个大字是："癸酉年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就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然后继续向我华北进攻，于是就爆发了英勇悲壮的"古北口长城抗战"。1933年3月5日，日军开始进攻古北口，当时在古北口的中国守军——东北军和十七军等部的将士们，满怀"消灭倭寇、救国救民"的爱国热情，在古北口前线，奋力狙击，英勇杀敌。但是，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致使长城抗战失败，古北口终于失守。

战争结束后，古北口村头、路边、荒郊山野到处都有阵亡将士遗体。牺牲在路边街巷的烈士遗体由群众掩埋在菜窖，四野山谷的尸体则由道士王乐如领人就地掩埋。后来，即"塘沽协定"签订前后，由国民党中央政府起运五百余具尸骨赴蚌埠立墓另葬。还有一些尸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捐款，古北口商务会牵头，请道人王乐如组织群众再次从四野山谷，甚至到古北口外的马圈子等处，共起运、收敛尸骨三百六十余具，放在古北口南关外的西山根，然后就地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些尸体全部埋在坑里。一层

苇席，一层尸体，共埋三层。最后，在上面堆起一个高大的坟头，从此人们就叫它“肉丘坟”。并在“肉丘坟”的四周砌起一圈花墙，在花墙两边的门垛上写上挽联，墓前竖立一座石碑，正文为“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从此，这个公墓即成为炎黄子孙抵御外侮入侵的历史见证。十年动乱中被拆毁了花墙，推倒了墓碑，险些把坟头彻底铲平。古北口乡政府于1984年重新砌上了花墙，竖起了新墓碑（水泥制作），又恢复了这个公墓。

原来花岗石制做的墓碑背面刻有碑文，记述了收敛烈士遗体的全部经过，现存于古北口乡政府院内。



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

血沃幽燕　名垂千古

——记抗日英雄白乙化

曹友林　鲍星时

在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密云水库北岸，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密云县河北村南山顶，绿树丛中矗立着一座庄严雄伟的大理石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原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将军手书的8个大字：“血沃幽燕，名垂千古”。它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平西、平北一带令日伪闻名丧胆的抗日民族英雄、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团长、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奠基人白乙化烈士。



抗日民族英雄白乙化，1940年初在平西根据地。

白乙化，字野鹤，满族人，1911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十五）出生于

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自幼天资聪敏，7岁入石场峪公立小学读书，13岁以优异成绩考入辽阳县立中学。中学读书期间，带领同学“抵制日货”，参加“不买洋货要买国货”的爱国宣传活动。

1928年中学毕业，立志武装救国，考入沈阳东北军教导队，不久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本科。1929年因不满军阀混战，离开讲武堂到北平入弘达中学补习，同年秋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进步书刊，1930年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白乙化满怀激愤，向校方提出抗战申请，其中写道：“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校方被他的爱国激情所感动，批准请求，并决定在抗敌期间保留其学籍。

1931年秋后，白乙化只身返回辽阳，寄身于吕方寺高级小学，以教学为掩护，联络有志之士，秘密积蓄力量。1932年5月，告别怀孕三个月的妻子，离开家门。不几日便带领三位同志奇袭辽阳伪警察局，夺走10支步枪，组织起一支抗日义勇军，号称“平东洋”，白乙化自任司令。他率领这支抗日队伍转战于辽西、热东，在鸽子洞、沟帮子火车站、凌源镇等地给日伪军以有力地打击，队伍也迅速扩展到3000余人。1933年春，由于日军“围剿”，白乙化所部粮弹不继退入关内，被国民党三十二军在冷口强行缴械遣散。

白乙化含愤复回北平中国大学，插入政治系13班继续读书。1935年夏完成大学学业，因学习成绩优异，留校文书股任职，并参加中大学生会的领导工作。白乙化身在北平，心在沦陷的白山黑水。他和董毓华（王仲华）等联合东北同学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面对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新闻、言论控制，白乙化等巧妙地出刊了一期《抗×救□》壁报，其按语中说：“人家是不允许抗×（抗日）的，可允许‘抗×’吗？神圣的

家族老爷们是不让救□（救国）的，可让‘救□’不?”这期壁报以新颖醒目的标题，耐人寻味的含意，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爱国运动。为了阻挡学生参加请愿活动，这天清晨，国民党警察当局派军警把守中大校门，不许学生出入。白乙化和董毓华带领100来名学生乘代表与军警交涉之机，逾后墙而出，沿途联络和接应了师大女附中、市立女一中等校学生，最早抵达原定集会地点新华门。学生们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毫无结果，遂改请愿为游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白乙化与另一学生合举着一横幅标语，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途中遭到军警镇压，从高压水龙中喷出的冰冷的水柱无情地浇在身上、脸上，那个学生由于惊慌扔掉了横幅，白乙化毫不畏惧，拾起被扔掉的一边，一个人举起横幅，迎着军警的水龙、警棍奋然前行。12月16日，北平城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白乙化和董毓华率领中大学生以及弘达中学一院、北大法商学院的学生作为第二大队，向预定的集会地点天桥进发。途中，国民党军警、宪兵、大刀队设下了多道拦阻线。他们指挥学生化整为零，巧妙地避开拦阻，全部按时到达天桥，参加了抗日大示威。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中，白乙化以勇猛无畏的行动赢得了“虎将”称号。

1936年2月21日，国民党北平当局开始大肆搜捕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正在北大法商学院一个集会上演讲，痛斥卖国贼的白乙化被冲进会场的军警逮捕。27日，北平国民党当局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了白乙化等爱国师生。

1936年夏，白乙化奉党的指示，赴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也称东北义勇军垦区）工作，不久担任中共垦区工委书记。他一面参加开荒，一面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在垦民中发展党的组织。根据垦区青年多、抗日情绪高的特点，利用办小报、教唱抗日歌曲、组织爱

国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扩大党的影响，推动垦区抗日运动的发展。白乙化亲自谱写了《垦区歌》："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吃饭就得做工，做工必须努力。不受剥削，不分阶级，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东北老家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白乙化领导垦区工委积极筹备，准备组织武装暴动。为了充实暴动骨干力量，7月13日，白乙化亲赴北平将"西安事变"后被解散的东北军学兵队部分学员及爱国青年学生王志成、王亢、师军、王波、江鹤等80来人接到垦区。10月，日寇节节进逼，归绥、包头先后失守，白乙化立即赴太原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并请示工作。垦区内一伙反动分子预谋把垦区武器交给国民党军队。中共垦区工委考虑到形势突变，因此提前组织了武装暴动，抢先夺下垦区的全部枪支。第二天白乙化赶回垦区，当即整顿队伍，宣布成立"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白乙化任总队长，并率领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南渡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东进抗日。

白乙化率部历经艰险，1938年6月胜利到达雁北，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师。白乙化将本部干部全抽出来送到三五九旅随营学校培训，学习作战、做群众工作，学习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队伍素质飞速提高，面貌焕然一新。同年秋，白乙化率本部配合三五九旅进行了粉碎日伪对雁北地区大举围攻的战斗，取得毙伤敌一批、毁敌汽车40余辆的战绩。

1939年4月，白乙化奉命率部开进平西抗日根据地，抗日先锋队与1938年冀东暴动中诞生的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王仲华（董毓华）任司令员，白乙化任副司令员。王仲华不久病逝，白乙化独自挑起了领导华北抗联的重担。他对部队严格整顿训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原来较松散的抗联很快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6月，白乙化指挥抗联将进犯平西的日军大岛大队奥村中队等300余人截击于楼儿峪，激战三天，白乙化亲手用步枪

打倒敌人3个旗语兵，使敌指挥失灵，毙伤敌奥村中队长以下130余人。

1939年底，华北抗联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1940年2月，白乙化率十团夜袭平西重镇门头沟，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批粮食。2月底，日伪军近万人兵分10路大举围攻我平西根据地，十团奉命阻击西面来犯之敌。白乙化率部与敌激战10多个昼夜，击退敌人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的无数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战后，白乙化受到挺进军首长的表扬。

1940年春，为了完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提出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白乙化奉命率十团挺进平北，创建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萧克司令员亲自向他交待了任务，指示：开辟丰滦密可使平西和冀东连成一片，形成对日伪华北大本营北平的三面包围，切断连接伪华北与伪满洲国的交通干线——平古铁路，破坏日本的所谓对苏战略防线，开拓挺进东北的前哨阵地。

白乙化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到最艰苦的抗日战场去，打回东北去是他的宿愿，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意识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回到十团驻地，他将曾到过丰滦密地区的挺进军政治部主任伍晋南请到十团介绍情况，又召集干部会议仔细研究进军平北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制定出具体的进军方案和应变措施，对战士们进行思想动员，还亲自下连队检查准备情况。为了隐蔽自己，采取"梯次进兵"的方案，命令三营及部分团直人员作为先遣队，由团参谋长才山和政治处主任吴涛带领，于4月出发，先期进入密云县西部的水川地区，了解情况，宣传抗日，筹集粮草，为团主力到来做必要准备。

5月，白乙化亲率主力一营和司、政、供、卫人员作为第二梯队，从平西百宝岭出发，向平北隐蔽挺进。临行前，《挺进剧社》的陈靖赶来送行，并关切地询问将从哪里突破平绥路封锁线，白乙

化风趣地引用《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巧妙作答："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居庸关是有名的长城要塞，可白乙化却偏选这里为突破点，在南口、沙河之间出敌不意地越过了平绥路。

白乙化率队到达昌平县沙塘沟，与在此迎接的三营九连汇合。22日上午，伪满洲军三十五团二营前来进犯，此时避开敌人已不可能，白乙化当机立断，命令一营抢占沙塘沟东北面的山梁痛击敌人，自己站到村头指挥。敌人连续7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傍晚，敌人伤亡60多人狼狈撤走。白乙化率队连夜出发继续按计划东进，途经南天门歼伪满洲军一个排，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10分钟一举攻克琉璃庙子据点，于5月28日在密云赶河厂与三营会合。

白乙化对丰滦密地区的敌情、民情、地理环境作了细致地调查研究，鉴于密云西部云蒙山区地跨长城内外，又是伪华北与伪满洲国的接合部，山高林密，靠近平原，群众基础较好，因而作出了以云蒙山为中心开辟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了"集中主力于外线打击敌人，掩护内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活动方针。白乙化从十团抽调出4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与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一起深入云蒙山区、白河两岸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6月建起了丰滦密抗日联合县。为保证地方开辟工作的顺利进行，留下三营七、八连在内线，率一营北出长城，深入丰宁、滦平等地进行外线游击作战，掩护内线开辟，同时接应七团进入平北。

为了吸引敌人，白乙化故意率部在大白天行军，牵着尾随的300余日军在大山里转悠了几天。一天夜里突然甩掉敌人，北上捣毁了五道营子据点，接着东进重创小白旗的敌人，再南下袭击司营子据点，又北上攻克虎什哈据点。又突然出现在丰宁境内，歼灭大草坪据点伪满洲军一个营。白乙化充分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惊呼："延安的触角伸进了满洲！"

在外线游击作战，伤员没有地方安置，白乙化便把他们带在身边。行军时，他身边又是担架、驴驮，又是伤员病号，团部变成了

卫生所，可他毫不厌烦。喇嘛棚子战斗，一营副营长冯克武负伤，白乙化特意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由于疼痛，冯克武夜间不断呻吟。白乙化不顾劳乏，彻夜不眠地守护他，安慰他。

伪满统治下的农村经济凋零，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甚至有的一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这更激起了白乙化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和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一天，一个10岁的男孩子找到十团要求参军报仇。他叫卜兴安，是丰宁大阁附近人，他的母亲和姐姐被日寇活活烧死，父亲和妹妹也惨遭日寇杀害，只有他逃出了魔爪。白乙化知道了卜兴安的悲惨身世，心如刀割，毅然把他收留下来。当晚就在油灯下亲手用自己的军装为卜兴安改制了一身小军服，早晨亲手为他穿在身上，周围的干部战士无不感动。白乙化为培养这个孤儿费了很多心血，教他学文化，教他打枪投弹，给他讲革命道理，使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抗日小战士。后来卜兴安在密云县臭水坑事件中英勇牺牲。

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白乙化率领一营终于在五道营一带与七团会师。七团到平北后，不断遭到日军的围攻，不久撤回平西。白乙化也率一营返回长城以内的密云地区。

由于外线作战的掩护，丰滦密内线开辟工作进展迅速。密云白河两岸大片地区的伪保甲制度被摧毁，相继建起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国会、自卫军、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白乙化还从十团抽调出一批干部协助地方先后组建起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四海游击队等数支区级地方武装。并亲自到各区视察指导工作，广泛拜访地方上层人士，扩大统战影响。1940年7月，丰滦密联合县为培训地方干部、筹建基层党组织而举办了救国会干部训练班，白乙化多次为训练班讲课，并在训练班结业证书上题词，勉励学员：“勇敢工作，坚（艰）苦学习，领导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8月下旬，为配合“百团大战”，白乙化率十团出击敌人连接伪

满与伪华北的交通命脉平古铁路，攻克小营车站，烧毁陈各庄铁路大桥，使敌铁路运输一度中断。9月，为配合“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白乙化率部再次出击平古铁路，乘虚直捣怀柔火车站，焚毁了停在车站的车辆、军火。两次出击平古路，受到晋察冀军区的表扬，被授予奖旗一面。

丰滦密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像一把尖刀插在伪满洲国和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引起敌人的极度不安。9月11日始，4000余日伪军对丰滦密发动了为时78天的大“扫荡”，采取“多头并进”、“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等多种战术，妄图一举吃掉十团，摧毁丰滦密。面对强敌压境，白乙化不畏惧，不退缩，针对敌强我弱和四面被围的形势，制定了“敌进我进，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开辟新地区”的反“扫荡”战术方针。令三营坚持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亲率一营跳出包围，乘虚插入敌人背后，取得了保育岭、达峪等一系列战斗胜利，歼敌一批。同时新开辟了长城外的贾峪、对大峪、黄峪口和石匣、古北口以西的半城子、不老屯一带大片地区。三营也在内线采用分散游击、集中歼敌等战术，在人民支援下连续取得了水堡子、梨树沟、白道峪等一系列战斗胜利。“扫荡”之敌在我内外线夹击下，损兵折将，于11月28日草草结束了“扫荡”，分途撤兵。白乙化又及时率主力返回基本区，寻机打击撤退之敌。12月15日一营在冯家峪伏击撤退之敌，一举消灭号称“常胜部队”的日军铃木大队哲田中队90余人，夺取了此次反“扫荡”的最后胜利。

反“扫荡”结束后，白乙化提出总结此次反“扫荡”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经过全团干部战士的认真讨论，最后由白乙化概括成几条基本经验：一、利用好敌人眼皮底下的地方，当敌人围攻时靠外线打击敌人；二、能打就狠狠打，不能打就放脚走，有便宜不放，没便宜不干，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以极大的毅力和灵活的战术拖瘦、耗干、打败敌人；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有效地

消灭敌人。这些经验，对以后十团在环境极其残酷的丰滦密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日伪赶走十团的野心没有死，他们到处散布“树叶落，八路军走”的谣言，妄图以此来动摇丰滦密人民对十团的信赖，同时也指望冬季的严寒能迫使十团撤出丰滦密。白乙化吸取前几次我军无法解决过冬棉衣而被迫撤出平北的教训，刚到丰滦密就着手筹办棉衣。他派人潜入敌占区采买，逐渐积存了足够的棉布棉花。反“扫荡”胜利后，立即动员根据地的妇女昼夜赶制，仅几天时间全团都换上了崭新的棉衣。没有棉帽，又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从北平买来酱色的毡帽头。白乙化穿上灰棉衣，戴上毡帽头，站在战士队列前自豪地讲：“我们的棉衣穿上了，新式钢盔（指毡帽头）戴上了，敌人靠“扫荡”赶不走我们，靠老天爷更休想赶走我们!”

丰滦密人民爱戴和信赖十团，更把白乙化看成是传奇式的英雄，“小白龙”的名字和事迹到处流传。当地流传着善良的白龙与凶恶的黑龙斗争的神话故事，当地百姓就把白乙化与神话中的白龙连在一起，说他是神龙的化身，是来惩恶扶善、救苦救民的。白乙化脸上留着又黑又浓的络腮胡须，与众不同的是向上长着，百姓传说那是“龙须”，能预知吉凶。对此，白乙化深感不安，对群众讲：不要把什么“龙”挂在嘴上，八路军有能耐，一靠共产党的领导，二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白乙化不过是八路军的一名普通战士。

“健全自己，影响旁人”，这是白乙化始终坚守不渝的格言。他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在生活上，他和战士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搞任何特殊，甚至连上级分配给他的一匹骡子也很少自己骑，行军时总要让给伤病员。在练兵场上，他和战士一样摸爬滚打，因此练出了双手使枪、百发百中的好枪法，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训练休息时，他给战士们绘声绘色的讲《三国》，讲民间故事和革命故事，讲得既有趣又富于启发性。有时，他和战士们

一起兴致勃勃地做游戏，玩丢手绢，战士们串通起来专门抓他，让他唱东北“二人转”或京剧，或者朗诵诗词，他总能满足大家的要求。由于他平易近人，与战士亲如手足，所以干部战士都尊敬他，亲近他。

白乙化平时治军极严，令出必行，不容稍殆。尤其在维护群众纪律方面，更是一丝不苟。如果谁触犯了群众纪律，他都毫不留情地给以严肃处理。十团驻在迎城岭村，有人检举团采购员吴章有严重问题。白乙化马上派人调查，查明吴章确有勒索群众钱财、贪污挥霍公款、吸大烟、玩弄妇女等劣行，手段卑鄙，影响极坏，败坏了八路军的声誉。白乙化立即召开全团大会公开审判吴章，并依照军纪将其处决。正由于白乙化认真维护军纪，严格部队管理，才使十团形成了遵纪爱民、勇猛顽强的优良作风，成为一支得民心、慑敌胆的战斗部队。

1941 年 1 月，白乙化的战友、中共平密兴联合县县委书记李子光由平西返回冀东途经丰滦密。一日闲暇，白乙化陪李子光到密云赶河厂村西的龙泉庵游览。龙泉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掩映在万木丛中，清澈的白河水在庵前山脚下潺潺东流。住持老僧将两人让进禅堂用过清茶，又在前引导参观。老僧久慕小白龙的威名，当他得知眼前这位战士装束、浓须倒长的魁梧军人就是小白龙——白乙化时，又惊又喜，当即取来笔墨，一定请白乙化在寺院影壁上题诗留念。白乙化谦辞不过，接过笔来，饱蘸浓墨，略加思索便挥笔写下了五言律诗一首：

古刹映清流，松涛动夙愁。
原无极乐国，今古为诛仇。
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
燕山狂胡虏，壮士志增羞。

诗以明志，这首诗正反映出白乙化誓把侵略者早日赶出中国的迫切心情。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九），伪满滦平县警务科长关直雄（日本人）指挥道田讨伐队170余人沿白河川向我进犯，欲乘我军民过节之机捞点便宜。敌人刚到张家坟，我丰滦密游击大队即与之战斗。白乙化当即命令游击大队且战且退，诱敌至鹿皮关，命令驻马营的三营抢占鹿皮关以北的白河西岸山梁截敌后路；命令驻赶河厂的一营赶赴白河东岸山梁布阵；准备全歼进犯之敌。可是，敌人进至五道岭后，没有再沿着河川走，而是攀上马营西北的降蓬山山脊向南面直插过来，与我一营相遇，激战随即在降蓬山西山坡上展开。战斗刚打响，白乙化就赶到前沿，手执令旗站在降蓬山顶一块大青石上指挥。警卫员怕发生意外，硬把他拉下大青石。敌人很快被我一营击溃，部分残敌退到长城楼子里负隅顽抗，我军的进攻受阻。白乙化见状又跃上大青石，挥动令旗，高声命令一营营长："王亢，冲锋！……"就在这时，长城楼子里的敌人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白乙化魁梧的身躯无声地倒下了，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3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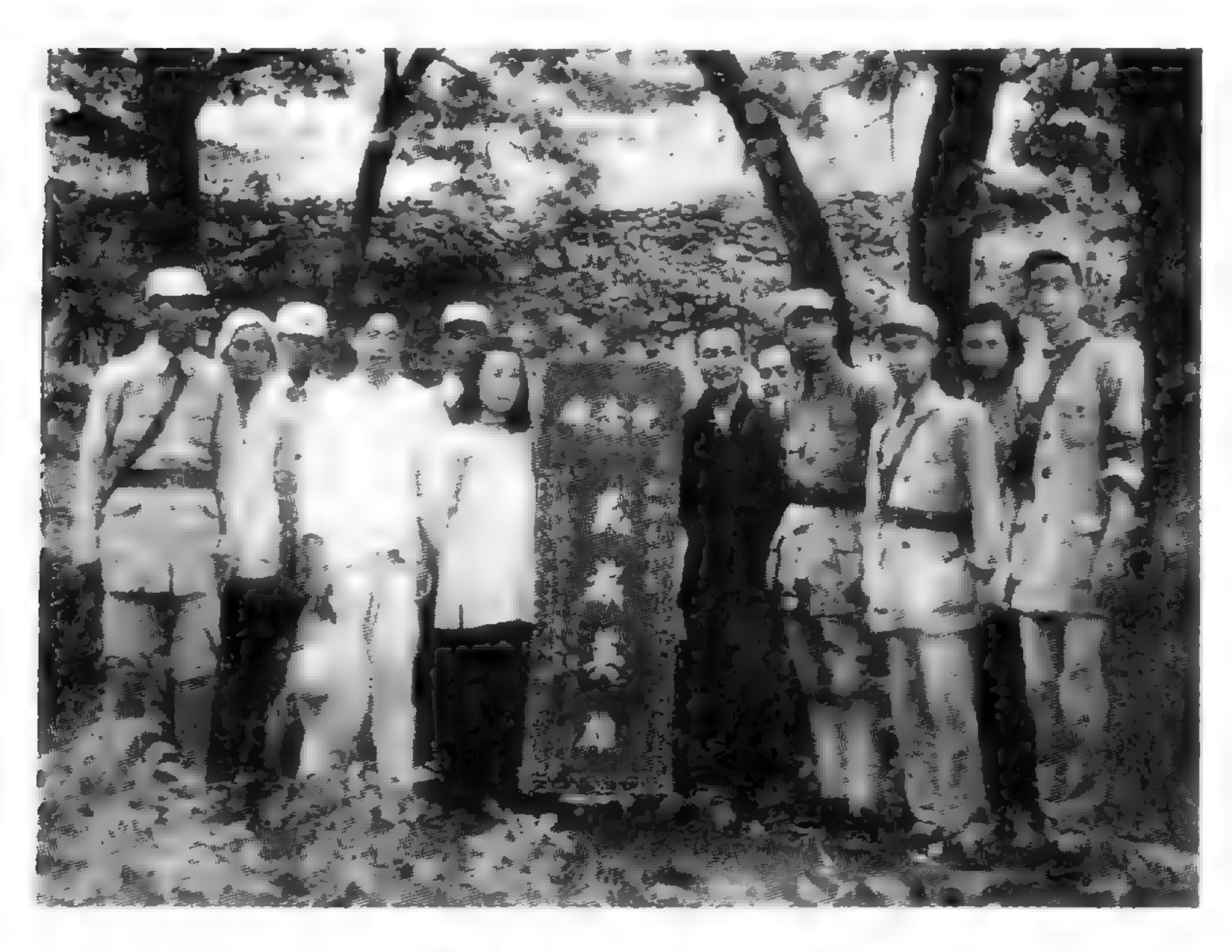
马营战斗我虽消灭敌人117名取得重大胜利，但白乙化的不幸牺牲也使我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噩耗传开，军民无不失声痛哭。丰滦密游击大队教导员刘力生挥泪赋《哭白团长》诗一首：

名将星沉冀北踪，降蓬山下夕阳红。
兵挥白马身先死，旗指黄龙志未终。
血泪家乡十年隔，风云事业一生匆。
长河若解英雄恨，滚滚奔涛怒向东！

白乙化牺牲后，遗体安葬在降蓬山东坡一棵栗子树下，丰滦密联合县还为其树立了"民族英雄"纪念碑。4月，十团和丰滦密联合县在石城召开3000余军民参加的隆重追悼大会，会上宣读了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为追悼白乙化同志而发布的《告全军同志书》，指出白乙化的不幸牺牲，"不但是八路军挺进军的损失，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损失！因为损失了一个有着丰富军事

经验的优秀指挥员，损失了一个有着长期斗争历史的坚强党的干部，损失了一个曾为民族独立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英雄，损失了一个曾为阶级解放而再接再励、英勇牺牲的无产阶级的先锋。”

白乙化烈士虽死犹生，他的革命业绩铭记在人民的心里，激励后人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民族英雄”纪念碑

附：白乙化生平活动简表

1911 年

6 月 11 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一个满族职员家庭。

1918 年（7 岁）

入石场峪公立小学读书。天资聪敏，学习勤奋，课余攻书法、诗词，有“才子”之名。

1924 年（13 岁）

夏，高小毕业，考入辽阳县立中学。

1925 年（14 岁）

日货冲击辽阳市场，当地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白乙化在辽中带头发起“抵制日货”的学潮，辽阳各界群起响应。

1927 年（16 岁）

带领学生罢课，抗议校长周味尝任意上涨学费，开除进步教师，并带领几百学生到县教育局请愿，要求罢免校长。罢课斗争胜利，校长被撤换，但白乙化被教育局点名开除。全校学生再次罢课抗议，教育局被迫改“开除”为“记过”处分，白乙化重返校园。

1928 年（17 岁）

夏，高中毕业。时值济南“五三”惨案发生，白乙化深感国亡在即，立志武装救国，赴沈阳考入东北军教导队，旋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本科。

1929 年（18 岁）

春，因反对军阀混战，发表不满言论而被军校当局追究，逃至北平，入弘达中学补习功课，准备高考。

秋，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

1930 年（19 岁）

秋，在中大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月 29 日，遵父命回石场峪与三块石村邹广娟成婚。婚毕返校。

1931 年（20 岁）

9 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辽阳沦陷，不久，东北全境沦陷。白乙化满怀激愤向校方递交回乡抗战申请，发出了“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的誓言。校方批准，并决定在抗敌期间保留其学籍。

秋后，只身返辽，寄身于吕方寺小学，以教国文为掩护，联络有志之士，秘密筹建抗日武装。

1932 年（21 岁）

3 月，回家筹措起事经费。

5 月 11 日，告别初孕的妻子，离开家门。不几日即带领有志之士三人，凭两支步枪奇袭辽阳县伪警察局，夺走步枪 10 支，遂组建“平东洋”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

其后，率部转战辽西、热东，先后于鸽子洞、沟帮子火车站、凌源镇等地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不久，队伍发展到 3000 余人。白乙化因指挥灵活、英勇善战、每战必身先士卒而获“小白龙”的美称，威名远扬。

1933 年（22 岁）

春，日军“围剿”甚凶，白乙化部弹尽援绝退入关内，被国民党三十二军骗入冷口强行缴械遣散。

春末，含愤复回北平中国大学，插入政治系十三班继续读书。读书期间不忘救国，与挚友吴涛等共创“政治学社”。

1935 年（24 岁）

6 月，获“学士”学位，留校文书股任职员，兼任中大学生会副主席。与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等创立“东北问题研究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2 月 9 日，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晨，军警封锁校门，白乙化率 100 余学生自后墙逾出，沿途接应了师大女附中、市立女一中等校学生，最早抵达新华门。学生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

不成，遂游行示威。白乙化与一学生合举横幅标语，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途中遭军警镇压，学生惊慌中扔掉横幅，白乙化独自举起横幅，迎着水龙、警棍奋然前行。

同月16日，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爆发。白乙化指挥由中大、弘达中学一院、北大法商学院组成的第二大队，巧妙避开军警宪兵的多道拦阻，按时到达天桥，参加了抗日大示威。白乙化因在运动中机智勇猛、作用突出而获“一二·九虎将”的称号。

同月22日，为揭露国民党北平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北平学联在中大逸仙堂举办血衣展览。白乙化参加筹备并主持了展览，还为展览手书横标：“血淋淋铁的事实！”

1936年（25岁）

2月21日，北平学联在北大法商学院召开救亡大会，白乙化赴会作演讲。会毕被捕，在狱中不屈不挠，据理抗辩，团结同牢学友坚持斗争。

2月27日，被学校保释出狱。

7月，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学联组织进步学生于樱桃沟举办夏令营，白乙化任总队长和军事教官，做军事报告并指挥进行游击战、阵地战训练演习，向学生灌输武装救国思想。

夏末，辞去中大公职，奉党的指示赴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亦称东北义勇军垦区）工作，任垦区理事、森林股股长，党内任中共垦区工委书记。

白乙化对己提出“健全自己，影响旁人”的要求，与垦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主持创办《抗日先锋》报，建立各种文体和学习组织，藉以团结教育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先锋队，领导垦民不断与垦区内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使垦区成了党争取爱国青年、培养抗日干部的一个基地。

在此期间，白乙化谱写出《垦区歌》：“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吃饭就得做工，做工必须努力。不受剥削，不

分阶级，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东北老家去！”垦民纷纷传唱，从中深受教育和激励。

1937年（26岁）

7月7日，抗战爆发。白乙化领导垦区工委积极筹备武装暴动。

同月13日，亲赴北平将“西安事变”后被解散的东北军学兵队部分学员及爱国学生等共80来人接至垦区，其中许多人是中共党员，充实了暴动骨干队伍。

9月初，赴太原向中共北方分局汇报和请示工作。

同月末，主持召开垦区工委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垦民家属撤往延安，留下者准备暴动，夺取垦区枪支，组建抗日武装。

10月上旬，日军逼近，归绥、包头相继失守。白乙化立即赶往太原向上级汇报暴动计划。

同月19日，晨，因垦区内一伙反动分子预谋起事，垦区工委抢先发起暴动，夺取枪支控制了垦区。第二日，白乙化由太原赶回，当即整顿队伍，宣布上级决定：成立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白乙化任总队长。先锋总队初时共200余人，其中大学生72人。

是时，垦区周围国民党军环伺，为保护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白乙化找到东北挺进军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他们与该军司令马占山商定，抗日先锋队编入东北挺进军为挺进支队，白乙化被委任为支队长（旅级），借以作掩护，并得到了武器弹药补充。

11月，白乙化率部作为挺进军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进抵东胜县御敌。

1938年（27岁）

初，东北挺进军驻防黄河西岸的哈拉赛一带。白乙化在积极备战之余，派人与河东岸中共山西河曲县委取得联系。

春末，傅作义侦知白部为共产党的武装，电令马占山以“触犯军纪”为由“从速严惩”。白乙化预先得知，急率部东渡黄河，脱

离马占山部。在中共河曲县委帮助下，找到八路军一二〇师，配合该师转战晋西北，取得煤窑沟战斗等胜利。

6月，抗日先锋总队奉命继续东进，越平绥路，渡桑干河，抵雁北的广灵县东河南镇，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合。白乙化将本部排以上干部全部抽出，送至三五九旅随营培训。

秋，率本部配合三五九旅粉碎日伪对雁北的大举围攻，毙伤敌一批，毁敌汽车40余辆。

1939年（28岁）

4月，抗日先锋队奉命开进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原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白乙化任副司令员。不久，因司令员王仲华病逝，白乙化负起领导抗联的全责。

同月，鉴于新组建的华北抗联战斗素质差，作风松散，率队于马兰村整训。白乙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既苦练杀敌本领，又狠抓作风整顿，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训近两个月，抗联面貌焕然一新。

6月，率抗联一、三大队于娄儿峪伏击进平西根据地“扫荡”的日军大岛大队，激战两日。白乙化用步枪连续击毙3名日军旗语兵，使敌指挥大乱，又亲率战士反复冲杀，终获大胜。毙日军大岛大队长等130余人，迫使奥村中队长等3名日军官逃进山神庙悬梁自尽。

7月，率部出击房山、良乡，在下马岭、公主坟、赵家台、王平村等战斗中连续重创日伪军。

年底，华北抗联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

1940年（29岁）

2月，率部夜袭平西重镇门头沟，歼敌一部，夺回大批粮食。

2月底，日伪军对平西根据地发起10路围攻。白乙化指挥十团在青白口、东胡林一线迎击西路的4000余日军，激战10余昼夜，

毙伤敌300余人，击落敌机1架。和兄弟部队一起，仅14天就粉碎了敌人原计划40天的大“扫荡”。

4月，奉命开辟平北敌后根据地，遣三营先期进入平北密云西部地区。

5月20日，率一营等向平北挺进。22日于昌平县沙塘沟击溃前来堵截的伪满军一个营，继续东进途中又克南天门和琉璃庙子伪军据点，28日抵密云县赶河厂与三营会合。

6月，决定以密云西部云蒙山区为中心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根据地。抽出40余名十团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在三营掩护下，深入云蒙山区、白河两岸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政权。

为掩护开辟地区，率一营北出长城，深入伪满洲国的丰宁、滦平境内作战。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连克五道营子、小白旗、司营子、虎什哈等日伪据点，几日后又攻克丰宁大草坪据点，全歼伪满军一个营。消息传至伪满新京长春，敌人惊呼：“延安的触角伸进了满洲！”

7月，率部返回云蒙山区。由于外线作战的掩护，地区开辟进展迅速，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已于6月宣告成立。白乙化致力于地方建设，组建各区游击队，帮助指导政权工作，广泛拜访地方上层人士，扩大统战影响。丰滦密联合县为培训本地干部和培养发展党员而举办救国会干部训练班，白乙化亲自讲课，并为训练班结业证书题词：“勇敢工作，坚（艰）苦学习，领导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8月，为配合“百团大战”，率部出击连接伪满与伪华北交通干线平（北平）古（北口）铁路，克小营车站，烧陈各庄大桥，使敌铁路运输一度中断。

9月初，为配合“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率部再次出击平古路，计取怀柔车站，焚毁大批车辆、军火。两次出击平古路作用很大，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奖旗。

同月11日，4000余日伪军对丰滦密白河两岸中心区发动大“扫荡”。白乙化制定出“敌进我进，到外线打击敌人开辟新区”的反“扫荡”方针，留三营在内线牵制和打击“扫荡”之敌，率一营乘虚插入石匣、古北口以西的敌占区，打击日伪军，摧毁伪政权，新开辟出大片地区。

11月28日，十团内外线结合共历37次战斗，彻底粉碎“扫荡”，日伪军开始分途撤兵。白乙化及时率主力回归，寻机打击撤退之敌。12月15日，于冯家峪南湾子设伏，一举消灭号称“常胜部队”的日军哲田中队90余人。由于反“扫荡”的胜利，丰滦密根据地由4个区扩展为8个区。

1941年（30岁）

1月，带十团驻密云石塘路、马营、赶河厂休整。

2月4日，指挥马营战斗，消灭伪满道田讨伐大队117人。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头部，以身殉国。



白乙化烈士纪念碑

救国救民英雄千古

——王波烈士传略

张怀敏　曹友林　鲍星时

密云北部半城子水库北岸，一片翠绿的柏林，掩映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碑园，它纪念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将热血洒在密云大地的八路军指挥员王波烈士。



王波烈士遗照

王波原名王慕禹，一九一一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绣匠屯村。自幼聪敏好学，然家境贫寒，无力供其读书，适与苏家订亲，苏家家境较好，王波即由苏家供给学费上学。一九三一年王波与苏雪金完婚，新婚燕尔正待发奋上进，日本侵略者却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强占沈阳城和东北三省。血气方刚的王波恨沦陷之耻，愤然离别故土，流亡关内，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魔爪继续伸向华北，平津危机，王波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毅然将前来探视他的怀孕妻子送返故里，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救亡事业。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赴绥远扒子补隆垦区工作，负责编辑垦区《抗日先锋》小报，凭借这块阵地，热情地宣传抗

日，呼吁救国。王波长于文笔，绰号“高尔基”，因此经他编辑出版的小报，观点明确、内容丰富、消息灵通、图文并茂，很受垦民欢迎。一九三七年夏王波参加中国共产党。十月，白乙化等领导垦区暴动，组织抗日先锋队，王波满怀解放家乡挽救祖国危亡的雄心大志，积极参加，并担任抗日先锋总队政治干事。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为开赴抗日前线，抗日先锋队南渡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向晋西北挺进。一九三八年一月到达河曲，归入八路军的军事建制。此时，王波一面行军打仗，一面继续编印《抗日先锋》小报，撰写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六月，抗日先锋队东进到雁北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师，为了向老红军学习，王波和先锋队其它干部跟随旅机关工作组深入部队和农村，参加战斗，学习建军、建党、建政、发动和组织群众等工作。五个多月的时间，不仅学到了红军作战和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也学到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王波以后成长为能文能武的指挥员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他把王慕禹的名字改为王波。由于抗日先锋队已发展到五百多人，遂改编为三个大队，王波任一大队政治干事。一九三九年四月，抗日先锋队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六月与冀东抗日联军合并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王波任三大队教导员。在王波领导下，三大队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月，日军大岛大队奥村中队进犯我平西根据地，三大队受命正面阻击敌人，两天时间没能吃上一顿饭，但在干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大队战士始终情绪饱满，勇敢战斗，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三大队的政治工作也经受了战斗的考验。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正式改编为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王波任三营教导员。四月，十团奉命挺进平北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三营作为先遣队首先进入密云西部的水川地区。王波等三营领导干部率领三营配合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

众，宣传抗日，筹集粮饷，为主力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团主力到达后，又留在内线协助地方干部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组织，为丰滦密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九月中旬，日伪军对丰滦密发动为期七十八天的大“扫荡”，三营又奉命留在内线坚持斗争。为了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三营化整为零，王波亲自带领七连与敌战斗。当时正是秋冬交替季节，他们身着单衣战斗在高山峻岭间，艰辛倍尝。一次七连被困在水堡子南山三昼夜，夜间寒风刺骨，白天仅能以萝卜充饥。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王波一面战斗，一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给战士讲抗日战争形势，讲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前景，坚定大家的抗日信心。后在王波指挥下，七连战士冒着敌人的弹雨，以大石作掩护，冲上山顶，越过山梁胜利突出敌人的包围。他们到达一个小山村，那里满目疮痍，人民穷困得连衣服都穿不上，指战员怒火中烧，一致谴责日军的侵略暴行。王波当时将仅有的替换裤子拿出来让一位三十多岁没穿裤子的妇女穿上。王波带领七连与十团其他部队一起共历三十七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保卫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王波的亲密战友十团团长白乙化在马营战斗中不幸牺牲，性情刚毅的王波不禁为之泣下。但他懂得“痛哭无用，流涕也无用”，打败日本侵略者是要流血的，那些用血换来的代价才是最“宝贵的代价”。因此，他在为悼念白乙化而写的《我们没有眼泪》①一文中，一面为自己战友的不幸牺牲而悲痛，另一面又以崇敬的语言来讴歌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白乙化。他写道：“为革命，乙化同志流了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除了开会来追悼他，纪念他，更紧要的是学习他！尤其是学习他那种英勇牺牲的精神。没有那种牺牲的精神，日本鬼子就无法赶跑，革命就无法胜利！前进吧，踏着牺牲者的血迹！”

是讴歌，也是誓言，王波正是用这种革命献身精神不断激励着自己前进的。为了扩大反“扫荡”的胜利，王波等三营领导干部将

三营集中起来，连续夺取了几次战斗胜利。他们奔袭木林敌人据点，俘获伪军八十三人。奇袭怀柔火车站，火烧敌军火一批。其中尤以王波亲自指挥的柏查子伏击战打得最为出色。战斗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上旬，战前王波侦知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对我军作了周密部署，他把七连和八连分别埋伏在敌必经道路两旁的高坎上，高山顶放了了望哨，敌人从琉璃庙据点出动时我了望哨看得清清楚楚。等敌人进入我伏击圈，王波一声令下，忿怒的子弹一齐射向敌群。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不等敌人清醒，我战士又跃上大路追歼残敌。仅三十分钟战斗胜利结束，计歼伪满讨伐队七十多人，获轻机枪三挺及其它武器一部。王波虽主管政治工作，但也经常指挥战斗，而且指挥果断，善于审时度势，善于处理突发情况。三月的一天，王波和营长翟飞共同率三营在分水岭梁设下埋伏，准备歼灭由大水峪开往琉璃庙据点的伪军。侦察员报告大水峪出来的敌人不是伪军而是百多名日军。情况突变，这仗是打还是不打？怎样打？意见分歧。王波认为分水岭梁地势不险，日军和伪军不同，十分凶顽，打起来必胜的把握不大，按照没有取胜把握的仗不打的原则，应改变原计划不打，如果要打也应换一个地形更为有利的地方去打。王波耐心说服原来主张在原地点继续打的同志，把队伍拉到路面狭窄，两侧山崖陡峭，敌兵不易展开的后山铺村西埋伏。日军行到这里，遭到我军打击，因地形限制无法反击，我军伏在断崖上也无法接近，只得溃散逃走。这次战斗虽没有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但由于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处置得当，仍然给敌人一定打击，而我则无一伤亡。

一九四一年秋末，日伪集中万余兵力对丰滦密发动了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扫荡”后期更实施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和“三光”政策，把方圆一百二十华里的长城两侧地区划为“无人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给我抗日斗争增添了许多困难。为了保存实力，十团主力转移到平北西部，只留三营在丰

滦密坚持斗争。面对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强敌，王波带领队伍仍能如鱼在水，在根据地游来游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其间虽有几次被围，但他临危不惧，凭借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一次，玉波与七连被“扫荡”之敌包围在沙坨子，敌人以强大火力朝我军射击，王波沉着地指挥我军利用白河岸边的山崖作掩护，坚守到天黑，夜间又令战士把艾蒿编成辫子点起火亮迷惑敌人，然后悄悄向西转移，涉过冰冷的白河，安全突围。反“扫荡”战斗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特别是在“无人区”，斗争尤甚。战士们有时以生玉米充饥，有时生玉米都难得到，不得不靠挖野菜吃草根来坚持斗争，因此个别战士出现了思想波动。王波及时而耐心地作思想工作，他对战士们讲：一个八路军战士最宝贵的不是生命而是气节，最可怕的也不是敌人和困难，而是失掉胜利信心。为了战胜困难，王波亲自协助司务长料理伙食，筹集粮菜。在最疲劳时候自己站岗警戒，让战士去休息。爱护战士，处事冷静，这是王波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一次夜袭榆树底下据点，敌用机枪拦阻我军前进，王波命令打哑机枪，王波身后的通信员尚茂站起来打了一枪，子弹擦着王波的耳朵飞过去。尚茂吓呆了，王波却没事一样回头命令：“别愣着，瞄着火亮继续打！”战后，尚茂请求处分，其它战士也要求追究尚茂的过失，而王波则一笑置之，说：“我的命就那么值钱？光荣了怕什么，正好去见马克思。”然而战斗中指战员牺牲了他却非常痛苦。一九四二年春，王波率七连在得天沟与伪满宋奇讨伐队战斗，七连指导员李帆和十几名战士牺牲了，王波很难过，部队转移到杨胡栅子宿营，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一个人呆坐在大山石上流泪。烈士遗体抬回驻地，王波逐个为他们擦去脸上的血迹和泥土，脱下身上的棉大衣，轻轻盖在李帆的遗体上。又叫人把每个烈士包裹起来，埋葬在青山下。他爱护战士的行动就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工作，因此尽管坚持丰滦密的斗争极其艰苦，但全营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使我丰滦密这把尖刀一直插在伪满

和伪华北接合部上，岿然不动。

一九四二年夏，十团缩编。王波改任团政治处主任。职务变了，但作风没有变，他与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那里最危险，那里就有王波。这一年敌人在我平北南部沿山边挖了一条长一百八十多里的封锁沟，沿沟炮楼林立，给我往来交通造成极大困难。为保障过往人员的安全，王波常亲自带部队护送。一次一百多名干部由平西前往冀东，王波又率一个排护送，准备夜间越过封锁沟。队伍行至康各庄村南突遭敌人截击，王波指定人员带领干部迂回前进，自己则不顾危险将数倍于我军之敌引向自己，终于使这批干部脱险安全到达冀东。

一九四三年五月，丰滦密抗日斗争已度过最艰苦的阶段，我军力量有了新的发展，在此形势下成立了丰滦密区队，王波任区队政委，兼任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委员会委员。王波与区队长师军一起指挥区队在丰滦密地区不断打击日伪军，逐步恢复了被敌人蚕食地区。七月七日，丰滦密区队在香水峪设伏重创伪满军三十三团一个营，毙俘敌五十九名，缴重迫击炮一门。八月九日又在石塘路伏击康各庄据点出扰之敌，歼敌十二人。王波还带领区队一连夜袭榆树底下据点，日军仓惶逃走，俘伪军五十多名，据点被拔掉，八区工作也得到恢复。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伪满军一个连窜到南香峪抢粮，为保护群众利益，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王波率二连赶到南香峪打击敌人。二连抢占北山，敌人开炮向我军轰击，一颗炮弹落在山顶上，横飞的弹片炸伤王波的头部，当即昏了过去。在场的连队干部仅有刚上任不久的副指导员，没有作战经验，听到通信员报告王波“牺牲”，惊惶失措，既未检查王波的伤势，又未派人进行抢救，看到伪满军蜂拥向我军冲来，慌里慌张带队伍撤走了，王波被丢弃在山上。王波苏醒后，见敌人已逼近，急将记有机密情况的日记本烧掉，因行动困难无法与敌战斗，只有怒视着敌人一步步走向自己

……。敌人将他抬下山，逼他投降，他心如铁石，毫不动摇，最后惨遭杀害。

王波牺牲后，丰滦密军民无比悲痛，将他安葬在北香峪南沟。一九四四年一月，丰滦密联合县和五区队②在赶河厂联合召开追悼大会，二月二十日平北军分区也在南碾沟召开追悼大会，沉痛追悼王波等烈士。王波烈士的亲密战友刘力生赋诗一首以志悼念：

冀热军前噩耗惊，战旗东指未成功。

英雄遗恨知多少，潮白涛声咽北风。

五月，丰滦密联合县和五区队为王波烈士建立纪念碑，碑的正面中间镌刻着“救国救民”四个大字，两旁书写着碑文：



“救国救民”纪念碑

“王波同志辽宁沈阳宏陵堡人③，年三十二岁，北平中国大学肄业。个性刚毅豪爽，富有正义感，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模范党员。入党后即参加武装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肉搏，艰辛倍尝，功绩卓著。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香峪战斗壮烈殉国，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注释

注①：载《纪念白乙化同志专刊》。

注②：丰滦密区队划归冀东后的名称。

注③：绣匠屯原属宏陵堡管辖，王波出生地的两种说法无矛盾。



不老湖畔王波烈士碑园

震惊平北的“臭水坑”事件

吕克新　曹友林

臭水坑，位于密云县西部黄花顶山中，是群峰环抱的一块山顶凹地，因凹地正中有一个积水坑而得名。这里四面皆山，只有东南方一条狭窄的出入口，山高路险，崖陡谷深，树木茂密，杂草丛生，地势隐蔽而险要。1942 年春，由于日军制造了丰滦密无人区，环境极其残酷，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县长沈爽（又名白涤非）、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十团团长王亢便率领县政府和十团供给处、卫生处及部分伤病员等共 100 多人转移到臭水坑，在十团六连的保护下居住下来。因居住日久，被敌人发现，1942 年 4 月 8 日，伪满讨伐队 1000 余人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自琉璃庙据点出发突然长途奔袭臭水坑。大水峪据点的日军也从南面协助包抄，封锁了臭水坑东南面的唯一出口。

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即 4 月 7 日下午，接到情报说后山铺据点的伪警察要到莲花瓣一带搜山，十团王亢团长认为这是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便带着两个排到莲花瓣去伏击敌人，臭水坑驻地内只留下一个排担任保卫。8 日早晨，驻地人员刚起床，忽然北大梁下的哨兵打了一枪，接着又打两枪，这就是预定的敌情警报。沈爽县长立即命令全体人员赶紧准备，给伤病员上药备担架，把尚未吃的早饭装进口袋，整理好文件和物资准备带着转移。没过几分钟，哨位告急：敌人太多，请求增援！临时负责军事指挥的十团锄奸股长邱阜马上命令六连副连长王德礼带两个班上北山阻击敌人。从驻地到北梁仅有几百米，增援的两个班还没到梁头，北梁制高点就已被敌人攻占了。敌人居高临下一面疯狂扫射，一面嚎叫着冲下来，王德

礼率两个班战士顽强地就地阻击。此时周围枪声四起，显然臭水坑已被包围了。情况紧急，沈爽和邱阜迅速集合全体人员，在一个班战士的掩护下翻越东梁，向东南面的唯一出口突围。队伍行至东沟南口，突然密集子弹袭来，出口已被大水峪据点的日军堵死了。六连副指导员沈奎带领大家两次冲锋，但由于只有一个班战士和少量干部有枪，多数干部身上只有一颗手榴弹，伤病员也没有武器，所以尽管付出很大伤亡也冲不出去。队伍只得顺山沟向北且战且退。沟北头直通北山梁，原在北梁阻敌的两个班这时也伤亡殆尽，余下的战士也被敌人压了下来。这样，我军的人员就都被敌人挤压在山沟的东北角了。这里东侧是峭壁，西侧是断崖，南北两侧都是步步逼近的日伪军。面对进退无路的危急形势，干部战士毫不畏惧，有枪的用枪，无枪的就用木棍为武器挺身迎敌，伤病员也赤手空拳与敌人撕打在一起，有的干脆抱住敌人滚下断崖同归于尽。县长沈爽、十团供给处长乔宇、卫生处长郭庭章、六连副指导员沈奎等，战斗到只剩最后一颗子弹，宁死不当俘虏，饮弹自戕。乔宇的警卫员卜兴安，只有15岁，双腿被打断，子弹也已打光，仍卧在地上用石块回击敌人。敌军机枪手冲至近前，见是一个双腿已断的孩子，便扔给他一件军大衣，让他蒙起脸免得临死害怕。卜兴安愤怒地甩掉大衣，手攀着小树挺起身来说道："打吧，怕死不当八路，我就站在这儿！"敌人的机枪响了，15岁的卜兴安壮烈牺牲。

下午战斗停止，敌人开始搜山。没有牺牲的干部战士都机警地利用地形地物隐藏起来。邱阜和十团电台台长王兆瑞等4人带着电台隐藏在一个巨石罩盖下的山洞里，躲过了敌人的搜索。白河报社编辑张景旺和崔福昌钻进一道山缝，挤出山缝一看，是另一条山沟，没有敌人，便顺山沟跑出几里地，才得脱险。伤员邢录增藏在一个地势较高的石窟窿里，还有些人躲在巨石夹缝和灌木丛中，没有被搜出，幸免于难。可是，县政府秘书兼财粮科长李昨非、白河报社编辑张士儒、十团卫生处张医生等一批干部战士和伤病员都未

能躲过搜查而被捕。一个姓常的战士躲在大石下被发现，他扔出一颗手榴弹炸死两个敌人，手中再无武器，落入敌手。十团张医生的妻子、女儿和儿子与14位伤病员藏在一起，全部被搜出。下午三时左右，敌人才离开臭水坑。他们将抓到的人员全部用铁丝捆成一串，连同搜出的钱粮物资一齐带走，还残忍地割下沈爽县长的头颅，悬挂在大水峪村头示众。

臭水坑事件，牺牲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等38人，另有45人被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北地区制造的一起重大惨案，对平北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利影响。然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丰滦密抗日军民没有屈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战胜困难，有力打击敌人，很快扭转了不利形势。

1944年5月，丰滦密根据地在臭水坑为死难烈士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由当时丰滦密联合县县长倪蔚庭、县委书记胡毅和冀东第五地区队区队长师军联合署名，正面镌刻着“卫国爱民”四个大字，背面刻有碑文：

“沈县长、乔处长、郭处长千古：沈县长（爽）吉林双城人，乔处长（宇）十团供给处长，吉林敦化人，郭处长（庭章）十团卫生处长，吉林人，以及张朴曾（志儒）、崔子毅、高会德诸同志，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同时壮烈牺牲。这就是坚持丰滦密最高血的代价，也是一笔最大的血债。他们坚决顽强与敌搏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八路军的光荣。

倪蔚庭、师军、胡毅敬奠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2005年3月22日，青年党员在“臭水坑”事件遗址，缅怀革命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附:"臭水坑"事件幸存者邢录增的回忆

我家住密云县椴树洼村，1940 年 11 月参加了丰滦密一区白河游击队，不久升编为十团四连。1942 年初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被送到团卫生队疗养，住在“臭水坑”。卫生队由郭庭章处长带领，当时连医生护士带伤病员共 63 人。住在“臭水坑”的还有供给处乔处长带的人和县政府的一些干部，由十团六连保护着。王亢团长也在，4 月 7 日下午我还看到他，天擦黑时就听说他带人走了，说是出去打埋伏。

4 月 8 日清早，北梁警戒哨突然打了三枪。我们赶紧起来上药，灌饭口袋，准备转移。部队也派人上北梁增援，还没走到地方，敌人就从山上压下来，机枪猛扫。所有的人紧急集合起来，我路熟，让我带路，翻越东梁，准备出东沟南口向大将峪、西什湖方向转移。山路陕窄，排成单队走，敌人的机枪一个劲儿的追着打。当我们走到距东沟南口还有几十米的时候，被大水峪的鬼子和伪军堵住了。我们大多数地方干部只有手枪，子弹也不多。双方一交火，敌人火力太猛，我们只好边打边退。往沟北退的就没有路了，被敌人堵在沟里，背后西北角是断崖。敌人越来越多，越攻越近，我们没有枪的只好各自躲藏，有的钻柴林，有的钻石缝，我向上爬，钻入一个大石窟里。这里地势高，能看到下边沟里的好多尸体，敌我的都有。敌人四处搜人，乱震唬一气。有个姓常的战士，在藏的地方挪动了一下，被敌人看到了，上来抓他，被他用手榴弹炸死，敌人又上来时，他没有武器，被抓走了。还有个姓韩的护士，早晨给我上的药，也被抓住了。沈县长、郭处长他们在队伍后面，那里人多目标大，没法跑，他们打了一阵，烧了文件，自杀身死。敌人由晨时闹到下午才走，押着被抓的人，让他们背着沈县长的人头和抢来的东西。天将黑时，我听没动静了，才走出来，只见东沟西沟到处是战友的尸体，有头部开花的，有肠子流出来的，还有与敌人抱在

一起的，惨极了。这次袭击，来了一些日本兵，但多数是伪满洲军。想起战友的死，我至今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

（曹友林整理）



解放后政府为“臭水坑”事件牺牲烈士树立的纪念碑

回忆“臭水坑”惨案

王　亢

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在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地区，发生了一桩震惊整个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事件——“臭水坑”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我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及十团供给处主任乔永昶、卫生队长郭廷章和地方、军队机关工作人员等三十多名同志牺牲；县政府财粮科长李昨非、团卫生队医生张云阁等五十多人被俘，使整个丰滦密抗日政权蒙受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大损失，是一桩令人触目惊心、永世难忘的惨痛事件。

“臭水坑”位于密云县白河西岸黄花顶山中、牛盆峪村西北方、东西走向大山梁之阳坡处。它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盆地，当中有一个夏季积水的坑，当地人民称之为“臭水坑”。其实这里的水并不臭，它经年常流，泉清水碧，可饮用。这里山高谷深，且多悬崖峭壁，地形极为险要。同时灌木丛生，大多高达一人深。附近无村庄，亦无一户住家，只有两间简易破草棚，为以前山外老百姓进山烧木炭住过。根据其破旧程度推测，至少近两年再无人住过。在这里屯兵，既无食水烧柴困难，又比较隐蔽，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比较好机动，因此是当时十团选择的军事活动站之一。

众所周知，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企图迅速稳住它在中国的占领区。一则好抽出手来进行太平洋战争，二则好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在其已停止对中国作正面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倾其主要力量来对付我在敌后所创造的各抗日根据地，尤其

是我平北抗日根据地。除在军事上大力进行反复“扫荡”外，特别着力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我山地中心区不择手段地加以“清剿”，急欲铲除而后快。我丰滦密地区在当时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中，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其政治影响，都是日寇不能忽视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九四一年三至九月间，驻于该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我多次（白道峪歼灭战、东西白莲峪沟口歼灭战、“一撮毛”歼灭战等）歼灭性的打击后，益发对我抗日军民恨入骨髓。从当年十月开始，日本侵略者不但大量调兵遣将到丰滦密，而且还特别从日本关东军一七四部队抽调六百余名惯于山地作战的老兵，组成独立大队，驻丰滦密半城子、下营、石坟（佛）、四合堂、马营、溪翁庄等地，专门对付我丰滦密抗日武装力量。在对丰滦密地区持续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大“扫荡”中，敌人所到之处，老百姓的粮食、牲畜、衣物统统抢尽，家什用具统统毁坏，房屋草棚统统烧光，人员不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掉。在孟思郎峪村，二十七名老幼和妇女没来得及跑掉，敌人将他们赶到一个场院内全部杀掉，又放火将尸体焚毁，成为有名的丰滦密联合县“孟思郎峪惨案。”

为了更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保存有生力量，避开敌之锋芒，我十团主力（一、三营）由吴涛政委、才山参谋长率领跳到外线（昌延和龙赤联合县）积极活动，寻机打击敌人。我率二营配合党、政、群工作，坚持在丰滦密地区与敌伪军开展极其残酷的斗争。一九四二年四月八号惨案发生前，我率二营六连及团机关部分人员就住在“臭水坑”。不久，县政府机关也迁进来了。当时，据了解，山外各大敌伪据点诸如古北口、石匣、密云、怀柔等处的敌人，都没有什么变化。为防备敌人的偷袭，平素我们很注意上面各大据点敌人的增减变化和动静。“臭水坑”北、东、西三面背靠敌人制造的“无人区”，虽有伪满军三十五团团部驻于四海，但其下辖分队大都驻于永宁、大庄科、渤海所等处，距我“臭水坑”都较远，唯有三十四团一个营驻大水峪距我较近。但对它我们一直保持

着警惕和情报工作，它稍有动静我们马上便得到情报。（据邱阜同志讲：在惨案发生的当天拂晓前，山外回来的侦察员报告，山外也没有什么动静。）因此，在我们思想上，安全感是比较强的。

四月七日，我们县政府得到后山铺自卫军来的报告说：后山铺伪警察队向村中老乡征派毛驴，明天（八号）到莲花瓣一带搜山。接情报后，我即同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和团特派员邱阜同志研究，为了狠打伪警察搜山，由我带着六连的两个排去莲花瓣伏击敌人，家里留下一个排掩护机关，由邱阜同志负责指挥。地方上的事，由县长沈爽负责。出发前我特别提醒和交代沈县长和邱阜，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即向莲花瓣方向靠拢。我带着分队翻过“臭水坑”的北大梁，进抵二道沟。黄昏时，令分队休息做饭，以备伏击时用。在此期间，我又派出两名侦察员去莲花瓣村对后山铺方向警戒，拂晓时分队进入伏击阵地。不久，侦察员急匆匆赶来向我报告：敌人已到莲花瓣村。当时我分析了一下形势，仍认为这是后山铺伪警察怕遭我打击，因而先我一步到了莲花瓣村。

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莲花瓣村伏击不成，只好改变计划，我即令部队向“臭水坑”驻地返回。当我们爬上二道沟南山梁时天已拂晓，及到“臭水坑”北大梁一线时，天已大明。这时，我令分队就地稍事休息，并端起望远镜，对四周作了一下观察：莲花瓣村方向没有什么动静，南山边和平原一带也无什么可疑情况，北面山梁上亦未见到什么。可是，当我观察到“臭水坑”北大梁北坡半山腰时，发现了已散开成战斗群的敌人，密密麻麻，正一个劲地往大山梁上爬，但却看不到也听不到“臭水坑”方向我哨兵的任何动静。我一看这情景，急了，当即命令两挺机枪和步枪特等射手，朝着敌群猛烈扫射（与敌直距大约八百米左右），试图用鸣枪报警的办法提醒我“臭水坑”人员。可是，既不见“臭水坑”大梁哨位对敌开火，也不见“臭水坑”驻地有人向我枪声处靠拢。于是我便认为：由于情况紧急，家里人来不及向莲花瓣方面靠近，及时转移了。这

时，我一回头，突然发现在二道沟底下，又有一股敌人正向着二道沟通往大牛圈之鞍部方向前进。我立即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根据当时的敌情，地形，迅速选择了突围的方向。我感到，如果就此下山顺山沟向南突围，出口处肯定有敌重兵把守，很难冲出去。于是遂率分队下了大山南面陡坡，折向西，直奔枣树林东北沟。这时才听到由"臭水坑"方向传来的激烈枪声，待爬上莲花瓣西南大山隐蔽时，"臭水坑"方向的枪声已经停止。由于对家里情况没弄清，我心里一直不踏实。随即又派侦察员前去察明情况。因为数十个敌人把守着二道沟与大牛圈之鞍部，侦察员无法通过。后来，我亲自绕到所在大山南侧，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在鞍部及南侧的山头上依然布满着敌人，看到这阵势，我的心就像悬着一块铅，直往下沉。我多么希望家里的同志正像自己所推测的那样，早已突出重围，少受损失地转移到别处；多么希望敌人的此次奔袭，亦像以前一样，徒劳一场啊。

约摸下午三时左右，奔袭我"臭水坑"的敌人陆续撤出。我急匆匆地带着分队赶到"臭水坑"。可是，摆在面前的是一幅目不忍睹的惨景。"臭水坑"被敌人破坏得一塌糊涂，牺牲了的同志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里，面目模糊。他们有的两手抱着大石头，有的手里紧握着大木棒……，可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些同志还在与敌人作殊死地撕拼。据从"臭水坑"惨案中侥幸突围脱险和隐蔽未被敌人发现而脱险的同志讲：当敌人从四面山上扑来的时候，我留在家里的六连一个排和所有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邱阜同志指挥下，英勇地迎击敌人，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抗击着敌人，危急关头，大家都把突围的希望，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没有一个装"熊"的。不少人虽然没有武器，但他们没有坐着等死，而是赤手空拳地同敌人拼，抱住敌人朝悬崖下滚。沈县长牺牲前对他的警卫员说："出去告诉同志们，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守我们的根据地。"他的年轻的警卫员朱显奎两腿负伤，没能冲出去，敌人将他包围了。

敌人在向他开枪之前说："用东西把头包上吧，免得你害怕！"面对敌人的嘲弄，他咬紧牙关，挣扎着站起来，昂首怒目，鄙夷地说："怕死就不当八路军了！打吧，狗崽子们，我就站在这里！"英勇地倒在了他终日相伴的首长、战友身旁。团卫生队队长郭廷章同志，宁死不当敌人俘虏，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时，饮弹自戕……

敌人血洗"臭水坑"，以为将我丰滦密地区的抗日军政主要领导和组织消灭了，以为我也被打死了。当敌人见我遇难同志遗体中有一个穿黄颜色羊皮板军裤时，便大喊大叫："王亢在这里！""王亢被打死在这里！"为辩真实，敌人把被俘后当了叛徒的王郎子（我联合县委组织部长胡毅同志的交通员）叫到跟前辩认，王郎子看了看说："这是十团供给处乔主任，不是王亢团长。"（因为当时我与乔穿一样的裤子）听说不是王亢被打死，敌人不禁大失所望。气急败坏的敌人，残忍地将沈县长的头割下来带走，悬挂在大水峪村头"示众"。

事后，我们通过调查了解才知道：敌人为袭击"臭水坑"，经过了周密地策划和准备，他们集结了大水峪、大庄科、永宁、四海等处据点的六百多敌人，采取了长途奔袭的手法，企图将我党政军机关和工作人员一网打尽。

"臭水坑"惨案发生后，敌人更加疯狂嚣张，并扬言鼓噪：丰滦密联合县县长被打死了，县政府被消灭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完蛋了……

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扼杀不了的。我幸存下来的同志并没有被吓倒，我率领着同志们，面对着烈士们的遗骨，庄严宣誓：一定完成烈士未竟事业，一定用更多更大的胜利告慰烈士英灵！于是，我们掩埋好烈士们的尸体，握紧手中钢枪，更坚强地继续战斗下去。

碧血洒黄花

——记沈爽烈士

鲍星时

黄花顶是密云县西部一座高山，海拔 1209.6 米，林木丛杂，人迹罕至。但每年春回大地，冰雪消融，草木吐绿季节，常有一队队青年、干部、学生，虔诚地从化石峪或牛盆峪，翻山越涧，艰难跋涉 30 多里路，来到黄花顶，凭吊革命遗址，缅怀在臭水坑惨案中与日伪军英勇搏斗而壮烈牺牲的沈县长。



沈爽烈士遗照

沈县长名爽，字子儒，化名白涤非，满族人，1896 年出生于吉林省双城县镶黄五屯一个富农家庭里（现为黑龙江省双城县大有村）。幼年在本村私塾读书，后考入吉林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家乡任教。是时正值军阀混战，日寇侵略东北阴谋加紧推行的时候，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沈爽，积极奔走于哈尔滨与双城之间，联络有识之士，秘密从事反帝救国活动。1931 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三省。沈爽弃笔从戎，奋起报国，在双城县东部地区，竖起抗日大旗，组织 1000 余人的抗日自卫军，被

推举为司令。抗日自卫军活跃在哈尔滨南，从双城东发展到双城西，直至邻近各县。不久又和抗日义勇军赵尚志部建立联系。自此，两支抗日队伍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抗日自卫军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就在此时，沈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一名先锋战士。日本侵略者先对沈爽进行“招安”。声称如沈爽率队归降，便授以伪县长之职。沈爽知是奸计，也不为高官厚禄所动，继续率队抗击日军。但其四叔却满心欢喜，找到沈爽劝其归降，并说：“见好就收，当上县长也好光宗耀祖。”沈爽听到亲叔叔说这种丧失民族气节的话，非常气愤，当场严加驳斥。爷俩从此决裂，成为仇人。诱降未成，日寇遂指使汉奸武装攻打抗日自卫军。1932年春，抗日自卫军副司令关亚洲率部于双城县郑兰头村（现农丰保安村）和汉奸地主武装桑团发生战斗。他们认为桑团是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所以不愿和他打仗，因而被包围。后虽经苦战，终因人数少、武器差，被桑团打散，关亚洲阵亡。沈爽当时不在军中，等他赶回，抗日自卫军已不可收拾，只得隐姓埋名四处隐蔽。同时在双城县、尚志县、宾县及哈尔滨东部地区秘密进行抗日活动。日军到处张贴告示，悬赏1000元捉拿他。一次沈爽见许多人挤着看布告，也挤了进去，一看是捉拿他的告示，他说：“出这么高的价钱抓个人，有什么抓头。”说罢挤出人群，扬长而去。沈爽胆大心细又有抗日群众做掩护，日本侵略军也没法捉到他。有时他就住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双城旅店内，日军也不知道。一年以后，大批日军开过来，隐蔽活动愈来愈困难，党组织才叫他转移到关内。为了安全，从双城旅店上马车，他躺在下边，上盖大枪（原文如此），由和他关系密切的伪警长和警尉二人护送，平安到达火车站，乘火车直达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城也遭日寇蹂躏。这时国民抗日军在北平西北郊崛起，沈爽又加入了这支队伍，在司令部任参谋。国民抗日军不仅打过北平第二监狱，而且在西北郊多次予日军

以打击。11月初，沈爽与司令部参谋主任吴涤伟带着国民抗日军的重托，前往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会见分区司令杨成武，政委邓华，要求将国民抗日军改编为八路军。这时一分区也收到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的来信，指示一分区，收编国民抗日军。信中赞扬国民抗日军将士英勇作战，打击日寇的功绩，并要国民抗日军迅速南下，与八路军汇合，共商抗日大计。11月9日沈爽亲自携带这封千钧书信返回，向国民抗日军战士报喜。12月底，国民抗日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沈爽从此成为八路军战士。

1940年夏，平北抗日根据地开辟，沈爽调到中共平北地委做敌工工作。7月随十团到达丰滦密，因病在密云四合堂地区休养，病愈后即留在丰滦密协助县委开展敌工工作。他温文尔雅，戎马倥偬八、九年，仍像个教书先生。但工作起来却很有魄力。他与十团配合接连在榆树湾子、四合堂、大甸子镇压了三个铁杆汉奸。他还把自己的家属安置在前栗园一个反动富农家里，一下就把这个富农震住了，从此再不敢与抗日政府作对。他化装进入日军盘踞的密云县城，多次住到伪政府要员大绅士苏俊峰和杨蔚庭家，并在县城内征收救国捐，然后装在点心盒里带出，一次就带出两点心盒钞票。他还在伪商会、伪新民会、伪县政府以及伪警察、特务队等组织里发展了能为抗日政府办事的秘密人员。通过这些秘密工作人员，获取了日伪军讨伐、“扫荡”的许多有用情报，从敌占区买回了枪支、弹药，以及根据地急需的紧缺物资，例如医疗用品、药品、布匹、染料、印刷用品等。1941年伪满程斌讨伐大队一部及密云伪警备队张博中队携械反正投诚，他也做了许多工作。

艰苦的战斗不仅使沈爽和丰滦密地区的抗日人民同甘共苦，而且和丰滦密地区的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他得知十团团长白乙化于马营战斗中以身殉国之后，极为悲痛地写下了“祭白团长”长诗一首。他满怀深情地称颂了白乙化为革命及抗日事业立下的卓著功勋，无限沉痛地倾吐了自己对抗日英

雄的怀念。他写道："马营战斗，壮烈牺牲。为国捐躯，谁不痛心。荒草衰烟，亦放悲声。"最后他还告慰烈士："未竟事业，我们完成。努力革命，慰你英灵。"这首诗，是沈爽烈士保存下来能够让后人看到的唯一墨迹。

1941年10月，日寇调集10000多侵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骤然恶化。丰滦密联合县县长王森年老体弱，已不适应在艰苦环境中工作，被调任新职。11月任命沈爽为县长。

日寇万人大"扫荡"后期，在丰滦密长城内外开始制造"无人区"，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干部、群众被抓、被杀，根据地面积急遽缩小，经济十分困难。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沈爽不退缩，不动摇，带领全县干部誓死不离"无人区"，领导丰滦密人民开展了反"扫荡"、反"围剿"、反经济封锁、反集家并村等一系列斗争。1942年2月县政府向丰滦密抗日人民发出号召，要求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哪怕只剩下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指出："坚持地区和开辟地区同样光荣。"当时根据地群众誓死不进"人圈"，大都逃进深山密林躲藏。为了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村政权和群众组织，沈爽又组织县区干部逐村逐沟的去寻找群众，然后按照群众实际居住情况，能按村的按村，不能按村的按照山沟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和建立村政权和群众组织。1942年3月又在石炮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动员"无人区"群众回乡搞春耕，将"无人区"变有人区，将少人区变多人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无人区"计划。会后，他又派出工作人员，动员和组织那些逃到山外的群众回山坚持"无人区"斗争，并向群众宣传"山外不如山里保险，""快回来种地，否则有挨饿的危险。"县政府还明确宣布，归山后既不向敌人纳税，也豁免抗战粮款负担。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对稳定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粉碎日寇的"无人区"计划，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沈爽还和十团一起率领丰滦密地区军民选择地形隐蔽、有水有柴的地方建立军事活动站，供军队和党政机关使用。这些活动站没有房屋，只搭有地炕，居住时把地炕烧热，临时支起窝棚和帐篷，离开时再把地炕用土埋上。臭水坑就是这种活动站之一。

臭水坑位于牛盆峪西北约30里的黄花顶山中，是群峰环绕着的一块小盆地，中有一个小小的积水坑，人们称之为臭水坑。这里山高路险，怪石嶙峋，只有东南角一条狭窄山口可供出人，地势极为险峻。1942年4月初，沈爽及十团团长王亢率领县政府机关、十团团部和伤病员就隐蔽居住在这里，由十团六连保护。4月7日下午有情报说：伪警察要到莲花瓣搜山，经过研究，王亢率十团六连两个排去伏击敌人，臭水坑驻地由沈爽和十团锄奸股长丘阜负责。7日晚，未发现周围敌据点有异常情况，经沈爽与丘阜商议决定暂不做转移的准备。8日清晨，伙房已开始做早饭，忽听北大梁方向清脆地一声枪响，紧接着又响了两枪，这是哨兵报警。沈爽立即要求大家赶快起来做转移的准备，命医生为伤员换药，让伙房把做好的饭装进口袋、准备带着转移。没过两分钟，哨位告急，请求增援。沈爽和丘阜商议后，立即派两个班上山增援，以阻击敌人。但北山梁制高点已被敌人占领，四周山上都响起了枪声，臭水坑被1000余伪满讨伐队包围。沈爽感到情况极为严重，紧急集合队伍，先将机密文件埋掉，然后命令仅有的一个班战士及40多位带枪干部保护着伤员、干部向南突围。当他们穿过树林进入东沟时，唯一能出山的南山口已被大水峪敌人堵死。想从这里出山，只有夺取山口，但两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从山口冲出已经无望，他命令部队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东沟的东北角。这里东侧是峭壁，背后是断崖。前无退路，后有追兵，沈爽遂率战士、干部返身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搏斗。他们有枪的用枪，无枪的用棍棒，挺身杀入敌群。有的赤手空拳与敌人撕打，有的抱住敌人滚下悬崖。沈爽与警卫员背靠着背对敌射击，一直打到剩下最后一粒子弹，他对警卫员讲：“出去告诉

同志们，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守住我们的根据地。”然后举起枪，饮弹自戕，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敌人竟极端残忍地割下他的头，挂在大水峪村头示众。

“臭水坑”惨案及沈县长牺牲的消息传出，平北与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军民极其震惊。奔袭臭水坑的敌人撤走后，王亢率十团战士返回臭水坑，眼含热泪，埋葬了沈爽及其他烈士。1944年5月，中共丰滦密县委及县政府，在臭水坑建立纪念碑，以追念沈县长及其他罹难烈士。

党的忠诚战士胡毅

鲍星时　张桂新



胡毅烈士遗照

胡毅原名胡葆森，又名胡潍泱、胡葆珊，曾一度使用胡维毅、胡伊等名。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荣城县城厢一破落地主家里，姐弟8人行四。说话有轻度口吃，性格内向，但聪颖好学。1931年读完小学后，至烟台谋生，次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自乡师成立，中共党组织即在此校开展活动。所以胡毅一入乡师，便受到该校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博览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常在夜间编写揭露黑暗社会的文章，抄写和张贴标语。冬天到大街贴标语手都冻出了血。1934年乡师未毕业，便离开学校回家乡城厢，与人合伙在城厢南门外开办一爿文化书店，秘密发行进步书刊。后党组织派党员来店任经理，书店遂变成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站。1935年胡毅又在自家场院房屋内，开办民众教育馆，开展民众教育。党组织利用该馆经费，购进大批进步书刊，组织青年读书会，借以联络青年，掩护秘密革命工作。1935年11月中共胶东特委秘密发动农民，准备举行

武装暴动。后被国民党政府察知，暴动未按期举行。胡毅是这次暴动的积极参予者，遂被国民党地方当局列入要犯黑名单。暴动未成，他继续在文化书店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此时他已立志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他父亲多次托人给他说亲，他讲道："现在没有时间搞自己的事"，加以拒绝。1936 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正式接纳为党员。1936 年 6 月 22 日，即农历端午节，国民党政府军按照黑名单，追踪到家乡来逮捕他。姐姐先得到消息，及时转告给他，他才没有落入反动军队之手。当地群众帮他化装成渔民，乘坐渔船从海上逃出，经成海、烟台，辗转到达北平，住进山东会馆。这时他改名胡维毅，后又改为胡毅，以示要用顽强的毅力，将革命进行到底。

1936 年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开始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为培养抗日骨干，组织抗日力量建立"学兵队"。胡毅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北平长期居住和工作，9 月由党组织安排参加"学兵队"，十月中旬到达西安，被编入四连。在"学兵队"享受普通士兵待遇，生活艰苦，训练紧张，可喜的是接受了正规军事训练，学到不少军事知识，培养起了军人素质，为以后从事戎马生涯打下了有益基础。12 月西安事变发生，胡毅被编进抗日宣传队，深入团队，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胡毅所在的"学兵队"被改编为"军官差遣二队"，随东北军移防安徽省怀远县境。1937 年 5 月蒋介石勒令解散"差遣二队"，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胡毅又回到北平。

"七·七"事变后，胡毅与 60 多名在平东北籍及全国各地爱国青年，随中共绥西和硕公中垦区工委书记白乙化奔赴垦区工作，任中共垦区工委组织干事，专职党务组织工作。在垦区，他深入群众，同垦民共同生活，一起劳动，按照党的部署也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0 月日寇侵略军已抵绥远省包头市附近，垦民情绪激奋，要求拿起刀枪，抗击日寇。然而垦区一伙反动分子却预谋将垦区所有武

器、弹药送交国民党军队。胡毅等一群热血青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与指挥下，趁开饭人员集中时间，英勇机智地将反动分子包围，夺取了这批武器，随即组织建立了“抗日先锋总队”。胡毅继续任总队组织干事。11月抗日先锋队沿长城东进，奔向抗日前线。一批不能参加抗日队伍的家属，在胡毅等的动员安排下，去了陕甘宁边区，使先锋队战士免去后顾之忧。

1938年抗日先锋队在山西省河曲县整编，胡毅被任命为中队指导员。6月抗日先锋队东达雁北，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师。胡毅和先锋队干部一起到三五九旅教导营学习。5个月的时间，使他学到了红军作战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学到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此时，抗日先锋队已达500多人，扩编为3个大队，胡毅被任命为二大队政治干事（即政治教导员）。1939年4月抗日先锋队到达平西，与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胡毅任联军司令部政治处组织科长。年底改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胡毅任组织股长，党内任团总支书记。

1940年5月胡毅随十团主力到达丰滦密，被抽调参加地方工作团，从事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组建工作，从此离开部队转到地方。6月中共丰滦密工作委员会建立，胡毅任组织部长。丰滦密地区过去没有党的活动和组织，建党工作需要从零开始。7月工委开办名为“救国会干部训练班”，实为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以及发展对象的学习班。胡毅亲自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和社会主义等课程。8月丰滦密联合县发展了第一批党员，1941年春建起了第一批党支部。1941年连续开办三期党员训练班，以提高新党员的思想认识。他还针对党员文盲多的状况，在党员中开展识字运动。胡毅亲自领导和参加《党员识字课本》的编写。他根据丰滦密三区自卫军大队长郭永安被敌人抓到石佛据点，乘敌不备夺枪逃回的事迹，编写了《英勇的郭大队长》一课。这种紧密联系抗日斗争实际的课文，使党员既识了字，又受到教育。

胡毅正在埋头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时，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十团团长白乙化在马营战斗中不幸牺牲。噩耗传来，悲愤万分，他奋笔写下了“伟大的创造者”一文，以寄托哀思。他在文章中写道：和白乙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四年来如一日。白乙化“对革命无限忠诚和高度的责任心，以及躬身励行的精神”，“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有着永铭不忘的深刻印象。”文章还对白乙化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文章中讲道：白乙化为完成开辟丰滦密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昼夜奔忙，不怕任何的艰险，不怕任何的疲劳，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中，打开了丰滦密的局面。”“白乙化壮烈牺牲，是党和民族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任何消极、悲观、失望都是不正确的，对党对革命都是有害的。为纪念他，追悼他，只有抖擞精神，加倍努力，为完成其未竟革命事业，勇往直前，继续迈进。”胡毅在文章中是这样讲的，在实践里也是这样做的。为完成白乙化烈士未竟事业，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往穿梭于敌伪据点之间，教育群众，发展党员，登门拜访开明绅士，做好统战工作。为刚刚建立的丰滦密联合县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1 年 8 月中共丰滦密县委正式建立，胡毅任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胡毅等的努力工作下，丰滦密抗日根据地村村建起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党员总数发展到 700 多人。

胡毅革命立场坚定，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 1942 年，他的抗日斗志也未有丝毫动摇。从 1941 年冬天起，日本侵略军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丰滦密地区制造“无人区”，抗日根据地遭受极大破坏。在这种严酷环境里，胡毅不得不较长时间隐蔽在深山区堡垒村石炮沟，但依然克服困难开展工作，领导“无人区”人民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指示。1942 年 4 月，伪满讨伐队长途奔袭制造了震惊平北的“臭水坑”惨案。沈爽县长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一些干部对能否坚持住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信心不足，甚至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县委领导仅胡毅一人在县境内。经过研究，他代表县委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由县政府秘书江卓化名刘振华，代行县长职务，并以县长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以安定民心。同时，紧急动员县大队和工作人员深入村落山沟，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告诉根据地人民，抗日政府还在，地方党组织仍然和人民在一起战斗。从而迅速揭穿了敌人散布的“丰滦密彻底肃清了，县政府消灭了”的谣言，扭转了悲观和动摇情绪。这一时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胡毅同县委其它领导一起又开展了党组织的清理整顿工作。他们认真审查党员，恢复重建党的基层支部，把那些誓死不进“人圈”而逃进深山密林的党员，都按山沟、居住地重新组织起来。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丰滦密联合县广大党员抗日立场更加坚定，党支部的战斗核心作用也更加显著。为了总结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丰滦密人民的抗日斗争经验及其教训，他和县委副书记马力一起，又化费许多时间，写出了长达几万言的《1942 年中共丰滦密县委工作总结》。这个总结为以后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发挥了指导性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抗日斗争历史资料。

1943 年 11 月胡毅被提升为县委书记。是月 11 日五区队政委王波在南香峪战斗中壮烈牺牲，他又兼任五区队政委。在胡毅的坚强领导下，丰滦密人民的抗日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2 月底，五区队又在赶河厂取得毙伤伪满讨伐队 170 多人的重大胜利。至 1944 年春，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大有好转，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为了让人民永远不忘昔日斗争的艰辛，铭记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烈士，胡毅亲自领导并署名，于 1944 年 5 月为白乙化烈士修建了“民族英雄”纪念碑；为王波烈士修建了“救国救民”纪念碑；为江鹤、秦岭、林青、王兆瑞四烈士修建了“英志长青”纪念碑；为冯家峪战斗烈士修建了“还我河山”纪念碑，为臭水坑惨案诸烈

士修建了“卫民先锋”纪念碑。1944 年 7 月五区队又在清水潭消灭抢麦之敌 70 余人，日籍三县顾问犬养毅等也被活捉。此后，丰滦密联合县境内之敌，再也不敢轻易进入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了。

1944 年 10 月，丰滦密联合县县长调走，胡毅又代理县长，因而集党、政、军于一身。权力大了，担子重了，但密切联系群众，勤奋工作，简朴的生活作风都没有改变。丰滦密一直没有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这时在胡毅领导下也开展起来。为了利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推动全县运动，胡毅还亲自抓了试点村迎城岭的工作。丰滦密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斗争非常激烈，尤其那些混进抗日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从中作梗，制造困难，干扰破坏减租减息运动的进行。县民政科副科长王孝鹏就是其中的一个。正当减租减息运动在丰滦密进行，一些地主富农为抵制减租而企图收回土地时，王孝鹏则依仗其职权，把自家已经卖成死契的 18 亩土地强行赎回，此事影响极坏，直接破坏和干扰了减租减息运动。胡毅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在说服教育无效后，于 12 月 31 日在西庄子召开县区干部大会，帮助王孝鹏认识错误。会上胡毅坚持原则对王孝鹏进行了严肃批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王孝鹏不思悔改，反而产生谋害胡毅的邪念。1945 年 1 月 1 日凌晨1时许，持枪闯入胡毅住房，乘其熟睡，开枪将其杀害。

胡毅生活简朴，勤奋好学，工作认真，坚持原则，深受丰滦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遇害时年仅 29 岁。他不幸遇害是丰滦密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当干部、群众听说胡毅被杀害时，极其悲愤，当天就将畏罪自杀未遂的凶手王孝鹏乱石砸死。

胡毅牺牲后，先安葬于牺牲地，1954 年 4 月迁葬于石家庄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忆县委书记胡毅同志

倪介瑜 李春山

胡毅同志随十团来丰滦密时，人称胡股长，穿便衣，做地方工作。是位知识分子，二十八岁，高个儿，面目发黑，口音像是东北人。原来他是丰滦密县委书记，倪蔚庭调走后又兼县长。他每天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救国会、妇联会、儿童团，组织村政权，成立民兵自卫军，站岗放哨，送信带路，动员青壮年参加军队打日本。

1944 年 3 月初，丰滦密县委由各区抽调村干部五名，去十四地委党训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当前形势。正赶上县委书记胡毅去冀东十四地委开会，我们五个村干部就跟他一起走了。由东户部庄出发，晚上住到庄头峪。胡毅同志不顾行军走路的疲劳，还到我们学员住屋看望，问寒问暖，逐个问我们都是哪个区哪个村的，家里有什么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并说，有困难政府帮助解决，希望我们安心学习，要带回好成绩来。看到他既关心我们的学习，又关心村里的群众生活，我们心里都感到很温暖。一路上横穿平古铁路、公路封锁线，过潮河，过大城子川瓦窑子日本炮楼，胡毅同志亲自指挥部队一个连，把我们村干部保护在部队当中，先把我们掩护过去，前后都是部队，一路平安地把我们送到冀东十四地委驻地黄松峪。等到完成两个多月的学习任务回来后，我们五个人先后都参加了区的工作。

1944 年阳历年，丰滦密县政府是在二区西庄子过的。县长胡毅和秘书、各科科长、工作人员、交通员、勤杂人员大约有三十来人。还有一个连的保卫人员。平时分散时间多，集中时间少，利用

过年机会，集中起来总结一年来工作经验，对敌斗争经验教训，提高对敌斗争的艺术和策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以利斗争。

民政科副科长王孝鹏，是燕落人，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就利用职权把已经卖出去的土地十八亩（给老爷庙郭朝利）又赎回来，给共产党造成不良影响，当地群众议论纷纷，反映到县政府，胡毅和其他领导干部都很气愤，对王孝鹏提出严肃批评，令他把地退回去。这个会一直开到夜间十二点才结束。一天没休息，大家都很累就睡觉了。王孝鹏心怀不满，等别人都入睡了，他提着手枪摸到胡毅睡觉的屋子，照胡毅胸部开了两枪。他提枪想跑，街上、村边路口都有部队站岗放哨。听见枪响，部队、干部、警卫人员就把胡毅住所包围了。王孝鹏见无法逃跑，就用手枪打自己头部，结果把嘴唇打坌，穿过面皮没死。天亮时，又听说白马关敌人讨伐往南来了，县政府的人员准备转移，就把胡毅遗体埋在西庄子东边，把王孝鹏抬上向迎城岭走去。因有敌情发生，又加上干部战士对王孝鹏都恨之入骨，不愿意抬他，就用石头把他砸死了。解放后，胡毅的遗体经河北省政府安葬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里。

胡毅同志在丰滦密开展工作时期，正是敌强我弱最艰苦时期，他坚强不屈带领全县军民开展对敌斗争，他的牺牲是我们的损失，全县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一位好干部，全县人民一直怀念他。

抗日区长张茂森

杨玉茹

一、受命

1940年春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内线开辟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十团挑选了40余名富有经验的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从事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不老屯一带被划为第四区，由张茂森担任该区区长。

张茂森，原籍顺义县，参军前当过小学教员。长期的部队生活，使他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二、智闯石匣镇

石匣，是当时密云县的一个大镇，距不老屯十五里路。这里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七·七”事变后，这里成了日伪警、特的重要据点。方圆仅一平方里的小镇，竟驻扎了九个日伪机构，日本兵和军、警、特务横行。北街三丈多高的炮楼下有日本兵站岗，人们常说：进了日本宪兵队，不死也要脱层皮。

石匣城外挖有深两丈、宽三丈的治安沟，城门口有日本兵和警察站岗。

万恶的敌伪势力，把一个好端端的富庶之区变成了暗无天日的虎狼窝，城里百姓人心慌惶。城外的百姓提起石匣就谈虎变色，平时谁也不敢轻易进城。

张茂森却多次闯入石匣。一天，敌人又集结兵力，下乡讨伐去

了。张茂森得知城内兵力空虚，立即决定乘虚而入。

这天清早，张茂森打扮成特务的样子，大摇大摆地来到石匣东关，进了一家饭馆从容地点了饭菜，边吃边盘算着。刚一出门，就见一名日本兵和一个特务正在路边调戏妇女。张茂森见状怒不可遏，抽出大肚匣子叭叭两枪，结果了那两个坏蛋。城内敌人闻声而出，边跑边喊边打枪，一窝蜂涌出城门口。

见此情形，张茂森灵机一动，举起匣子枪望空中打了一排子弹，迎着敌群冲过去，边跑边怪声大喊："抓八路哇！快追呀！往东跑了！"霎时间就和敌人擦身而过，城门口的哨兵以为他是自己人，一挥手便放他进了城。

张茂森刚进城门，见一个戴墨镜的特务，边跑边大声喊："张茂森进石匣了，张茂森进石匣了！"

张茂森不敢怠慢，一直向西跑去，见日本鬼子正在集合，他飞快地转到围墙西边，向院里用力甩出两颗手榴弹，快步进了伪警察二分局。

张茂森闯进局长室，大声命令说："快！城里发现了八路，赶紧带队搜查！"伪局长忙陪着笑脸问："嘿嘿，先生在哪里供职？"张茂森厉声说："1418司令部宪兵队的！"那局长还不放心，陪着小心又问："先生，我怎么对您有点儿眼生啊？"张茂森不耐烦地训斥道："净他妈废话，老子是后勤，快集合！"

伪局长还想再问点什么，突然电话铃响了，伪局长刚要去接，张茂森眼疾手快，抢先一步抄了电话，先是嗯啊地应付了一阵，然后说道："报告队长。警察局长不他妈动弹！什么？押着他们去！是……是！""叭"地一声，张茂森扣死了电话。二分局长只好乖乖听令。

一会儿功夫，伪警察们列队出发了。张茂森吸着局长递过来的香烟，威严地走在敌人队伍中间。好容易搜完了西街，张茂森又命令他们再去西关搜查。伪局长不敢违抗，只得叫开西门来到西关。

张茂森让众警察分头搜查，要过了伪局长的自行车，又闹着玩儿似地下了他的枪，抬腿骑上自行车，戏谑地说："再见了局长先生，咱们后会有期!"便头也不回，一溜烟向抗日游击村——永乐驶去。

伪局长吓呆了，待惊魂稍定，慌忙叫几个警察跑步追赶，边追边打枪，一直追出六里多地。张茂森故意放慢了速度，待与敌人相距不远时，猛回头甩手就是一发子弹，打断了上坎铁路旁边的两根电线。紧接着厉声喝道："滚回去，我是张茂森！"几名警察见状，再也不敢拿性命开玩笑，乖乖地溜了回去。

三、威震敌胆

张茂森的大名在石匣传开了。敌伪人员都把他当成了"克星"，只要提起张茂森，他们就心惊肉跳，甚至有的特务在打赌起誓时也这样说："我要是骗你，出门就碰见张茂森!"那个二分局长，从此也无不唯命是从。当不老屯村成立民校时，石匣二分局竟派人送来两驮子纸、笔、本子。当年深秋，又派人送来几驮子毡帽头，都声称是奉张区长之命送来的。民兵们用敌人送来的纸笔学习文化，热情更加高涨。战士们戴上敌人送来的毡帽，自豪地说："咱们戴上这新式'钢盔'再也不怕西北风了!"以后各村纷纷建起了抗日政权、民兵、民校、儿童团，站岗放哨送情报、捉敌特、交公粮、做鞋做袜供应军需。

张茂森眼睛有点毛病，绰号"斜瞎子"。所以敌人尽管对他恨之入骨，悬赏捉拿，其实并不知他到底是何模样。

有一次，一个农民走进城门，哨兵见他身穿灰布二大袄，衣襟下露出一绺红穗儿，就把他当成了张茂森。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区长长、区长短地叫个不停。那个农民连忙说："我可不是张茂森。"哨兵指着那个红穗儿说："你带枪干什么?"农民说："不过是一个扇子坠儿!"

张茂森摸透了敌人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胆子更大了。有一

次，他头戴破草帽，肩背捎马子，来到城门口，一步步接近岗哨，猛地亮出匣子枪说："我是张茂森，你让进不让进?"哨兵闻言大吃一惊，哪敢阻拦，乖乖地放他进了城。进城后，张茂森又找到二分局长，命令他一块去给八路军办事。事情办好了，他拉着二分局长的手，从容地出了西关，一群警察追上来，待双方相距三、五丈远时，张茂森大声喝道："追什么？你们局长在这儿哪!"

为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茂森通过各种关系，争取敌伪上层人员。在石匣北门住着一名姓王的日本翻译，张茂森几次找到他，讲清中国人不做亡国奴的道理，动员他利用特殊身份为八路军做事。几经教育，那个翻译终于良心发现，向我军送出不少重要情报。

四、深夜除奸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茂森与兵马营一韩姓村民拜了把兄弟，在他的影响教育下，那个人也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事。但后来形势恶化，姓韩的经不起敌人的利诱，暗中串通了石匣的敌人，使抗日工作遭到损失。经上级研究，决定由张茂森除掉这个变节分子。

这天晚上，张茂森像往常一样来到韩家，与他同吃了一顿晚饭。待天黑以后，他不露声色地说："天黑了，路不好走，请你送我一段儿。"待走到南庄头，张茂森猛地用手枪对准这个坏蛋说："站住！告诉你，我今天是奉上级命令来杀你的。"接着就历数了他的罪行，面对事实姓韩的无可抵赖，只好乖乖地走到蝎子石，被就地枪决。

五、水边歼敌

7月里的一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张茂森去区里开会。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头戴破草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机警地驶在

路上。当骑到离朝都庄不远时，远远看见路边的大坑里有人洗澡，他顺着青纱帐摸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十几个鬼子和伪军。张茂森哪里肯放过这个歼敌的好机会，只见他悄悄靠近敌人，瞄准几个日本兵，抬手就是一个连发，几个日本兵应声倒地。张茂森命令十几个伪军穿好衣服，站成一排，给他们训话："看见了吧，今天打死的都是日本人，这是因为八路军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人没大呆头了，你们要是再跟着他们跑，决没有好下场，今后怎么办，自各儿掂量着！"张茂森说完，扬长而去。

六、牺牲经过

于家台村有个伪保长，由于铁心资敌而被抗日政权镇压。他的弟弟赵国良在石匣当特务，蓄意为其兄报仇，于是，他与日本人串通好，搞了个假投降的阴谋。

这一天，赵国良带着两把手枪，从石匣宪兵队假装逃出，日本宪兵当晚即在于家台赵家放了一把火，以示惩罚。第二天早上，赵国良跑到白土沟，找到张区长表示：今后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了，要投降八路军。张茂森一看赵国良是带枪投诚，又有昨天的一把火为证，就相信了他，并按照带枪投诚条例予以优待。由于区里其他负责人不在，当即决定：亲自将其送到县政府听候上级处理。

到了窑子洼村的自卫军哨所，张区长口渴难耐，想找点水喝，所内只有一名岗哨，赶紧去烧水，张茂森即斜靠在铺上稍事休息。赵国良趁机偷了枪，溜到屋外，隔着窗户向张茂森开了三枪，都打在肚子上。

县长江卓远远听见枪声，立即带人跑来，赵国良已仓惶逃走，一气跑到石匣，力尽炸肺而死。

张茂森身受重伤，也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四区群众失去了一位好区长。县长江卓为此痛哭不已，四区的老百姓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将抗日区长张茂森的遗体埋

葬在窑子洼。

张茂森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直至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白河游击队长任永海

郑云山

“扛长活的庄稼汉子也领兵打仗，可不能隔着门缝看人啊!”云蒙山、白河川一带老百姓口里这样说，心中感到无比自豪。

1940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五，十几名小伙子，吃过节日的晌午饭，相继来到猪头岭小自然村任永海家，哥儿们说东道西闲扯，说说笑笑到了天黑，他们等待八路军十团派军代表来，组织他们成立队伍。农村老百姓从小就吸旱烟，十几个小伙子挤在一间屋子里，时间不大就闹得屋里烟气腾腾。这都是由任永海串连而来的，他们的年岁都是十八、九，二十多岁，扛长活，打短工，放牛倌，他们为了打日本救中国，一传俩，俩传仨来到任永海家。在任永海带动下，这十六名小青年等侯军代表李瑞徵来组织地方武装——白河游击队。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就要组织建立起来了!

军代表李瑞徵由任永海领进屋来，并向大家作了介绍。李瑞徵给大家讲了八路军的性质、任务和与老百姓的关系，特别讲道：司令部同意组建这支游击队，由任永海任队长，他自己为军代表。这十六个人编成两个班：第一班由任永丰任班长，以下有朱连福、任永全、任永水、郑若瑞、谭景华等为战士；第二班孙庆才为班长，孙庆禄、孙庆秀、李文山、任连瑞、任永江等为战士。有趣的是郑德安年纪小，个儿小，人还没有枪高，就动员他回去，但他死求活缠地坚决要当游击队，硬是不回去。只好留下他当预备战士，跟着队伍学当兵。

白河游击队组建起来了，枪从哪儿来？李瑞徵回团部请示，首长拨给他们十五支杂牌大枪，一支手枪，但没有子弹，得由他们自

己去搞。每人还发四颗手榴弹。领回武器，队伍装备起来了，好不威武。他们在十团直接领导下，边开展抗日活动，边进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教育。当时他们的任务是：除奸反特，保卫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村政权，打击反对抗日的地方势力，以武装支持人民的抗日行动。游击队在云蒙山区、白河川宣传抗日救国，除奸反特。四合堂地主王树达收藏枪支不交，拒绝为抗日出钱出粮，造谣言攻击抗日政权，白河游击队把他抓住处决了。这件事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对群众震动也很大。汤河口伪满警察署派遣特务进根据地，伪装成卖炕席的到处造谣说，八路军杀人放火，抢男霸女，烧杀掠夺，……也被游击队捉住杀掉。他们边训练，边战斗，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军事素养的队伍。

当年八月，对家河、水川的一支抗捐税的农民武装与白河游击队合编，合编后队伍发展到三十多人。队伍扩大了，由两个班组建成三个班，任永海继续任队长，水川农民自卫武装的首领孙长志为副队长，郑卿为副官（负责军需）。

部队刚刚合编，还没有来得及训练，九月中旬，日伪纠集四千多兵力，对云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时七十八天的大扫荡。白河游击队奉命随主力部队转战到山外。游击队人员少，武器又差，但他们凭着人熟、地熟，人少行动方便等有利条件，乘敌人之虚在敌占区四处出击，弄得敌人惶恐不安。他们从滦平的下栅子、汤河口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兜了个大圈子，敌人扫荡过去，他们又转战回来。他们声东击西，多次与敌人交战，吸引日伪追赶。我十团主力则抓住机会歼灭敌人，弄得敌人顾头不顾尾、惊慌失措，终于鞋底子抹油，逃之夭夭。任永海的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白河游击队配合十团主力，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打击敌人，保存了自己，胜利地粉碎了日伪策划的七十八天的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云蒙山根据地，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却扩大了

地盘。白河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也大了，白河以北的北对峪、大峪、黄峪口、西湾子等村，都开辟为新的根据地。

在反扫荡斗争中，白河游击队的影响扩大，威力大振，队伍本身得到了锻炼，战斗力提高了，许多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游击队，十二月底白河游击队发展到一百多人。从日伪军手里夺得枪支，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也加强起来，游击队歌编得好："没有枪，没有炮，我们都从敌人手里要……。"

1940 年年底，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两支游击队合编，组成丰滦密联合县的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分为两个中队，中队相当一个连，合编后任永海任一中队的队长。

1941 年 6 月，丰滦密游击大队升编为十团二营（原十团只有一营和三营），一中队编为第五连，任永海任连长。当时十团主力部队，经常以连为战斗单位活动，有时也以排为单位各处活动，任永海率十团二营五连转战丰滦密地区与敌人继续战斗。

1941 年 8 月，由于他年过四十岁，身体有病，不适宜作大部队工作。于是，十团首长决定他仍回地方游击队，继续任丰滦密联合县一区游击队长。1942 年 3 月，在保护根据地春耕生产中与敌作战壮烈牺牲，时年 44 岁。密云人民永远不会忘怀他的不朽功勋！

宁死不屈的七烈士

阎秉哲 鲍星时

密云县石城乡张家坟村珍藏着一块银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碑的正面左侧镌刻着“任宗玉、任宗芳、任宗学、任宗山、任永刚、孙长瑞、韩二炮千古”，这就是七烈士。正中是“不屈不挠”四个大字，写的刚劲挺拔，正象征着烈士们的不屈性格。正面右侧书写“县长倪蔚庭”和“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立”，说明这块碑是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政府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建立的。

一提起七烈士，张家坟的人们会马上告诉你，他们和日军英勇斗争的事迹。

一九四一年，丰滦密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壮大，它不仅将我平北与冀东两大抗日根据地连接了起来，而且直接威胁着敌人往来于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命脉——平古路，并象一把尖刀直插伪满和伪华北两个伪统治区的接合部。因此，日本侵略者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要摧毁它。一九四一年秋末，日伪曾调集一万多人的兵力，向这块仅有几万人的根据地进行“扫荡”，结果被我抗日军民粉碎。然而，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相反的竟采取了更加残暴的政策，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军民。他们将丰滦密联合县长城以外的广大山区划为“无人区”不许人们居住，也不许种地，强令当地居民统统搬入他们指定的“部落”（人圈）里去。日伪在“无人区”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破坏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以达其摧毁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张家坟村就座落在敌人划定的“无人区”内。面对着日伪这种灭绝人性的残暴政策，张家坟的

抗日人民没有后退，没有动摇，而是更加坚强地与日伪斗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除一部分老弱妇女被转移到关内亲戚家躲藏外，大部青壮年和无亲可投的人全都迁到深山密林，誓死不进敌人的“部落”。房子烧了就搭窝棚，窝棚烧了就住山洞，东西被抢光了，他们就背上背篓跟着八路军打游击。

一九四二年三月，春回大地，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石炮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动员“无人区”的群众回乡搞春耕，将“无人区”变有人区，将少人区变多人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无人区”计划。并且采取措施安置已经回乡群众的生活，帮助他们搞好春耕。在抗日政府的号召下，张家坟村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乡种地。为了防备意外，村自卫军（民兵）还派了岗哨，建立了消息树，观察、监视敌人，保护正在春耕的群众。正当人们忙着春耕的时候，驻四合堂据点的日军和后山铺伪满军一起包围了张家坟及其附近地区。这天，负责到西梁尖站岗看消息树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任永华，由于连日抢耕抢种，十分劳累，精神困倦，恍惚睡着了，未能发现敌人，等埋头耕种的群众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逃跑和转移了。这时，日军和伪满军鸣枪围捕进入“无人区”种地的群众。任宗玉拼命向南沟跑去，敌人从背后射击，子弹打在他脚上，他蹲在地上，跑不动了，因而被敌人捉住。任宗学在南岭梁，孙长瑞和韩二炮在大梁沟耠地，也被敌人捉住。任宗芳，任宗山、任永刚藏到猪头岭根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也被抓住。敌人将他们捆绑起来，穿成一串押回四合堂据点。

共产党员任宗玉是张家坟中心村的副村长，他是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回村组织群众春耕的，不幸被敌人抓住；共产党员任宗芳是村粮秣委员，在村里一直负责征集、保管公粮，为抗日军队号房、派饭等工作，这次也被敌人抓住。共产党员任永刚是闾主任，也一直为抗日工作奔忙。任宗山、任宗学、孙长瑞都是坚决抗日的自卫军（民兵）队员，任宗山还是自卫军班长；韩二炮名叫韩丙方

是黄土板地人，这次是来张家坟帮人种地，不幸被捕的，也是自卫军队员。他们被敌人押到四合堂据点的当天夜里，就被一个一个地拉去审问。敌人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老百姓，种地的。”“你们谁是八路军？谁是干部?”他们都回答：“不是。”敌人问：“你们的政府在哪？八路军住在哪？炸弹厂、被服厂在什么地方?”他们也都回答“不知道。”敌人见问不出什么，气急败坏地对他们一一施以酷刑：吊打、灌凉水、灌辣椒水、压杠子，一直折腾了半夜，他们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然而，敌人的酷刑折磨又有什么用呢？这几位是经过战争锻炼，受过党的深刻教育坚决抗日的群众，再残酷的刑法，也休想从他们嘴里掏出半点情况。敌人没有办法，只得把他们关押到一座破烂不堪、充满臭气的牲口棚里。为防止他们逃走，敌人还用铁丝穿着锁骨把他们锁起来。

为了折磨他们，敌人一连四天四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而且每天吊打拷问。然而，我们的共产党员、自卫军队员，在这种情况下，刚强如初，没有一个人屈服。敌人知道用硬的办法得不到东西，又改用软的办法。第五天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好饭好菜，让他们吃。然而，七个人看着饭菜，没有一个人去吃。他们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谁都不愿上当，宁愿忍受饥渴，也不吃送来的饭菜。敌人看到七个人都拒绝吃饭，只好把饭菜拿走。七个人不饿吗？不是。有的饿急了，就从破袄里撕块棉花套子嚼嚼咽下去；渴极了，用力抿一抿嘴唇。他们宁死不屈，坚持和敌人斗争。敌人妄想用软办法从他们嘴里套出我抗日军民情况的阴谋，又遭到彻底失败。

凶恶的敌人在我坚强抗日群众的身上施用软、硬办法都失败了，再也无法得到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情况了，因此，便对他们下了毒手。

就在任宗玉等被抓捕的第七天下午，山风呼啸，山色空朦，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押着任宗玉等七名被抓捕的群众，来到四合堂南

一里许的栗树沟门。几天来的饥饿、干渴、严刑拷打，已将七个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们在敌人面前不肯流露出一丝怯懦的情绪，而是用极大的毅力站起来，向敌人指定的地方走去。当他们来到栗树沟门时，这里已挖好了七个大坑，周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七个人都明白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死，对他们七个人来说已经不是可怕的了。因为，在敌人的酷刑下，他们都已经死过去几次了。他们站到大坑前，面对着敌人的刺刀，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倒下去了。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英勇不屈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七烈士被日军杀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家坟，传到了丰滦密各地。人们为他们惨遭杀害而悲痛，也为他们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精神所感动。丰滦密联合县政府，根据任宗玉等人的斗争事迹，将他们追认为抗日烈士。并将烈士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村庄张家坟命名为“七烈营”，以示纪念。丰滦密联合县县长倪蔚庭，还专为他们树立“不屈不挠”纪念碑，以慰七烈士之英灵。

七烈士英勇牺牲，已经四十多年了，他们的英雄事迹，仍然在密云县广泛流传，他们那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仍然激励着密云县的广大人民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张家坟七烈士纪念碑

烈士王克成

郭德昌

1943年4月8日上午，在密云北部山区日寇驻马营据点的审讯室里，一位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四肢被叉开，手掌、脚掌被铁钉钉在里屋门框上。里屋、外屋柴火正旺，两把铁锹被火烧得通红。两个刽子手分别站在里、外屋，凶残的敌人对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正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刑讯……

"你到底讲、还是不讲？枪是哪里来的？你是什么人？"一个敌军官凶狠地问道。

"我早已说过了，我是人民的儿子！"在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声过后，只见他仿佛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到牙齿上。随之，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接着，一块血淋淋的肉状物出口落地。敌人见他咬断了舌头，再也无法得到口供，便下了恶令。两个刽子手拿起红通通的铁锹，恶狠狠地烙在这位勇士的前胸、后背上。几经折磨，这位人民的儿子已经不醒人事，然后敌人又从门框上将他起下，拖出后院，放出狼狗……，我们的英雄就这样被犬撕裂而死。

这位人民的儿子名叫王克成，生前是密云县尖岩村人，担任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二区区委交通联络员。当年，抗战进入最艰难困苦的岁月，日寇在密云北部山区制造"无人区"，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丰滦密县委、县政府根据平北地委"坚持下来就是胜利"的号召，领导群众全力坚持反"无人区"斗争。根据"无人区"军民居住隐蔽零散的特点，每隔十几里建立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站，设专职联络员，负责联络部队和传送文件，保证政令和情报上传下达，并动员群众宣传"山外

不如山里保险”，“赶快回来种地，否则有挨饿的危险”。变“无人区”为有人区，变少人区为多人区。王克成带着党和政府的指示号召，只身一人回到家乡——尖岩村开展工作。

4月6日，任务完成后，他想和村干部话别，再次强调一下工作，乡亲们气愤地告诉他说：“马营的特务又来敛钱啦，村长这会正应付他们呢！”乡亲们的愤慨，激起了王克成为民除害的强烈怒火。为减少敌人对乡亲父老的敲诈勒索，惩戒敌特，他背着乡亲悄悄地离开了村，来到村北杏岭沟一个石坝下隐蔽起来。

过晌时分，那两个特务骑着骡子耀武扬威地朝村外走来。当他俩走到离石坝约40米远的时候，王克成将早已紧握的手榴弹拉开弦，甩向了特务。不巧，手榴弹因受潮没有爆炸。王克成又急忙扣动枪板机。糟糕，子弹也卡了壳。此刻，早已被吓得魂飞胆丧的特务，见手榴弹和手枪都没响，便慌乱开枪，子弹擦伤王克成的头部，致使他昏倒在地。两个特务见他倒下了，害怕另有埋伏，便仓皇逃回据点，报告给上司。敌人派重兵反扑到杏岭沟，抓捕了刚刚苏醒过来的王克成，把他拴在马鞍子下拖了20里地，来到马营据点关押起来。

敌人对他动刑审问，鞭抽、棒打都毫无结果。一连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也就是8日早晨，敌人见用硬的不行，又端来酒菜好饭、好茶进行软化，但王克成心如既往，仍不屈服。敌人束手无策，最后只得把他凶惨地害死。

中共丰滦密二区委员会，为王克成烈士镌刻了一块汉白玉墓碑，立在了他家乡的后山上，以纪念这位“人民的儿子”。

五道岭联合村村长崔福来

孙明舜

丰滦密老一区五道岭联合村村长崔福来是一位没有赢得身后功名的无名英雄。

崔福来1902年生于密云县石城乡白河岸边五道岭村一个中农家庭，幼年上过私塾，由于他有文化，而且为人正直，乡亲们非常信任他，三里五村闹纠纷都找他调解。抗日战争爆发后，长城内外逐渐沦为日伪统治区，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和压榨下，人民的生活更苦了。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来到密云，十团的地方工作团便来到五道岭开展工作。崔福来在八路军的教育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积极主动地帮助地方工作团工作，他的三弟崔福长也参加了八路军，给中共丰滦密工委书记马力当警卫员。

1940年7月，为了培训基层干部和发展党员，中共丰滦密工委在王庄、水堡子举办首届救国会干部训练班，抽调近百名抗日骨干参加学习，崔福来也参加了学习，由白乙化、马力、胡毅等亲自授课。学习结束后，白乙化在他们的结业证书上题词："勇敢工作、坚（艰）苦学习，领导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经过培训，八月，崔福来等人正式成为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批党员。崔福来家也成为当地抗日堡垒户，马力等县领导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经常住在他家。白乙化同志住在他家，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不摆司令的架子，穿着件灰大褂儿，管自己的母亲叫大嫂，向母亲借书看，在聊家常中就把调查民情工作搞了。

培训班结束后不久，崔福来被任命为老一区五道岭、亮平台、石麻沟等几个村的村长。他积极开展工作，在联合村里建立了半脱

产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自卫军模范队，担负监视和袭扰敌人、搜集情报、破坏交通、为我部队秘密带路、送信等任务。由于崔福来的工作突出，几次受到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和一区领导的表扬。

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1940 年 9 月 11 日开始，敌人调集密云、丰宁、滦平等地日伪军 4000 多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展开七十八天的大扫荡，妄图扼杀新生的抗日政权。但在根据地军民打击下，敌人损兵折将，不得不草草结束了扫荡。我抗日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由原来的 4 个区扩大到 16 个区，崔福来家乡一带村庄被划为五区。经过反扫荡斗争的锻炼，他的斗争经验更丰富了。1941 年 10 月 4 日，伪满和伪华北日寇纠集了万余日伪军联合对丰滦密根据地发动了两个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制造无人区，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在根据地内推行“集家并村”计划，把老百姓驱赶到他们指定的敌占区村庄或根据地边缘的“部落”居住，“部落”外十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许耕作不许居住；十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这些地区统称为“无人区”，以实现其“民匪隔离”，彻底消灭我抗日力量的目的。针对敌人的政治阴谋，崔福来等抗日根据地的村干部们响应丰滦密县委提出的“誓死不离山”、“坚持下来就是胜利”的号召，坚持根据地斗争。为了安全，他隐蔽在河东山上的石洞中，父亲崔明伦早晨假装拾粪，一举粪叉（平安的信号）他才能回家吃饭。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全家人及村里人全部被强迫搬到东户部庄，他一个人继续留在五道岭坚持山地斗争，为八路军传递情报，掌管秘密活动站的盐、粮，在山中种地并积极组织动员外逃的青壮年群众回山种地坚持“无人区”斗争。在他的动员下，五道岭和附近几个村的山地都耕种起来。

1942 年 6 月，崔福来和从敌占区跑回来耪地的十几个群众住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出去给牲口割草，不幸被

偷袭沙坨子的马营据点敌人抓住，但身份没有暴露。敌人偷袭一无所获返回后，发现了亮平台白河对岸山上的放羊娃和羊群，便强迫崔福来游过涨水的白河将放羊娃抓过来。崔福来游过河对岸后发现了隐蔽的群众，他想引开敌人，被敌人开枪击中胸部。敌人让他游过来哄骗说给他上药。他想，自己要不过去，敌人过来后，隐蔽的群众就要遭殃。自己一个人死了，群众就能活下来。于是他将计就计，强忍着伤痛，游过了河。敌人待他上岸后，搜他的身，他将证件吃到了肚子里。有叛徒偷偷地告诉敌人，他就是崔村长。敌人高兴地说："好你个崔大个儿，我们可抓住你了！"原来敌人有各村干部的名单，可是有的人和名字对不上号。

抓住崔福来后，敌人严刑烤打，用棍子敲他的手和脚指甲盖，逼他说出区政府和八路军的活动站、联络站及区政府的行踪，他宁死不屈，被敌人用刺刀刺死在五道岭村的猪圈里，年仅 38 岁。

崔福来死后，区里给他开了追悼会，将给敌人通风报信的伪保长王少宗、郭发处决。崔福来的爱人和留下的 6 个孩子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崔福来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白河两岸人民的心中。

柏栅山四十八烈士罹难记

张景旺口述 曹友林整理

在密云县革命烈士陵园的骨灰堂里，有一个“四十八烈士”的灵位。它是半个世纪前，日军侵华暴行的罪证。

密云县东部山区有一条清水河，它自兴隆县穿过长城入境，流经20公里西下注入潮河。抗日战争时期，清水河两岸的广大山区，是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冀东、平西两大根据地往来的重要通道。常有抗日部队、领导干部和爱国青年、学生从这里路过。因此，日军对这一地区控制得十分严密，除了在墙子路、孝女台、北庄等地设下据点，屯兵把守外，还在两岸村庄网罗特务、汉奸，四处刺探抗日情报，破坏抗日活动。

1942年10月初，冀东地区党组织选派13名精明强干的爱国学生（其中有两名是女学生），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去学习。为了避开敌人的阻截，这13名热血青年，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以日行40公里的速度，向目的地进发。每到一站，便不顾疲劳和饥渴，为百姓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受到沿途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上级派冀东第六大队三中队指导员李耀庭率队护送。10月9日由平谷县进入密云东部的蔡家峪村。原计划沿清水河川前进，翻过四顶山，渡过潮河到了丰滦密联合县，就可以顺利的抵达平西。10月11日，队伍行至黄土梁村接到情报，日军正在潮河丰滦密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形势险恶。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使队伍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停留，只好返回冀东。队伍返回一里多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因山高路滑，前进十分困难，当晚宿营在转山会村。就在乡亲们忙着烧水、做饭、

腾房子，热情招待爱国学生和抗日队伍的时候，清水河西岸苇子峪村的汉奸地主曹佩久向日军设在石匣的中心据点告了密。密云、石匣、北庄和墙子路四个据点的日军，串通一气，连夜扑向转山会，把通向周围村庄和山外的道路封锁起来。

12日，东方麻麻亮，青年学生和战士们开始集合了，正要吃早饭，哨兵报告："北山坡上发现敌人。"李耀庭迅速带领队伍向南转移，沿着苍术会西柏栅山前进。队伍走出四、五里，尖兵和向导碰见放羊的百姓吴焕义。吴低声问："什么人?"向导回答："自已人，八路军。"吴急忙往南一指说："你瞧瞧，别走了。"他们往南一看，日军头顶钢盔，黑压压的一大片正在往山上爬。尖兵立刻报告："南山口有敌人!"李耀庭当机立断，按原路返回，想朝东面的苍术会撤退。没走多远，又被墙子路来的敌人迎面堵住了去路，在这三面受敌的时刻，李耀庭率队抢占西柏栅山。此山尖秃，稀疏的长着几簇小柏树，山势陡峭，尽是悬崖，每登高一步都十分困难。青年学生们在战士们的帮助下，奋力地攀登着。队伍爬到半山腰时，尖兵发现敌人的4挺机枪，正对准前进的学生。他急忙报告："山上有日军!"尖兵和向导是当地人，见四面是敌人，难能突围，就钻进崖缝隐蔽起来。李耀庭做了紧急的应战布署后，大声命令："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打呀!"随着命令，一连串儿的手榴弹投向了敌群。但因敌人事先占据了有利地势，因此杀伤力不大。紧接着战士们有枪的使枪，有刀的挥刀，赤手空拳的学生们搬起大块石头朝着敌人们的脑袋砸去。日军发疯地轮番扫射着，密密麻麻的子弹使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不断的倒在血泊之中。战士们也因子弹不足而接连倒下。剩下的战士杀红了眼，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就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有个战士头部负伤了，看见一个日军正对准学生时，他使尽全身力气，抡起枪托狠狠地朝敌人的头上劈去。不幸被身后的鬼子刺中，当即牺牲。李耀庭英勇战斗到最后一息，他身上多处挂花，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他誓死不屈，倒背着胳

膊把手枪压在身下，至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指挥枪仍被紧紧地握在手里。半小时之后，枪声止了。敌人抓住一名十五、六岁的徒手小战士，翻译问："你们当头的死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小战士回答："不知道"。敌人上手就打，打后又指着李耀庭的尸体问："他，是不是李满盈!"李满盈是八路军冀东十三团一营教导员，经常率队袭击清水河川上日军据点，敌人曾多次寻机报复，一直未能得逞。11日，李满盈部住黄土梁村，得知敌人在潮河西地区进行了大"扫荡"，便连夜转移。小战士灵机一动，顺着话音立即改口回答"你们打死的是李满盈"。敌人这才罢休，将他放生。另有两名战士趁机突出包围圈。又过了20分钟，敌人开始清扫战场。日军气势汹汹地端着刺刀，在山坡上寻找着。见到负伤的战士，不是补枪，就是补刀，连一个负伤的学生也不放过。敌人逼迫两名负伤的学生投降。两名学生正义凛然，横眉怒目，大骂不止，凶残的日军一刀割开他们的胸腹。一群日军嗥叫着扑向一名年仅19岁的女学生。她身上已多处负伤，一身黄色的学生套装已血迹斑斑，殷红的鲜血还在顺着面颊下淌。但她坚贞不屈，毫不畏惧。敌人步步逼近，她一步一步地退到崖头。在即将落入魔掌的一刹那，她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毅然纵身跳下悬崖，为祖国，为民族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另一名女学生，也身负重伤，自尽未遂，被敌人逮住了。青年学生和李耀庭等战士，一行共53人，除4名战士大难脱险外，12名学生和36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半个世纪过去了，清水河川上的人民一直牢牢记住这一天。

敌人带着"战果"邀功请赏去了，川上的百姓满怀国恨家仇纷纷赶来。为了不使烈士们的遗体再受伤害，乡亲们含着泪水，轻轻地收拾起烈士的尸骨，在当天就地掩埋了。三日后，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由平密兴联合县区长刘长城主持，将48位烈士的遗体扒出入殓。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将48口棺木抬进柏栅山东边一个不易被

敌人发现的山湾。等候在那里的人们已将48个墓穴排列成“一”字长阵。安葬开始后，首先把李耀庭的棺木安放在正中间，学生和战士的棺木分列在两侧。乡亲们敬佩他们生前是奋勇杀敌的民族英雄，尽管当时还不完全知道这些烈士的英名，为了缅怀英烈，教育后人，还是分别在墓前立下了墓铭碑。

48座坟墓，是侵华日军暴行的罪证。清水河川上的人民，一直用48位烈士的铮铮铁骨和坚贞不屈的情操，教育着子孙后代，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拼搏奋进。



大城子镇苍术会四十八烈士纪念碑

保卫县委会的四竿顶战斗

李义明

1943年11月，队长张汉臣到分区教导队学习，副指导员韩济民调走，李义明从教导队回来后，任党支部书记。

12月中旬，承兴密联合县原县委书记江东、县长王慕林二同志调出，新县委书记马力、县长江卓二同志到任，为此县委在二区大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义勇队派李义明带一个排保卫会议。会议进行三、四天，四外发现敌情，因此向西转移到潮河东沿的下庄头峪村。隔一天夜间，来自密云县城、塘子据点、沙厂钨矿以及北面的石匣、北庄等方面的情报，都称敌人在抓伕、抓驴，有到根据地讨伐的迹象。拂晓前又接到塘子据点敌人奔庄头峪方向来的情报，于是我们集合队伍奔向庄头峪东山——四竿顶。当时我们人员情况是，义勇队一个排和一个机枪组约40人左右，县公安队六个班约六、七十人。县委机关人员从大岭向庄头峪转移时虽有减少，但仍有20人左右，其中有县委书记马力、县长江卓、原县长王慕林、公安局长项一等同志，共计130余人。我们的队伍刚上山，庄头峪村西的柴草垛就被敌人点着了，跑敌情的老乡也跟随我们跑上山来，并说咱们的队伍如果晚走20分钟，就会与敌人遭遇了。县委领导同志找来李义明等人一起分析敌情，认为根据夜间情报，敌人不会是这一股，我们人虽多，但战斗力不强，马上分散又来不及。因此决定奔四竿顶山的顶峰，居高临下，待弄清周围情况，再采取措施。假如已被围坚持打，也在山的顶峰为好，待天黑后突围。因此，义勇队在前，县委机关干部在中间，公安队在后上山了。走到山的半腰就发现山的顶峰有人，我们认为可能是十三团五连，因为五连夜

间住巴各庄东山，距庄头峪十余里路。于是义勇队就用旗子联络，刚晃了两三下旗子，顶峰上的人就向义勇队方向开枪了。我们肯定这是敌人，因此人们开始向后转，义勇队由排头变为排尾了。县委机关的几十名同志听到枪声后便顺着南坡往下跑，到沟底又上南面的山坡，不料南面山坡已有敌人，县财粮科长王林白跑在前面，一上南坡就被敌人俘虏了。敌人向沟里开枪，机关干部和公安队又跑回北坡，与义勇队合在一起，原县长王慕林带着几名同志向东跑去脱离了集体。这时县领导召集李义明等人再次研究，鉴于西面庄头峪村、东面四竿顶山尖和南面山上均有敌人占据，只有西北方向有一条下山的大沟尚未发现敌人。决定从此下山，必要时渡过潮河到丰滦密。江卓同志说："只要过了潮河，过了平古铁路就好办了，那边我熟悉。"于是仍由义勇队在前边开路，公安队在后保护县委机关干部顺着沟下山。队伍未到沟口，李义明向县委领导报告说"前面已发现敌人，如果突围领导一定要跟上，不然我们冲出去再回来接应就太困难了。"几位领导当即决定，冲出去的可能性不大，不如坚持为好。这时整个队伍又返回山腰，公安队占领一个山头，抵抗山顶和南面的敌人，义勇队占领下边的一个山头，抵抗西面和西北面的敌人。县委领导烧了文件和干部一起在义勇队阵地附近隐蔽起来。县委书记马力同志对李义明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已经到了非常的时刻，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实在坚持不到天黑，也得坚持到下午四点左右再突围。这样等敌人追出你们后再返回来搜索战场，天就黑了，可以保住县委。"李义明表示坚决照办。遂即向战士们简短动员说："现在我们已被多于我们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有好的地形，有公安队配合，又是夜长天短的季节，七八个小时好坚持，保住县委安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守住阵地，听从指挥节约弹药。"队伍刚布置好，敌人的轻重机枪就向我方阵地猛烈扫射。密集的子弹在头上呼啸，迫击炮、

掷弹筒的炮弹，不停地在阵地上爆炸。由于有巨石林立的地形，直到下午一点，义勇队的伤员不多。我们隐蔽不还击，脚下小山包的敌人就沉不住气了，约有二三十个日本鬼子向义勇队的阵地蠢蠢而来。从敌人的小山包到义勇队阵地前，有一段没有石头长着茅草的开阔地。敌人见我们还是没有还击，就快速地通过了开阔地，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怪声怪气的尖叫着冲上来，连喘息的声音都听到了。这时义勇队居高临下，30多颗手榴弹同时甩进敌群，炸的敌人血肉横飞，没有炸死的鬼哭狼嚎般的拼命往回跑，他们跑到那片开阔地时，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给予杀伤，二三十个鬼子没有剩下几个，义勇队的阵地前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还在呻吟、蹬腿，多数已和死狗一样，一动也不动，有的钢盔顺山坡往下直滚。这时副排长带领一个班冲了下去，想快速占领敌人的那个小山包，扩大坚守的阵地，以利晚上突围。冲到开阔地甩手榴弹已快够着敌人的阵地了，不料敌人从左面射击过来，副排长和战士们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了。另一个班和机枪组也立即撤了回来。约下午一点钟左右，敌人开始向公安队阵地发起猛攻，用密集的炮火两面夹击，公安队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多数战士壮烈牺牲。队长张瑞同志打的非常坚决，全身四处负伤，仍坚持到最后撤出阵地。两点钟左右敌人占领了公安队的阵地，这时义勇队四面受敌，就更加困难了。李义明把尚有的20余人组织起来重新布置了防位，并提出为保卫县委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两点钟以后义勇队战士凭借有利地形和不怕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四点钟左右，敌人又用20倍于我的兵力疯狂发起攻击。形势严重，班长傅崇勇报告，西北面的敌人从大沟围上来了，全班子弹快打完了，手榴弹也仅有两三个。李义明见太阳快要压山，已到了县委要求的突围时间，向战士们动员说："现在是四面受敌，必须坚决果断的突围，要不怕牺牲，准备牺牲，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把敌人引出山口。"突围的方向是顺山南面那条大沟，出沟口就是庄

头峪，敌人指挥在那里，但指挥部一般没有作战准备，是对我们有利的。随后把伤员和多余的枪支隐藏起来，仅有的17名干部战士在一片喊杀声中冲向大沟，敌人见状便从左右后三面用火力追击，炮弹硝烟弥漫了不宽的山沟，大家一口气冲到沟口。途中有6名战士英勇牺牲，4名同志负伤，李义明的左肩也挂了花，他见北山坡上有便衣，前方二三十米处一道梯田坝坎上露出几十个敌人脑袋，当即下令打，战士江山立刻向敌人狠狠射击。李义明发现这伙敌人全是伪军后，便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中国人往南去。"这伙伪军顺从的持枪朝南跑去。真是狭路相逢，勇者必胜。出了沟口往南是庄头峪，有敌人；向北是黄各庄南山也有敌人，只能往西去过潮河。敌人发现后又用火力死命的追击。炮弹落在河滩上烟柱四起，子弹打在冻沙地上发出道道绿光，在战士脚下乱窜。战士张宝贵被敌人枪弹击破睾丸，行动十分困难，不住地说："支书哇，你给我补一枪吧，免得拖累你们。"李义明的肩部阵阵剧痛，听到战友的哀求，他的心真是比伤口还疼。不能丢掉伤员，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踏破河边的薄冰，连棉衣也没顾得脱，蹚着齐胸的河水艰难的前进。尽管一昼夜没吃没喝，饥寒、伤疼交迫，由于大家坚定必胜的信念终于到达了西岸。这时有4名同志累得口吐白沫再也走不动了，大家只得将他们就地隐藏起来，让另两名伤员躲进西山沟。李义明带着其余5名战士和一挺机枪上了西山。蹬上山顶后又发现黄各庄南山那股敌人正绕道包围过来，李义明等人迅速退下山来，沿潮河西岸向南前进五、六百米处回渡潮河。当敌人爬上西山顶时，他们已顺利的到达潮河东岸。等各地枪声稀少了，他们来到荆子峪村西一个砖瓦窑里，擦了机枪，天黑后翻过东山到达豹子峪，将一名重伤员交给村干部，由两名民兵带路，夜十点钟左右到达龙潭沟东山，也就是大岭西山，在老乡家住下了。房东说："王慕林县长往东去了，时间还不大呢。"大家听了异常高兴，都说那怕有一位县领导幸存，机枪没丢，对领导就好交

待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四个人翻过东山到了大岭，与几位脱险的县委领导相聚，坐在炕上诉说一幕幕悲壮情景。领导告诉他们：义勇队突围时，敌人一直追到沟口。然后又回来搜山，当接近县委领导躲藏的地带时，天已大黑，敌人退缩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化险为夷。县委书记马力同志安慰大家说："这次咱们虽有损失（共牺牲 58 名同志），但县委领导都在，机枪没丢，这就叫完成任务，如果有错误，县委承担。"次日，马力同志亲自把李义明等同志送到义勇队。几日后，义勇队接到了十四地委书记李子光同志写来的鼓励、慰问信。



穆家峪镇四竿顶战斗烈士纪念碑

大义凛然震顽敌

——记金崇山烈士

阎秉哲　鲍星时

在刑场上刽子手被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下祈求我抗日烈士的宽恕，这是日军杀害金崇山时出现的非同寻常的一幕。

金崇山号俊川，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出生在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溯河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八岁开始上小学，由于社会动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学习时断时续，直到十八岁才考入蓟县龙王庙学校上高小。蓟县是我党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龙王庙学校的许多教师是我党党员，金崇山来到这所学校读书，很快就接受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抗日大暴动，年轻的金崇山扛起自家购买的大枪与龙王庙学校五十多名师生一起投身到暴动洪流里。他们的队伍与附近的暴动队伍合编，组成抗日联军十八总队。十八总队在州河两岸多次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十月，冀东抗联队伍西撤，金崇山随十八总队一起沿着蓟县北部山区西行，一直到达昌平地区。这时，多数战士因留恋故土，不愿继续前进，并在“回家乡抗日”的口号下返回蓟县，金崇山也跟着返回家乡。在日伪残酷统治形势下，返回的战士后来有的被杀害，有的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金崇山等大多数则隐姓埋名，潜伏起来，等待时机，重新参加抗日队伍。

一九四〇年五月，蓟平密联合县建立，蓟县盘山成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十一月，蓟平密联合县扩建为平密兴和蓟宝三两个联合县。金崇山得悉这一情况后，精神非常振奋，几经周折，终

于回到了抗日队伍，被编入蓟宝三联合县二区基干队。由于他在逆境中经受了考验，很快被接纳入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九四一年春，又被选送到冀东军分区教导大队学习。六月二日教导大队与军分区司令部、十三团一起被日军包围在蓟县十棵树，我军英勇奋战给围攻之敌以有力打击。由于敌众我寡，难以取胜，为保存实力，只得乘黑夜分散突围。金崇山和五名战士一起顺利突出重围，回家乡再次潜伏。

一九四一年八月金崇山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分配到平密兴联合县第三区工作，任公安助理，具体负责第三区四分区的工作。平密兴第三区辖密云县潮河以东及兴隆县大、小黄岩地区，四分区位于密云县八家庄、庄头峪和墙子路一带。一九四一年春天，这一带地区才刚刚开辟为抗日根据地，抗日工作基础薄弱，地方党的组织还未建立，那时三区干部缺乏，一个小分区也只有一两名脱产干部。金崇山在这里既是四分区的负责人，也得亲自做各种具体工作，加之敌伪十分猖狂，斗争环境恶劣，金崇山只能利用夜晚时间进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事抗日工作。白天必须转移到山沟树林里隐蔽，有时还要化装以迷惑敌人。由于金崇山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政策，依靠群众，锄奸防特，时间不长，便逐步建立起党和民兵组织，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政权，四分区的斗争形势很快出现一个新局面。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间，金崇山和区民兵大队长张福海一起来到庄头峪召集邻近几个村的干部开会，商讨征收和分配救国捐一事，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后，为了安全，他们离开庄头峪到潮河西山沟里一棵桃树下休息。第二天又到南碱厂工作，他们刚刚进村，小营据点的敌人也到达南碱厂。金崇山和庄头峪民兵赵士亭向村南转移，这里是潮河滩，地势开阔，故被发现，敌人从后面追赶上来。金崇山渡过潮河正要上岸，不幸脚部负伤，赵士亭要背他往前跑，紧追的敌人愈来愈近，金崇山当即将文件包交给赵士

亭，并命令他赶快冲出去，他自己则爬进一条石缝用手枪阻击敌人，以掩护赵士亭，直到子弹打光，最后被捕。

金崇山被捕后，敌人用毛驴将他驮到小营据点，尔后转送到石匣。敌人知道金崇山是平密兴第三区干部，了解我方的机密情况，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把情况弄到手。开始他们对金崇山反复审问，问他“公粮存在什么地方?”“军鞋藏在哪里?”金崇山一一回答“不知道!”敌人又问他“你们有多少人?”金崇山讲：“我们有的是……”审问没有得到一点情况。敌人对他又施以重刑，金崇山被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但仍未吐出半点实情。敌人没有办法，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遂将金崇山转送古北口关押。在这里敌人采用软办法对待他，妄图达到利用酷刑而未能达到的目的。金崇山对敌人的这套作法，一看便知是阴谋，但为了养好伤，继续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因此，敌人派医生给他治伤，他便欣然接受；敌人给他送来好吃好喝的东西，他也全部领受；可是，敌人要他洗“脑筋”送来大批反动书报，却被他抛掷一边；敌人派“美女照料”他的生活，他拒不接纳，敌人许以高官厚禄诱惑他投降，他坚如磐石，毫不动摇。敌人技穷，决计杀害他。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金崇山被推上汽车来到后八家庄。后八家庄是四分区的一个村庄，也是金崇山工作战斗的地方。敌人将他送到这里来，妄图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震慑抗日人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金崇山一眼便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面对凶狂的敌人毫不畏惧，毅然把刑场变成了与敌决斗的战场。

十一点左右，金崇山被拉到西大庙后山坡，这里早已挖好一个长方形大坑，四周站着被驱赶来的百姓和强迫挖大沟的民工，外面密布日伪军，他们手握上着刺刀的大枪，监视着老百姓。日军小队长赤哲和王翻译官走到金崇山面前，再次逼问金崇山降不降？金崇山避开赤哲的提问，面对着周围的群众大声讲道：“父老乡亲们，我虽然就要被日寇杀害了，你们不要害怕，日本帝国主

义长不了，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金崇山讲的话，使日伪军吃惊，也使赤哲狼狈不堪，他再也不向金崇山劝降了，急忙命令日军把金崇山推入大坑，强令民工向坑里铲土。黄土一铲一铲地扔进大坑，从金崇山的脚下迅速升起，金崇山没有害怕，更没有一点想要投降的表示。土愈积愈高，金崇山的半个身子已被埋在土里，赤哲忽然命令民工停止铲土，他走到大坑边沿，再次逼问金崇山降不降，并且讲道只要金崇山说出一个“降”字，马上就把他从大坑内拉上来，如果拒不投降就要继续向坑内铲土。金崇山听了赤哲的话后，坚定地讲：“今天你们杀了我，二十年后又是一个我，还要抗日，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赤哲看到金崇山宁死不降，知道劝降的计划已经遭到彻底失败，遂强令民工再次向坑内铲土，黄土升到胸部，金崇山的呼吸愈来愈困难，他使出最后的力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金崇山呼喊着抗日口号，双肩被埋上了，头部也被埋上了。但是他不肯这样就死去，他还要和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斗争，他挣扎着，挣扎着，头顶把黄土堆顶的乱摇动，日军看到金崇山这样顽强不屈、英勇斗争都惊呆了。日军小队长赤哲害怕了，急令两名日军上前用刺刀去扎土堆下的金崇山，一个日军连扎两刺刀，不知刺刀扎在什么地方，用尽力气也拔不出来，日军吓得面色如土，急忙跪在地下向金崇山叩头祈祷，请求宽恕。后来，另一日军上去二人一起拔，才把刺刀拔出。而我们的金崇山就这样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时年二十三岁。

日本侵略者原想借杀害金崇山来震慑抗日人民，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金崇山烈士铁骨铮铮，大义凛然，不仅给了在场群众以深刻教育，而且让日伪军胆战心惊。金崇山死后，我抗日政府将其埋葬在后八家庄东山坡，并且召开追悼会，进行悼念。有的群众还写了金崇山的牌位供在桌上，烧香祭奠，以示纪念。抗战胜利以后，又将他的灵柩转运回原籍安葬。到现在金崇山英勇就义已经四十多年

了，但他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密云人民中流传，他的英勇斗争精神也一直鼓舞着密云人民前进。



太师屯镇金崇山烈士纪念碑

一位坚贞不屈的抗日战士

程桂珍

我的父亲程全恩，生于1921年，1939年参加抗日工作，1944年农历10月20日，被伪满洲军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

父亲参加革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先是在本村——学各庄担任情报站的工作，后来调到区小队任侦察员。由于他工作积极，对党忠诚，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有一支伪满洲军，在令公村安下据点，经常四处讨伐，杀人放火，残害百姓。我父亲和战友们在雷励区长领导下，以大梁村为中心，和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大梁村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进可攻，退可守，地形对我十分有利。特别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们把区里干部当做亲人，军民之间鱼水情深。我父亲和队里其他同志一样，工作起来总有使不完的劲！在扩军时，他曾亲自动员房东的儿子学庆全参加了抗日队伍。一次，他听说蝙蝠峪有一户姓高的老乡，为防土匪，家里藏有一支快枪，就几次登门走访，经过反复地做工作，姓高的终于愉快地把枪交了出来，为抗日武装增添了实力。为了侦察工作的需要，我父亲曾用过三个化名：中山、福荣、振岳。他们经常化名深入敌区，了解掌握敌人活动情况。敌人出来的少，区小队就抓住战机消灭他们；敌人稍多时，就报告县大队请求支援；敌人再多时，就主动转移，从来没有因为侦察失误而使我方遭受任何损失。因此，他们的侦察工作，多次受到区里的表扬。

1944年初冬，上级决定攻打令公庄敌人据点，命令区小队向大树洼方向转移，以配合兄弟部队，对敌人据点形成包围态势。为了

弄清敌人近况，区小队派我父亲和郑、何两位同志，深入到伪满洲军腹地进行侦察。这一天，三位侦察员来到令公东沟大石洞一户独门独院的人家活动。不慎被汉奸告密。敌人很快派来几十人的兵力，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凭借院墙，和敌人交了火。在相持不下中，敌人喊话：如不投降，就点火烧房！这时，他们考虑：敌众我寡，单凭实力，很难击退敌人。若这样坚持下去，必然给这户老乡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伤亡。于是便果断地决定突围。在突围中，敌人以密集的子弹射向他们，他们边跑边还击，不幸都负了伤。敌人像疯狗一样扑了上来，三人一起被俘。

敌人把他们押回据点，伪团长亲自审讯，妄想从他们口中，探知我党我军的机密。可是，三位侦察员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任敌人怎样耍花招，逼降诱供，严刑拷打，他们只是异口同声地说："为了给被你们杀害的中国同胞报仇，我们是自动前来消灭你们这些狗汉奸的！"拒不透露一点有关我党我军的机密情况。后来，郑、何二位同志，决意用自己的生命最后再拼杀一两个敌人，就谎称，愿意把我军埋藏物资的地方告知他们。于是，带着敌人上了高山，想趁机抱住敌人滚下悬崖，与敌人同归于尽。不想狡滑的敌人没有就范，因而未能如愿。二位同志，一位被杀害在山头上，一位惨死在山下的小庙前。

郑、何二人被害后，敌人变本加厉地把怒火发泄在我父亲身上。先是以生死相威胁，进行诱降。诱降不成，便更加残酷地动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我父亲始终坚贞不屈，不向敌人低头。在稍清醒时，就大骂伪满洲军是认贼作父，充当日本走狗！"狗汉奸，你们杀人放火，残害中国同胞，决没有好下场。"敌人对他无计可施，便最后下了毒手。就义那天，由于我父亲已被折磨得站立不起来了，就由几个伪满洲军，硬是把他抬上驴背驮向刑场。一路上，我父亲除了怒斥敌人外，还大声高喊："乡亲们，别怕，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日本鬼子狗汉奸，是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几天

啦。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父亲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于令公南沟。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他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父亲牺牲后，敌人根据汉奸的告密，还企图追捕他的遗属。但我们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抓捕。敌人每次都把我家里的东西抢劫一空。那时，我们整天都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杨家堡血案

张桂新

杨家堡位于密云县东部，是长城脚下大黄岩河川的一个小山村。

1942年底，冀东盘山抗日根据地受挫之后，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保存抗日力量，冀东党政机关曾一度先后转移到密云县东部山区令公、干峪沟等村庄。日本侵略军为消灭抗日力量，不断加紧跟踪追剿。杨家堡血案，就是日军在偷袭令公村途中制造的。

1943年9月，中共冀东十四地委为了提高干部对敌斗争能力，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在地委机关所在地——密云县令公村，举办干部训练班。9月19日，蓟遵兴等联合县的县、区干部杜秋、光野、全贞、铁峰和陈捷华五人，在一名地方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去参加学习，途经杨家堡。由于地理不熟，走了很多弯路，尚未找到目的地。杨家堡村西五六公里便是日军的北庄据点。几天来连日跋涉，几名年轻人均十分疲劳，虽然天色已晚，但为安全，他们仍然继续赶路。当他们得知八路军十三团的警卫连正住在村里时，又产生了安全感。于是一行六人在村头路旁的一户老乡家里住了下来。就在全村百姓和杜秋等人熟睡的时候，密云、北庄等据点的日伪军联合奔袭地委机关住地，途经杨家堡时，一群日军顺手牵羊地把杜秋等人的住处包围起来。八路军警卫连见敌人来势凶猛，迅速鸣枪报警后，全部转移。这几名年轻人，夜里听见了枪响，误认为是八路军扰乱日军据点，未能引起警觉，直到日军“咄”地踢门时，才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日军端着刺刀把他们赶出屋来，又一个个捆绑上。当敌人最后一个捆陈捷华的时候，陈捷华身高力大他

猛力推开了刺刀，摆脱了敌人的捆绑，敌人顺势一刺，一刀刺在胳膊上。陈捷华忍着巨痛蹿过了一丈高的坝台，直朝山弯跑去。一群日军在后面死死追赶。在这危难之时，光野急中生智，他拼命地大声喊：“不要追他，他是个孩子，他是老百姓，八路军在这，我就是八路军，”故意把敌人引向自己。敌人听见喊声，果然信以为真，停止了追击，忽拉一下子把光野等四个人围了起来，敌人的翻译官问：“你们谁是八路军?”四个人一齐矢口否认。敌翻译官又问：“不是八路军，为什么有枪?”四个人又不约而同地回答：“我是八路军，是新参加的。”日军的一个头目凶相毕露地拔出战刀，恶狠狠地说：“你们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光野等四人被带到不远的大黄岩河边上，惨遭杀害，交通员被带走。

天大亮了，杜秋、光野醒过来。光野因失血过多已不能支起身体。杜秋脸色腊黄，有气无力地挪到光野身边，两个人互相解开了绳子，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就在他俩为难之时，杨家堡村治安员出村查看敌情，发现他俩和已经牺牲的全贞、铁峰，治安员见光野生命垂危，急忙回村找来民兵和担架，把他俩一直送到冀东十四军分区卫生所——干峪沟。光野因伤势恶化，抢救无效，于当夜含恨死去。杜秋和陈捷华，死里逃生，伤愈后重返抗日工作岗位。血案发生的当天，杨家堡的乡亲们眼含热泪将全贞和铁峰两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北山坡上，由于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为了便于家属认领，即按着遗体的特征，将其棺材一个头朝南，一个头朝北，予以埋葬，以示区别和纪念。年年为他们填坟上土，一直到烈士的灵柩回归乡里。

50年过去了，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这笔血债，杨家堡的人民一直牢记在心头。

纪念刘治龙同志

王小波

1944年3月18日，是刘治龙同志牺牲的日子。承兴密三区的人们忘不掉这位屡建战功的青年人，每年清明扫墓，人们习惯地朝着他战斗过的方向，洒上一杯水酒，以寄托哀思。

刘治龙是冀东十三团里一名军事作战参谋，后又兼任特务连连长职务。他年轻有为，足智多谋，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他好舞刀弄枪，钻研战略战术。日寇侵略我国国土，刘治龙又潜心研究日本人的战术。他说："作战要有胆有识，必要时采取速战速决，准能取胜。"

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初，十三团特务连连长孟昭信，因违犯纪律，组织上批评他，他投奔北庄据点，向敌人去自首了。

我们从据点里获得可靠情报，日本鬼子要往石匣押送孟昭信。经侦察核实，情报准确。3月18日，刘治龙奉命带领五连和特务连中途设伏捉拿叛徒孟昭信归案，并趁机打击鬼子的嚣张气焰。

事先刘治龙对埋伏圈周围的地形地物作了周密调查，并和同志们研究了打法，决定在斗子峪、葡萄园之间设伏。那里地形从东往西有一漫坡，坡下有条公路。距北庄、石匣据点均为10余公里。这个地形对我歼敌十分有利。

战斗之前派出三路侦察兵：一路侦察北庄据点里的变化；一路警戒石匣城里敌人的活动；一路监视古北口敌人的反应。以此保障战斗顺利进行。

这一天，夜12点钟，刘治龙率队敏捷地到达预定地点，命令部队进入自己作战位置。刘治龙又仔细地观察部队的隐蔽情形，以便

做到万无一失。俟后发出作战口令："鸡鸣早看天。"

派出的侦察员，一个装做拾粪的，一个装做敲梆子卖油的。这两个侦察员是游动哨。除此，封锁一切消息。

三月的天气还有些寒意，天空时有阴霾，不太晴朗。约八时左右，鬼子似乎没有发觉什么，径直往埋伏圈走来。走在前边的是尖兵，有一个日本兵在刺刀上挑着他们的膏药旗。咔！咔！笨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刘治龙见时机已到，啪啪，两颗信号弹突然腾空而起，战斗打响了。埋伏在斗子峪的五连战士象猛虎扑食一般从山上压了过来，截断鬼子的退路。特务连从庭院里冲了出来，挡住鬼子的去路。鬼子前进不行，后退无路，陷于夹击之中。由于我军的猛烈攻击，日本鬼子被分割成两块，退缩于公路两旁。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了一片。公路北侧的鬼子架起两挺机关枪拼命还击，企图撕开一个缺口，逃出这个埋伏圈。刘治龙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他认为是速战速决的时候了，于是命令上刺刀。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开始了。

在我军两倍于敌的情况下，速决战是可行的。一阵拼杀，鬼子负伤的负伤，击毙的击毙。剩下一些残兵败将不敢恋战，逃进"四磨"村隐藏起来。

战斗行将结束时，侦察兵回来报告敌援兵来了：西面从石匣据点，东面从墙子路据点来增援的日本鬼子约计有四、五百人。刘治龙见伏击成功，宣布打扫完战场，部队立即转移撤退。

这场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共歼灭鬼子 73 人，获得战利品无数。遗憾的是，叛徒孟昭信乘混战之时，逃进"四磨"村，便宜了他。

不幸的是：刘治龙同志与日寇搏斗时，身负重伤，在随军转移时，牺牲在程各庄村。这是我军的一大损失。

“我是真正的中国人！”

———记曹一川烈士

鲍星时　张桂新

曹一川，原名曹克敏。1914 年出生于密云县黄土坎村。1931 年毕业于密云县高等小学堂，同年受聘到长城关口曹家路教书。1933 年长城抗战失败，密云被划入所谓“非武装区”，1937 年 8 月完全被日军占领。曹一川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亲身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又目睹了密云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惨状，因而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痛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曹一川已无法继续在曹家路任教，被迫回到原籍黄土坎村。后来他把自家的房子腾出几间办私塾。在课堂上他经常向学生讲：“好好学本领，将来决不让人家再欺负咱们国家。”

1940 年八路军挺进平北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后，黄土坎也成了抗日游击地区。丰滦密联合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江卓常到黄土坎工作，有时还住在曹一川家。这使曹一川有机会和江卓等抗日政府工作人员接触，并且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马列主义读物。经过学习，他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本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41 年，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地方工作干部。经江卓动员和介绍，曹一川参加了抗日工作，出任丰滦密三区教育助理。

曹一川参加抗日工作后，积极热情，坚定勇敢，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由于当时区干部很少，曹一川除抓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外，还管其它工作，有时还去董各庄等有敌人据点的村庄工作。

1941 年夏末，他不幸被马营据点的敌人捕去。敌人对他施用酷

刑，不给吃饭，不给水喝，逼他供出自己的身份和抗日政府情况。但他忍住疼痛和饥饿，只承认自己是教书的先生，其他的话再也没有了。敌人得不到实情，又没有抓到别的证据，关押7天后只得将他释放。曹一川回到家里，妻子见他血迹斑斑的长衫粘在身上，不禁掉下泪来。但他反倒笑着安慰妻子说："这回打得真够呛，但一点儿也不害怕。"一个多月后伤势刚一好转，他又离开家继续工作。不久他又被敌人抓住关押在石匣据点，敌人强迫他参加特务组织。他将计就计，假意应允，乘敌人放松监视他的时候，逃出石匣回到抗日根据地。1942年底，敌人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万人"扫荡"，抗日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我抗日工作人员虽千方百计和敌人斗争，仍有不少同志被敌人逮去杀害。因曹一川已经两次被捕，身份暴露，为了安全起见，1942年初组织上将他调出丰滦密联合县，安排到平北西部的龙赤联合县工作。

在龙赤县公安科，他开始为科员，化名林森，直接和汉奸特务打交道，在锄奸反特斗争中，做出很大贡献。后来，他主管审理犯人，工作抓得很紧，不但能及时搞清案犯情况进行处理，而且在审理案子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打骂犯人，不搞逼供信。对公安科警卫队的同志也很关心体贴，教他们学文化，找他们谈心，有了困难积极帮助解决。1944年秋，他被调到龙赤县二区任民教助理。

11月，为了培训民校教员，龙赤县开办民校教员训练班，曹一川被调去做组织工作，他和30多名学员住在上轿子村。17日清晨，伪满洲军一个营包围了上轿子村。曹一川和30多人被围在屋里。他从屋里冲出来越过西院墙，顺一条河沟向前跑去。他是区助理员，身上带着机密文件，为了不使党的机密落入敌手，他在沟内用手挖了个坑把文件埋掉。敌人追上来了，他就向山上跑，最后被敌人包围逮住。

曹一川和其他30多名学员被捕后，被送到后城敌人据点。他慌称自己姓范，想以此欺骗敌人。但伪大乡职员中有一人曾在我龙赤

县公安科办的伪职员集训班中受过训，一眼认出了曹一川，马上报告给伪大乡长，因而曹一川被提出来重点审问。开始敌人许以金钱地位收买，被曹一川严词拒绝，并用手指着汉奸骂道："我是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人都像你早就灭亡了！"敌人一看软的一手失败了，转而又对曹一川进行毒打。曹一川挺胸站立，毫无畏惧。敌人问他："你不怕死吗?"曹一川回答："怕死不革命，只有你们这些软骨头的狗才怕死！"敌人恼羞成怒，一次次地把曹一川打昏过去。但曹一川苏醒后，继续痛骂敌人。敌人兽性大发，用木柴棒向曹一川劈头盖脑地打来。曹一川被打得皮开肉绽，仍然怒目圆睁，锐利的目光狠狠地盯在敌人的身上。敌人心惊肉跳，竟凶狠地下了毒手，将他的两眼挖掉，又把他的双腿打断。曹一川昏死过去，敌人又用绳子拴住他的脚腕，把他拖到后城东门外。曹一川再次醒来时，又高声喊道："我虽然死了，但八路军共产党人还很多，中国人还很多，抗日战争一定胜利！"并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万恶的敌人害怕他继续呼喊，又用刺刀在他的嘴里乱绞，直至绞断了他的舌头。

11 月 19 日，曹一川在后城东门外被敌人残害了，时年 30 岁。

曹一川牺牲后，中共龙赤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学习他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并经平北地委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 年 2 月 6 日，晋察冀日报以《赤城民族烈士曹一川被敌挖眼刺腹壮烈殉国，临死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题，揭露敌人的残暴行为，以悼念壮烈牺牲的烈士。1945 年春，后城解放后，群众在曹一川牺牲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1984 年，后城乡的共青团员又重新为烈士修建了纪念碑。

曹一川烈士永垂不朽!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杨宗辉

杨素琴口述 田郁金整理

我永远怀念我的父亲。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父亲的音容笑貌和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总是浮现在眼前。父亲高高的个，大眼睛，是密云银冶岭村的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名字叫杨宗辉。

银冶岭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距县城七、八公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地下党活动的好地方：一是地形好，敌人来了便于周旋；二是离县城近，了解敌情方便。因此敌人也把这小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来袭击，到村杀、烧、抢。我父亲是村里干部，经常是白天在地里山上干活，晚上搞革命工作。我看见过他组织妇女做军鞋，他把一双双做好的军鞋捆成捆，装进口袋，顶星光把鞋送走。我看见过他组织乡亲挖洞，藏粮，藏衣。看见过他给住在我家的八路军伤员喂饭，熬药。1942 年的一天，我还看见他在一个坟圈里举手宣誓，我爸爸入党了！他嘱咐我："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这件事。"我点点头，至今我还记着爸爸那严肃而激动的表情。

1942 年 9 月 21 日凌晨，爸爸听到报敌情的梆声，便立即把住在我家的八路军伤员转移到南峪山沟里。当他回来接我爷爷时，日本鬼子进村了，爸爸藏进棒秧垛里，但还是被日本发现了，当即就把我爸捆上，日本逼问我爸："村里人都哪儿去了?"

我爸爸回答得干脆："跑了！"

敌人在每家找不到粮食又问我爸爸：

"粮食哪儿去了?"

"早被你们抢走了！"

敌人听了用皮鞭抽他。

问："有没有八路?"

"有，常来，常走。"

日本又问："八路来了找谁? 谁是八路军的干部?"

爸爸说："不知道。"

敌人发怒了，对爸爸动刑了：开始把爸爸往水缸里摁，后来又捆在板凳上，用棍子撬开嘴，灌辣椒水。日本见他仍不说话，怀疑他是八路军的干部，便把他带走了。

我爸爸被日本带走了，村里有些人怕我爸爸受刑不过说出藏粮的地方，便把粮食转移了。

到了9月27日，噩耗传来，叫妈和乡亲们去密云西门外河套收尸。听说我爸就义那天，被日本人押着走在密云的西大街上，穿的衣服已成一条条的，全身是伤，但他坚强不屈，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

我妈和村里人找遍西河套，也找不到我爸爸的尸首。有位老人告诉我妈："你们甭找了，当时就被日本几只狼狗吃了。"大家听了，泣不成声，悲愤万分，我妈妈又一次昏了过去。

每当想到这，我就肝胆俱裂，爸爸死得太惨了！但是爸爸牺牲得有价值，他用生命保住了全村的粮食，保住了八路军的伤员，他用生命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的精神，证明了正义是不可战胜的永恒真理。爸爸，您的死重如泰山，我为有您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爸爸，我要用您的精神激励我自己和教育后代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和平的日子里，勤奋劳动，搞好四化建设；如果敌人敢于侵犯我们，我们要挺身而出，象您一样，不怕牺牲，和他们斗争到底！

五、抗日爱国诗词歌谣选

一、关麟征请缨诗一首

长城抗战之初，日寇向华北大举进犯。1933年3月，关麟征奉命率十七军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当行军至石匣镇时，又接到就地待命的电令。此时，古北口正处于敌军进攻的紧要关头。他权衡利弊后，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抗命北上，急赴国难，并赋诗一首以明此志：

半壁河山狼烟中，烽火照红北地冰。
长城之外牧寇马，铁蹄咫尺危古城。
大厦将倾于汤火，神州存亡瞬息中。
岂肯折膝求苟安，站立抛颅笑颜生。
炎黄子孙多傲骨，我今抗日三请缨。

二、白乙化题龙泉庵影壁诗一首

1941年1月，白乙化陪故友中共平密兴县委书记李子光游赶河厂村西龙泉庵时，应老僧之请，于龙泉庵影壁上题诗一首：

古刹映清流，松涛动夙愁。
原无极乐国，今古为诛仇。
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
燕山狂胡虏，壮士志增羞。

三、罗立斌诗二首

罗立斌曾任八路军挺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晋察冀四纵十二旅政治部主任等职，现录其在密云的诗作两首如下：

（一）吊白乙化团长（1941年春）

辽西抗日出先锋，杀敌风旋“小白龙”。
夏令营盘升大幕，绥西垦地务劳农。
宛昌智勇惩倭伪，滦密声威震满蒙。
察热开山功不朽，鹿皮关下吊英雄。

（二）“无人区”斗争（1943年夏）

“无人区”里有人家，“七绝”“三光”路末涯。
众志成城千百计，魔高道长救中华。

四、王森同志悼念白乙化同志诗一首

民族深仇，
妖气遍宇宙，
残敌未灭国贼稠。
利刃斩不尽奸人首，
哥呀！弟呀！
杀吧！冲吧！
叹将军名德功未就。
眼见得，
人们公敌，
碎鬎付东流！

五、吴涛同志纪念白乙化烈士诗三首

（一）

绥西首建先锋队，挽辔忍看燕山碎。
战旗猎猎迎风展，直捣黄龙方一醉。
冬迈黄河风雪暖，春踏长城江山媚。
抗战烽火燎原起，何惧倭寇如蛇虺。

（二）

破晓杀敌古北口，黄昏又战青龙背。
大队蹑脚入敌营，鬼子伪军正酣睡。
快刀切得敌头滚，那抵“三光”滔天罪。
燕山兄弟喜白龙，白河两岸旌旗会。

（三）

壮志峥嵘韬略高，艰难当前不后退。
行军作战似闪电，坚定顽强多智慧。
日与战士同甘苦，饮冰吞暮眠无被。
革命何暇问死生，思君不觉一挥泪。

六、刘力生《烽火沧桑》诗稿选

刘力生，又名刘天游，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一营二连指导员、二营教导员。此诗稿收录了作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写下的诗作151首。现将与密云有关的诗稿共39首摘录于后，以飨读者。

（一）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1938年夏）

东亚谁还称病夫？揭竿十万气吞胡。
燕山蓟水风云色，蓑尔胡奴胆落无！

（二）十团开进丰滦密（1）（1940年5月）

战罢沙塘沟（2），东进不稍息。
途经南天门（3），脱手打遭遇。
攻取琉璃庙，顺路不费力。
兵扼宝峪岭，敌叹撼山易。
夜袭大草坪，大小战皆利。
马蹄踏虏尘，横扫丰滦密。
红旗白马关，谈笑生霹雳。
鬼子缩龟壳，汉奸远逃避。

大旱望云霓，父老军前泣。
白河涛有声，燕山凌空立。
长城万里迎，塞上新天地。

作者原注：

(1) 当时河北省丰宁、滦平、密云地区。

(2) 团长（乙化）指挥二团主力一营夜过平绥线，在昌平沙塘峪村，打退伪满洲军一个营的来犯，击毙其营长。

(3) 南天门、宝峪岭、白马关等地现仍属密云县。

（三）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成立，段苏权同志从延安前来领导斗争（1940年6月）

察东冀北动欢声，万里长城汉帜红。
锦绣神州如此土，安容丑虏任纵横！

（四）王亢同志指挥密云冯家峪伏击战（1940年冬）

七十八天“扫荡”回，燕山脚下一声雷。
“哲田不败”成虚话，万里神州新炮灰。

作者曾有副题记：十团粉碎敌78天“扫荡”最后一击，寇军哲田中队歼灭。

（五）军威（1941年）

战马风驰冀北，军旗威震关东。
喜看健儿磨剑，笑闻疲虏增兵。

（六）创业——贺十团二营成立（1941年）

白河滚滚来，红旗迎风开。
誓师赶河厂，进军滦昌怀。
今朝催战马，他日登燕瓴。
慷慨驱胡虏，神州多雄才。

（七）英雄千古鹿皮关（1941 年 2 月）

英雄白乙化，光辉此一生。
奇才出辽海，丹心矢燕京。
伟干饶胆略，虬髯多神通。
闻鸡家国病，揽辔山河惊。
扬眉藐狂虏，奋臂挥长缨。
寇难“九一八”，慷慨家乡行。
大旗“平东洋”，赤手敢屠鲸。
救亡“一二、九”，虎将著声名。
怒吼长安街，四海生雷霆。
炮声卢沟桥，崛起绥西戎。
饮马雁门关，斗虏沿河城。
谈笑进平北，梦寐收辽东。
白河朝磨剑，燕山夜点兵。
秋风铁马阵，古塞汉军营。
骅骝已开道，金鼓期全功。
军威老十团，神话“小白龙”。
一朝洒热血，万众吞悲声。
滔滔白河水，巍巍燕山峰。
长埋英雄根，永垂壮烈风。
遗志付我辈，何日胡尘清?

（八）“诓军计”（1941 年）

《三国》人人读，“盗书”有篇章。
周郎诓曹操，蒋干充桥梁。
借古为今用，故事听端详。
话说密云县，据点康各庄。
鬼子恶如虎，疯狂把人伤。

汉奸"大乡长"，甘心为虎伥。
密报供敌寇，表面好人装。
乡亲受其害，十团定主张。
计授区政府，"机密"告"大乡"。
集合白道峪，干部来各方。
乡长连夜到，紧要非寻常。
政府一番话，汉奸喜洋洋。
密事报"太君"，"功劳"又一桩。
"太君"获密报，狰狞笑声狂。
杀人喝鲜血，涎垂三尺长。
小队集合快，山村开路忙。
狼狗牵在手，洋刀挎身旁。
赶路急如火，扑村冷不防。
惊心空荡荡，可怕夜茫茫。
"什么的干活，集合的那厢?"
"太君"话未完，四面齐响枪。
原来"诓军计"，十团摆战场。
鬼子上圈套，枪响一扫光。
汉奸没有到，巧计再商量。
今夜打老虎，改日捉豺狼。

作者原注：此战歼鬼子兵一个小队。

(九)"钓鱼计"(1941年)

故事又一桩，密云驼骨梁。
十团小游戏，情报诱东洋。
山梁点篝火，"香饵"非寻常。
精兵三面伏，"鱼网"备办忙。
"情报"加"香饵"，猪首贪又狂。
黑夜集合快，急行扑火光。

不知“钓鱼计”，惩罚即刻尝。
后路先动手，左面也鸣枪。
右面飞白刃，杀声震山岗。
重围肉搏战，猛虎扑恶狼。
八月烈日下，丑类何处藏！
日寇妄想溜，沟口枪下亡。
政委增援兵，顺手来牵羊。
罢钓归来晚，凯歌送夕阳。

作者原注：此战歼鬼子兵猪首（应为朱狩）中队。

（十）密云白马关寄家（1941年）

三年驰骋快生平，揽辔心雄胡虏清。
若向秋风问消息，高关白马古长城。

（十一）荒山夜营二首（1942年）

一

村舍烧光剩荒山，风雪夜营天地宽。
若问伤员与病号，土窑山草不知寒。

二

雪花如毛风如刀，残垣断壁歌如潮。
山柴火映胸中火，敢将悍虏顽奸烧。

（十二）营房二首（1942年）

一

白天一片荒山洼，夜晚灯火百数家。
山柴野草战士手，平地楼台何是夸！

二

座座“营房”一夕成，讲文演武大本营。
小队轮番派山外，袭虏锄奸各有功。

（十三）鸡声（1942年）

又是行军夜，东方天欲明。

宿营在何处，山下有鸡声。

（十四）病肺（1942年）

烽火满天烧，关山戎马劳。

虽然身病弱，追赶各英豪。

（十五）南瓜二首（1942年）

一

热气腾腾笑呵呵，战罢午餐在山坡。

要问今天吃什么，南瓜两个水两锅。

二

海坨山下开饭声，水煮南瓜瓦片盛。

一次午餐一次课，雪山草地思长征。

（十六）反“无人区”斗争（1942年）

鬼子烧山并大村，逼我军民两离分。

夜闹下营枪一响，老乡回转旧山林。

（十七）青松（1942年）

栉风沐雨不知霜，何有冬寒岁月长！

拔地凌空傲冰雪，神州劲骨本无双。

（十八）坚持（1942年）

兵分长城外，黑夜见尽头。

奸虏少猖狂，军民多筹谋。

游鱼有深水，苍鹰在高丘。

何有黎明寒，不为壮士羞！

偏师愧无功，坚持志必酬。

（十九）减租斗争（1943年）

延安指示颁，减租为抗战。

农会掌大权，县委亲试点。

大会庙台前，法令讲当面。

贫农据理言，租债剥削算。

地主心不甘，事实难狡辩。

群众身要翻，时代大改换。

（二十）扩军所见（1943年）

壮志昂扬个个夸，胸前朵朵大红花。

送郎送子牵衣话，“为打东洋莫念家！”

（二十一）反蚕食敌后武工队（1943年）

小队精兵各路分，翻江搅海闹平原。

山穷水尽孱头虏，蚕食鲸吞尔敢言！

（二十二）据点锄奸（1943年）

探囊取物一宵间，民愤难容万恶奸。

无亮城门见布告，坏人害怕好人安。

（二十三）武装秋收（1943年）

一手镰刀一手枪，孤城困虏有何妨！

千军万马秋收仗，月黑风高夜正忙。

（二十四）人民战争七题（1943年）

查路条

河边洗衣妇，村头割草孩。

路条查得紧，坏人捉起来。

放哨

山头瞭望哨，一树报消息。

敌来树就倒，敌走树又立。

送信

传送鸡毛信，消息十万急。

沿村快如飞，半夜一百里。

带路

脚下崎岖路，山头风雨夜，

引路奔山前，去把鬼子灭。

运军粮

毛驴一队队，山梁一道道，

军情即刻需，公粮立时到。

抬担架

山前打胜仗，伤员山后运，

担架一抬抬，快速又安稳。

反“扫荡”

鬼子来捣乱，“礼物”迎当面：

村边地雷阵，山头麻雀战。

（二十五）军鞋（1943 年）

军鞋做得好，更加一片心，

五字缝鞋底：“努力杀敌人！”

（二十六）《春闺》（1943 年）（对敌军士兵传单之一）

神州万里为何来？叹息抛家作炮灰。

知否春闺今夜月，又含残泪梦君回。

（二十七）打柴下山路遇吴涛主任（1945 年）

饭后纷纷去打柴，人人劳动有安排。

一担路上谁相遇？平北分区主任来。

原作者注：吴涛主任一次能打柴九十斤，经常为冠军。

（二十八）围城（1945 年春）

烽烟春复春，形势八年分。

我军朝日胜，彼虏夕阳昏。

延安军令下，平北阵方屯。

我兵发各路，敌城围经旬。

冷枪压城头，战壕抵城根。

鬼子惊丧胆，伪军吓断魂。
弃城何处逃？缴枪活命存！
袭取又围困，据点下纷纷。

（二十九）蔡家窑与江卓同志追念故战友（1945 年）

春夜蔡家村，长谈忆故人。
胡毅多正气，方城尤可亲。
几年分战地，一朝传哀音。
或遭奸人手，或患病魔侵。
良材堪痛惜，何日清胡尘？

（三十）抗战胜利追念烈士（1945 年 9 月）

中华儿女争死生，多少头颅抛从容。
血汗夺来胜利日，河山永存壮烈风。

七、抗日歌词

（一）挺进军三大任务歌

挺进军三大任务第一个：巩固扩大平西，巩固扩大平西，要努力，要努力！

挺进军三大任务第二个：冀东游击战争，冀东游击战争，要坚持，要坚持！

挺进军三大任务第三个：欢迎开辟平北，欢迎开辟平北，根据地，根据地。

（二）平北抗日战歌 4 首（刘振球收集）

（1）向新中国挺进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为自由解放而斗争。
人民领袖和士兵，血和汗流在一起。
用血肉收复失地，保卫山河和长城。
冲出山岗，冲出原野，冲破黎明，杀向鬼子兵。
跟着毛泽东，跟着总司令。

向法西斯反攻，向新中国挺进！

向法西斯冲锋，向新中国挺进！

（2）勇敢的行列

勇敢的行列，勇敢的行军，庄严的阵容，铁的子弟兵。

震憾着平原，震撼着山岗，我们的刀枪，对准鬼子的胸膛。

当战争卷起在家乡，我们组织起上战场。

大兵团在敌后成长，控制着敌人的心脏。

我们来自田野，各个英勇顽强。

为了明天的自由幸福，舍己在自己的土地上。

听，战号已吹响，在晋察冀边区大地。

看，战火已燃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新中国就要在我们手上出现。

勇敢的行列，勇敢的行军，庄严的阵容，铁的子弟兵。

跟着总司令，跟着总司令，跟着他，

向胜利挺进，向胜利挺进！

（3）行军小唱

一更鼓，月牙大，巴依呀登，巴依呀嘿。

擦好枪，装好子弹，等待命令。

今夜里，去摸营，杀他个干干净净。

直杀他个干干净净，巴依呀嘿，一二三四。

（4）学习白团长

共产党里是模范，奋斗十余年。

不畏惧，不迟延，革命哪怕艰和险。

不后退，永向前，站在抗日最前线。

创建平北昼夜忙，壮烈牺牲鹿皮关。

你不要哭泣，更不要悲观。

要学习他坚定勇敢，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建设丰滦密，铜墙铁壁一般。

坚持华北游击战，驱逐日寇鸭绿江边。

驱逐日寇鸭绿江边！

注：这是白乙化牺牲后，为纪念他在部队中传唱的一首用“黄水谣”曲谱写的歌词。

（三）抗日生产歌（刁克源）

我们去开荒呀，我们去备粮；

我们打柴上高山哪，劳动的歌声儿飘扬。

劳动的战士快乐像春风一样。

抗战的日子长，抗战的道路远，困难多如山。

节约的事情一刻不能忘，从不多花一文钱，从不浪费一粒粮。哎嗨哟！

爱护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困难保国保家乡！

（四）儿童团团歌

我们组织儿童团，团长团副指导员，三个中队九个班，每班人数十二三，啦嘟啦嘟嗖嗖，啦嘟啦嘟嗖。

儿童团真能干，站岗送信都能办，查路条，防坏蛋，跟着民兵学武去操练，啦嘟啦嘟嗖嗖，啦嘟啦嘟嗖。

（五）赶走小日本才好建家园

民国二六年，华北起狼烟，小小的日本来到我这边哪，搅闹我中原，哎嗯哎嗯哟，搅闹我中原！

全民总动员，青年去参战，赶走那小日本，才好建家园，人民得团圆，哎嗯哎嗯哟，人民得团圆！

八、抗日民谣15首

（一）瓜儿离不开秧

瓜儿离不开秧，孩子离不开娘，承兴密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人民打鬼子呀，人民永远拥挤共产党。

（二）万众一心把日抗

有钱就出钱，有枪就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紧紧跟着白团长，杀得鬼子无处藏。

（三）白河水

白河水，流的忙，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郎房峪，今天要烧王各庄，抓去青年当伪军，抓了妇女受凄凉，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上战场。

（四）想起奴的郎

月牙一影高，挂在杨柳梢，小奴家在房中实在好心焦。思念奴的郎，死的好冤枉，鬼子扔炸弹，扔到他身上。盼小儿，快快长，长大后为你父报仇恨，保卫咱家乡。

（五）清水河

清水河，清又清，我的丈夫要当兵。夫妻临别订计划，不当英雄不回家。你在前方打胜仗，我在家里做鞋袜。赶走东洋小日本，夫妻见面笑呵呵。

（六）送郎去当八路军

夜更深，掌上灯，姐姐房中喜盈盈。千针万线做双鞋，千言万语离别情，明日郎君上前线，八路军里打冲锋。

（七）儿童团

我们组织儿童团，三个中队九个班，下地雷，埋炸弹，潮白河畔发传单。站岗放哨贴标语，军鞋公粮送前线。日本鬼子快完蛋，密云过个太平年。

（八）土地雷

土地雷，真叫棒，民兵带它去打仗，先炸伪军兵和马，后炸鬼子指挥官，炸得伪军团团转，炸得鬼子滚下山，全民皆兵上战场，抗日胜利在眼前。

（九）破坏敌人交通

一更里，月牙上树梢，背起了炸药，扛起了铁锹，离开了村庄，铁路公路统统破坏掉。

（十）敌人来了埋地雷

八路军来了做干饭，日军来了埋地雷，地雷好比西瓜大，不见鬼子不“说话”。

（十一）集家修“人圈”

小日本心太恶，害得百姓没法活，烧杀奸淫不用说，集家又组合。

说集家真可怕，强盗鬼子命令下，好房好屋拆趴架，硬把人圈搭。

修“人圈”万人愁，拿着百姓当马牛，群众生活如罪囚，哪能得自由。

（十二）小日本割庄稼

小日本没爹妈，带着汉奸割庄稼，刺刀镰刀一齐上，毁了青苗吃什么?

（十三）伪警察是条狗

伪警察是条狗，挎着洋刀胡乱走，见了鬼子洋爸爸，作揖又点头，见了乡亲老百姓，呲牙瞎乱吼，给中国人丢了丑。

（十四）日寇烧家园

民国二六年，华北起狼烟，小小的日本，来到我这边。

先烧东驼骨，后烧栗树园，烧得老百姓，叫苦又连天。

没有房子住，山窟窿里头钻，冻得老百姓，混身打颤颤。

上下黑圈全烧光，你看多可怜。

（十五）无题

小日本真白搭，带着百姓去出发，大道两旁割庄稼，地主也无法。

镇上人（指汉奸特务）笑哈哈，跟着日本去出发，拔了白薯和甜瓜，怀里还抱个大窝瓜。

当天晚上回了家，他爸见了笑哈哈，到明天再去吧，见了东西你要多多拿，见了毛驴也要拉，活该把财发。

小日本和特务，大道旁走得熟，遇到八路打埋伏，打得直轱辘。镇上人抓了瞎，扔了白薯和甜瓜，滚到沟里往回爬，直叫洋爸爸。

夜晚摸黑回到家，回到家里骂他妈，发财另想别法吧！

六、日寇在密云地区的侵略罪行

日军1933年屠杀密云战区平民的暴行

曹友林

1933年3月初，日本侵略军继挑起长城战火、侵占中国热河省后，又乘势兵分数路，攻向长城东部各主要关口、进逼平津。其主力第八师团全部及骑兵第三旅团扑向北平的东北大门——密云县古北口，使这个素有“京师锁钥”之称的古代边关要镇又成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

日军在古北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2000余人。因伤亡惨重，日军兽性大发，对手无寸铁的战区平民进行了血腥报复。在古北口周围地区，日军四出搜查，见人就杀，被害者除中国军队未及撤走的伤员外，更多的是当地的无辜平民。如3月10日，日军搜索到一个只住有两户人家，名叫胡同沟的小山沟里，抓到孙焕、孙凤亮、陈君、陈贵仓、何双合、赵得保等6名百姓，全部用刺刀刺死，其中赵得保已60多岁，陈君只有16岁。日军还出动飞机轰炸战区村庄和石匣城、密云县城，炸死炸伤平民无数。4月18日(后文为4月16日)，正值密云县城大集，街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突然日本飞机偷袭、轰炸，炸得房倒屋塌，血肉横飞。县城南街广义和估衣铺的一座地窖内躲有男女老少10余口（后文为29口），一颗炸弹落下，窖内之人全部炸飞，残肢碎肉被气浪抛出几十米远，落挂在屋檐、树枝上，其状惨不忍睹。

日军对曾经遇到激烈抵抗的地方的平民更不放过，实施野蛮的

血洗，“潮河关惨案”就是典型的一例。潮河关，位于密云县古北口镇西南，是北齐天保年间修筑的一座古关城，东西、南北长度各仅150米，当时有住户80家。日军进攻古北口时，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伤亡很大。因此，日军攻占古北口不久，便疯狂血屠潮河关。4月14日拂晓，第八师团一队日军闯进潮河关城，见人就杀，见房就点火，顿时，枪声、破门声、杀人者的吼叫声、被杀者的惨叫声与烟尘火光交织在一起，吞没了小小的山城。许多居民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有的甚至刚从睡梦中惊醒，就作了日军的刀下鬼。一位壮年农民正在自家菜园干活，被日军从背后捅一刀，倒在血泊里。一对老年夫妇尚未起床，被从炕上揪下来，背对背靠在一起，两个日军嚎叫着把刺刀同时扎进两位老人的胸膛。一家祖孙5口，包括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全被日军开膛破腹。居民们这才明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来了，惊叫着纷纷跳城逃命。日军四下拦截追赶，拦住一个挑死一个。临近中午，日军搜遍全城再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人，这才离去。这次屠城，共有71名男女老幼被杀害，另有3人被扎成重伤未死。4月26日，穷凶极恶的日军再次窜进潮河关，尽管一些居民没等日军进城就逃避上山，但还是有12名老幼妇女被抓住。日军将这12人关进城西一间草房里，向房内投掷手雷，把人炸得粉碎，房顶也被炸飞。然后，日军又把前次未曾烧毁的房屋重新烧一遍，这才撤走。日军两次血洗潮河关，共杀害平民83口，全城共有409间房，被烧毁360间，家畜家禽也被杀掠一光。

长城战火的蔓延和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屠杀，给战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密云战区数十个村庄、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扶老携幼逃难他乡，仅密云县檀营收容所就收容了1000余难民。难民们失去了家园财产，也失去了春耕的大好时光，“衣食维艰”挣扎在死亡线上，还有许多难民因遭日机轰炸或因冻饿惨死在逃难路上。

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战区平民的暴行和欠下的累累血债，密云

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潮河关惨案目击者，左起刁桂云　贾德生　李军

潮河关惨案

王长青

1933年4月14日（旧历三月二十日）天刚亮，一百多名日本侵略军，闯进潮河关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把无辜的中国百姓围困在中间，杀人取乐，其状惨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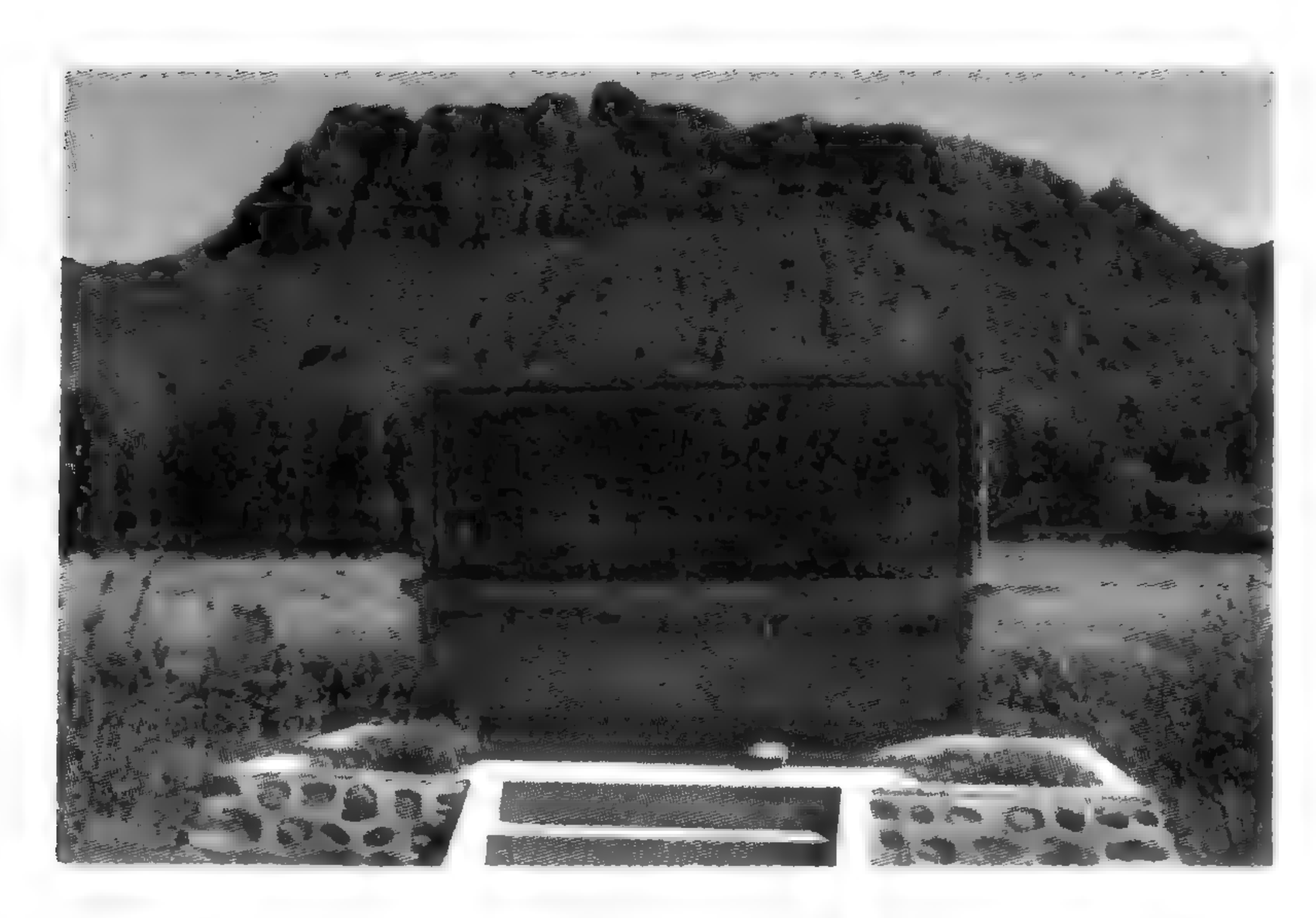
村东头贾得明一家五口人被杀死了四口，她媳妇被日本人打死以后，三岁的孩子满口血糊，趴在妈妈的身上乱哭乱嚎。何国庆正在菜园子里栽菜，日本兵照他后背狠刺一刀，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死在血泊中了。李发一家四口人，日本鬼子从街上追他哥哥，一刺刀就扎死了。然后又把他父、母捆在一起，两个日本鬼子前后各一人喊着号一块下手把老两口挑了。当时李发只有十几岁，鬼子对这个孩子也不放过，在他身上扎了两刺刀，李发倒在了屋里。鬼子又狂笑着把三间房子泼上汽油点着火狂笑走去。李发苏醒过来后又疼又烤，就从屋往外爬。刚爬出外屋台阶，房子就烧落了架。

4月26日（旧历四月初二），日本鬼子又到潮关“扫茬儿”，把没死的十个人集合到一起，用手榴弹炸死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四个年轻小伙子躲到赵振发家，鬼子也在赵家扔了手榴弹，赵家八口人只剩下三人，其余都死了。李发跑了，鬼子随后就追。日兵子弹把李发的棉袄打了好儿个窟窿。李发跑到下甸子还踩着了地雷幸亏没响。在下甸子东沟里又遇上鬼子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掉在地上也没炸，总算拣了一条命。

这个仅有八十户人家，四百来间茅屋草舍的小山村，在日寇一手制造的惨案中，有83口人被杀，360余间房屋被烧。

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这笔血债，古北口人民永世难忘!

(根据李发口述记录整理)



潮河关惨案纪念碑

日机狂轰滥炸密云县城

王敬魁

在密云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小日本，真敢干，坐着飞机扔炸弹。
先炸长城古北口，后炸石匣密云县。
军民挥刀上战场，杀死鬼子保江山。

长城抗战时，进攻古北口的日军西義一第八师团全部及骑兵第三旅团，并配有空军和炮兵，于 1933 年 3 月 10 日清晨 7 时 30 分，开始在古北口上空轰炸，继而大炮掩护步兵向古北口阵地发起总攻，防守古北口的中国军队某 25 师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密云县城距古北口仅 100 余华里，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得到密云人民的大力支持。老百姓纷纷腾出住房让给官兵，许多青壮年主动到战场救护伤员，运输弹药，筹集粮草，送饭送水。县城南关附近的居民还与支援前线的北京爱国学生一起，设立粥棚、茶水棚、急救站等为抗日官兵服务。

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日军伤亡惨重，称这一战役为“激战中的激战”。日军不甘心这次惨败，开始利用空军对我后方进行惨无人道的空袭报复，妄图割断我军与后方的联系。4 月 16 日至 18 日，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石匣和密云县城。

4 月 16 日上午八时，随着防空警报声响，日军飞机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各飞来九架双引擎重型轰炸机，机群是三架编为一队，成人字形，每九架编成一个三角的队形，先后侵入密云上空。开始轰炸时还保持原编队飞行、施行水平投弹，后队形又分散变为俯冲投弹轰炸。目标先是对准城内高大建筑物及商业区、居民区，后又

对准城内运输车辆、行人及商贩。日军飞机在密云县城上空盘旋，轮番轰炸。全城内阵阵爆炸声和人喊马叫声交织在一起。日机在县城内炸了整整一个钟头，到九时才离去。

日军飞机这次轰炸，对城内文物破坏严重。地处四街的真武庙为明代建筑，庙内塑像栩栩如生，殿堂雄伟壮观，壁画为三国故事。轰炸过后，真武庙成为一片瓦砾，在庙门前留下六个大弹坑。城内一街有座清真寺，是清代建筑，轰炸后发现寺门外东南角有两个直径三米多，深两米的大弹坑，清真寺内房屋有七处被震坏。密云城最高点的钟鼓楼，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有 400 多年历史，是县内重点文物之一。楼座上立有明代石碑，还建有三层楼房，楼高 10 米，楼内东面有高大的木质鼓架，架上大鼓直径 1.5 米，鼓架周围装有木制擂鼓台，可容四名鼓手同时擂鼓。楼内西面有高大的铸铁钟和钟架，钟高 4 米，钟架高 5 米，撞钟时，钟声响亮，音韵悠长，声闻十余华里。楼厅内皆是木质雕刻阁扇，雕梁画柱，富丽堂皇，气势雄伟。被日军轰炸后，石碑炸碎，大鼓炸飞，大铁钟被炸坏，残钟掉在楼座上，木质油漆的雕刻檀柱、阁扇、门窗等都已荡然无存了。

日军飞机轰炸后，街巷里血肉横飞，其状惨不忍睹。这一天，正值县城大集，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当听到警报后，大家乱作一团，不少群众惨死在街巷内。据目击者估计，当是死伤在街巷内的人少说也有 200 多人。县城西 8 里的韩各庄村杨老汉赶集刚走到西街，就被飞机炸死，到下午三点多钟，家人得知后，才用木板抬回掩埋。

有的老百姓听到警报，躲进防空窖内，也未能幸免。县城南门外南菜园村何德功一家五口人，听见警报后，在家的四口躲进自家白菜窖里，日军飞机的炸弹正巧炸在窖棚上，他一家四口人被活活炸死。南街路西广益和估衣铺，在自家后院挖了个防空窖，此窖长两丈，宽七尺、深八尺，窖顶用石条棚盖，还有三尺厚黄土。日军

飞机扔下的炸弹落进窖口，窖内有广益和掌柜杨云兴和学徒杨大荣及邻居 29 人全被炸死。窖顶的石条被炸飞，有一块抛到南街路东李家的房上，把房子砸个大窟窿，砸坏了锅台和饭锅。窖内人的胳膊、大腿、衣服片飞出窖外，抛落在墙上、房上和树上，收敛尸体时，无一人全尸。只有一名学徒张向臣（饶阳县人）没来得及进防空窖，藏在广益和估衣铺的货架下，才得以幸免，成为目击者。当时街巷、商业区、居民区内，到处是弹坑累累。轰炸过后第三天，清理街道时，从弹坑旁和尘土里又清理出 10 多具尸体，据说是外地的赶集人和小商贩。据不完全统计，日军轰炸时，躲在房屋或地窖内被炸死烧死的有 150 多人。

据几位老人估算，光是 4 月 16 日这天，县城及附近村庄炸死、烧死的有 250 多人，炸毁房屋 170 多间，炸弹引起火灾，烧塌房子 60 多间，共损失 230 多间。炸伤致残的更是无法统计。当时一街一位杨 × × 生小孩，躲在城墙防空洞内，虽未被炸死，但得了惊吓，造成终身病患。被炸致残的老百姓数以百计，他们无钱医治，终身处在病痛的折磨之中。

这次轰炸是侵华日军欠下密云人民的一笔血债，同时，激起了密云人民的抗日热潮，不少青壮年参加了抗日队伍。

以上是根据许生 93 岁，崔瑞云 84 岁，宋贵恒 78 岁，秦振如 74 岁，杨敬鳌（杨云兴之孙），金铸英 71 岁，杨春青 76 岁，杨芝甫 75 岁，赵秉辛 74 岁等目击者的回忆写成，作者谨此表示鸣谢。

冀热辽行署关于热南、冀东集家并村（人圈）惨状的调查报告

（一九四六年）

敌寇制造“无人区”（无住〈禁作〉地带）

热南冀东42000平方里的土地灭绝人烟

敌寇对中国人民的残杀、统治是无奇不有、无所不为的。但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决不会因此而压制下去，相反的时刻打击着敌人，特别是分散在各个山沟的人民，凭借着山地的有利条件开展着对敌的周旋。因此，敌人认为最美妙的也就是对中国人民最残暴的做法——制造“无人区”！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敌寇在我冀热辽区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长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均不让有一个中国人存在，开始了残酷的“集家并村”办法：第一阶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户，集中到村庄里。这是“命令”，不去就是烧杀抢。但老百姓不是那样温驯的，除开展“非法”斗争外，还利用一些“合法”的斗争，拖延时间。三十二年（一九四二年）开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户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离长城40里以外山沟口较大村里，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国人民能够服从这个“命令”么？绝对不能。因此“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残暴的施行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敌寇的兽群每天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与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就是一所茅草窝铺也难免灰烬的命运，牲口和财物抢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鸡犬也难逃

活命。这样的搜索“扫荡”，一个村至少在几次以上，在马尾沟竟烧杀了14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被烧了房子，他们又搭起茅屋来，但是狠心的敌人又来了个二次放火。经过数次“搭”与“烧”的斗争，群众的力量使尽了，只得隐蔽在水［山］沟里、大树下、山谷里，以减少目标，略避风寒。但是敌人还有更残酷的办法，在每个山头上分布着碉堡，监视着人们的动静，只要发现人影，必追逐杀死而后已。因此，躲在山谷里的人们连火都不敢生，恐怕烟火暴露了消息。母亲抱着小孩，时刻不敢让他离开奶头，恐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时，可怜的让他母亲长久的用奶头塞死。马尾沟只4个村，70户人家，竟被杀死50余人。好多村庄被杀在半数以上，全家被杀的也为数不少。有42000平方里的土地上成为人烟罕见的一片凄凉了！

住在“部落”附近的人们不得已跑在“人圈”里，都过着非人类的生活（“部落”都在千户以上)。“人圈”里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秘输犯”等犯罪条款，谁要表现任何一点活动，或是看见那个人不顺眼时，就加上某一罪名结束了他的生命。从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与外面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相隔咫尺的村庄也不准互相来往。10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让种，凡是一个能拿动枪的男人，都要编为自卫团，每晚巡查不能睡觉，白天才能抽点时间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为他们又都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每月都要抽出15天到20天的功夫“勤劳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沟，就是修山头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做工，就是到东北矿厂，他们的劳役没有服完的时候，以至于死。“人圈”里的生活完全是配给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让吃。其他用品的配给，着实可怜，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他们所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定交“钢钝”①5个，如没有交款，每个折5元，一年一次募捐，每亩地

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这仅仅是所知的数种，总计每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斤粮食，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即可想而知了。“人圈”里的女人们，一般定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妇女，扔下自己可爱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个圈，然后才能回家做饭奶孩子，不然就要犯罪。第二种是“跑山”，每礼拜一次，把妇女们集中在一个山麓下，发号赛跑。但山头早已暗藏着一些丧尽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妇女快到山顶时，“砰！砰!”的枪声，把女人们吓个抖擞而后快，这就是那［所］谓“锻炼”，谁要不去，马上定个“思想不良”的罪名成为刀下鬼。“人圈”的妇女们被敌人奸淫污辱已成为“公开合法”，因为抗拒，被处通匪者不是少数。“人圈”的生活此仅一、二，实难尽述。

在这块地区里，以9个县计，其中最重要者4县，有600万亩土地在敌人践踏下荒芜了，每亩以产粮3大斗计，以4年计算，共减收粮食720万大石。1000余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牲畜不见一头，衣服不能遮体，有将近50万的人们受着衣食住无法解决而死亡的威胁。此种嗷嗷待哺的惨象，令人心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

注：①原文如此。

血泪凝铸云蒙山

——日军制造丰滦密“无人区”暴行

曹友林

平北丰（宁）滦（平）密（云）“无人区”是日本侵略者自1941年底开始在中国华北制造的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中最早的一块。它以密云县西部的云蒙山区为中心，东起密云县半城子，西至滦平县渤海所（现属怀柔县），南起密云县白道峪，北到滦平县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包含了当时丰滦密抗日根据地所辖的全部山地。日伪在制造这块“无人区”的过程中，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毁灭性政策，暴行累累，罄竹难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1940年6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创建了丰滦密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它象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洲国与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既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军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干线平（北平）古（北口）铁路的安全，又使冀东、平北、平西三大块抗日根据地得以连通，因此被敌人视为心腹之患。为了消灭八路军十团，彻底摧毁丰滦密根据地，1941年10月，由日军第二十一师团长盘井虎二郎亲自指挥，调集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十一师团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和柿本大队、日本关东军一七四独立大队和守备队等10000余人，联合对丰滦密发动了持续两个月的毁灭性大“扫荡”，自此开始制造无人区。

日军把以密云云蒙山区为中心的丰滦密山地全部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采取“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等多种战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交叉反复地“清剿”，

甚至连当地百姓都不常去的险僻山沟也不放过。“扫荡”中实施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把百姓的粮食、畜禽、衣物全数掠走，家什用具捣毁殆尽，房屋草棚一概烧毁。房屋烧掉顶盖还不算，还要把墙壁推倒，把地基刨掉，使之无法修复。并把水井填死，把碾磨炸毁。日军先后将半城子、西驼古、张家坟、冷风甸、朱家峪、孟思郎峪等100多个村庄烧成一片废墟。房子被烧毁后，百姓只好搭窝棚住。日军又开始烧窝棚，见一个烧一个，逼得百姓没办法，就住山洞和长城楼子。日军见到山洞和长城楼子就予以炸毁，甚至连能容人遮风避雨的石窟窿也要炸塌。不愿离山的百姓万般无奈只好躲进深山密林，过着风餐露宿的野人生活。于是日军又开始烧山毁林，先后烧光了牛盆峪、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地的数十万亩山林。

尤其残忍的是，日军疯狂捕杀手无寸铁的山地百姓，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血腥惨案。1941年10月28日，日军“围剿”西白莲峪一带，将在井儿峪抓到的8名百姓押至双窝铺，推入地窑用手榴弹炸死。第二天日军又在这一带集体枪杀了6名百姓。10月30日，日军把朱家峪、罗圈厂，石湖根等村共33名百姓抓到下营村，当晚分两批砍杀在该村的万人坑里，只有罗圈厂的郑凤山在被砍头之前挣断绳索，乘夜黑跑掉，幸免于难。之后不到1个月，日军又两次将“扫荡”中抓到的共47名百姓带到下营村集体杀害，无一幸免。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手段残忍至极。如11月上旬，日军在“扫荡”中抓到孟思郎峪等村老人、妇女、小孩共36人，把他们全部赶到一个院内刺杀，又架起柴堆，焚尸灭迹。再如，冷风甸村孙桂生一家10口被日军抓住，当场杀死。仅在万人大“扫荡”的两个月里，日军就用各种残暴手段杀害山地百姓300余人，抓捕500人。

面对敌人的淫威，丰滦密根据地党和政府执行中共平北地委关于“哪怕只剩了一个村庄、一座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指

示，领导抗日军民誓死不离山，咬牙坚持“无人区”斗争。因此。自1942年始，日军又以6000余兵力长驻丰滦密地区，在长城各口和山边山内要地广设据点，以各主要据点为核心，把“无人区”划分成若干小块，反复进行分区域的“肃清扫荡”，实施更加凶残的毁灭政策，见人就杀，见房屋草棚就烧，见物就抢。这种“肃清扫荡”的频繁与残酷是罕见的。

日军在推行“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毁灭根据地生存条件的同时，又对丰滦密山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堵死了出入山地的所有通道，严禁一切生产生活物资流入山地，妄图困死、饿死还在山地“无人区”内顽强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为了生存，抗日军民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利用反“扫荡”的间隙开荒种地，以解决生活急需。针对这种情况，日军自1942年春开始，又连年发动了季节性的“割青扫荡”，实施了阴损毒辣的“片光”政策。所谓片光，就是把地里的青庄稼割净。每年当春庄稼刚要吐穗灌浆的时候，日军就对山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强行驱赶大批平原敌占区百姓进入“无人区”割片庄稼。日军逐村逐沟的搜寻，发现庄稼就强迫百姓割掉，哪怕是只种有几棵庄稼的石缝石坎都不放过。有些平原百姓不忍心割掉尚未长成的庄稼，又不能不割，便偷偷把庄稼按倒，但如果被发现就会大难临头。春庄稼被割后，山地军民只得抓紧种荞麦、白薯等晚秋庄稼或萝卜、白菜，希望多少能收获一点，但当庄稼苗、菜苗长出时，日军又来“扫荡”，连割带放牲口，又给毁得一干二净。日军毁灭性的割青，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年年如此，从未停止。尽管由于抗日军民开展了激烈的反割青斗争，保住了部分青苗，但年年仍有很大部分的青苗被割。仅1942年7月，丰滦密山地就有三分之一的青苗被割掉，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地的青苗被割得一棵不剩。山里可耕地少，日军年年割青又使很多土地有种无收，加之日军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丰滦密山地抗日军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活困难。

以吃饭为例，最困难的1942年，军政人员的粮食定量降到了每人每天小秤12两原粮（合市秤7.5两），但这也无法保证，有时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百姓的生活更为凄惨，除抗日政府发放的少量救济粮外，几乎全靠野菜、树叶度日，野菜树叶吃光了，就吃树皮，挖草根。由于缺盐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人人身体虚弱，遍身浮肿。饿死人的事时常发生，非常普遍，如冷风甸村仅17户，1942年就饿死12人。

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目的，就是实现所谓“民匪隔离”，以便于其“竭泽而渔”，彻底消灭抗日力量。为此，日军从万人大“扫荡”的后期开始，又在丰滦密山地推行所谓“集家并村”计划，采用各种野蛮手段，大搞“集家并村”，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苦难。

在华北方面采取了用沟壕碉堡将山地和平原分割封锁的办法。1942年4月，日军强迫平原区百姓沿着丰滦密山边突击挖掘“治安沟”，西起昌平县桃峪口，东至密云县辛庄，全长90公里。大沟深5米，宽11米，沟边每隔一华里修筑一座炮楼。为了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日军几乎无偿征用了平原区的全部青壮年，仅密云县西部平原区就有5000多青壮年被征用，无偿付出工日累计达30万多个，老弱妇女也被强制去捡石头。挖沟百姓被迫自带工具和干粮，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动作稍慢就遭日军监工的打骂。许多百姓连累带饿晕倒在大沟里，却被视为有意怠工，横遭毒打，有的甚至被打死。春耕和夏收季节，日军不许挖沟百姓回村种地和收割，致使大片土地荒芜，许多长熟的粮食烂在地里，生活更加困苦。因此，百姓都气愤地把“治安沟”叫做“毁民壕”。1942年10月，大沟挖成，沟边炮楼都派驻日军监守。随后，日军宣布长城以南、大沟以北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命令沟北百姓限期搬到沟南居住。日军随即开始对沟北“非治安区”反复进行“扫荡”，逐村驱赶百姓，赶不走就杀。除留下小石尖、小水峪、石城、马营、石塘路、赶河厂、黄土坎等几个村庄的房屋，贴上封条留作以后“扫

荡”时临时落脚点外，其余沟北村庄全部烧毁，同时毁尽一切生产和生活设施。一时间，沟北到处烟火冲天，哭声震野，百姓眼睁睁看着家园财产被付之一炬，被迫携老扶幼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被押送到沟南投亲靠友另谋生路，只有少数百姓躲进了深山密林中。长城以内、大沟以北遂成为废墟满目、人烟稀少，鸡鸣犬吠不闻的荒芜地带。

伪“满洲国”方面对丰滦密地区实施“集家并村”的手段是修建“部落”，即搞所谓“部落化”统治，选定一些村庄，用1丈多高的石墙围圈起来，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这利用炮楼和高墙围起的村庄即为“治安部落”。到1942年3月底，日军在丰滦密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共建起四合堂、白庙子、番字牌、白马关、石湖根等29个“部落”。“部落”建成后，日军宣布每个“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允许“部落”百姓耕作但不许住人。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严禁任何人居住和耕作，命令山地百姓统统迁入指定的“部落”。日军随后开始分区域的“合围扫荡”，用残暴的手段强行驱赶百姓入“部落”。将“部落”外的村庄全部烧毁或拆除，抢走百姓的财物，捣毁其他一切生产和生活设施，强迫被围住的百姓带着少量生活用具迁入指定的“部落”，不去就杀，在无住禁作区还将地里的庄稼割片一光。这样，丰滦密长城以北山地除29个“部落”外，全部被夷为废墟，一片荒芜。

被圈进“部落”的百姓，在日军残暴的殖民统治下，生活处境极其悲惨。他们终日受到严密监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男人每天都要被迫出外去为敌人种地，上午10时出去，下午4时归，生病也不能不去，回来晚了要处罚，如借机逃跑则杀其在“部落”内的亲属。青壮年全部被编入所谓“团员队”，发给火枪、棍棒，每天种地之余强迫接受军事训练，夜里还要站岗巡更。妇女的处境更惨，长年不许出“部落”门，每天都要被强迫服役干活，还经常遭受凌

辱。日军以“防八路”为借口，命令各家日夜不得闩门，鬼子汉奸经常随意闯人民宅奸污妇女，甚至连未成年的女孩也不放过。受害者及其亲属泪往肚里咽，敢怒不敢言，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些妇女实在不堪忍受敌人的凌辱，服毒、上吊，含冤而死。“部落”内实行所谓“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百姓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百姓王金鼎，仅因饥饿难忍摘了自家果树的几个果子吃，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枪杀。百姓辛苦劳作终年，一无所获，生活上只得依靠日伪的“配给”。日军规定每人每年配给少量混合面（一种用高粱米、玉米骨、白薯秧等掺杂一起磨成的混粉）、1盒火柴、半斤盐、3尺布，经过敌人层层尅扣，到百姓手里所剩无几。以布为例，据调查，多数“部落”平均每人每年仅实得9寸布。因此，“部落”百姓的生活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由于配给的混合面数量太少，百姓一年有多数日子只能以野菜、树皮勉强果腹，每个“部落”周围的所有可食树皮几乎全被剥光。穿衣更困难，多数人衣不遮体，许多老人全身只围着一块羊皮或麻袋，多数小孩一年到头光着身子，有的姑娘、媳妇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为了遮羞，只好在住屋的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部落”内地狭人多，居住和卫生条件更为恶劣。百姓大多住在一种用木料作架、柴草围墙的“马架房”内，有的几家人挤住在一起。屋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臭气熏天，瘟疫流行，无医无药，成批成批的人染病身亡；冬天冰雪封门，青黄不接，人们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很多人冻饿而死。据《中共丰滦密县委1942年总结报告》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70—80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有400人，这一年就死亡160口。

由于进入“部落”，就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等一切自由，只能象牛马一样任凭敌人役使和宰割，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所以百姓都愤怒地称“部落”为“人圈”。正因如此，许多山

地百姓誓死不进“人圈”，躲进深沟密林。一些被赶进“人圈”的百姓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也想方设法举家出逃，逃人“无人区”。对待这些百姓，日军采取了残暴的“剿灭”政策，长年不断的反复搜寻“清剿”，见一个杀一个，制造了无数起血腥暴行。“小西天惨案”就是其中一例。小西天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林，由于全村百姓誓死不进“人圈”，敌人在一次“清剿”中，就抓捕老幼妇孺 37 口，杀死 28 口，被称为“二八惨案”。

日军在制造丰滦密“无人区’’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方方面面举不胜举，以上所述事实仅为其中的一部分。日伪的残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仅据密云县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就有 7600 多人被杀害，3 亿多公斤粮食被抢走，17460 间房屋被烧毁，90600 头（匹）牲畜被掠去，另有 3589 人被抓送到东北或日本国内作劳工，其中绝大多数惨死异乡。这段浸满人民血泪的惨痛历史，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子子孙孙不会忘记。

“无人区”和“部落”

郑云山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平北抗日根据地云蒙山区，实行“无人区”和“集家并村”的政策，妄图藉此来分割老百姓与八路军的鱼水关系，达到摧毁我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1941 年秋末，云蒙山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日伪发动的万人大扫荡。敌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云蒙山方圆百余里被划为无人区，房子被烧光、村庄被摧毁，真是鸡犬不存。

“万人大扫荡”施行了两个月，他们在琉璃庙子、后山铺、汤河口、四合堂、马营、康各庄、大水峪等村安下了十几个日伪据点。然后围着云蒙山的冷风甸，莲花瓣、黄土梁、张家坟、柳棵峪、郎房峪、榆木沟、小梁子、对家河形成一个对头圈，进行拉网式的扫荡，沿山梁、沟谷、沟沟岔岔进行搜索。

这次大扫荡从 1941 年 10 月 4 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起，到 12 月 3 日结束，共进行了 60 天。敌人的行径，确实使我丰滦密抗日根据地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在这次扫荡中，我方牺牲干部、战士和群众 300 多人，有 500 多人被抓捕。汤河口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30 多人的游击队同成百上千的敌人周旋，也给敌人以一定的打击。敌人懵懵懂懂弄不明白是我主力还是游击队。然而由于敌众我寡，我武器装备差，受活动区域的局限．结果全部战死在疆场。平北的第四游击大队在敌人的大扫荡中连续突围二十多次，其中在石骆驼南沟的一次突围中就牺牲了 30 多人。处于劣势的抗日武装，作战英勇顽强、壮怀激烈。

在云蒙山的北部山区，敌人实行了“集家并村”。1942 年 3 月

底，敌人设置的“部落”也就是“人圈”已经完全修成。敌人在与云蒙山交界的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西湾子和番字牌的山区总共修筑二十九个“部落”。云蒙山区被划为“无人区”，在山里居住的老百姓发现一个抓起一个。“集家并村”把人们赶到“部落”里去。所谓的“部落”是什么样子呢？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四角建筑了炮楼子，炮楼子有日伪军警特务驻守。“人圈”留有两个大门，门口有日伪军把守，不得随便出入，15 岁以上者都必须要携带“良民征”方可出入。老百姓出去种地也必须携带“良民证”，不带良民证要严加盘问。敌人担心八路军混进来。

“部落”是以一个较大的村为中心，把十里以内的小村、自然村，分散住户集中到“部落”里。“部落”里除原有民房外，又盖了一些小而潮湿、黑咕隆咚的排子房。按居住情况把老百姓中 15 岁至 45 岁的男子编入自卫团。自卫团和日伪军警昼夜在“部落”的岗楼上轮流值勤。自卫团是被迫劳役，不给任何报酬。发现有嫌疑人出入“部落”，值勤人往往被扣上私通八路罪名。实际上，“部落”里的人们就是会说话的牛马，没有自由可言。

人们被赶进“部落”后，生产受到严格限制。敌人给“部落”的人们规定：在“部落”以外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为“无住禁作地带”，在“部落”十里范围内允许种地，但不许居住，为“无住地带”。出“部落”种地早 8 点以后才允许，在晚 3 点以前必须回到“部落”，因此大面积土地荒废。老百姓生活日用品实行配给制．缺吃少穿，凄惨难言。日伪官方组织所谓“合作社”，凡入社的百姓每年配给半斤盐，二盒火柴，三尺布，每户每月供给半斤煤油，不入社者一概不给，所以“部落”里的人们生活极困苦。

敌人通过“大扫荡”和“集家并村”，就是要达到“净化”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用心十分险恶。然而，真金不怕火炼，云蒙山区的军民经受住了考验，敌人割不断八路军与老百姓的联系。尽管敌人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手段，但根据地并没有被摧毁，反而更加

巩固。村村都有自卫军中队，有村政权、青救会、基干队、儿童团、妇救会等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随时都在准备着打击敌人。八路军和老百姓更加深了鱼水之情，“部落”里的人民和八路军的侦察员、地方工作人员来往频繁，八路军随时都能得到有关敌人活动的准确情报。敌人大扫荡和集家并村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

日寇逼迫中国百姓背“十条”

王敬魁

1944年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已进入后期，密云地区的抗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而敌人兵力则更为不足。我抗日军民镇压了一批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力的伪大乡长、保长和作恶多端的汉奸。开展了“破交月”活动，在公路上挖出一道道断壕，把路旁的电线杆锯倒，剪走电线。焚毁了一些木桥，拆掉了一些石桥。把平古路的铁轨掀翻，烧掉了枕木。敌据点的电话线被剪走。破交活动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和电话联系。

日寇不甘心失败，于1944年旧历正月，在全县范围内，强迫老百姓，看护公路、铁路、电话线，阻止八路军等抗日军民的破交活动。为此，敌人在我县广大地区强迫老百姓背“十条”，要按“十条”内容去做，违者轻的体罚，重的打死。

“十条”的内容是：一、绝对服从自身所属县政府和日本军的命令。二、不许说谎话。三、讨伐队到村不许躲避逃跑。四、不许收藏八路军。五、不许阅读八路军宣传品并不许收藏。六、不许给八路军送粮送衣送药品。七、保护近村的铁路和汽车路。八、保护近村电线和电线杆。九、保护日本军队和宪兵队。十、一人责任，众人责任，一人犯罪，众人犯罪。

日寇公布“十条”以后，要伪乡、保长到村中宣传，在十日内能背诵并全部做到。

当时的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令公、石塘路、墙子路、下营等城堡的城墙上有日伪军、自卫团站岗，过往行人从城门过，必须先背“十条”，如能背下方能通过，若背不下来，要面对城墙跪

下，等能背过再走，否则以私通八路论处，轻者用枪把子戳，重者抓到日本宪兵队，扔到洋狗圈里，任洋狗撕咬。

密云镇原来集市在东街和西街，到1943年第五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集市全部移到城外。居民买粮、买菜、买柴必须出城，商人交易必须到集市。有些居民因不识字，一时背不下来“十条”，或在家能背，而到城门时一紧张就背不下来。特别是老年妇女多数背不下来，不少人被打伤。这样，给居民、商人的生活和交易造成严重损失，给人们的生命带来很大威胁。

正月十四日早八点多钟，小营火车站日伪军来到南省庄西大庙，召集全村老百姓，人人背“十条”，背下来的可以走，背不下来的跪在一起。到中午时分，把背不下来的群众扒光上衣，用猪毛绳沾凉水一个挨一个地打，打一阵，日伪翻译黄克焕训一阵话。轮番几次，有几位老年人坚持不住，骂出了声，被宪兵队给灌凉水，把肚子灌得鼓鼓的。宪兵队的人穿着皮靴站在鼓起的肚子上乱踩，边踩边问：“你不背‘十条’是不是八路军的探子？”日本侵略军这样惨无人道地迫害老百姓，致使有几位被当场治死。还有几十位不能走动，到天过晌午，由亲人把他们抬回家。当时，有几位未在家的人听说此事，怕下回再来逼迫背“十条”，便跳进潮河的冰窟窿而死。

正月初十早饭后，日军山本带警备队来到西智村，命令伪保长张永堂集中全村成年男子到村东小庙前空场上分行站立。敌人士兵荷枪实弹，特务手持木棍把老百姓围在中间。敌人命令在空场前挖几个土坑，以此为埋人之处。并按户口册点名，有不到者即令家人找来惩罚，否则封其门户。村里张保生之子张荣出外未归，点名不到，山本勒令张保生去找，张保生胆小，到家后悬梁而死。

点名以后，山本从群众中唤出数人令背诵“十条”，幸此数人均能熟记未受惩罚。随之又问伪保长张永堂八路军的情况，张答不知道。山本以为他是隐瞒敌情，即令众特务举棍乱打，打致半死推

到坑中活埋。根据“一人犯罪，众人犯罪”的第十条，山本命令全村人趴下，其姿式是十个手指着地，两个足尖着地，全身挺直不许着地。几分种后，有力不支者兼用两膝着地，被日本兵和特务看见，用脚踢、木棍打。更令人难受者则登在人们的背上乱踩乱踏，此时，呼天叫妈之声不绝于耳。

这天，村里人忐忑不安，妻惦念其夫，母惦念其子，都不敢出村探视，恐遭鬼子和特务凌辱，只好在家祈佛求祖保佑。到黄昏时分，男人们才回到家里。惊悸之余，家家都没有心思做饭。

正月十四日夜，山本率队又一次来到西智村。因村里轮流站岗的张、王二人未上前欢迎，即令本村人把张、王二人乱棍打死。又根据“十条”中“一人犯罪，众人犯罪”之条文罚西智全村将村内所有树木放倒。山本说：“你村留一棵树，我就砍你村一个人头！”西智村人慑其淫威，回村后一夜之间即将全村树木伐尽。天明之后，全村面貌袒露，植物也遭此厄劫！

我在调查采访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的暴行时，发现有五个乡镇中四十三个村庄的群众都曾背诵过“十条”，并遭到其迫害。

挖治安沟

张明栋

1942年，日本鬼子为了“确保”他的占领区，频繁地清乡、扫荡，但每次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于是，敌人施行个罪恶的计划，即挖治安沟。

鬼子用挖治安沟的办法，来阻止抗日军民的联系。

通常，沟上沿宽约三丈，底宽约一丈，沟深在两丈左右。沟挖成之后，通往山区的小路就全断了。只在大路留一路口，构筑堡垒，驻兵看守，检查来往行人。

这样在沟的范围内似乎就安全了，所以鬼子叫它治安沟，还有叫“惠民沟”的，其实老百姓叫它“毁民沟”。

挖沟的民工，都是附近村庄的农民。我们那村——平谷县西高村是按各户种地亩数（不论是自己的地还是租种的）来摊工，一亩地一个工。可是种地多的户，都是村里伪保甲长之类的人物。他们称自己整天在村里忙着，就不出工了。结果出工的都是贫雇农。

民工们离挖沟的工地，近的二三华里，远者二十多华里，工地不设工棚和伙房，民工们只得来回跑路，中午自带干粮。穷人生活很苦，早晚只吃点稀粥，中午有的拿糠饽饽，有的拿菜或树叶饽饽，很少有拿玉米面饼子的，所以人们身体很弱。这沟，纯属是毁老百姓的，人们从思想上反对，情绪上厌恶，谁还有劲去挖呢！所以人数不稳，忽多忽少，工程进度很慢。

况且，挖沟这活也很累，由于沟面宽，一开始就得把土往远处抬或挑，沟挖到三尺深之后，运土十分困难。从沟中间分为两边，每边各往自己的一侧翻土，从下往上三至五尺高为一个台阶，下边

人挖的土放在上一台阶上，逐次把土扔到沟沿外。从沟外看沟内，一段一段，一阶一阶倒也挺可观，只是这些饿着肚子而又满腹怨气的人们，无论如何安排，工程进展依然缓慢。

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来了一队鬼子兵，有30多人。说是什么太君来检查工程进展情况的。这天正好我也来出工（这年我十六岁）。鬼子来后，就一列散兵式在沟的左侧排开。一个挎洋刀的鬼子军官身边跟着个翻译，沿沟边看了一遍，不时嘴里还嘟噜几句。

这个鬼子军官让翻译把民工们全叫上沟边，并让民工面对面站两排。然后，鬼子军官气势汹汹地说话了，不时还用洋刀戳几下地面，好像十分生气。翻译说："你们大家都不好好干活，大沟挖了一个月还不到七尺深。你们心坏了，今天要惩罚你们！"接着鬼子军官又咕噜一阵。翻译又说："现在你们相对着互相打嘴巴！开始打！"。人们有的是一个村的，有的是邻村的，有些互相都认识，不认识的谁和谁也没仇没根，怎么抬得起手呢？所以谁也不肯动手。沉默几秒钟之后，鬼子军官狼嚎一般地喊："八嘎"！接着举起刀就向离他较近的民工肩上砍了一刀，眼看那民工的胳臂就耷拉下来，鲜血直流。被砍者嚎啕哭喊倒在地乱滚。鬼子在嚎叫，翻译又嚷："打不打？不打每人吃一刀！"人们无耐，只得互相打起来。但下手轻，作作样子。鬼子吼了一声又用刀砍了一个人的右手腕。那人的手与臂只连一小部分，左手托着右臂，悲惨地坐在了地上。翻译喊叫："使劲打！"人们没办法，只好用点劲吧，但还是样子有劲，着力点没劲。过了几秒钟，鬼子军官哈哈大笑哇啦哇啦地咕噜了几句。翻译说："太君要看你们打半个小时"。人们的手，动作越来越慢，尽管如此，半个小时过去，人们的脸和眼全肿了，嘴和鼻子都淌着血。

鬼子们却个个哈哈大笑，翻译说道："以后要好好为皇军挖沟，赶快把沟挖完，不然，皇军要砍你们的头！"说完，鬼子官儿一挥手"开路！"野兽们滚了！

人们虽然都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还是赶紧把两个被砍的人抬回家去了。剩下的人瘫坐在地上叹惜、哭涕、叫骂，这就是亡国奴的悲剧！

日本热河宪兵队在密云地区的活动

李东明

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军占领了热河地区后，置热河宪兵队，其主要是以参加热河地区作战的第六师团配属宪兵为主编成。初期，下属5个分队，两个置于长城要塞上的古北口和喜峰口。其中，古北口分队管辖靠近长城，通往平北的滦平、兴隆两县。“七．七”事变后，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古北口分队亦将其管辖区推进到长城以南的密云地区，并在石匣镇设置了分遣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配合八路军向华北地区挺进，中共中央提出，要不失时机地以燕山山脉主峰雾灵山为中心，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为此，到1941年8月，围绕着雾灵山地区，迅速开辟了丰滦密、承兴密等抗日根据地，对该地区侵华日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日伪统治当局十分恐慌，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古北口分队在承德宪兵总队授意下，向汤河口等地区派遣宪兵，搜集共产党八路军情报，企图查明共产党外围组织在密云地区的活动，给我方造成极大损失。

1943年，日军又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又补编了三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人。当时第一游击队长就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密云等县活动，镇压抗日武装。

1944年，日方又将三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小股部

队和中共地下县委干部。其中，第二分队为古北口分队，队长由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兼任。

热河宪兵队在密云地区制造了多起惨案。下面是日本人岛津酉二郎 1954 年 8 月 16 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 1942 年来到中国，1943 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队长，他说：

“1943 年 11 月 15 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密云县兵马营村西北方活动，逮捕了一名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队长当即命令我等七人对其严刑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己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 年 2 月 20 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 12 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通过这个宪兵队长血淋淋的供述，就可以想见日本宪兵在密云地区的累累暴行！

伪满间岛特设部队在密云地区的暴行

李东明

“七．七”事变后，随着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广泛开展，使一意孤行的日本侵略者受到极大打击。为了巩固后方战略基地，加紧对东北地区抗联的进攻，于1939年在间岛省（伪“满洲国”建制省）建立了以朝鲜族青年为主的特设部队，以维持其反动统治。

1944年初，该部队调往热河省，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忠实执行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积极组织扫荡，采取极端野蛮、残忍手段，对我抗日志士进行残害。尤其是在密云地区，制造了多起悲惨血案。

当时，间岛特设部队主要集中在石匣镇活动，不时地对石匣镇周围50公里以内的大水峪、聂家峪、东田各庄等村庄进行“讨伐”。由于特设部队“讨伐”极端猖獗，使该地区抗日军民伤亡和被捕人数极多。据调查，在石匣镇地区“讨伐”事件达34起，被害的军政人员和群众39名，被捕者62名。下仅举几例：

1944年10月，特设部队情报班逮捕了一名八路军工作人员。在刑讯中他供出了离石匣镇10公里的村庄埋藏八路军粮食一事。敌人立即出动到该村起出藏在洞里的粮食40多麻袋和布鞋40双，还宰了3头牛。在搜查中特设部队还用军刀刺杀一名八路军战士。同年旧历八月初一，特设部队到离石匣镇东部约30华里的东庄禾去“讨伐”，天刚亮时，该村百姓看见敌人来了，就往村外逃难，特设部队举枪就打，一名老百姓中弹死在田里，一名孕妇被机枪射中腿部，爬到高粱地里，被讨伐队用刀捅杀，连胎儿都流了出来。1944

年旧历3月20日，特设部队配合当地宪兵队、警察、棍团到离石匣镇东南8华里的东田各庄进行“讨伐”，在村庄里大打无辜老百姓，并抓去21名群众。同年旧历7月27日，他们又配合当地警察到黄各庄去征粮（实际是抢粮），逮捕20多名百姓，其中一名农会主席羁押一个月后，被其砍死。1944年9月，特设部队还在离石匣镇15公里处，配合蒙古骑兵“讨伐”八路军。在双方交战过程中，特设部队惨败，他们在一气之下，于归途中到石匣镇西部10公里的一个“部落”，放火烧了20户人家，并抓捕了两名老百姓，且将两人残忍地用军刀杀死，还宰杀了村庄多头牲畜。1944年9月，他们配合日本宪兵队，半夜出动包围了离石匣镇4公里的一个村庄，在搜查中逮捕了八路军工作人员3名，并把他们绑在大树上，连踢带打，直至折磨而死。

伪满间岛特设部队对密云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真是罄竹难书。

山本在密云白河西的罪行

李善文

1943年前后，北京市密云县白河西地区包括现在的西田各庄镇、十里堡镇、及密云镇沿白河西岸的西大桥、季庄、大小唐庄、李各庄以及划归怀柔的驸马庄、宰相庄、梨园庄等共32个村庄，统归侵华日军柿本部队在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据点的山本小队长管辖。大辛庄据点驻日军约30人，一个警备队约120人，伪“新民会”，工作人员30余人。伪“新民会”长姓黄，警备队中队长陈庭相。“新民会”设在大辛庄郭正中家。郭在日军侵占密云时举家逃离，18间房空着，全部为日伪占用。郭家房子间数多，间量大，大门和二门之间另有三间南倒座房，东间为门道，中间改为牢房，西间设澡堂。日军、警备队和伪“新民会”统设一个伙房，全在郭家大院里。



李各庄村惨案目击者王有才

山本在河西地区搞强化治安，设法整治中国百姓。山本心黑手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密云河西地区制造多起血案，犯下了滔天罪行。山本一手制造的李各庄惨案，杀

死7名中国人，其中有3名少年儿童。当年目睹这一惨案的中国人，至今没齿难忘。

大辛庄的李宽、李各庄的王有才及死难者张金的儿子张凤增等人，都是当年山本杀人罪行的见证人。1987年，笔者曾在李各庄村，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当时参加座谈的有死难者张金的妻子张永荣（74岁），目睹山本进村的李凤玲（79岁，现已故去）。笔者原计划只搞清李各庄惨案经过，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山本在河西地区罪行累累，涉及村庄人员很多。于是改变原来计划，进行跟踪采访调查，直到1993年底。谨将采访调查材料，整理如下：



李各庄村惨案目击者李宽

李宽：我叫李宽，今年73岁，属狗的。家住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大辛庄甲长杨仲林派我到新民会当博役，管做饭。当年我二十岁出头，正是青年。日本人派劳工，哪次我都躲不过。当博役虽说也属派的劳工，不挣工薪，一是稳定、安全，二是听说做饭的可以自得锅巴，能添补家里口粮，所以就很痛快地答应了。虽说是做饭的，因为我年轻，什么活也都做。日军下乡讨伐，山本抓百姓毛驴骑，也让我去赶脚（牵毛驴）。山本在密云河西地区犯下的许多罪行，都是我亲眼所见。

一、成立棍团

山本命令白河西32个村庄，全部成立起民团。男子8至65岁全部编入。每人自备木棍为枪，百姓称为“棍团”。18至45岁称青壮年团，夜间，出勤站岗。其余为老少团，白天站岗。各村中心设铁钟。听到钟声，不论男女，必须跑步到指定地点集合，棍团必须携带木棍。集合地点由保甲长临时通知。有时在本村，有时在外村。迟到的，身上没跑出汗水的，轻则挨打挨罚，重则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如果迟到的人多，则解散回家，听到钟声再集合。民国三十一年腊月（1942年1月）西大桥、燕落寨两村同时在燕落寨大庙水坑前集合。两村相距3华里，西大桥迟到的男女一半以上，大庙前水坑腊月结冰，山本令两村三百余口男女，脱光衣服，趴在冰上。在靳各寨本村集合，距离短，跑出汗水的人不多，山本下令搞第二次集合。又嫌动作慢，罚全体村民趴在地上。手和脚撑地，胸、腹不准沾土。一个多小时以后，人们坚持不住，山本令士兵用木棒打。人身上棉衣被打后尘土飞扬起来，像刮一场旋风一样，尘土形成一个烟柱，飞上云霄。

棍团成立起来以后，用站岗的人当活电话。以岗哨之间说话互相都能听到为距离，以大辛庄据点为中心与各村相通。山本下令，哪个岗位断了消息，查出后一律枪毙。山本有时还用假消息作传递试探。其实，当时百姓都明白，八路军真的出现了，没人传消息，反倒是山本出发的消息不断被传送出去。

二、残杀中国人

山本是个杀人魔鬼，任意残杀中国人。山本在靳各寨体罚中国百姓，只因怕尘土呛人，才不得不停止，但他怒气不消。恰好一个青年因病没出来集合，后被从家里搜出来，也没拿木棍。山本骑在驴上问青年：“八路在哪里?”青年答不知道。山本又说，“你的八

路送信?"青年答我有病，山本就给身边日兵一个手势，日兵还没容那青年把话说完，冷不防抡起木棒，青年的头立即被打碎，血和脑浆窜了一地，我身上都溅了好多血点子。

河西的百姓都怕山本抓劳工。大辛庄的于佐躲劳工，逃出家门。山本不但下令封了于佐家门，还把于佐妻子小名叫娥子的抓起来。娥子被关在牢房里，山本亲自拷打，逼她交人。三天后，山本没有抓到于佐，就把娥子枪毙了。

河槽村李本文，出门走亲戚，恰在全村搞集合那天回家。日本兵抓住他后，说他通共产党，押在牢房，也不审问，一天就灌 32 壶凉水。一壶水少说也有 3 斤，百八十斤凉水灌进肚里，然后摧肚子，水从口中往外喷，象个水柱，有一、二尺高，几天人就不行了。

西田各庄的马久启，是卖绿豆芽儿菜的，必然得串村叫卖。被山本疑为共产党暗探，命令棍团用乱棍打死了。

三、李各庄惨案

张凤增：我家是李各庄老户。张金是我父亲，他老人家被山本杀死在大辛庄据点，埋在郭家墙西。父亲死时，我 9 岁，妹妹张凤春是父亲死后六个月生的，是暮生。父亲死时，母亲张永荣才 27 岁。一直守着我们哥俩，靠给人缝缝补补，总算活了过来。我父亲被抓的情景，当时虽说我年岁小，但永远也忘不了。王有才被抓走时，哭着让他妈给留煎饼，直到现在，一合眼那场面就出现在眼前。

王有才：我今年 63 岁了。山本到李各庄抓人那年，我 13 岁。我也是死里逃生。从根儿上说，那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正月三十，山本怀疑卸甲山村暗藏八路军，命令李各庄棍团全体青壮年到卸甲山，砍掉全村树木，拆掉各户院墙。李各庄棍团团长王景兰也是出于惧怕山本，表现特别积极。前些天，我哥哥贪玩，站岗迟到被他打了四十大棍。这次在卸甲山王景兰带头干得很认真。白天

干了一整天重活，人都乏了。夜间就由老少团替岗。张二友又叫傻柱儿和王金福二人是青年游动哨，负责查岗，不能替换。张元是老年班长，不该他的班，应该是王兆臣当班。夜间冷，王兆臣没有棉衣，张元好心眼替了岗，张金是替自己9岁的儿子张风增站岗。

这天夜里，在村北山口站岗的有12岁的田蔓头，13岁的唐二黑，张元、张金。王金福和傻柱儿查岗正好也查到村北。我和张凤祥的岗位在村东。王景兰对山本表现忠诚，村民们敢怒不敢言，为了挽救王景兰，不能在汉奸路上越走越远。这天夜间，八路军武工队从北山口进村，抓走了王景兰和伪保长田彩章。武工队进村时，先看住放哨的，抓人后又放了他们。山本怀疑当夜站岗的暗通八路军，就把他们总共16人全部抓了起来。

第二天，二月初一，太阳刚冒红，山本带着日军和警备队，气势汹汹地进了村。全村老少，从8岁到65岁共400余口，全部集中到村南头王家坟后边的空地中。四周架起机关枪，周围是端着刺刀的日兵和警备队。事先挖三个土坑，山本指着土坑对村民说："铁铳胡同，单间地干活?"李翻译解释说："谁暗通八路，快交出来。不然，把你们全部活埋!"就这样，一直围到太阳快落山，整整一天，没一个出来说话。最可怜的是那些吃奶的孩子们，他们渴着、饿着、冻着。妈妈们用奶头堵住他们的小嘴，不敢叫孩子们哭一声。山本发疯了，他给机枪手准备射击、日军和警备队后撤的手势后，从人群中拉出一个叫孙孝廉的，凶恶地吼道："一个不说，一个的活埋，统统的不说，统统的死啦!"孙孝廉眼看就要没命，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开始。就在这危急的关头，只听人群中一声高喊："放了孙孝廉，八路军进村我知道!"人们惊呆了，一看，是韩进学大步挺胸走出了人群。

韩进学40上下年纪，为人忠厚，主持公道。在本村里人人敬重。婆媳口角、儿女分家、婚丧嫁娶、买卖典当，总之乡亲家家离不开韩进学，有他在，天大的难事也能过去。今天韩进学一声高

喊，全村人的心都震颤了，妇女们不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山本阴冷地笑着问："你的私通八路？"韩进学不慌不忙地回答："不是。"山本又问："八路的来，为什么不报告？"韩进学也笑了一笑，回答说："太君，我是想报告，可是还没容我报告，八路抓了人就跑了。"山本一时无话可问，便让棍团每人打韩进学一木棒。并且下令，不打的和不用力打的不准归队，不准回家。山本十分险恶，这是在检验百姓到底听不听皇军的话。人们心里都清楚，不让回家的，最后都免不了一死。韩进学当然比大家看得更清楚。他十分冷静、沉着。便对乡亲作个揖，说道："乡亲们，别光心痛我一个人，这些吃奶的孩子多可怜啊！把木棒举起来，使劲打吧，明天就是二月二了，我多吃你们两张煎饼都有了。舍不得打我，咱们谁也甭想吃煎饼。"坚强的韩进学，可敬的韩进学，为了全村四百口人，献出了自己！乡亲们在韩进学面前，热泪横流，不得不举起木棒……

尽管人们加着十二分小心，只往腿和臀部打，三百多木棒打下去，即使木头人，也会散架的。不到一百棒，韩进学就倒下了。一直到太阳落山，山本下令埋了韩进学后，当场把站岗的16人全部抓回据点。我妈一直追着我，出村以后，我哭着告诉妈妈："给我留点煎饼！"

大辛庄据点只有一间牢房，里边原来还押着人。牢里挤不下，只把村北站岗的张元等六个人押在牢里，我们散押在二门外院里边。被抓的人中。司万山、王少仪家里富裕，送了礼，陆续的放了。老年班张凤祥、轮班是该他站岗。当夜他花半升玉米（0.70公斤）雇王永才替岗，押五天也放了。

押在牢里的6个人，罪受大了。牢里人多，挤不下，都站着。不给水、不给饭，连尿都接着喝了。我们在院里散押的，也不好受，也是不给饭不给水，夜间还冷。唯一自由的是可以在地上躺着、坐着。

李宽：牢房原来的窗户都拆掉了，用椽子竖钉着，门上窗口横

钉木棍。除了李各庄的6个人，先押在里边的，我知道的有西大桥的魏老，燕落寨村王瑞复，有十里堡村的罗连义、龚瑞福、罗慎言，河槽村的李本文，还有靳各寨一个姓刘的，辛相庄一个姓周的，大辛庄张坤原是给警备队伙房挑水的，因给牢房一个亲戚送个玉米面饼子，也押在里边，一共是30多人。

押在牢里的人有什么罪？中国人是亡国奴，任日本侵略者折腾罢了。都是中国人，怎忍心看着自己同胞渴着、饿着、冻着！我们三个做饭的，警备队站岗的，甚至给日本当翻译的李克勤，都背着日本人，设法帮助这些受难的骨肉兄弟。

张坤押起来后，我乘日军出发的机会，跑到他家。张坤家里还不知道，刚揭锅的玉米面饼子还没出锅，找家什都来不及，我顺手扯下他家门帘，兜上饼子就跑，送给张坤。

李各庄的司万山体弱怕冷，听他说家里有皮袄。我出不去，取不来，就托大辛庄情报组长崔凯。崔凯虽然当汉奸，可还是愿意帮忙。从李各庄把皮袄给取来，他又托李克勤，给了司万山。

押在牢里的人，喝不着水，吃不上饭。我们三个做饭的，想尽各种办法往牢里送水送吃的。我们把涮锅水故意往牢门口泼，让水从牢门流进屋里。警备队都是中国人，站岗的一咳嗽，暗示有日本人，我们就低头做活。没日本人时，我们就往牢里扔花生、扔萝卜。切萝卜时故意留根子，当垃圾扔在牢门口。有一次，日本人不在，我从锅里捞了一脸盆半生不熟的萝卜丝，还有剩锅巴，从门上窗口送进牢房。窗口木栏是横钉的，刚好能进脸盆。做饭的米汤，几乎天天能送进去。里边人多，送进的东西很少，但总比没有强些就是了。我们虽然千方百计瞒着日本人，但还是被发现了。

山本亲自过堂审问李各庄的张元、张金、王金福、傻柱儿、田蔓头和唐二黑。墙上靠了四把木梯，木梯下放四只能盛五担水的大水缸。把田蔓头、唐二黑两个孩子倒仰捆在木凳上，其它四个大人倒吊在梯子凳上，就像滑车，可以提起，可以放下。水缸里装半缸

水，放下时，人头淹在水中。先用木棒打，打一阵之后放绳，淹一阵子提上来，空出水后再打，再淹。第一天，张元的肋骨和胳膊就被打断了。这几个人肺都呛坏了，鼻子、口不断喷血。

田蔓头、唐二黑和李本文捆在凳子上，嘴上盖条毛巾，从毛巾上往嘴里灌水。据说是为了好灌，用毛巾遮着，喷水时也溅不到灌水的人。把肚子灌圆了，先是用手推肚子。后来再灌完时，日本兵就穿着牛皮靴，站在肚子上，水从口中往外喷，水柱把毛巾顶起一尺多高。除了灌水的，另外还有四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有的对着脑袋，有的对着胸口，有的对着肚，摆出随时刺杀的架势。

我起早做饭，把一个大萝卜顺手扔进牢房，田蔓头站在牢门口，他接到后先吃着了，喷水时吐出萝卜来。日本人追问萝卜来源。我怕连累那俩做饭的，便求警备队中队长陈庭相，编了个假话，说是洗萝卜时掉在地上一个，滚到牢门口，田蔓头拣到以后偷着吃了。给警备队做饭的赵永庄，给日本人做饭的王安也都帮助说是他们亲眼见的。晚上，我又回家设法买20斤鸡蛋，给李克勤送了礼。山本原说要打我40大棍，有李克勤说情，也没打。

李克勤给日本人当翻译，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他对山本的意图是了解的。为了救李各庄张元等六人，连着给李各庄捎信，说："你们有病，应该早治。"李克勤的意思是让李各庄赶紧给山本送礼，不敢明说。可是，那六个家里都很穷。张元是个光棍，靠打短工糊口。张金媳妇正在怀孕，儿子张凤增才9岁，没出正月，家里已经断了粮。其它几家，日子好过的也强不过张金，要他们送礼，就等于要他们的命。

张元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央求站岗的，求日本兵杀死自己，留兄弟张金一条命，回家养活孩子老婆。张金托司万山给自己老婆捎信，家里穷，孩子小，别守寡。司万山说："我要是能出去，借钱给你打点。"张金流着泪央求司万山说："您把我救出去。我也是残废了，背了债，干不了活了，他们娘几个的日子更没法过下去。"

第五天，也就是农历二月初六。山本召集河西32个村庄百姓开大会，就在郭家大院西墙外，把十二岁的唐二黑、十三岁的田蔓头、张元、张金、赵金福和张二友（傻柱儿）六人枪毙了。警备队执行，枪子儿都没打正。唐二黑还没有中弹。实际上，这六个人是活埋的。埋完后，天就黑了。我父亲扛着铣出去三、四次，想救活他们。日本兵一直不撤岗，谁也没救成。

王有才：张元他们被杀以后，我们不在村北站岗的随后就释放了。从正月三十晚上，直到二月初六天黑，我只喝过几回米汤，吃过一个萝卜根和几个带皮的花生。刚听说让我回家，呼的一下子眼前就是一片漆黑。醒来时，已经骑在驴身上了。我才12岁，想妈，叫不出声，连抬眼皮的劲都没有了。后来我才知道，提前释放的王少波，身体很弱。山本召集大会，又不得不来，毛驴是他的。到家后，躺在炕上，昏昏迷迷。想说话，张不开嘴；想哭，流不出眼泪。我妈借点小米，第一天灌米汤，第二天喂稀粥，一勺勺喂我。四、五天以后，我才能站起来。到了三月，青草芽发，该种地了，可是粮食种子都给我吃了。我哥被打四十大棒之后，屁股烂成两个坑，脓水不断。实在是没法混了，我父亲用柳条筐挑起我和哥，就逃荒到热河的围场去了。到农历九月份围场太冷，我们爷儿仨又返回李各庄。

李宽：西大桥的魏老和我连亲，是我托人保释的。送萝卜的事虽说搪塞过去了，可我一直提心吊胆。山本生性多疑，又十分凶恶。杀个中国人，就像踩死只蚂蚁，随随便便。我在“新民会”做饭的一年多时间，眼看着许多骨肉同胞，一个个惨死在山本手中，对日本侵略者我满腔仇恨。慢慢的我悟出一个道理：八路军打日本，日本恨八路军又怕八路军，只有投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打跑日本侵略者。所以，1944年春天过后，我离开“新民会”，参加了八路军，在十三军分区三连当了八路军战士。

后来听人说，李各庄惨案之后，河西32村联庄会，为了感谢我

们三个做饭的，凑一千银元，答谢我们，被情报组长崔凯私吞了。“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王安、赵永庄问过崔凯。崔凯承认后，把花剩下的钱交了出来。我知道以后，没让要，只是把崔凯足足的教训了一顿。全中国解放后，1964年搞“四清”运动，我已经退伍在家，我才提这件事，崔凯当场就吓瘫了。

补充一句话。王景兰、田彩章二人被武工队抓走不久，就放回来了。经过共产党教育，这二人觉悟了。王景兰后来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潜入驻密云的日本一四一八特务队，以特务身份，为八路军搜集情报。

王有才：日本侵略中国，残杀少年儿童，这笔血债，李各庄人牢记心头。全国解放后，翻身的农民演戏庆贺。孙孝廉堂弟孙孝先把李各庄惨案编成一段快板书，开头两句是：“田蔓头、唐二黑，十几岁的孩子认得谁……”才开个头，台下就哭成了一片。

日寇在冯家峪村的暴行

刘振声

1940年5月，八路军晋察冀步兵第十团开进密云县云蒙山区，在白马关、半城子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冯家峪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武装委员会、青救会和自卫军，担负起送信、带路、监视敌人、除奸反特任务。

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敌人非常恐惧。1940年9月，驻下营的日本鬼子，对冯家峪村搜查了一天，杀害了住在马家河滩的李来福、李二栓和他的祖母。在庄稼地里杀害了正在收秋的刘庆勇、刘庆海以及在山里放牛的丛起俊。抓走了我的父亲刘庆祝（昇平）和我的叔父刘庆伶（鹤亭）。

敌人把我的父亲和叔父抓到据点后，先是严刑拷打，灌凉水、烧肚皮，但他二人宁死也没有暴露出我根据地的组织和八路军的活动情况。

这年，腊月十五，八路军十团在南湾子伏击了由下营南撤的日本哲田中队，打死了骑马走在桥上的哲田和几十名鬼子。

这天晚上，密云县城的日本鬼子前来报复。烧毁了250多间房屋，还有粮食和物品。烧死了叶明发、刘德顺及其老伴三位老人。全村共40多户，除三户逃到山外，其余的为坚持抗日斗争，都在附近小村暂住。1941年，全村就有30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

1941年春，日寇在石佛、下营安了据点，纠集驻司营子的伪满洲队，对冯家峪及其周围村庄进行大扫荡，实行集家并村，逼迫冯家峪周围的老百姓都到冯家峪集中居住，把其余山沟统统划为无人

区，实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粮食牲畜就抢的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但村民们绝大多数仍然在山沟里搭窝棚、挖地窖居住，坚持抗日，誓死不离开这些小山沟。

1942 年 3 月，一天晚上，冯家峪村救国会主任丛蔚林带人往石洞子背盐，回来时天晚了，住在街东了。不料，次日天不亮，驻白马关的鬼子闻讯，包围了村子。日寇把全村百姓都圈到村中心的一个小场院，抓出了丛蔚林、刘庆彪、刘庆义、刘庆林四人，严刑拷打。敌人扒开丛蔚林的上衣，看见他肩上有梯架绊印，问他给八路军背什么了？丛蔚林至死不说。鬼子把碌碡抬到他肚子上，来回滚压，大小便都压挤出来。丛蔚林抱定必死的决心，至死不向敌人屈服，最后惨遭敌人杀害。丰滦密联合县政府追认丛蔚林为革命烈士，命名冯家峪村为“蔚林峪”和“抗日模范村”。

1942 年 4 月，日寇又抓住了武委会主任刘庆厚、自卫军指导员丛树起。这二人不但态度坚决，还大骂日本强盗。最后，刘庆厚被杀在野鸡膀沟，丛树起被杀在石佛。二人也被丰滦密联合县政府追认为烈士。

从 1942 年到 1945 年，冯家峪曾遭日寇抓捕的还有刘庆豹、李世绵、刘庆申、张森、刘庆稳、刘庆春、刘德海、刘庆书、刘振樊、周占岐、尹春泉、郭治孝、郭勤、郭会合、郭全秀、张景华和郑凤岐。这 17 个人中，除郭治孝一人投敌叛变外，其余 16 人在凶顽的敌人面前，都坚贞不屈，很有民族气节，最后都惨遭毒手。

郭治孝当时在村里曾当过民兵副中队长，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叛变以后，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村里立即实行坚壁清野，转移了所有的公粮、鞋袜等军用物资。日寇根据郭提供的情报曾到冯家峪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日寇在气极之下，在返回白马关的途中，于红桐峪湾结果了这个可耻叛徒的狗命。

五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但日寇的罪行却历历在目，它将永远留

在冯家峪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国耻，牢记血泪仇，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日寇血洗孟思郎峪

张桂新

孟思郎峪，是密云县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

1941年夏天，日本侵略军妄图把新开创的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变成他们的“治安区”，驻密云县石匣的日军铃木大队，派朱狩中队到长城线上的古堡西驼古村建立了据点。9月，八路军晋察冀步兵十团一举歼灭了该据点出扰之敌，击毙朱狩中队长以下官兵56人，活捉一人，日本兵溃不成军剩下几个，漏网逃走。其中有一个钻进了朱家峪东山，被朱家峪和孟思郎峪两村百姓发现，两村人民对日军的侵略行经，早已恨得咬牙切齿。因此，自发的组织起来，手持棍棒、镐把和铁锨，上山追剿。漏网的日本兵十分狡猾，疯狂开枪打死一名百姓之后，夺路逃回了西驼古据点。不久敌人重新调集重兵，对朱家峪、孟思郎峪这一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扫荡”。不到20天时间，孟思郎峪人民先后两次被抓、被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孟思郎峪惨案。

10月30日，日军进村“扫荡”，村民彭大真、文海江、文海山、文士荣四人被敌人抓住。在押解途中，彭大真机智逃脱，其余三人被押到下营据点，和周围村庄被抓来的33名百姓一起，惨遭杀害。

几天之后，日军纠集了下营、石佛、白马关和西驼古四个据点的兵力，对这一地区再次进行“梳篦式”的清剿。朱家峪村人民发现得早，迅速撤离了村庄。日军没有抓到老百姓，就放火烧毁了所有的房屋。孟思郎峪村，年轻力壮的人逃跑了，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没有来得及躲避，即被敌人堵住。村民王春荣一家11口，扶老携

幼的跑出村一里多路，被日军截住了，除两人趁混乱之机逃生外，其余9人被赶回村里。在村里，到处是杀气腾腾，无不嚎天动地，悲痛欲绝。人们互相劝说着，安慰着，关照着度过了这个悲愤交加的难眠之夜。大家发誓；把这血海深仇，深深地埋在心底，迟早要和日军清算这笔血债！

小小的孟思郎峪，全村共有71间房屋，已全部化为灰烬。共有10户人家，却有9户遭到血洗。村民彭大荣一家7口人，老伴、儿媳和两个孙子四人一块被杀害。一家只剩下父子三条光棍儿，是全村遭难户中幸存者最多的人家。王春荣祖孙三代11口，有9人同时丧生。文海陆兄弟俩8口之家，兄弟俩虽然脱险了，可是六旬老母、嫂子、侄子、闺女等六人均被杀害。彭大香、彭大魁、彭光品等4户，每户只剩下两口人。最惨的文氏家族有三户被杀绝。文士清老俩口年逾六旬，他们唯一的儿子文海山，十多天前被敌人杀害后，俩老人精神失常，痛不欲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情绪刚刚稳定，这对老夫妻杀子之仇未报，即惨遭杀害。文海江，十多天前在下营被杀害后，抛下了年迈的叔父、妻和4个女儿，这次全家6口横遭焚尸。文士英老俩口也被斩尽杀绝。敌人把这36名无辜群众围堵在一个场院里，用机枪扫射，并焚尸灭迹。其中有12位老人和11名儿童，年龄最小的彭大荣的孙子只有2岁。

日本鬼子走了之后，人们含恨咽泪掩埋了亲人的遗骨。幸存者人人带白孝，全村到处有哭声。然而孟思郎峪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在“无人区”积极生产，支援前线。敌人把瓦房给烧了，百姓们盖起草房。草房烧了，搭窝棚。窝棚烧了，住山洞。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孟思郎峪惨案简表

户主姓名	人口	被害人数	被害者与户主关系	幸存人数
彭大荣	7	4	老伴、儿媳和两个孙子	3
文海陆	8	6	母亲、嫂子和女儿、三个侄子	2
彭大香	6	4	老伴、儿子、儿媳和孙子	2
彭大魁	4	2	父子二人	2
彭光品	3	1	老伴	2
王春荣	11	9	老伴、孙子和外孙等	2
文海江	7	7	老伴、叔父、儿子，女儿等	绝门
文士英	2	2	夫妻俩	绝门
文士清	3	3	夫妻俩	绝门
备注	文海江和文士清之子文海山，是10日30月被抓至下营杀害的。此次全村被害者共36人。			



孟思郎峪惨案纪念碑

白马关惨案

杜长德

一九四一年秋的一天，日本鬼子到了白马关村，大部分群众没能来得及逃走，有十八名妇女还在场上打谷子，被鬼子包围了。日本鬼子在场的四周燃起大火，谁要从场里往外跑，日本鬼子就用刺刀往火里挑。有的妇女还抱着孩子，结果连大人带孩子都被活活烧死。有个妇女正怀孕，肚皮被烧裂开，小孩都露了出来。面对如此惨景，一切善良的人都会目不忍睹。而日本鬼子却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视为乐事。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已经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魔鬼和野兽。这次惨案，无辜的妇孺共被烧死十八人。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日寇加倍偿还。

小西天惨案

阎秉哲

小西天位于密云西北部，云蒙山东北侧的一个山洼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和冷风甸为一个行政村，化名燕山堡。西面紧靠滦平县（现为怀柔），只隔着一条大山梁。翻过梁便是滦平县后山铺敌人据点。这里层峦叠嶂，林木参天，沟壑纵横，陡壁悬崖，地势极为险要，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地方。一九四〇年六月，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后，就成为抗日根据地基本区之一。这个村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站岗送信、做鞋做袜、护理伤病员，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四一年冬季，日军将长城线以北广大地区，划为“无人区”，并广建“人圈”，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从此，小西天的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光，许多人惨遭杀害。但是，小西天的人民没有屈服，更至死不进“人圈”，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他们藏到深山沟树林内，搭草棚、住炭窑、蹲山洞，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

由于村民董春荣当了特务，向敌人告密，敌人才得知我小西天的群众躲藏进了山沟。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天刚刚发亮，后山铺的伪警察和棍团一百多人，在伪警察所长牛长（牛犊子）的带领下，由特务董春荣、刘九贵引路，从后山铺出发，踏着积雪悄悄钻进小西天西面的七道沟。这条沟，悬崖峭壁，树木丛杂，很少有人进入。小西天的群众认为这条沟很难出人，敌人不会从这里上来，所以麻痹大意未设岗哨监视，而敌人却攀藤而上，突然到达了小西天南边的南天门。躲藏在南天门的王庆德、王庆海、

王庆田、王庆堂和王庆顺等户来不及转移，便全部被敌人逮捕。接着敌人又到达小西天下沟，躲藏在这里的群众也未及转移，因此孙桂荣等男女老少被抓。三道沟的张连顺到小西天走亲戚，冷风甸的郭振友和郭振兴家的长工，二道涎人贾三到小西天挖土豆也同时被捕。敌人在小西天整整折腾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兵分两路，返回后山铺。一路走原路，另一路走旱道峪沟，途经旱道峪沟的敌人又在青峰山抓捕了从“人圈”里逃出来藏到这里的李生一家五口。

回到后山铺以后，敌人将男人关进了炮楼下面的地下室里，妇女和孩子关进了靠近炮楼的一栋房子内。两天两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被捕那天夜晚，除小孩之外，敌人对被捕群众一个个地进行审问，审问中又打又骂。特别是男人，敌人把他们吊起来拷打。然而，经过战争锻炼的小西天群众，在敌人的法西斯暴行面前，宁死不屈，抗日斗争情况只字未露。王庆田是我燕山堡村自卫军分队长，共产党员，经过他的手存放了不知多少粮食，尽管他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咬紧牙关，誓死不吐露情况，使敌人一无所得。曾经带领我游击队攻打过后山铺据点的李洪满、李洪祖兄弟俩，在审问中也坚决不讲出我军半点情况，当即被押送到琉璃庙杀害。小西天群众被抓去后，百姓叫伪甲长李洪春出面保释，但李洪春已暗中参加了敌人的特务组织，他不但不出保，反而讨好伪警察，强迫年青妇女李素华、邓芝兰等与伪警察结婚。这些妇女在敌人的淫威下只得假意应允，以后才借机逃出了虎口。

第三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大雾迷漫笼罩大地，后山铺的伪警察一个个手持上着刺刀的大枪，分成两路，押着小西天被捕群众向村外走去，男的用绳子捆绑着，妇女和孩子跟在后边，进入后山铺东南一里多路的偏僻山沟。这时，小西天被捕群众一看被押到这里，心想他们就要被枪杀，便一家一户的互相靠拢在一起，“要死，全家也死在一块。”然而，凶恶的敌人，用刺刀拨，用枪托砸，强

迫男女老少分开。孙桂荣的老伴觉得不妙，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女儿，用被子蒙上头。就在这时，架在南面山包上的机枪，哒！哒！哒！一阵扫射，闪电般的子弹射向了人群，小西天被捕群众纷纷倒卧在血泊之中。王庆海的老伴和两个儿子、王庆田夫妇、王庆道的儿子王瑞华、王庆堂的妻子、李生一家四口等全部被杀害。王庆海不满周岁的儿子，中弹未死，哇哇哭着，爬在妈妈的尸体上，被凶恶的敌人一刺刀挑开肚子，扔进坑里带着气埋了。李洪满的童养媳在逃跑的路上，踩响了敌人埋设的地雷也被炸死。这场屠杀前后死了二十八人。所以，小西天惨案又称为“二八惨案”。在枪杀中，有些伪警察目睹敌人的残暴，特别是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残杀，非常不满。在执行命令过程中不那么坚决，因此，有些未被捆绑的妇女、儿童得以乘机逃进了山沟密林，才幸免于难。计有李洪兰及女儿王桂云、王桂芬，任宗兰和儿子李福华，王金华及女儿王桂春，孙桂荣的大女儿孙淑云，以及邓芝兰等。另外，还有王荣华、孙秀珍、李振江三个孩子，由于年幼体小，在大人的尸体掩护下，未被打死，事后被人们抱走抚养，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家里人找回。

“小西天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我县人民的一个铁证。为了控诉敌人的暴行，纪念被杀害的群众，抗日群众编写了一首《小西天惨案歌》在群众中传唱。歌词是：

咱们丰滦密，抗战四、五年，巩固地区靠大山。

提起大山山连山，惨案出在小西天。

十一月二十七日被敌围，围到后山铺，牛狼问一番。

牛狼把话发，电话报给他洋爸爸。

他洋爸爸把他夸，坚决第一属着他，围来犯人你办他。

我们百姓下决心，找个甲长李洪春。

李洪春不是人，不但不保提婚姻。

我们妇女贞节心，就让死了也不跟。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了胜利。残

害我抗日群众的汉奸、特务董春荣、刘九贵和李洪春相继为我镇压，小西天惨案的首犯伪警察所长牛长（牛犊子）逃回东北吉林老家，隐姓埋名，在镇反中也被查出枪毙了，从而为死难者报了仇、雪了恨。

下营惨案

王敬魁

1942年9月初，驻密云县西驼古村的日本关东军朱狩中队的一名日军，从朱家峪村回营房，途经朱家峪沟门时，商成和老李两名抗日群众躲在树丛里，同时搬起山石，砸向这个日军，因没有砸准，日军开枪打在商成肩上。当这名日军经下营村南熊峪沟时，下营村出来20多名抗日群众，手持铣镐和棍棒追赶，吓得这名日本兵没敢进下营村，绕山道逃回营房，向中队长朱狩汇报说："下营那边的老百姓统统地是八路。"

次日，由这名日军带路，一个日军小队到下营村，抓走五名老百姓。这天夜里，李守喜、郭世恩、李守福、李廷福被日军杀害。对耳聋的李守俊看守不严，他趁天黑逃回了村。

下营是古长城上的一个隘口。9月8日，200名日军和10多名宪兵队住进下营村，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日军在城门站岗放哨，老百姓出入城门要向日军士兵鞠躬施礼。日军在下营城里无恶不作。

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一日），日军对朱家峪、孟思郎峪、西白莲峪、罗圈厂、石湖根等村进行"扫荡"。抓来33名群众，押到下营村彭子祥家院内，饿了一天。第二天，日寇在正房和东厢房分头过堂审问。在正房被审问的群众有商青山、李启祥、李大祥的父亲等人。商连宝、李其祥、郑风山等在东厢房被审问。日本鬼子坐在炕里十分得意，翻译石川青，高丽人，坐在炕沿狐假虎威，被审群众由两名宪兵架着，对每个群众都审问一个多钟头。敌人吼道："你当村长没有？是不是分队长？是八路不？……"问一句，用细

棍打一下脑袋，有的人脑袋肿起大包，有的满脸是血，大家都是宁死不说。敌人没有办法，把被抓群众都押到了西厢房。

到太阳落山时，日军将33名群众的眼睛用手巾或旧衣服撕成的布条蒙住，倒背手捆着，用一根大绳子把他们链在一起，押到下营北城豁子的真武庙边，在事先挖好的大坑沿上跪下。日军刽子手杀人取乐，有的从后脖胫砍头，有的从左边砍，有的从右边砍，有的从喉咙处砍。砍下头颅后，日寇将尸体踹进坑里，把人头踢进坑里。还有的只抹了半个脖胫，不等人断气，就踹进坑里。在剩下七、八个人时，罗圈厂的郑风山弄开了绳子，迅速取下蒙在眼睛上的布条，从人缝蹿出，朝山沟跑去，敌人怕打着自己人，也没开枪。这一次被杀害32名群众。

之后，不到十天，日军又将两次“扫荡”中捕到的49名群众带到下营村集体杀害。在原来“万人坑”的西北不远处又添了一个“万人坑”。

日寇几次“扫荡”之后，下营的70户人家只剩30户，幸存者逃到深山密林的大全头、牛栏峪等地的山洞里居住，靠吃树叶和野菜过活。“万人坑”里的尸体，只有少数被家人认走埋葬。认领时有的找到头找不到尸身，有的找到尸身找不到脑袋。多数的尸体没有人深埋，腐烂后恶臭难闻，任凭饿狼和野狗撕咬。野狗把人骨头和脑袋叼到下营城里，好端端的一个下营城，被日寇搞得满街是骨头棒子、人脑袋和破烂衣裳。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鬼子在下营村前后四次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无辜群众85人。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血债，下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日寇在东驼古一带烧杀抢掠罪行实录

曹荣贵

从1941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就把半城子西北的史庄子、邵庄子、古石峪、阳坡地、栗树园、东沟和西驼古等方圆40多华里的地方划为“无人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这里是平北抗日根据地丰滦密联合县的一部分，日本鬼子把这一带地区的抗日军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1940年以后，就不断对这一地区进行大扫荡。扫荡最严重的是东沟。因为东沟地处长城以外，当时属于伪满洲国地区，日本鬼子早就想把东沟的人全赶到“部落”即“人圈”里去。可是东沟的人民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敌人就放火烧毁了他们的全部房屋，硬逼着他们搬家。但这也没有得逞。1941年10月27日，又接着扫荡西驼古，把房子几乎都给烧光了。但是，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坚决地斗争。房子烧了，就搭窝棚。窝棚烧了再搭。这样，有的村在一年当中被连烧两次，最多的烧过7次。从1940年到1945年，哪年也没断烧房子，连猪圈也给烧塌，石磨也给烧坏，让老百姓回来后根本无法再生活（那时人们都临时躲到深山沟隐蔽起来了）。有时日本鬼子夜里来，人们来不及都跑掉，有的就被捉住了。捉到后，逼着他们烧自家和全村的房，不烧就用刺刀挑死。老百姓被糟蹋得经常躲在深山沟里，有时十来天不敢回家。夜里看着星星睡觉。遇到连阴天，上面淋着雨，屁股坐在水坑上，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妇女和小孩？人们终日躲在山沟里，吃饭也成了问题，有时几天几夜见不到粮食，只好喝点泉眼水，拿水充饥。

日本鬼子最恨这里的老百姓，说他们个个通“八路”，所以每

到一处，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即所谓“杀光”。

1942 年 9 月 17 日，山外没来得及把信送到古石峪，日本鬼子就进村了。结果村里人只跑出去一半，另一半都给堵在村里。敌人在村里整整闹腾了一天。晚上人们回来时，见房子都给烧了，到处都是鬼子留下的大皮靴印。郑福全见到村里地上有一双倒扣着的鞋，以为是谁家的呢，结果翻过来一看，却露出了两只脚。原来是日本鬼子进村后，把郑三小倒着给活埋了。

那天，日本鬼子把古石峪邻村的人刘福好、刘福顺、刘福海等一共有十几口，都给烧死了。日本鬼子走了，人们回村了。大人小孩一天没吃东西，肚子饿得慌，进门先做饭。可是饭还没做好，鬼子又来了，只好撂下饭再跑。如此周而复始，日子实在难挨。这时，有条件的人家就把老人、妇女和小孩临时安置到外地，青年、壮年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

1942 年 9 月，在古石峪战斗中，日本鬼子死了一个军官和一个翻译。战后，日本鬼子来找这两个尸体的下落。同时，他们也知道，这次战斗肯定也有八路军的伤员。他们就到处搜查。在西驼古村，他们找到了周承山，问他“太君”和翻译的尸体在哪里？八路军的伤员在哪里？周说：“不知道。”日本鬼子就把点着的干草放在周的怀里，一边烧，一边问，当周再说不知道时，一刺刀就扎进他的胸膛。还有一个姓李的外地人，来这里找他的姐姐，没想到一进村就被鬼子抓住，问他这儿有没有八路军，他怎么会知道。当他答说不知道时，也被鬼子当场扎死了。

另一次，日本鬼子抓走了栗树园郑銮宽等三人，硬叫他们带路去找八路军的伤员。他们不去，日本鬼子就用刺刀逼着他们去。当走到一里多远的地方，再往前走，就是藏伤员的山洞了，他们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就站住谁也不往前走了，并说这儿没有八路军伤员，也不知道八路军伤员藏在哪儿。不走就揍，打得三个人死去活来，最后用大石头把他们压在山坡上。结果，他们三个人

中，除中间一个人因能透点气没压死外，其它两人均被大石头给压死了。

古石峪战斗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又到了阳坡地。人们紧跑慢跑，还是让鬼子逮住了20几个人。鬼子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问八路军的伤员藏在哪儿？把日本“太君”和翻译官的尸体埋哪了？结果没有一个人说话，鬼子就动手打人。彭大恩、夏文元和一个姓杨的被鬼子从人群里揪出来，先是毒打，后又用柴禾把他们围起来烧，直到活活烧死。鬼子想用这种方法吓唬大家，可是大家还是不说话。鬼子就上前把一个姓张的妇女衣服扒得精光，逼问她“太君”埋到哪了？她始终没说一句话。鬼子又把其余10几个人的棉裤剥下，反绑在头上，十冬腊月，让大家光着屁股站了一夜，冻得人人直打哆嗦，险些被冻死。

1942年旧历八月初七，头甸子战斗后，日本鬼子返回来找死尸，在二道沟烧死了20多个老百姓。王朝满一家4口躲在一个山洞里，日本鬼子找不着人，就让特务高喊：日本人走了，乡亲们回家吧！王朝满一家信以为真，刚出洞口，就被鬼子全给挑死了。

日本鬼子每到一处，除了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外，还有一个毒招，就是片青苗。从1942年到1944年，这里的青苗就大片过三次。每次都是日本鬼子端着刺刀，逼着老百姓自己去片。有时也让伪满洲队、伪警察或从口外抓来的老百姓去片。时值六、七月间，眼看着就要到手的粮食，让鬼子给片个精光，人们都恨得咬牙切齿，都盼着八路军快点来，再狠狠的揍揍他们。

日军在雾灵山区制造无人区的罪行

齐显富

集家并村是日本伪满制造无人区的主要手段。他们企图以此来隔绝人民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达到其彻底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敌人驱赶群众迁家移村并入指定的村庄，在四周修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四角建炮楼，驻上军警特务。这种用高墙和炮楼围起来的村庄，敌人称之为“部落”。人民一旦被圈进“部落”，即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的自由。人们象会说话的牛羊一样，任敌役使和宰割。因此无人区的群众把“部落”称之为“人圈”。1942 年 3 月，“部落”建成了。无人区的群众在两月内全部被赶进了“人圈”，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

一是生活无着落。据承兴密联合县政府统计，密云邻县兴隆县原有 2000 多个自然村，被指定集家“部落”199 个，约十个自然村并成一个“部落”村。人所共知，山区的特点是山高路远，地广人稀，十几个自然村迤逦距离几十里远，生产及生活十分蹩扭。如：坡头村，大南峪村，大沟村，雾灵山村，每个自然村都是十几里长沟，每个村都由小自然村组成一个大村，这四个村被日本指定到大沟村口修一个“部落”，都相距几十里，怎能回原住地耕种呢？何况划为无人区就不许有人迹存在。在集家过程中，群众住房被烧得片瓦无存，粮食衣物被抢夺一空。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圈”周边允许耕种的地是极少的，即使租得一点地，糊口也十分艰难。

二是非人居住的环境。“人圈”四周是一丈五尺左右高的围墙，墙顶上插满枣树刺枝。围墙四面和大门顶上设有碉堡。还设有站台

马道。并把群众 18 – 35 岁的人组织成自卫团日夜守望着。碉堡和大门由伪军把守。稍有风吹草动就几天不开门。在人圈内的一般人家必须门户开放。勒令夜不闭户以便日伪警特人员横行无阻地去奸淫掠夺。

“人圈”内划定范围由各户自己建房。一般为长宽各三丈，也有二丈的。山里赶来的老百姓无依无靠，糊口都难维持，哪有力量建房呢？大多数是搭个马架子窝铺，对付着住下去。冬天满屋飞雪，夏天污水粪便横流。苍蝇、蚊子、臭虫、蟑螂等肆虐无阻，鼠疫、伤寒、霍乱，痢疾流行。1943 年夏季，仅大沟这个部落一次就死了 40 多人。真是家家陈尸，户户嚎啕。死了人没人往外抬，要臭在屋里，因为健康人太少了。

三是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敌人对“人圈”里的群众进行经济掠夺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什么都要什么也不给”。“人圈”内实行的是伪满洲国的组合配给制。群众一年的农副产品全部交给组合。他分配你什么就是什么，分给你多少就是多少。另外收税更是五花八门；同时还要献储金、钢铁、皮毛、鸡蛋、菜等，群众早已被榨干了血水。仅大沟口这个“部落”一并村时有 300 只羊，后来只剩 11 只了。可还征 300 只羊的税。群众劳动所获被全部搜刮干净，只能靠配给物资过活。配给粮食叫共合面，是豆饼、橡子面和霉烂的粮食混合磨制成的。群众私藏点粮食搜出来就当成“经济犯”以通敌论罪，要受尽折磨的。

规定每年每人配给十尺布，发到群众手里就剩三、五尺了。都被官吏和伪警特人员层层尅扣去了。“人圈”里的群众出来种地身上披着破布块和麻袋片，也有的破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有的女人在家两人轮流穿一条裤子，这类事凡是在无人区工作过的人都看到过的，一句话，在敌人“部落”里的老百姓被剥夺了一切自由。

四是恶毒的大捡举。日本对“人圈”中的群众更是象猪羊一般

地任意宰割，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泄密犯、通匪犯等数不清的罪名，可以加在任何人的头上。搜出几个信封就被加上“通匪犯”；念四书就加上“思想犯”；与人谈话，说自己是中国人，就给扣上反满抗日分子。侵略者兽性一发作可以任意宰割中国人。连年累月一次又一次的大捡举，大搜捕，每次都有不少群众被逮捕和屠杀。每年不知要抓多少劳工，大批青壮年被抓走，有的发配到北满或日本去服苦役，也有的被秘密送到细菌研究所或武器试验场当试验品。在大检举中集体屠杀的血案更是不胜枚举。就以大沟这个“部落”来说，在并村进“人圈”时 195 户 975 口人。几年后到日本投降只有 130 户，872 人，在几年过程中死于各种原因的共 103 人。日本制造无人区就是企图使我们种族灭绝。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企图封锁住我军挺进东北的通道，妄图摧毁我冀热辽抗日力量。可是冀热辽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站稳了脚跟，粉碎了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恶毒阴谋。

东庄禾惨案

张桂新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长城内外制造“无人区”，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3月开始，又在密云县潮河以东地区，增加10余处据点，屯兵防守。敌人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和抗日力量，除了进行有目的的长途奔袭之外，又实行“分区扫荡”，屠杀无辜，制造多起血案。其中“八·二二”血洗东庄禾，在潮河以东地区为最甚。

东庄禾村，位于密云县城东北50公里，是长城脚下安达木河北岸的一个山庄。它与西南2.5公里处的令公村隔河相望。抗日战争时期，安达木河川是平西、冀东两大抗日根据地往来的交通要道，两岸村庄常驻有八路军。1942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一）冀东八路军十三团五连住在令公村，两名侦察员奉命到东庄禾村观察敌情。承兴密联合县区干部艾久正在村里召开群众会，布置征收公粮、筹备军鞋等工作。因未发现异常情况，当晚三人同宿东庄禾村。不料这一情况被日本古北口据点的密探郭勋发现。郭勋系古北口人，以亲戚关系为掩护，长期隐蔽在该村，一直未被乡亲们发现。由于他的告密，正当全村百姓熟睡之时，密云和古北口两股敌人一齐奔袭而来。

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拂晓，200余名古北口据点的关东军，抢先爬上北梁尖，开始向村里胡乱开枪、打炮。两名侦察员发现敌情，迅速从南边撤离回队报告。百姓们听到突如其来的枪炮声，不知所措。除少数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出村躲避外，大部分被吓得不敢出门，纷纷在各自家中寻找安全地方藏身，村里一片寂静。枪炮声停了，日军见村里仍没有武装抵抗，便蜂拥进村，挨户搜查。村民王

顺，头天给儿子结婚办喜事，借了乡邻的饭碗。枪炮声过后，他赶忙去送还，走在大胡同正巧碰见敌人。王顺急步直奔大东院，还未见到碗的主人，即被拦住。日军指着他手中的一箩碗哇啦哇啦地吼叫起来，王顺不知道啥意思，死死抱着碗左右躲闪。日军一阵狂笑，举起洋刀直朝他的脖子上砍去。眨眼间，60 岁的王顺人头滚落，身首分离，第一个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村民王殿清、王殿策、王殿财、王崇正、王宗田先后被日军从家里搜出来，又被驱赶到大东院。日军端着刺刀，逼着他们脱光上衣，立正站着。然后对准胸膛一一进行杀害。凶狠残暴的日军，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先是凶猛地吼叫一声，随着敌人“嘿！“”嘿”的吼叫，王殿清、王殿策、王殿财、王崇正四个人应声倒在血泊之中。21 岁的青年王宗田不甘心老老实实地等着挨挑。当寒光闪亮的刺刀戳向胸膛时，他猛地把身子一转，胸腹被保住了，刺刀戳在后背上，疼得他就地翻滚起来。凶残的鬼子见他未死，连吼带叫地在他身上，一连“噗哧，噗哧”地刺了 7 刀，直到他不再翻滚时，才狂呼乱叫地离去。小小的东大院血淋淋的倒下 6 个人！

在 6 名村民惨遭杀害的同时，另一股日军正在大街上血雨腥风，70 余名村民的生命危在旦夕。村民王殿耕、刘殿玉均 30 多岁，起五更到地里割谷子，听到枪炮声就在坝台下藏起来，被第一批抓到村里。区干部艾久躲到菜地里，青年王崇云钻到草棚里都先后被抓住。敌人把从四面八方抓到的 70 余名村民，全部驱赶到村中心的大街上包围起来。又强迫民伕挑来一担凉水，随后开始逐个审问。先是日军的头目嘀啦哆啰地说了一通，一个姓金的翻译官跟着翻译说：“太君说了，八路军哪去了，你们谁家藏着八路军？赶快交出来，实话说了，保大伙平安无事，放你们回家，要不说实话，就把大伙全杀了！”老少爷们儿互相观望着，无一人答话。这是日军第一次围攻百姓，善良的村民毫无经验，很多人对嗜血成性的敌人还抱有幻想，甚至跪地求饶，乞求他们能发慈悲。顺义县杨各庄三个

来村做生意的汉子，苦苦哀求，又掏出“良民证”递给翻译官，期待它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不料被日军头目一把扔掉了。他抽出战刀凶恶地吼叫一声“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在场的村民全部惊呆了。三个生意人被剥光上衣，由于腰间围着大兜肚钱包，第一刀未能刺进，惨无人道的日军，在他们身上连刺数刀。三个外地人当即客死他乡，其状目不忍睹。日军把沾满鲜血的刺刀，在水桶里涮过之后，又在人群中搜寻屠杀的目标。人们互相拥挤着，躲藏着，惶恐万状。日军把凶光集中到壮年王殿印的身上。王殿印被拉出人群，他是个直性人，毫不畏惧地说：“我是民兵班长，专管派人站岗、放哨，监视日军。”话音未落即被踢倒在地。他见势不妙，站起身来猛力拨开刺刀，转身逃跑，不料被另一个日本兵从背后刺中。王殿印的七旬老父王朝瑟，见亲生骨肉惨遭杀害，不顾死活地扑上去，想救出儿子。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又将屠刀刺向老人。刀进人倒，老人双手捂着翻裂的肚皮和流露出的脏腑惨叫着，令人撕心裂肺。霎时间，父子俩人同时丧生。青年刘殿玉被日军抓走了，其父四处奔走，借钱、托人，当他带着大把钞票来救儿子时，刚年满 20 岁的儿子也被活活挑死。八个遇害者的尸体横七竖八的浸泡在鲜血中。日军把魔掌伸向第九个人——王崇云。他年仅 18 岁，日军使劲地往外拉，他拼命地往人群里缩，就在拉锯之时，他急中生智，掏出了“良民证”。当日本兵仍端起刺刀准备猛刺时，南山上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是八路军在南山口和密云县城来的敌人进行激战。村中的日军不明真象，立刻慌乱起来，王崇云和其他村民才幸免遇害。日军为消赃灭迹，强迫村民把八名被害者的尸体，抬进路北陈秉森的院内，进行焚尸。因枪声吃紧，未及点火，即仓惶撤离。激战中日军头目岗村在南河套被击毙。

八月二十二日，是东庄禾历史上难忘的一天。这个仅有六、七十户的山村，共有 14 人惨遭杀害。除王宗田被扎 7 刀，大难幸存外，王殿清等 13 人（其中 3 名外乡人）全部丧生。王殿策、王殿

耕、王崇正三户，从此断绝香火，后继无人。区干部艾久和村民王立岩被日军逮走，生死未归。然而，东庄禾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亲人的尸体，把这国恨家仇牢记在心，更加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八路军一起抗击侵略者。1943 年，敌人设在东庄禾地区的情报网被破获，密探郭勋和同案犯特务徐大勇被政府镇压，为东庄禾惨案的遇害者报仇雪恨。

附：东庄禾惨案幸存者王崇云的回忆

我十八岁那年，阴历八月二十一日，有八路军十三团的两个侦察员在庄里住着，十三团正住在令公。这天区里的艾久也在庄上召开群众大会，说是给八路军征收公粮，还要鞋和袜子。这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没走，住下了。第二天是八月二十二日，起早收秋的人走了，大部分老百姓还没下地。天亮的时候，我看见北梁尖上上来好多人，穿着黄衣服，有 200 多个。不大功夫，他们往庄里打炮，枪也咯咯地响成了一片。人们都说是日军。一会儿枪不响了，山上的日军四下散开了，往庄里走来。我怕从前门出不去，想从后门往外跑，结果日军从后门进来了，我就钻进草棚子迷下了，街坊四邻都藏起来了。日军端着刺刀挨户搜查，把我从草棚子里搜出来。我村还有好多人都被赶到大街上，有 70 多口子。日军叫王进友挑来一挑水，大伙都愣了，不知道要干啥。有个姓金的翻译说是开会。然后由一个日军头目哆哩哆的说了一遍，老百姓谁也听不懂，那个姓金的人替他翻译说："太君问，八路军哪去了，在谁家藏着，快说出来，你们谁是八路军，快点说实话，说了就没大家的事了，保大伙平安，要是知道不说，就把你们全杀了！"老百姓没经验，全都害怕，都跪在地上央求饶命。日军站在人群外边挨个瞧着，瞧谁不顺眼，就往外拉。顺义杨各庄的三个做买卖的，是叔叔和侄子。他们三个掏出来"良民证"，一个劲儿地央告。日军头目哩勒哇啦地叫喊着："统统的死了死了的。"让手下人先把三个买卖人挑死了。日军随后又要拉人，大伙更慌了，日军在南边拉人，大伙往北边跑，北边拉人往南边跑，来回的躲藏，到底把王殿印拉出来了。这小子心眼儿直，一问他就承认了说："我是民兵队长，专管派人站岗、放哨，监视鬼子的。"日军上去就是一脚，把他踢倒了，随后就挑。他爹 70 多岁了，也在人群里挤着。一看急了，扑上去救他，

也被一刀挑死了。爷俩个一块死了。刘殿玉起早割谷，王殿山、王殿耕都被抓回来挑死了。日军挑人的时候，都剥光了上身，让你站直了立正，他好挑呀。在大街上挑死了八个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害怕使劲儿往人群里扎，日军使劲儿地往外拽，我们俩个拉开锯了。我想有“良民证”是好人呀，我掏出来让他瞧，他摇头，我想完了。边上的日本兵端着刺刀，正冲我来下手了。我心说这回没命了。那叫巧，算我命大，南山上枪响了。后来才知道是住在令公的八路军和密云来的日军打起来了。要不然我就死了，70多口全部完了。枪响之后人群更乱了。日军又冲我来了，我把眼一合，心想，这回可是真的完了。只觉得刺刀在身上冰凉的，可怎么不疼呢？我睁眼一看，原来日军也害怕了，他顾不得涮刀了，正在把刺刀上的血往我身上蹭呢。随后他又叫我和几个老百姓，把挑死的八个人抬到道北陈秉森的院子里。王宗田当时没有死，还有点气，会说话。我一抬他说：“你慢点吧，轻一点吧，我疼呀！”他一个劲儿的哼哼。鬼子让我们把死人抬进去之后，村外的枪声一个劲儿地响。一会儿街上的日军就吹哨集合了。日军跑步到了南河套，他们黄亮亮的站了一大片。敌人走了，王宗田挨了7刀，没有死，活到70多岁，前年得了癌症死了。（张桂新整理）

日寇在我村的一次暴行

田郁金

我的故乡银冶岭是个山青水秀的小山村，我无限地热爱她。这里不但气侯宜人，而且盛产红果，有“红果之乡”的美称。每当“山里红”成熟的时侯，在片片的绿叶丛中，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果，像红玛脑红艳艳的闪亮，像用珍珠给他镶了个边，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家园。

这里的山美，这里的人更美。淳朴勤劳的乡亲们，祖祖辈辈在这小山村里繁衍生息。大山养育了乡亲，乡亲们用汗水抚育了山林。他们默默地耕耘着，任劳任怨地劳作着，可是灾难并不因此而不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日本侵华，华北沦亡，战火也烧到了这个小山村。和平宁静的生活一下被打碎了，因此激起了乡亲们对日寇的反抗，对卖国贼的仇恨，乡亲们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武委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组织纷纷成立，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有站岗放哨，监视敌人动向的；有做军鞋送给八路军支援抗战的；有给八路军送信的；有保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军民团结抗日，亲如一家。

有次日本偷袭来了，包围了村子，把乡亲们围在一个台子下边，让大家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可乡亲们面对凶恶的敌人，谁也不说话。恼羞成怒的敌人，便让大家脱掉棉袄，往身上泼凉水。几十桶水泼在光背的人身上，冻得人们哆哆打颤，就是无人吭声。随后，敌人又把乡亲们轰进一个大屋子里，窗台架上机枪，逼迫乡亲们说出谁是八路的干部，谁是共产党？仍是无人吭声。敌人气急败坏了，就从屋里拉出几个人放在火堆中烧。衣服烧着了，

身上冒油了，还是没有人开口。敌人开枪了，被拉出来的人有人倒了，鲜血洒在大地上，溶入泥土中。这是血的教训。经过这次磨难，乡亲们更加坚定了抗日斗争的信念。以后敌人来了，就利用山作掩护和敌人捉迷藏：敌来我走；敌走我再回来生产，打下粮食立刻坚壁清野，让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找不着，什么也得不到。就这样和敌人周旋了七、八年，斗争是多么惨酷啊！有位叫杨宗辉的，被敌人逮住后，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什么也不说，最后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后来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就是这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农民，显示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农民谱写着雄伟悲壮的历史新篇章。这里的山是雄伟的，高昂的。它溶化着烈士的鲜血，掩埋着烈士的忠骨。我将永远无限地热爱着她。

日寇投降后的再一次施暴

刁克保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正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欢欣鼓舞之际，一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却突然降到不管峪村平民的头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日本投降后，要把一头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骡子卖掉。这头骡子被暂住在不管峪村段连春家的段连江等几个人买去，钱尚未交齐。

阴历七月底，盘踞在石匣镇尚未缴械的日军头目杜边派两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陈英）到不管峪村找段连江讨债。三个人全副武装路过下金山，打听了路径就朝不管峪走来。一进村，碰见刁文启的夫人刘氏，问村内有没有八路军？刘氏回答“没有”。几个人就朝村内走去。

一个时辰过去了，段连江没找到，两山却响起了枪声。一个日本鬼子从村后石梯子逃走，由于慌不择路，误入东田各庄村西，被东田各庄民兵逮住，送往朱家湾区政府。另一个日本鬼子和陈英想从原路出村，早被民兵中队长刁玉华等堵住村口，说：“陈英，你跑不了了，把枪交了，我保你安全。”陈英不得已，只好同另一个日本鬼子都把枪交了。这两个坏蛋也被押往区政府。

原来文启老夫人回答陈英的话是实情。那么枪声和民兵是怎么回事呢？那是陈英三人离开下金山朝不管峪走去后，下金山人火速跑到东田各庄去报告，东田各庄即刻组织十几个民兵，飞跑到不管

峪，与不管峪民兵一起抓了山头，堵了道口。

不知朱家湾人怎么看守的，被押的三个俘虏全在夜间逃回石匣。

第二天（农历八月初一）9时许，人们照常忙秋。刁克信正在清河沿忙碌时，猛一抬头，突然发现在过潮河的道上，有100多日本鬼子正在过河。已经过河的分成两股向不管峪方向包抄过来。刁克信一看，不得了，扔掉工具，拔腿就朝村子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大家快跑啊！100多鬼子包围咱村来啦！"正在田里做活的人，听到喊声也都扔掉工具，跟着边跑边喊。跑得快的不见了踪影，动作迟了就成了鬼子的俘虏。

山上站岗的听到了喊声，也看到了北河套遍地是鬼子，像篦头发似的向我村包围过来。立刻破着嗓子喊："老乡们，快跑啊！鬼子到清河北了。"村内百姓像炸了锅一样，男人赶牲口，女人抱着孩子，我和孩子们也夹在当中，像潮水一样向后沟拥去。

说时迟、那时快，日本鬼子已经进了村子，封锁了各个道口。没跑掉的女人和孩子都躲在南坑子的一户人家里。幸亏鬼子没有到这家来，大家才幸免于难。刁文启夫人当街被认出后，一枪打倒，子弹穿入咽喉，当场毙命。文启长儿媳趁鬼子不注意抱着儿子跳过墙头，从山根小路逃出村外，在过河时不幸被河水冲倒。大人被住在附近的周喜捞出后得救，孩子却被河水冲走淹死。上庄子人佟启泰在王宽林家打短工，同王宽林一起被鬼子圈到大庙后。佟启泰吃了鬼子一刺刀，倒在血泊中（后经抢救未死）。王宽林挨了两刺刀后，两手托着流出的肠子，向清水河踉跄跑去，鬼子追上来又补了一枪，也倒在河里死去。

刁永刚同他十岁的儿子刁连兴（小名石桩子）正在河北干活。儿子说："咱跑吧！"爸爸说："咱不惹人家怕什么？"他父子爷俩由于不跑也没逃过这一劫，双双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刁福田赶驴往回驮庄稼，刚到家就被鬼子抓住，拉到庙后，死在鬼子刺刀下。同一

天遇害的还有刁连江。

刁克明在河北干活，被鬼子捉住，拉到庙后头。鬼子对他要下毒手了，先命他跪下。克明想，跪下好让你扎个老实的，我绝不能跪！鬼子不耐烦了，对着他肚子就是一刺刀，克明稍稍一偏，顺势倒地，合上双眼一动不动。鬼子走后，他被家人抬回救活。

这场惨案，我不管峪村，共死了七人，伤两人，这笔血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日寇在密云的暴行及民众斗争

杨春青　王敬魁

1933年夏初，日寇侵占了密云县城，下面记述几件实事。

糟蹋民众财物

日本军队侵占密云县城以后，任意糟蹋老百姓的粮食和生产生活用具。日军的骑兵，每住一地都是把马拴在老百姓的粮仓旁。日军用刺刀挑开装粮食的踅子，任军马在粮食堆上拉粪、尿尿，糟蹋的粮食无法计算。

日军把所住各户的水缸，在靠近下半部凿一个茶碗口大的孔洞，再用布或毛巾堵上，装多半缸水，当作日本兵洗澡之用。日本鬼子所到之处损坏大缸、二缸无数。

日军出县城，任意糟蹋老百姓的庄稼。有时日本兵骑着马在庄稼地里乱蹿取乐。日本侵略者发现密云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便公开掠夺，强行开采沙厂钨矿、墙子路钨矿，还有金矿、银矿。

日寇在密云境内修公路，强占人民耕地，拆毁民房，致使当地老百姓无家可归。如修通（州）古（北口）路，就拆毁民房千余间。

痛打日本哨兵

日本兵在密云县城各城门布有岗哨，哨兵手持三八大盖步枪，上着刺刀。中国人进出城门，开始是随便鞠个躬就能过去，以后要求姿式越来越严，必须面对鬼子兵，站在三步以内，脱帽鞠九十度躬。稍有怠慢，轻者拳打脚踢，用枪托子蹾，重者用刺刀刺伤或挑

死，东西南三门都发生过日军刺死过往行人的惨案。

日军未进密云县以前，驻县城的中国军队东北军 107 师，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常对密云人讲家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密云人听了对日寇恨之入骨。日寇占领密云以后，事实果然如此，广大民众自发地反抗日本侵略者。密云县城南一带，如宁村、提辖庄、河南寨等村是武术之乡，人们喜欢习练刀枪棍棒，又有武术教师胡本恒的教练，各村都成立了少林会。就在南门日本哨兵打人最凶的日子里，一天上午九时左右，一位 20 多岁的小伙子，身体特别健壮，戴一顶旧草帽，走到日本哨兵前，点点头就要进城。日本哨兵象往天一样，提起枪托照这个小伙子打去，小伙子一蹲身，一个扫趟腿，鬼子象一个草捆倒在地上。正要挣扎着爬起时，小伙子突然用碗大的河光石砸在哨兵后心上，这个哨兵应声倒地。住南门里火神庙的日军警卫班发觉时，小伙子早无影无踪了。到日本投降后，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宁村人。

在南门砸了鬼子哨兵后第三天，东门又发生了痛打日军哨兵的事件。正午时分，来一名 30 左右岁的人，也是戴一顶旧草帽，一身兰布裤褂，右手提一个破旧的荆条篮子，篮子里放一个旧铁盒，还用破旧的毛巾盖着。等他走近日军哨兵时，日本岗哨用左手指着提篮问：“这是什么？“答：”治庄稼虫子的。”“我的看看！”哨兵一边说，一边往前凑。这个小伙子很沉着地把篮子放在地上，从篮子里端出一个长形旧铁盒，日本鬼子正睁大眼睛要看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小伙子猛一抬手，把铁盒里的沙子和土扬在鬼子脸上。这个鬼子的眼睛被砂子迷住，正在揉眼时，小伙子手疾眼快，把枪夺在手中，用枪托狠击鬼子的头部，使鬼子倒在地上，出入城门的老百姓心里高兴。等日军东门岗班发觉时，小伙子早已跑进高粱地里。

这两件事发生后，日本鬼子在各门都变成双岗，不准过往行人接近岗哨，如遇可疑情况，一名日军检查，一名作好射击准备。

摔跤场上

密云县原县衙西一场地上，经常有几十名鬼子练习摔跤。场地旁是一条街道。鬼子不穿衣服，每人一条白布，宽30厘米，长一米多，一头穿在扎腰绳上，从后裆兜到前裆，前后各垂下一点。鬼子轮班摔跤，摔得满身泥土。有的摔跤术比较熟练的就自觉了不起，看见中国人就要比试，不会摔跤的躲着这块场地，躲不及只有让鬼子摔倒或摔伤，群众十分气愤。

一天，从这场地边走来一个大汉，身高一米八，膀阔腰圆，四方大脸，络腮胡须，光头略有秃顶。他住密云县娘娘庙附近，自幼习武，力气过人，拳脚利索，善长摔跤，名字叫刘永和。他刚走到鬼子的摔跤场旁，有个摔跤术最好的鬼子兵，走过来对刘永和说："你的试试。"说着两手用力抓住刘的双臂。刘永和若无其事，轻轻把两臂向上一翻，很轻巧地把鬼子两个上臂抓住，两手一使劲，这个鬼子慌忙往回缩手，连连说："你的大大的，我的小小的，我的不行。"刘见这个鬼子连连告饶，把两手慢慢松开，笑了笑，转身向南走了。从此，鬼子兵在此摔跤练习，不再和中国人比试，中国人可以顺利通过摔跤场旁的道路。

"有花姑娘"

日本鬼子进县城以前，密云城的人听说日本鬼子野兽一般，经常是见妇女就强奸，因而年轻妇女大多逃到城外。

鬼子进密云县城以后，经常向在街上走路的男人要"花姑娘"。一天中午，一个小矮子鬼子兵，歪戴着帽子，身穿旧草绿军服，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把刺刀，在西街由西向东走。迎面碰见一名本城30来岁的男子。鬼子兵拦住问："你的花姑娘的有？"这人向鬼子兵身后一指，说："那边的有！"当鬼子兵转头向后方看时，这人趁势向鬼子兵左脸狠狠打去，把鬼子兵打得向后退了好几步，等鬼子兵站

稳，这人已经钻进胡同向南跑去。鬼子兵拔出刺刀就追，还不停地骂："八格牙噜!"时间不长，全城戒严，捉拿"凶手"，没有抓到。

一张国耻地图

当时，杨春青家保存一张民国初年印制的《中国国耻地图》，宽1.2米，高0.8米，此图记载了自清代以来，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间，割地赔款的数字等。这张地图贴在杨家北房西间的阁扇上，用以教育家人永远不忘国耻。

中国军队原来驻防密云县城时，住在杨家的是东北军107师所属部队，一位长官指着这张地图说："如果全国人民都不忘国耻，我们的国家就有前途了。"古北口长城抗战失败后，该部队撤走。

几天后，日本军队的一个白胡子军官住在杨家，他胸前挂着一双链子，放在右上兜里，听翻译（高丽人）金子胜说，他是联队长，军衔是大佐，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老鬼子看见这张中华国耻地图，立刻瞪起双眼，向杨春青吼道："小孩！这图你家的?"春青一看，才知道家里大人逃难到城外山村，忘了带这张地图，春青当年15岁，和一位70岁的亲戚在家看门。春青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承认是自家的，就会被杀掉，只好推说是前几天中国军队居住时挂的，临走时没有摘下来。这个老鬼子说："这个图，中国不能有!"说着，他用手杖将这张图给打烂掉在地上。

地图被打破了，地图的内容还清楚地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铁的事实、启示后代

曹保余

一、天地庙前活埋我无辜青年

1942年夏季的一天，驻密云县宁家花园的日军一四一八宪兵队，通知密云城关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在上午九点钟到密云县东门外天齐庙前开会。

庙前的几棵松树下，有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在吃力地挖土坑。他衣服破烂，遍体鳞伤。庙前周围有几十个日本兵，都荷枪实弹，有的面向外，有的面向内，枪口对准来参加会寥寥无几的群众。两条吐着舌头的大狼狗，张牙舞爪地和日本岗田伍长一起嚎叫着。十点钟，岗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他的，八路的干活，死了死了的有。谁的八路干活，一样的统统地死了。"他指的是挖坑的青年。说着令那青年下坑，青年不肯，岗田叫两个狼狗去咬他，青年跟两狗拼命地搏斗，他搂住一条狗的脖子，咬住狗的一只耳朵，狗在惨叫着，岗田急了，用刺刀猛刺青年的大腿，他倒在了土坑里。忽然又挣扎着站起来，但已无力再爬上坑来。岗田带头用铁锨往坑里埋土，青年的膝盖下被埋住，岗田令日本兵停下。岗田命令哭泣的群众，每人往坑里埋一锨土。谁稍犹豫，岗田就令狼狗去咬谁。土逐渐埋到了青年的胸部，青年的脸变成了紫色，慢慢地他垂下了头………。日本侵略者活埋我无辜青年的情形，是原密云县城后村甲长曹英杰亲眼目睹，他今年八十二岁。

二、奸淫中国妇女

1941年秋，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军的配合下，对密云北部山区进行大扫荡。一天下午来到了溪翁庄村。进村后，除杀猪羊，抢鸡鸭外，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这群野兽色狼，用刚学来的中国话，嚎叫着要找“花姑娘”。

村东头，一个叫赵连华的中年妇女，她是抗属，婆母外出，她独自在家，没来得及逃走，被两个日本鬼子轮奸了。由于脸面问题，她没敢声张，吃了哑叭亏，不巧她怀了孕，没法处理。婆母见儿媳整天哭哭啼啼，肚子大了，认为儿媳偷情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捎信让儿子回来。孩子生下来了，一家几口人抱头大哭。本来生孩子是喜庆事，却变成了苦恼事。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

村中间一位姓陈的姑娘，方出嫁第一天，就跑情况，从东智村逃回了娘家溪翁庄。还是没逃脱被日本兵奸淫的恶运，她羞愧难当，当天悬梁自尽了。

这村西头有位姓王的老两口，年龄都五十有余，这天听说日本鬼子进村了，就把两个女儿藏在正房西屋。这时三个日本鬼闯进院内，老俩口急忙迎出去，想骗走仨只恶狼。不容分说，领头的鬼子问：“花姑娘的有?”没等老头回答，一枪托子把老头打昏倒地，老母想转身堵住西屋门，一个鬼子抢先一步，用刺刀挑掉了西屋门帘，一见屋内有两个姑娘，象饿虎扑食一样，冲进西屋。母亲揪住鬼子不放，鬼子残暴地当场刺死了老母亲。姊妹俩见事不妙，急忙跳窗户（上支下拿的）上西墙，跳入庄稼地逃跑了。这仨野兽，兽欲无法发泄，把刺死的老太太尸体给轮奸了。其幸免于难的女儿仍健在，都已七十多岁了。

三、掠夺我矿产资源、残害我矿工致死

1942年6月，我从北平初中毕业，考入了宣化龙烟铁矿制铁部

土本课当雇员。我亲眼看见日本侵略者，怎样疯狂掠夺我国宝贵的矿产资源，残害我矿工致死的事情。

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华北以后加紧抢掠我国的钢铁资源。他们只来少数管理人员，在大批日伪警宪的弹压下，从我国贫困地区抓骗而来的老百姓，放进宣化庞家堡、烟筒山和制铁部三个矿区内。矿区周围布满电网，电网外挖沟放水，沟内栽上尖朝上的鹿砦，在开阔险要地区埋上地雷，矿工们自己插翅也难逃出这所岗楼林立的“监狱”。矿内有日本监工和汉奸工头，对矿工任意打骂，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稍有怠工，就遭监工严刑拷打，押禁闭。禁闭室内有各种刑具。矿工吃的是红高粱面，衣、食、住、行都在矿石堆里，矿工的粪便都是铁锈颜色。矿区内没有医疗设备，矿工有了病只有等死。死了的矿工尸体被扔在山沟里，供鸟兽食用。夜间时常会听到地雷爆炸声，那就是进出矿区吃死尸的狼踏响了地雷。一批矿工死净了，他们又会押运来另一批矿工。我就见过换了两批矿工。至于生还的则寥寥无几。

国家耻、民族恨，我们应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日寇统治下石匣的伪组织及暴行

李光亚　马相云

1937年7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石匣镇。当时在石匣有九个伪组织驻扎。他们的任务是保护铁路，阻止游击队活动。伪组织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队长叫岗岛，翻译是张英杰。日本宪兵队，共十几个日本人，五、六个特务，两个朝鲜人做翻译，队长叫杜边，是日本曹长军衔，他们还统管石匣的税收。满洲宪兵队，共十几个人，来自东北三省，队长满春才，会说日本话，专门搜刮民财。华北宪兵队和中国宪兵队，这是一体二个牌子，共十几个人，都来自中国的南方，他们同日本守备队和日本宪兵队勾结在一起活动。除以上的伪组织外，还有地方性伪组织四个：石匣二分所共有二十几个人，所长刘汉文，日本投降前又改为张英杰，他们掌管石匣镇的户口，维持地方治安。密云警察队石匣分队，有十几个人，队长姓毕，协助二分所活动。"先锋队"是二分所所长张英杰组织的，成员是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每天由张英杰带队去农村逮人。张英杰还把年龄在十八至四十五岁之间的男子组成棍团，城内五个队，城外五个队。城内的棍团成员，每天夜间手持木棍在城墙站岗，天亮下岗。城外五个队在城外围按固定地点夜晚站岗，发现情况，便一个传一个报告给城墙上的岗哨，岗哨敲锣，城内听到锣声赶紧敲大钟，各伪组织听到钟声便集合行动。

日本守备队驻地在石匣北大街路西草场头条东口，大门口有三丈多高的炮楼，白天日本兵下楼站岗，晚上都缩在炮楼里。中国人从这个门口过，都要给日本兵鞠躬，否则拉回来轻者罚跪，重者用

枪托杵肚子，用脚踢，稍有反抗便被拉进里边施以重刑。在城外的北山、西大屯等地也有守备队驻防。城的四门只留有北门可以出入，其他三门都被堵死。北门有守备队和伪警察站岗，百姓出入城门要证明书，对不顺眼的、可疑的人就带回守备队严刑拷打。守备队强迫城内外的群众到离城十里远的地方挖治安沟，沟宽三丈，高二丈。发现有怠工的，就拿皮鞭抽、木棒打。还强迫治安沟以外的百姓搬到城里来，把这个地区变为无人区，拒搬的当场打死。以后发现无人区仍有百姓居住的，便烧光、杀光、抢光。挂甲峪、沙峪里、边庄子等村，已经被烧、抢得片瓦皆无。果子峪郝玉山的祖母，因年老多病，行走不便，被活活烧死在屋里。挂甲峪晁士军、晁士如、晁金生等二十多人被捉走坐牢，后来转押到古北口、承德，只有晁士军越狱逃跑才幸免一死，其他人都含冤死去。日本的飞机经常在石匣上空盘旋，一次从飞机上扔下八颗炸弹，许多人被炸死。日本守备队的翻译张英杰，经常领着日本兵和特务出城讨伐，闹得百姓地不能种，家不能归。1944 年 6 月，张英杰带着日本兵和“先锋队”到城南五里的上金山村，胡吃海喝乱抢不算，还到一个姓蔡的家里，以他家有八路军为由，将这家的男人肚子扎个窟窿，肠子都勾出来了。张英杰为了效忠日本兵，经常穿着便衣，冒充八路军试探群众，有谁对日本兵不满或盼望八路军来便被捉走。就是对参加棍团的团员也不放心，也常化装试探。1944 年 7 月的一天夜里，张冒充八路军试探棍团站岗的团员曹永发，曹信以为真，便把日本兵占领下的石匣伪组织的情况说了，张当时便露出真相，把曹的两眼蒙上带走了。石匣人民在日本统治时期，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什么时候会大祸降临。

石匣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屈辱生活

曹荣贵

我的老家石匣镇，位于从北京去东北的交通要道上，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是方圆百里之内的一个重要物资集散地。可是，自193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很轻易地就落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里，成为日寇统治下的一个沦陷区。从此，当地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屈辱的生活，长达12年之久。

进城如“过关”

原石匣镇有四座城门，城内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自日本侵占以后，除有伪军驻防的时候以外，平时东西南三门紧闭，只留北门供人行走。就是这一个门，也是早八点以后开，下午三四点钟关。人们进城办事或出城下地，都必须得在这个时间出入。若稍迟了一步，不是被关在城内，就是得滞留城外，遇到清查户口，就会引出一系列的意外麻烦。同时，就是这一个城门，平时也只是开半扇门，有时就开一道缝，仅能供一人出入。城门口有日本兵把守着。人们要从这里进城，不但要给鬼子兵鞠躬行礼，还要接受搜身，把两支胳臂伸平，让伪警们从上到下地摸个遍，然后才放你进去。记得有一年，日本鬼子搞“五次强化治安”，凡是要进城的人，都得背“十条”（即亲日反共的所谓十条规范）。背不下来的，都让脱光脊背，两手着地，在烈日下趴着。有一次，我进城买东西，就亲眼看见在北门里大街上，长长地趴着一大溜光着脊梁的人。据说，他们中有的已经在烈日下暴晒了两三个钟头，个个头上冒着汗，身上

流着油（汗珠）。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有几个日本兵过来，手持藤条棍，挨个地抽打了一遍，才放他们走。这些人像获得大赦一样，顾不得再办什么事，就急忙逃出城门跑回家去。

特务横行无忌

在日本鬼子侵占时期，中国人受日本人的气不说，还要受那些认贼作父的狗特务们的欺侮。他们歪戴着帽子，敞穿着外衣，斜挎着盒子枪，整天像幽灵似地在大街小巷转游，谁也不敢正眼看他们。他们明着是访查“八路”（指抗日军民），实际是寻找对象进行敲诈勒索。我家住在城外，院墙外边是牲畜市。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邻村一位老乡，刚卖了一头牛，就被狗特务们给盯上了。他们把他带到我家院墙外边，连踢带打，声称他是八路军的“密探”，要把他带到日本宪兵队去。人们知道，凡是被他们带到日本宪兵队去的人，大都是有去无回，不死也得脱层皮。这时，就有人出来“说情”（也可能是他们的“托儿”），一面对特务们说，这人他认得，担保不是八路军的“探子”，一面示意这位老乡，还不赶紧拿钱“买命”。直到这位老乡把刚到手的卖牛钱全掏出来给了这帮狗特务，事情才算结束。在那个时候，类似这样的事，几乎是天天都有，到处可见。

居家无宁日

那时，驻在石匣的日本鬼子、伪军、便衣队（特务），经常下乡“讨伐”，每次出发前，都要抓人抓牲畜，给他们带路、扛子弹、驮给养。我们住在城外的人，被抓夫是常有的事。因此，平时没事，谁也不敢出门。我家养一头小毛驴，为了不让日本人抓去，每逢遇到鬼子出发，就把他拴在后院过道里，把缰绳拴得低低的，离地不过一尺多高，好不让他叫出声来。我那时人小，不被鬼子们注意，我哥哥、叔叔每天下地干活，都得由我先出去观察一下动静，

然后他们再出门下地。就是在地里干活，也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瞄着有队伍出来，就得赶紧撂下活先躲一躲，否则，就有被抓去的危险。那时，男人们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女人们就更不得安生了。日本鬼子一出来就找“花姑娘”，见着年轻的姑娘、媳妇就追，藏不得藏，躲没处躲，只好终日闭门不出。遇到有事，必须得出门的时候，姑娘、媳妇都要先“修饰”一番：大姑娘把辫子盘成发髻，往脸上摸些锅烟子，外面套上一件破旧衣裳，装得憔悴一些。再着人陪着，找僻静小道，匆匆地去，匆匆地归。直到安全返回，一家人才能把心放下来。

日本鬼子侵占中国的一些地方以后，为了不断地扩大其侵略战争，不但对解放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极端的困苦；就是在他暂时控制的地区，也是极尽搜刮之能事，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资，都集中起来支持其侵略战争。所以那时，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也日益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比如，像煤油、火柴、食盐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开始还实行“配给”，每月给那么一点点。后来，由于物资日渐匮乏，就连这一点点也不给了。怎么办呢？人们就开始找代用品。没有煤油点麻油（麻籽油），没有麻油点“明子”。什么叫“明子”呢？就是把油松木劈成一小条一小条地当灯点。点一晚上“明子”，熏得鼻子、眼圈全都是黑的。没有火柴使“大取灯”，这“大取灯”也是用麻杆沾硫磺做的一种引火物。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没有盐吃，就用老咸菜汤引饭。说到吃的，就更难了。石匣是个城镇，过去吃粮主要靠四乡供应。由于日本人搞封锁，外地的粮食根本进不来，只能靠日本人从东北调些高粱米来维持。有时买到的高粱米，发了霉，有老鼠屎，甚至搀了砂子，也得吃。后来，就连这样的高粱米也买不到了，就只好吃“混合面”。据说，这种“混合面”是用橡子、豆饼加少许杂粮加工而成的，做熟了呈灰褐色，既涩还有些苦，吃起来很难下咽。到后来，就连这种“混合面”也得起大早，排大队

才能买到。沦陷区人民就是这样过着非人非马的生活。

民族习惯遭践踏

回族人民笃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规定每年有一个“斋戒月”，夜间吃饭，白天不吃不饮。可是，在日本统治下，夜里根本不许点灯，也不许有响动。城墙上站岗的鬼子兵，一发现哪里有亮光，有响动，就向哪里打枪，随着就会出动人马去搜查。当地回民，在“斋月”期间，为了避开鬼子们的监视，大都在头天晚上把夜饭做好，放在锅里温着。为了不让鬼子兵发现亮光，就用大棉被把窗户遮得严严的。夜里起来，轻手轻脚地走动，互相打手势，尽量不说话。就这样，也坚持着把一个月的“斋”把下来。我家住在城外，经常住过往的日本“讨伐队”和伪满洲军。他们一住下来，不管你是不是回民，随意大吃大喝，弄得家里的锅碗瓢盆，住一次就得彻底清洗一次，不然就不能继续使用。有一次，我家又住上了日本兵，家里人都躲出去了，只有我和爷爷奶奶留下来照看门户。一天，他们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头猪，要杀了吃肉。不想这猪挣脱了绳子满院跑，要捉也捉不住，怎么办呢？几个鬼子兵就把门关死，用铁锨、镐追着打。猪跑人追，猪嚎鬼叫，折腾了大半天，才算把猪砸死。猪是被砸死了，却弄得我家满院满墙都是猪毛、猪血、猪尿。我爷爷奶奶是上了年纪的人，目睹这一场，直气得混身打颤，心里比刀扎得还难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就没有家，哪还有什么宗教信仰可言呢？

民族意识永不泯灭

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霸占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永久殖民地，就在它的统治区内，大肆宣扬什么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之类的反动理论。可是炎黄子孙，自古以来，就有反抗外族侵略的光荣传统，即使是在日伪统治区，处在日寇的淫威铁蹄下，人们也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就拿小学生来说，尽管日伪挖空心思地进行奴化教育，从小学就让学日语，几乎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可是大多数同学，对学日语都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情绪。每逢上日语课，不是借口出恭上厕所（半小时左右），就是翻阅别的书籍，或者做作业，根本不去听讲。每次期末考试，多数同学日语都不及格。记得有一次，上历史课讲日本明治维新，课文上附有日本明治天皇的图像。有位同学，为了发泄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偷偷地用小刀把明治天皇的头裁掉。当日本人来查堂时，可把这位同学给吓坏了。他急忙把书压在胳臂底下，装做专心听讲的样子，两眼直瞪着黑板，一动不动。幸好，查堂的日本人，在教室里转了一下，见同学们都很用心听讲就出去了。这位同学虽然躲过了一场大祸，却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急忙把这本书烧掉。再上历史课时，就谎称忘带了，与同桌同学同看一本书。直至学期完了发了新书，他的这块“心病”才算去掉。

那时，学生是这样，成年人更不甘心当亡国奴。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横征暴敛，催粮要伕，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实在拖不过去躲不掉，就用做假的办法来应付。比如挖大沟要民伕，大多数人家都是让一个半大的孩子去顶数，谁也不肯给日本鬼子真干。那时，人们在日本鬼子的严密监视之下，谁也不敢公开谈论抗日。可是在背地里，人们见面，就在袖筒内，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八”字，籍以交流思想感情，传递解放区抗日斗争的胜利消息。那时，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明着不敢抗日，就在暗地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办法，支持解放区抗日军民的抗日斗争。大家企盼着能有一天光复祖国，重见阳光。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记得 1945 年 8 月，刚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

开始还有点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没有广播，老百姓也见不到报纸，消息都是口传）。当后来看到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这时都龟缩在据点或炮楼里不再出来；过去那些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的狗特务，这时也一个个地销声匿迹躲在家里不再露面，才相信中国确确实实地是胜利了。人们把蕴藏在心里，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悲愤之情，一下子都迸发出来。大家欢呼雀跃，互相奔走相告，共同分享着这胜利的喜悦。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过去在日寇铁蹄下的那段屈辱生活，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它却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因为人们知道，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幸福，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

日本侵略者统治古北口的十二年

关幼椿　蒲洪译

一、日寇入侵古北口

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片明媚春光，农民们正准备春耕播种，街市上的人们熙熙攘攘，表面上充满着和平景象。那些保国守边的东北军第七旅的将士们，却在阵地上忙忙碌碌地修筑工事，以防入侵之敌。接近中午的时候，人们听到空中有隐隐的嗡嗡马达声，由远及近、由小而大，抬头一看，只见数架日机飞着、围着古北口上空侦察。忽然，丢下来第一枚炸弹，随着刺耳的轰鸣巨响，古北口大街南聚兴楼门前，卖菜的苏玉林、姚寿春当即受伤，菜摊也被炸烂。第二枚炸弹又响了，落在街心桥东民房上，房被炸毁，卖煎饼的奎林爷（满族）被埋在屋里，屋顶幸被坍下的檩木支住，身虽未死、耳却震聋。接着三枚、四枚……。

古北口人民的战祸灾难开始了。

接着，3月10日清晨，日寇飞机又在古北口上空轰炸。下午3时，敌步兵向古北口发动试探性的攻击。11日拂晓，敌军在大炮掩护下，大批步兵向古北口阵地发起总攻。守卫古北口的中国部队进行了顽强地抵抗。12日，日军又增加重炮和飞机对古北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攻击。中国军队虽然伤亡很重，仍然顽强地还击，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后来，联络终断，后援不继，前方部队各自为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古北口，转移到南天门阵地，古北口完全被日军占领。

日本侵略者占领古北口以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并制造了潮河关惨案。

二、由“非武装区”到“三家”统治的特殊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占领古北口之后，当时由伪满的滦平县政府设临时办事处加以统治。

这一年（1933 年）的 5 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塘沽协定》。协定的内容表明，当时的政府不仅默认了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承认，长城到冀东一带包括古北口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这些地方驻军队，只能派警察维持治安，而日本却可以在这里自由行动。根据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签定一年之后，即 1934 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算是收回了古北口的行政权，派来了三十名警察“维持”治安。相反，日军却在这里修建兵营、构筑炮楼、增兵添将、长期驻守下来，古北口就成为日本军向华北地区进行侵略的重要基地。

1935 年，日本侵略者在派军队增兵关内的同时，又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即唆使汉奸建立脱离当时中国政府的地方政府）。这年 11 月，指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了汉奸政权，包括古北口在内的广大冀东地区以至后来的华北地区，沦入敌手。而这时的古北口，又成为日本两个占领地区——东北与华北的走廊与纽带。

这样，由于古北口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华（汉奸政权）满（伪满政权）及日本侵略者三家逐步设立了“一式三份”的各种统治机构，日人及那些被日寇奴役的朝鲜族人在此修路开矿。表面上看，古北口这个小小的地区，机关林立，交通商业都有了发展，实际上却走上了殖民地的道路，陷人了更深的苦难之中。

日本关东军在这里大肆修造兵营，设炮楼，强占了古北口地区大约五分之一的土地，数十户住户被驱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阎王殿一样的日本关东军古北口宪兵队设在古北口大街中间偏南路西（原杜姓大院，今古北口供销合作社址）。该队是由多数日人宪兵、、少数华人宪补，后来又附设宪兵队特务大队和一些特工人员组成，是专门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伪满古北口宪兵队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北头路东大楼。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爪牙、一只守门狗。

伪满“国境警察队”是由伪满政府派驻这里守卫伪满“国境边界”的边防警察。由日、伪满、白俄等籍人组成，由日籍警官领队，是一支骑兵警察。队部设在古北口东关李白两姓的大院内。他们在南天门以北有人家的地方，设岗哨一所，昼夜设人值班，盘查来往行商旅客。来往行人，不能随意出入，无身份证明及出入手续者，则以“偷越国境罪”论，或逮捕关押、或被送伪满充当劳役，严重者就被杀害。以后，这个警察队改编为滦平县地方警察，归巴克什营警察署所辖，在古北口北门外建立警察分驻所，守卫着伪满的“国境线”。

古北口日本警察署是日本直属机构，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北头路东，古北口火车站对过。

长城抗战后，华北伪政权派驻的古北口佐治局，局长霍实，带数十名警察，佐治局设在古北口东横街东头路北。它是根据“塘沽协定”来此代替伪满滦平县的临时办事处行使行政权的。到1936年5月改为古北口警察第三分局，由密云县警察局管辖。

此外，还有古北口铁道警护队，驻在古北口火车站内，是属伪满警察机构，专门负责承古铁路（承德到古北口）一段。而华北警务段古北口分驻所，设在古北口铁路隧洞外路东。

三、经济上的掠夺

随着武装占领而来的，就是经济上的掠夺。在古北口这一特殊地区，又有它的特点。这首先就表现在“关税”上，满洲税关，其

全称是“山海关税关古北口分关”，是伪满的关税机关，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北路东又称北海关。中国海关，全称是“津海关区古北口长城分卡”，是华北伪政权的关税机关，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北路西，为津海关北京办事处所管辖，又称南海关。其中北海关还设有武装缉私队，终日去山沟小径，武装缉私，遇有所谓偷税漏税和带有违限货物者，货主被打、被关，货物没收，然后交承德伪满的法院法办。

此外，还有“古北口税捐局”，设在古北口北门外原征收局的旧址，归伪满承德税务监督署所管辖。

除捐税等之外，当时的日伪政府还规定“烟酒专卖”，不允许私人经营。伪满“古北口专卖署”，设在古北口东横街路北，专卖烟酒，并查禁私运私卖，后撤至口外的巴克什营。

以上这些捐税关卡，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物资，直接为他们的侵略战争即所谓“大东亚圣战”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压榨。

再就是对土地和矿藏的掠夺。自从日寇人侵之后，日、伪的各种组织机构，纷纷来古北口，公开抢占土地，疯狂掠夺。

古北口的西沟桃园一带，金矿丰富，日本侵略者早已垂涎三尺。于是便设立了“日本亚细亚金矿株式会社古北口金矿办事处”，大批日籍的技术人员携带家眷来到古北口。这个办事处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北路东。并强租强占河西西大街仓库三条胡同冯家宅院为工人宿舍和家属住宅。招中国人作矿夫在桃园采金开矿。

古北口合作社，是汪伪华北政权所设立的，这里备有存粮仓库，常有人看守。

此外，伪满还在这里设置了“满洲中央银行古北口出张所”。地址在伪满的税关内。

四、为侵略者服务的各种设施

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古北口人民难忘的另一件事，就是铁路的修建。1936年开始修建通古（通州——古北口）铁路。这个路又分为通古和古承（古北口——承德）两段。古北口西街直向西，横过铁路的地方，就是两段铁路的分界线。界线以北属于“满铁”的锦州铁路局管辖，界南为“华北铁路株式会社”的北京铁路局管辖。古北口车站，机关区、检车区、电汽区、工务区、货物处和“国际运输构内驻在所”，应有尽有。又因为是伪满国境地区，车站内还有伪满银行兑换所，海关检查处等。此外还建立了铁路员工宿舍。设在古北口北门坡西胡同的“南关寮”，是“满铁”的日籍职工宿舍。设在古北口大街石桥北路东的“铁路乘务员古北口宿泊所”，是西段铁路华人乘务员（包括机车和列车员）在古北口交班休息的宿舍，由“满铁”管理。

为了修建铁路，老百姓的耕地被占，房屋被拆，老百姓被抓去修路。修路的劳动强度大，吃不饱、还不断遭受打骂。怠工、逃跑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

这段铁路于1937年3月建成，4月1日全线通车。

铁路除去侵略者在军事上的作用之外，也有经济上的作用——又多了一条经济侵略的渠道。与铁路配套的机构，就是“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古北口营业所”，营业所设在古北口大街北头路东，火车站对过。是日本的商业资本经营的。日本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的营业面很广，日本全国各地、朝鲜各地、以及所有日寇侵占的中国各条铁路、各个车站，都设有它的营业点。主要业务是承包铁路沿线各站的物资运输、火车装卸，代客携取物品，代客办理托运物资，代办海关纳税手续等等。

日、朝、伪满地区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其简单的标志为“ン”（日文字母）。华北地区的名为“华北运输株式会社”，其简单

标志为“力”(日文字母)。设在内蒙等地区的名为“蒙疆运输株式会社”，其简单标志为“モ”(日文字母)。这三个运输公司，因地区不同而名称不同，实际上都是“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的分社。经济上是统一的，都受日寇控制。

此外还有“阪田组汽车公司”的古北口汽车站，专跑京承公路，每日两地对开，古北口为中间站，为日人阪田经营。后被撤销，改由“奉山铁路汽车公司”继续营业运行。

为了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日伪还在古北口建立了邮电设施。邮政局有三处：中国邮局（在古北口西横街中间路南），伪满邮局（在古北口大街北头路西，是新建的）和日本军部邮便所（在古北口大街石桥南路西）。电报电话局有两处：伪满设的古北口“电报电话局”，在古北口大街北头路西是新建的。再有就是“华北电话局”，设在上坡长盛店院内。

随着日寇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侵占、掠夺，古北口市面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为了长期占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邮政局”，还建了日朝两籍的“居留民会”（居留民即侨民），地址在河东大街石桥北路西。“日本小学校”，在古北口大街南头，师生都是日籍人，不收中国学生。

医疗方面除日本关东军军医院（在古北口河西东阁外路北）和伪满派来的“古北口检疫所”（在古北口北门里路东，主要管进入伪满洲国的防疫注射等）之外，还有日人伊部医生的“伊部医院”，朝鲜人姓金的“康德医院”和朝鲜人姓金的开的镶牙馆。

商业服务业方面，日人开的照相馆“相川写真馆”，“东荣公司”，“南天门屋”（饭店兼妓院），“古北口饭店”掌柜是日本人木下（专供日人食宿），“福岛洋行”、“大东公司”、“国境堂糕点铺”等。还有朝鲜籍人开的“日本理发馆”、“冷餐馆”。

此外，还有日本人经营的日本妓院“大和妓院”、“福岛妓院”、

日本人经营而妓女为朝鲜人的“松竹园妓院”等三所。朝鲜人经营的“金泉馆妓院”“大黑屋妓院”。另有一处不辨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开设的妓院。这些妓院，四所在河东，三所在河西。他们开的“土膏店”是公开贩卖毒品鸦片的地方。

五、反动的思想统治和野蛮的文物掠夺

除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掠夺之外，日本侵略者还进行反动的思想统治和文物掠夺。

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北路东的“满洲协和会”是“满洲帝国协和会”的分支，是专门进行反动宣传的机构。设在古北口河西东转角路西的“新民会分会”是伪“新民会”的直属单位，这是个专门向中国人民灌输“大东亚共荣”等军国主义思想和负责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组织，在进行反动宣传之外，还搜集各地抗日武装和人民抗日活动的情报给日伪机关。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南路西的“华北劳工协会”，也是又管抓“劳工”，又管搞反动宣传的机构。

自从日本占领古北口之后，这里的“密云县古北口第三小学校”（即河西小学）也受他们的控制。为了磨灭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们在学校里推行奴化教育，各年级都设日语课，由日籍教员讲课，极力给青少年灌输什么“日中提携”“共存共荣”的奴化思想，腐蚀奴化中国的下一代人。

掠抢长城砖。自古北口北门起向东大约二华里到崔家地这一段长城城砖被日本侵略者拆走达三火车皮，至少在百吨以上．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又一笔债。

六、重见光明

1945 年 8 月 24 日这天，古北口夜雨早晴，红日东升，空气新鲜，万丈光茫。上午十一时左右，五名苏蒙联军的军官，骑着栗红

色的高头大马，雄壮威严的来到古北口，直奔日军兵营。时间不长，长城上的日本据点全都挂出白旗。不久，几百名苏蒙联军乘车来到古北口。他们登上山头，把日兵象赶绵羊似的集中到兵营里的广场上。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野少将向苏联军官举行投降式，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战刀。全体日军脱帽缴械，按照顺序跪在地上……。日本投降了！

古北口，在侵略者铁蹄下蹂躏了整整十二年！

日寇侵占古北口罪行录

张伯丞

日寇自1933年侵入古北口后，他们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仅把我所回忆起来的略述如下，以志不忘。

一、赶出家门

古北口被日寇占领后，日寇就占据了学校、殿堂和大宅院，如文昌阁小学校被占到1935年。河西东栅子外路北郭家住日军，以后改为陆军医院。河东大街路西杜家大院（今供销社）被日军占据，以后改为日本宪兵队。丁字街三合店，被占为日军仓库，以后当做日本小学校。……1934年冬，日寇的军队增多，占用了许多民房，不少人家被赶出家门。

1936年以后，日寇占据了自上营小城南门以南，东至二里沟，南至东山住户，西至大街的一片地域，把这里的住户，如关祝三、关树臣、关又春、徐大有，陈家、赵家等三十多家赶出家门。并拆了理藩院、三官庙、戏楼、关帝庙、姑子庵旧址和一些民房，建为兵营。以后，日寇对被赶出的各家，通过商务会，给过两次伪满洲票，算是象征性的房地租用钱。

二、四处屠杀

1933年日寇在进攻古北口的同时，于3月10日在东关门外稻池北边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山沟——胡同沟，刺死群众孙焕、孙凤亮、陈君、陈贵仓、何双合、赵得保等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赵得保60多岁，最小的陈君18虚岁，还刺死一头毛驴。

1933年4月14日，在古北口制造了潮河关惨案。两次共屠杀平民83口，烧毁房屋360多间，使一个只有80户人家的小村，户户遇难。

1938年，农历五月十四中午，从古北口西河套日寇简易军用机场起飞的三架飞机，到北台村狂轰滥炸。李清泰的父亲脑袋被炸成两半，母亲被炸伤。李进禄和母亲一同被炸死。李树林的母亲被炸伤。蔡瑞林17岁的女儿和蔡瑞祥6岁的儿子被炸死，本人被炸伤。炸死的牛、猪、羊200多头。炸毁住房10多间。

三、鬼门关

日寇驻在文昌阁时，他们在文昌阁西南角外面修了一个岗楼，日夜有日军站岗。这里是过往古北口的必由之路。来往的人从这里经过时必须给这个站岗的日本兵鞠躬；如果不鞠这个躬，或是鞠躬的姿态毛草，要是孩子，就会被骂“八格牙鲁”；要是大人，就会被痛打一顿或扒光衣服仔细搜身，检查所带的东西。最厉害的是还要看“手相”：皮粗、手厚、有老茧的，挨几个嘴巴或被踢几皮鞋就放过去；没有老茧、皮不粗、手不厚，甚至被认为还有用过枪的迹象的人，就甭想走了。1936年，日寇不在文昌阁驻了，却在北门坡顶上设了岗。1938年以后，日寇的岗撤掉，改由警察设岗。坡顶南边的台上有一间房，内有火炕。凡是从此路过卖柴人，必须单有一小捆柴放下，留作烧坑用，否则不能放过。实际这柴有很多是被警察运回家的。过路人所带的东西，不论是吃的、用的、站岗人都随着“检查”就拿起来。不愿意叫拿的人，挨打是小事。送走就危险了。路口有一个大木架子，上面钉着铁蒺藜，太阳一落就横过来加上锁，太阳出时才开。

四、特务横行

日寇在古北口设的军、政、警、宪等机关，如日本宪兵队、伪

满洲宪兵队、驻军、警护队、警务段、日本警察署、警察所、领事馆、南海关、北海关等，都豢养着特务。其中特务最多的是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内设特务队有一百多人。所有的特务都歪戴着帽子，穿一身中不中，洋不洋的衣裳，腰里掖着一把手枪，枪故意从衣襟下边露出来。他们除了伙同日、伪军，警察经常到乡下“扫荡”外，都在河东、河西、大岭、潮河关等地没有八路军的地方寻找八路军。他们走在路上横眉立目，不用好眼看人；遇有不认识的人和从乡下来的，立刻拦住盘问、刁难、勒索、打骂，或抓走后滥用酷刑，硬逼人承认是八路军的探子，然后带到日本人面前邀功请赏。宪兵队的特务因为人多，经常到古北口附近的村庄搜查。他们到了哪个村庄，哪个村庄都必须杀猪宰羊款待一番。临走，鸡、鸭、鹅等吃完了拿上活的。不这样就被诬为“私通八路”。1944 年农历正月，这一帮匪特，到汤河村以后，一个姓季的小队长，看到河沿有一家新娶的媳妇十分美丽，进屋闩上门进行强奸。女方不从，就毒打，直打得女方无力反抗了，奸罢离去。

五、文化侵略

古北口河西完小经费，原有自己的基金，教师由校董事会聘用。日寇占领后，1934 年，日本的密云县顾问山本到学校来，把学校改为“县立”，一切受伪县政府及日本人的控制。在各年级授《日语》课，并在《修身》课本中，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学生对《日语》课十分反感，说：“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三年用不着。”

驻古北口的军、警、宪等机关的日本长官，经常到校监视、检查师、生思想表现。满洲铁路警护队派徐振修到学校强迫学生参加他们的“军训”。

河西转角设有密云县伪“新民会”古北口分会，专门向群众，向学生灌输“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满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思想并从事特务活动。

六、没有粮食

古北口原为丰宁、围场、隆化、滦平等县的粮食集散地。自日寇成立伪满洲国后，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以长城为界．实行粮食物资封锁。古北口关内东部、南部村庄的农民，又没有人敢到古北口来卖粮。所以，古北口千余户人家无处买粮。日寇把东北碾高粱米籽的糠和榨油剩下的豆饼，花生皮做成”混合面”运来，“配给”到各家吃，因为又苦又辣，以后人们宁可饿着也不吃了。商务会曾由东北买过一批高粱米，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 1939 年）夏季卖给群众，每家可买到一斗二斗（每斗 15 公斤），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时口外农民有粮食，没有衣穿；古北口人有衣穿而没有粮食。于是口里口外在饥寒交迫中，从山间小路，乘黑夜来往贩运粮食衣物。一旦被捉，即以“密输犯”治罪。

七、掠夺

日寇发现西桃园山里有金矿，于 1939 年至 1941 年秋，在石桥北设立《日本亚细亚金矿株式会社古北口金矿办事处》，来了大批日籍采金技术人员，150 多名矿工，挖掘古北口的黄金矿石，而后运走。

以前，古北口的市面上流通的是大铜子儿、小铜子和银元。日寇进关后改用纸币，搜刮和换取银元、铜子儿。以后就再也见不到银元和铜子儿了。

1933 年冬天，日军住东关李尧臣院内，民工挖窖时刨出一大罐子银元、银锭和元宝。被民工分了。日寇知道后，对这些民工大事逮捕、拷打、搜索、查抄，直到把银元等全部追回到日寇手中，才算罢休。

日寇经常通过伪警所、镇、保甲组织，向古北口及周围群众摊

派钱、柴、草、花生、线麻、大麻子、芝麻、大米、红高粱、黑豆……凡是农村能产的，没有不要的。另外还要铜和铁，自家没有，买来也得交。

八、“讨伐”

日寇经常从古北口四出“讨伐”，多数都带着特务、警察。有时还有伪满洲军。有时伪满洲军和特务队也单独“讨伐”。

“讨伐”队每到一个村庄，首先占据周围的高地、山岗，然后进村，集中被围困的人民群众，进行毒打、恫吓、枪杀，搜寻八路军。明知没有八路军，也“照方吃药”。他们说：“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

各村人民在抗日政府领导下，组织侦察，掌握敌人动态，并在各个山头设有岗哨、暗语。“讨伐”队去了，群众早已躲避一空，敌人找不到粮食，就放火烧房。到井儿峪去的日寇“讨伐队”，就烧了那个小村三次。

古北口的日寇讨伐队到快活峪“无人区”，见到人就开枪，见到庄稼就给片了，见到住人的窝棚就烧。

1941 年 7 月 28 日古北口宪兵队在上甸子、下甸子、涌泉庄捕捉群众 128 人，酷刑折磨，送承德监狱判处七人“极刑”，其余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当年九月初六于香水峪、北香峪、南香峪捉 95 人，经古北口宪兵队、承德监狱判四人“极刑”，其余十二年徒刑以上。日寇投降时，这大部分人相继被折磨死去。上甸子等村，只有黄玉宝、谢仲勋、李相禹等 14 人生还。香水峪等村，只有钱志礼、田瑞山、王世文、张振邦等 8 人生还。

古北口的日寇“讨伐队”，每次由农村里“讨伐”回来，总要捆着或用铁丝拧着、串着一些群众和赶着一些牛、羊、骡、马、驴等，还有的挑着一串串鸡、鸭、猪肉。

九、对妇女的残害

一次，古北口的日寇“讨伐队”，包围了新城子附近一个村庄。村里的男人都躲远了，只有几十名妇女藏在高粱地里，被日寇赶出来，都被迫脱光衣服站成一排，供他们取笑。

古北口日本宪兵队有一个日本人，是汉语翻译，叫郑木。他来古北口时，带着一个女人，姓车，丰宁县人。郑木在丰宁县患病，住在这个女人家。这个女人把他伺候到病好，就跟他到古北口来了，住在河西。1943 年，郑木的日本女人来了，于是郑木在这年 11 月份的一天，学生下早学的时候，指使三个特务把这姓车的女人打死在潮河土桥的东头。第一枪是特务从桥西头向那个女人身后打的，她被打后坐在桥上用手绢捂着脑袋。另一个特务在桥东头上又打一枪，枪弹由那个女人的太阳穴打入。这三个特务中，有一个是大岭人名叫苗振远。车姓女人从丰宁还带来一个儿子，随郑木叫郑文七。后来，郑文七在石匣当特务，他妈死后，郑木派特务曾德，把郑文七枪杀在石匣北门外。

伪满警护队日本特务村上，汉语说得很好。他扮做中国人，深入到大烟馆、赌博场、万寿山白阳道、保甲、商贩等等内部，对他所认识的人，都“密切”交往，如生日、节日、过年、婚丧嫁娶都要献上厚礼，伺机刺探情报，极其阴险。

十、阎王殿

日寇占领时，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护队院内，经常有受刑人发出惨痛的喊叫声。

日寇对中国人使用的最普通、最平常的刑罚是灌煤油、凉水、辣椒面，把人的肚子灌得臌起老高，或是用气筒向人的肛门里打气，直打到肚子象个扣着的锅时，穿着大皮鞋上去狠狠地踩，把人踩得连汤带血由上下各个孔道流出来。还有过电；用烧红的通条、

烙铁烙肉、烫眼儿；用带许多钉子尖儿的胶皮板或木板打；用木杠子打；用狼犬撕咬……所有的酷刑，无一不备。凡是被捉进去的，能活着出来的极少。

古北口的日本宪兵队，伪满警护队，是名副其实的"阎王殿"。他们明里暗里，害死、杀死的中国人，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东关校场南边的乱葬岗，在明朝时是杀人场——刑场。清朝至日寇侵占古北口以前，古北口的杀人场在南关白果树下和娘娘庙北的善地（乱葬岗）边上。清末河西段八爷女儿的坟墓被盗，捉住的盗墓贼就是在白果树下正法的。

万寿山七郎坟边的黄土坑，是日寇公开杀害我八路军战士和革命干部的刑场。差不多每年要杀人一两次。每次最少两人，最多一次是七人。杀害前，日本宪兵队出布告，叫群众观看。

日寇统治时期，杀害我抗日群众最多的秘密杀人场，是隧道北口潮河边上。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坝，现已被淤，坝上宽平，坝下是河滩。日本宪兵队经常在夜里把被害人拉到水泥坝上砍头，从来没有枪声和其它声音。然后浅浅地埋上一层沙土。所以在这片河滩上，罹难人的白骨、头发、烂衣服成堆成片。三五成群的野狗日夜不离地在这里狂吠和咬架。

在这里被害的人，大多是从外地抓来的。密云城东塘子村王利君老师的父亲，因看共产主义的书被塘子宪兵队逮捕，送到古北口宪兵队。王利君那时只有十岁左右，由母亲带着，曾来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内探望过一次。以后，父亲就杳无音讯了。1940 年，春节前的一个风雪天傍晚，日寇讨伐队从古北口东边的村庄扫荡回来，他们押着数十名老百姓，用一根八号铁丝穿着手心连成一串。这些受难的人，进了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就无影无踪了。

到 1942 年以后，有少数被害人是在日本宪兵队院内被杀，碎尸后装入麻袋，扔到这个杀人场喂狗的。

这个地方，在那时，南面是山，西面是大河，东面是不许老百

姓随便去的火车道、火车隧洞和铁路警察的机关——警务段，北面是铁路和潮河边的许多坝笼，距西横街较远，是人迹罕至的僻静处，也是日寇暗杀中国人的所在。而且潮河每涨一次水，就把杀人的痕迹冲净一次。

1934年至1940年我在河西完小读书。这里春天河水浅，冬季有冰桥。我和两三个同学穿着学生制服，每天从这里走抄道上、下学。这个杀人场是我亲眼所见。

就我目睹，这个杀人场在6年中，每年都有四五百人在这里遇害。这是自古以来，古北口最大的杀人场，是古北口人应该永远悼念的地方。

驻古北口日本宪兵队的两次大抓捕

曹友林

密云县古北口，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一个重要长城关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3 年长城抗战时这里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设立了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分部，长期驻扎着大量日军和警宪特务。其中恶名昭著的古北口日本宪兵队活动极为猖獗，疯狂残害周围地区人民，令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至今，密云县上甸子、香水峪一带的群众也忘不了古北口宪兵队抓捕残害当地人民的滔天暴行。

上甸子、香水峪一带地区，属于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第七区，各村都秘密建有抗日村政权和救国会、自卫军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一情况被日伪探知。1941 年 8 月 31 日（农历七月廿八）凌晨，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带领部分伪军和特务突然包围了上甸子、下甸子、涌泉庄三个村。村民从梦中被枪声惊醒，知道大祸临头，躲避不及，只好听天由命。日本宪兵挨家挨户破门搜查，凡是青壮男子不由分说全部抓走，搞得三个村小孩哭，妇女嚎，鸡飞狗跳，乱成一团。敌人从三个村共抓到 128 名男子，全部捆绑着押解到古北口宪兵队队部（现古北口镇供销社收购站院内）。下午，日本宪兵将被抓的人集合起来，让当地特务一一辨认，从中挑出 50 人，被认定与八路军没有联系或与伪组织有关系的，每人背后画个“O”，令其家属交保金后释放回家。然后，对剩下的 128 个逐个进行审问。受审人只要回答不出敌人提出的问题，便遭酷刑。有的人被日军用木杠抽打，打得哀嚎翻滚，皮开肉绽；有的人被敌人用烧红的铁钩子在前胸后背上烙，烙得“吱吱”响，冒青烟，流黄油；有的人仰

面朝天被敌人放在一条翻过来的长凳上，头和两腿分别捆在凳腿两端，然后向嘴和鼻子里灌煤油、辣椒水，肚子灌鼓胀起来后，鬼子穿着大皮靴上去乱踩，直踩得受刑人上下一齐流血粪汤；……被抓的128人就这样一连被折磨了7天7夜，人人被整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日本宪兵直到认为再也“审”不出什么了，这才把被抓的村民全部捆绑结实，押上火车送往承德监狱。下甸子村抗日村长梁青山、自卫军中队长梁文成、小队长梁文贵，上甸子村自卫军中队长梁万恩，小队长刘汉忠等7人被以所谓“国事犯”的罪名处以“极刑”，拉到承德水泉沟“万人坑”砍了头。其余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20年、15年、10年不等。只有上甸子村民刘万福和龚青，因只有16岁，从轻判处各7年。判后，被分押到伪满洲国的各个监狱，其中以押在沈阳监狱的最多。他们在监狱中作苦力，遭虐待，受尽了各种各样非人的折磨。到日本投降时，只有14人得以生还，其余均惨死在监狱中。

1941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六）清晨，刚下过小雨，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带领部分军警又突然包围了香水峪、南香峪、北香峪三个村，把各家的成年男子全部抓走，没有一个人逃脱。其中香水峪村70户，被抓走120人；南香峪村10户，被抓走16人；北香峪村27户，被抓走27人。这些村民先被押到石匣，又从石匣上火车押解到古北口宪兵队部。日本宪兵把这163人逐个严刑审问，最后挑出95人，以所谓“国事犯”的罪名押送到承德监狱。在承德监狱里，4名曾当过抗日村干部的村民被判处“极刑”，在承德水泉沟“万人坑”杀害，其余均判处了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日本投降时，这95人中只有7人生还。

古北口日本宪兵队的两次大抓捕，给上甸子、香水峪等六个村带来了一场空前灾难，使这几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这两起暴行，是日本侵略者疯狂抓捕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

殿臣峪惨案

张桂新

1941年秋，日本侵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一连持续两个月的大“扫荡”。凡是抗日武装和抗日政府驻扎过的地方，敌人都要反复“清剿”。每到一处，抓不到八路军，就抓无辜百姓。致使无数村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丰滦密联合县殿臣峪村即是受害者之一。

殿臣峪，原名居连峪，是密云县城北75公里丑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1940年夏，八路军晋察冀步兵第十团来这里开辟工作，人们很快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当年，这个仅有24户的山庄，即有3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从此抗日武装和地方干部常来这村。1941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在离村1.5公里的兵马营村，建立了据点，后又控制封锁沟，妄图割断八路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这里的人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送粮、做鞋，配合捉特务、除汉奸和监视据点日军的动向，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0月19日，兵马营据点的日军制造骗局，一枪未响地对郎家营百姓进行了突然袭击。

天刚亮，一队荷枪实弹的日军进了村。多半村民还未下地。日本翻译官石××按其主子旨意，强迫村长洪殿臣通知全村男劳力，马上到兵马营去“开会”。村长信以为真，挨家挨户地通知着。日军在村外设了岗哨，村民洪江和儿子洪润清父子俩起早耕地，被日军赶回村来；洪江的二弟洪海、三弟洪宾、四弟洪义，五弟洪怀均先后被哄出家门。周家兄弟广海、广生；祁家兄弟仲全、仲安和当天在家的男劳力共19人，全部被日军赶到兵马营去“开会”。一进

“会场”就被一个一个地捆了起来。这时，善良的百姓才知是日军设下的圈套，上当受骗了。但为时已晚，洪殿臣后悔莫及，十分愤慨。曾多次试图逃跑，均因敌人防守严密，未能成功。村民陈继忠(忠)因患病是拄着棍子来开会的，日军见他不能独立行走将他放回。陈风迟托人说情被释放。其余洪殿臣等17人，当天夜里就被装进火车，押往关东，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投进监狱。敌人为防止他们逃跑，用手铐把两个人铐在一起，受尽了折磨，还要做繁重的苦役，有的因饥饿、劳碌含恨死去。20岁的民兵队长洪润清，因不甘心忍受非人的待遇，带头坚持斗争，被活活打死。多人因不满奴役而起来反抗，让狼狗活活咬死。17人无一生还。一夜之间，全村有70%的家庭，父母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多少人成为可怜的孤儿寡母。乡亲们为了记住这深仇大恨，自称“寡妇村”。寡妇村的人们没有向日军低过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老少寡妇们擦干眼泪，接过男人用过的农具，积极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誓与日军拼到底。为了鼓舞人们的斗争士气，纪念在狱中惨死的干部和群众，经区长张茂森提议，以村长洪殿臣的名字命名“寡妇村”为殿臣峪。从哪时起，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日寇在古北口抓走的劳工

胡春才口述　白天整理

日寇统治期间的1943年春季，伪密云县政府命令警察局古北口分局协同伪保长在古北口抓走二十多名劳工。

他们的办法主要是欺骗。说是上石景山修飞机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美机轰炸，把飞机和火车头藏进修好的高大的洞内），出官工，挣钱多，几个月就回来。还给二斗米安家，可是抓到警察分局就铐起来。

那年清明节前后，胡春才、傻柱子和王起富等，二十多人被捆上，送到伪密云县保安队和全县被抓来的四百多人一起（两人一根绳子捆起来）装上铁路闷罐车，到塘沽北炮台。由于美机轰炸，没有船，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又被装上闷罐车到青岛。后被装上了往日本载运钨矿石的七艘货船，人就坐或卧在钨矿石上。

河东北门坡下的王起富，家里有个傻女人，两个儿子年岁也小。他被抓后，惦记家里没法生活，非常想念家人，自己身体也不强，加上风摇船颠，一连几天吃不下东西，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死在船上，被日本人装进麻袋，坠上矿石，扔进黄海。象这样被扔进大海的每天都有。

这七艘船在航行中被美国飞机和潜艇炸沉了四艘，其余三艘于旧历五月初五，中国的端阳节那天到了釜山。下了船，劳工们都被换上了国民党的旧军装，当作战俘被运到四国岛的一个铜矿。铜矿的周围是电网，有持枪的日本兵严密看守。

铜矿的劳工有苏联人、朝鲜人和我们，都是“战俘”。

铜矿伴生铅汞，毒性很大，劳工们每天下井十二小时以上。出井住的是潮湿的地面，吃的是橡子面馒头和发霉的挂面。一日三餐一顿四两。喝的是矿上那黄色的泉水。

劳工们最容易得的病是身上起红点，溃烂，流黄汤，也没人管治疗，不久就死去。有的还未死，就被日本人架出去放在柴堆上烧了。劳工有病，被认为是怠工便惨遭毒打，被打死的也不是少数。

1945 年旧历七月初七，日本投降，劳工们自由了。我们被联合国的船运回天津。回来时，古北口的二十多人，只剩下我、李青元和傻柱子三人。

被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赵士端

李善文

密云县穆家峪镇庄头峪村的赵士端，生于1922年10月13日，今年73岁。他是四竿顶战斗的目击者，是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幸存者。他的左腿至今留有被日本工头次岛打伤的疤痕。

1943年12月19日，1000余日伪军将中共承兴密县委、县政府包围于四竿顶山区。我公安队、义勇队及自卫军战士奋起抵抗。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情况下，与敌激战竟日，58名战士光荣捐躯。

赵士端当时为自卫军战士，在北庄头站夜岗。19日天刚亮，当他听到四面枪声，已经被敌团团围住。被俘后押到石匣日本宪兵队。后经密云转到北平西苑。1944年4月被装进火车运到青岛后上了轮船。开船后翻译才说明是到日本当劳工。

到日本的下关上岸，乘火车到了长野县龙王村挖山洞。

中国劳工共330人，来自香港、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各地。组成一个大队，分三个中队。

一中队长崔如臣，是河南省伪治安军一位连长。二中队长李文华。三中队长是河北人叫司玉中。大队长姓商，山西龙井人，是被俘的八路军一位营长。他常嘱咐大家说，日本是个小国，永远灭不了中国。劝大家注意身体，和日本百姓搞好团结。他说，我们肯定能回到祖国，不能永远当亡国奴。

在日本，劳工们开山挖石，活计繁重，累得直不起腰。

饭食很少，每顿只给核桃般大小四个馒头，一羊皮碗萝卜丝汤，汤里的萝卜丝只有手心那么丁点。献县的刘树才人高马大，顿顿不饱，活计又重，活活被折磨死去。里县贾福平对挨饿不满，与

日本监工次岛发生口角，被次岛用铣把打断脊梁，活不到三天死去。在日本的二年时间里，折磨死中国劳工60多人。

一起劳动的劳工中，也有普通的日本百姓，但他们都是上不了战场的五十岁开外的老人。平岗、野村、高井、三品等人，和中国劳工一样，干重活。



当年被日寇抓去日本的中国劳工赵士端，愤怒地指着腿上的伤疤，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赵士端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痕，愤怒地控诉着中国劳工们在日本所遭受的苦难。他说，次岛监工嫌我干活不出力，先用铲灰的大铲砸，嫌不解气，丢下灰铲又举起铣把，打在左腿迎面骨上，当时鲜血直流。第二天，连大腿都肿了。甭说出工，连床都下不了。按规定，凡不出工的，每顿只给两个小馒头。这点饭一口就揉进去了，整天饥肠辘辘。赵士端悲愤地说，为了每顿能多吃两个小馒头，强忍到第十天，自己咬牙挤出伤口的脓水，第十一天清早就跟大家一起出工干活了。

劳工们直到1945年8月15日才停止劳动，开始吃上饱饭。1945年11月20日，这些受尽苦难的中国同胞，才重归祖国怀抱。

日伪统治时期的墙子路

刘占发 蔡世龙

墙子路位于密云县城东 80 里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是京东通往承德的要隘之一，乃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为日本统治区。1938 年初夏，日本一个中队约百余人在墙子路村安营扎寨。从此，墙子路就成了日本、伪满、华北汪伪三方都管的地方。墙子路上空乌云笼罩，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虽说墙子路是个小城池，但日伪的统治机构并不少，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南大街路西有日本守备队队部，兴亚矿警队队部，东街路北有伪警察所，西街有伪满洲兴隆县特务队队部，南门里东胡同有高周波矿务所，南关有新新矿务所。南门外西侧城根下是密云县日本 1418 特务队在墙子路设的情报站。

敌人的压迫

墙子路是一座不足 6000 平方丈的小城池，设有东、南、西三座城门。1938 年日本驻军后，将东门、西门用石块堵死，只留一个南门。同时又把南大街以西的南北小胡同中间堵死，大街以东的两条南北胡同也堵死一条，城内的百姓到田间干活，放牧牲畜等，南大街是唯一的通路。南门口两侧日本兵持枪站岗，老百姓出入城门都得向日本兵鞠躬。放牧牲畜的牛、羊倌最怕过城门，倘若牲畜在日本兵面前拉了粪，就必须打扫干净，否则就得挨打。

日本在墙子路的情报站，特派员是赵星三、赵同禾父子，他们的任务一是盘查过往行人，发现疑点进行审讯和拷打；再就是每天

向日军递送八路军的情报。他们的情报来源除了自己搜集之外，还命令每村每天必须派人到情报站送情报，可他们得到的情报却是固定的：我村没有八路军活动，平安无事。一天两天过去了，时间长了特务们可不干了。1943 年夏季的一天，轮到老庙沟村刘永送情报，赵同禾说刘永送的情报不实，将他关押在日本队部。赵同禾这样做是因为他看中了老庙沟李××之妻，想霸占她，并放出风说："要想放出刘永，必须让李××之妻前来交涉。"老庙沟村百姓得知刘永被关押的消息后，知道这是赵同禾设下的圈套，经过商议后，乡亲们决定不能让李妻前去救人，只能另想办法。

正在这当口，刘永祥（化名洪福，八路军地下联络员）听说胞弟被特务关押，一时感情冲动，不听乡亲们的劝阻亲自找赵同禾要人，结果不但人没救出，连自己也自投罗网了，也被关押在日军队部。八路军得知此事，与日军守备队翻译官金森密商营救刘家二兄弟。一天下午，日军守备队队长斋藤好像有所预感，恐其营救刘家兄弟，把金森翻译官支走去密云办事（金森是朝鲜人，当时是高周波钨矿负责人之一，他经常独身一人来老庙沟村，以察看钨矿开采为由与八路军地下工作者联系）。在金森翻译官去密云的夜里，小日本就将刘家二兄弟用刺刀刺死在墙子路南门外。

时隔不久，伪满洲兴隆县宋清讨伐队（当时在三道河村驻防），来老庙沟讨伐，又将我地下联络员李连奎（化名齐天）、李凤明抓走。他二人受尽了严刑拷打，非人性地折磨，可他们宁死不屈，最后，被讨伐队杀死在三道河村西山脚下。

1940 年初夏，日本强迫墙子路和附近 10 个村的老百姓修南城门（城内两处坍塌）。各村按摊派的人数轮流服劳役，每天有 40 多人，驴骡 20 余头，到距墙子路村五里外的小关门长城上拆城砖并给背运回来。城门还没修完，又强迫老百姓背砖，各村摊木料，在南门城墙上建两层楼，便于敌人向四周了望。在城楼东侧的城墙上建浴池、厨房各一间，墙子路的百姓轮流给浴池担水。1941 年春，日

本又强迫老百姓到墙子路北城外挖长 300 米，宽 7 米，深 3 米的弧形护城沟。老百姓在服劳役中，不知有多少人挨过日本、警察的打、骂。

人民的斗争

墙子路警察所有一个叫高兴禄的（密云松树峪人），20 来岁，他是百姓恨之入骨的一个。每逢他在南门站岗便对出入城门的百姓百般刁难。修南门城楼时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对南门外大路上过往行人搜查、勒索财物。1944 年南沟村进步青年张金庭、贺少正，夜间悄悄摸进墙子路矿警队部，抢走三八式步枪两支。日军得知后满城挨户搜查，没有找到八路军的踪影，便将值夜班警察刘旭生带到日本守备队部进行拷问，没有结果，次日便把刘旭生刺死在南沟村外的马家坟。和刘旭生一起值夜班站岗的高兴禄听说刘旭生被日本抓走，他趁黑夜偷偷地从城墙上爬下跑了。当他跑到潮岭子村时天已大亮，他让老百姓备好毛驴送他回老家。老百姓认识他，恨不得当时把他碎尸万段。地方民兵向大家使个眼色，便备好驴把高兴禄送到瑙峪沟，就把他活埋了。

1945 年旧历 5 月初，日伪满宋清讨伐队百余人从三道河村出发，去苍术会一带抢粮，抢物，抢牲畜，准备过端午节。八路军郭子忠支队得到情报后，急行军翻山越岭在水泉沟至下圈的峡谷地带设下埋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宋清讨伐队几乎被全歼。一小股日军没从峡谷走，从梯子峪北山逃跑时，被八路军击毙一个。残余的讨伐队抬着十几具死尸，日兵用毛驴驮着一个死尸逃回了墙子路，把死尸放在墙子路城中心警察所前的空场上。讨伐队到各户搜木料，把檩子、柱子、杆子扛到空场，一层木料一层尸体摆放火化。火焰二、三丈高，威胁着周围的民房，人人提心吊胆。猛地一声雷响，倾盆大雨降下，刹那间大火被淋灭了，雨也渐渐地停了，全城百姓默默地谢天谢地。

敌人的力量虽然很强大，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却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有时搞得敌人胆颤心惊的。他们除了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和敌人斗争外，有时还做敌人内部的分化瓦解工作。经常给他们上一些思想政治课，进行形势教育。一次，地方区小队的郭占恒在西稻畦邓玉发家碰上了自卫团的三个人，郭占恒向他们讲了国内外的形势，告诉他们小日本的末日即将到了，警告他们今后再刁难百姓，给日本卖命，八路军记着你们的帐，人民总有一天会清算的。并让他们回去后在敌人内部做宣传。

日本侵略者在墙子路村驻了八个年头。这漫长的岁月，是墙子路人民受凌辱、奴役、蹂躏的八年，是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八年，是血泪仇、民族恨载入史册永世不忘的八年。墙子路村蔡德茂回忆说："金森翻译官在 1944 年离开墙子路时对我透露，日本准备在西门外挖个大杀人坑，要对百姓进行大屠杀，让我们多加小心。"幸亏共产党、八路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墙子路和周围村庄善良的百姓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日伪时期我的学生生活

蔡世龙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度过的。八年的奴化教育和身心所受的摧残使我终生难忘，回顾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奴化教育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开进了密云县墙子路村，从此墙子路沦为日本统治区。

1939年春，日本在墙子路村辅仁堂占用空闲房屋六间，建立了初级小学校，两个复式班，四个年级，男女学生50余人。教师是潘斌琪（籍贯不详），徐长荣（巨各庄乡金山子人），学董（教育委员）是本村绅士蔡荣臣。

学校建立后，驻墙子路日本守备队长小森常来学校，假充大善人，为学生买纸笔、赠款，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牛翻译经常来学校教51个片假名（日本正楷字母）和单词。潘老师是个亲日分子，为对日本守备队长赠款之举有所表示，他在教室内正前方悬挂木框纸匾一块，第一行填写××赠款××元。从此，凡来墙子路换防的日本队长来学校也效仿上任队长之举，在下一行填写自己名字、款数，表示日本人对中国青少年学生的关心，达到奴化儿童心灵的目的。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对外施用的“欲亡其国，必先亡其魂”的文化侵略和攻心战术，足见其对中国青少年一代进行奴化教育手段是阴险的，用心是恶毒的。1940年正月，我才十一岁，父亲将我送到伪满洲国兴隆县马圈子国民小学去读书。这小学校两个复式班两位

教师，我插班三年级，住在姥姥家。

来到异地“异国”小学念书和家乡的小学截然不同。日语是主要学科，日语字母、发音要从头学起。学唱日本国歌，伪满洲国歌（伪满洲国歌歌词是：“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背诵康德（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学做伪满的建国体操，这些都是我从前没听说过的东西，更得从零学起。当时我的日语成绩最差，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总算熬出了因所问非所答而挨打、罚站的困境。

我小学三、四年级班主任老师是兴隆县寿王坟人，名字栾九经，三十来岁，对四书五经、古典文颇有造诣，是受大家尊敬的老师。他写得一笔赵帖好字，刚柔并济，成为同学学习的楷模。他不教日语，也不重视日语课，教学以算术、国语（语文）为主。伪满发行的国民小学国语课本比现在的语文课本要厚 2 至 3 倍。栾九经老师除选择课本中有教育意义的寓言、修身、常识外，像宣扬日本神圣、明治维新、日满亲善、王道主义的篇章一律不教。他亲自去六道河伪村公所刻版，用油印机翻印《爱莲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腾王阁序》、《吊古战场文》等古文进行教学。在日伪统治时期像这样的不亲日老师我还是少见的。

1942 年春，我升入伪满热河省兴隆县国民优级小学（高小）念书。每天朝会（晨会）在上午第一节课前，全校师生按年级、班次列队站在操场上，面向正东方听值勤学生用日语喊口令：向满洲帝国皇帝陛下遥拜，行 90 度最敬礼（鞠躬）；再面向东南方，向日本帝国天皇陛下遥拜，行 90 度最敬礼。礼毕唱日本国歌，满洲国歌。再由体育老师带领全校师生做建国体操，后来又增加了农业体操，校长训话完毕开始上课。放晚学时全校师生依旧在操场列队，除不做体操外，其他程序和朝会一样，天天如此。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设日语课七节，上课时不准说中国话，回

答问题必须用日语，训练学生语言同化。1944年春我考入伪满洲国热河省立兴隆县国民高等学校（初中学制四年），奴化教育更加严重，日语课更是主科，凡在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达到日语三等翻译的水平。为适应当时环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不论在校内、校外皆用日语对话。

在学校内、外很少看到报纸，国际大事根本不知道。周会所听到的都是由副校长（日本人）宣传"日满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和太平洋战争的话题。街面上商铺、浴池、饭摊等屋内正面墙上都贴着"莫谈国事"四个大字。日伪宪兵、特务经常活动在这些地方，若被他们听到议论国事，就以"政治犯"论处。

日本以强化手段奴化、愚昧人民和青少年思想，历史课主要讲日本明治维新发展史，对于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领土，中日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等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罪恶史，从未在伪满洲国小学课本中看到过。

音乐课教唱日本歌曲：《爱国进行曲》、《爱马进行曲》、《日本纪元两千六百年》，还教唱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千里送京娘》、《送情郎》、《我是满洲姑娘》等把学生搞得昏昏沉沉，糊里糊涂，怂恿学生向往奢侈靡烂生活，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听到淫词滥调、靡靡之音。

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体现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同学之间不分年龄大小高年级学生有权打低年级学生，他让你替他干什么必须照办。在校外低年级学生必须举手向高年级学生致礼，和你谈话你必须立正听着。日本侵略者把训练军队的手段也同样用在伪满高等学校学生身上，使中国青少年一代不自觉地成为日本的小奴隶。

服装一律是黄色制服，戴日本军帽扎裹腿。扎裹腿也有严格规定，从脚腕开始向上绕两圈后第三、四圈必须在小腿中部外侧折叠两次，然后再向上绕三圈用小带系紧。这种扎法也有奴化教育，当

中折叠的意思是表示“日满亲善”，处处都渗透着奴化教育。

住宿生的磨难

我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是在学校住宿，生活是艰苦的。每个宿舍住六名同学，睡的是砖炕，从未烧过火，宿舍内也不生煤火，冬天就像睡在冰窖里一样寒冷。早晨六点起床，由负责住宿生的老师（叫舍监老师）带队跑步一千五百米。然后学生各自端着脸盆、漱具到井沿打水洗脸。冬季井沿四边是光滑滑的冰，井绳就像一根不弯曲的铁棍。这对十几岁的孩子实在难啊！待洗漱完毕毛巾冻挺了、手也冻僵了。

住宿生的伙食是一日三顿稀红高粱米粥，大咸菜有限（有时也能吃上干饭）。同学们最恨炊事员王师傅（兴隆县西关人）。学校规定吃饭时间15分钟。吃饭铃声响后，同学们在食堂门外站队进入食堂，在固定的饭桌周围立正站着等候老师说：“开饭！”同学必须用日语回答：“领受了。”意思是这碗饭是日本天皇赐给的，这才能端起饭碗匆忙地喝起来。王师傅明知喝热粥难进口、难咽下，他偏偏在吃饭铃响时才把沸腾的稀粥从锅里掏在大盆里放在饭桌上。还没喝完一碗上课铃声又响了。可恶的王师傅把剩下的粥担回家去，他也同样地在生活上折磨学生。

“日本四个爹”

1943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的下学期时，教我们日语的教师是日本名古屋人，名字叫宫布，30多岁，是副校长。他说中国话不太流利，发音也不准确。学生如果用日语回答错了他便狠狠地打嘴巴，学生不敢反抗。一次，宫布在讲课时用中国话说：“日本国是你们满洲国的亲邦，不是盟邦，也不是友邦。因为日本人解救了你们，才建立起满洲国。满洲国就是日本生下来的，满洲国是个儿子，日本是个爹，明白吗?”又说：“日本是个爹，满洲是个儿子”，让同

学们照他的话复述一遍。同学们听了非常气愤，谁也不说。宫布扳起狰狞的面孔骂了一声“巴嘎”。和我一桌的李泉林思维敏捷，爱说诙谐话。他站起来说：“宫布老师我会照你的话说一遍，日本四个爹，满洲四个儿子，对吗?”宫布笑了（因为他对“是”和“四”的发音是一样的）。其他同学都照李泉林的说法轮流说起来，宫布更加夸奖。突然有名同学没听懂这话的含义，便伸出四个手指说：日本四个爹，满洲四个儿子。这可捅了大漏子，宫布举手就顺着座位打前排同学的嘴巴。尚未挨着打的同学一看势头不妙只有跑之大吉，便不约而同地打开教室后门，绝大部分同学都从学校后门跑到后苗圃半天没有回校上课。宫布气急败坏地找校长，让把带头跑的同学交给他严加惩罚。多亏李校长从中斡旋，总算把这场罢课风波暂时平息了，可是宫布却记在心上。事过三个月后，时值数九隆冬季节，宫布以课堂秩序乱为由，让全班同学在教室外的背阴处站立45分钟，达到了他的报复目的。

肉体摧残

在伪满洲国的国民高等学校里读书，体育课是最残酷的。学校设教官、体育老师各一人。教官是东北人，行伍出身，粗通文化，他专门负责基本的军事训练。上课时每人手持一支木枪学练持枪姿式，卧倒、匍匐前进和投弹等。体育老师姓乔是关东洲人，黑红色的皮肤活像印第安人，学生给他取了个绰号：“体育棒子”。他专门负责体操、田径、单双杠、木马等课程的训练。在我记忆中，学校操场不论春夏秋冬从未扫过，夏季雨后操场的积水都是学生在上朝会做操和体育课趟干的；冬季操场的积雪不管多么厚也是学生天天踩化的。烈日炎炎他带领学生到操场上脱光上衣，面北背南地坐在地上晒背，所有的学生背都晒起水泡，脱过表皮；冬季越是下雪天不管地面积雪多么厚，让学生做俯卧撑运动。因寒冷手指冻得疼痛支撑不住腹部挨地时便是一顿脚踢，等起来时已成了一个雪人。

1944年旧历十一月的一天，朔风凛凛，雪花纷飞，下午第一节体育课铃声响了，我班学生站好队在操场等候乔老师上课。学生们都在议论着天下这么大的雪，天气又是这么冷，今天的室外体育课准不上了。出乎意料的是乔老师赤膊从办公室走到队前用日语说："脱光上衣，快！快！快！"。学生只好把上衣脱光放在雪地上。他带领学生跑步出校门从东关沿着大街跑到西关革新桥处返回，往返有五、六里。廖廖无几的街上行人说我们是疯子，有的人叹息地说："十多岁孩子也受这般折磨，日本人太残忍了！"

修神社

1943年初夏，日本在兴隆县后苗圃东侧占地约100平方米建神社一座（日本式的庙），内供日本天照大神。自破土动工到修完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日伪当局命令各机关、团体人员、学校师生多次到这里"勤劳奉仕"（就是被奴役的义务劳动）。自神社修完后，各机关、团体、学校所有人员必须按他们规定的日期到这里集会祭拜。把伪满洲国的人统治得忘了自己是中国人。那时期如果有人问你是哪国人，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满洲国人"。我也不例外。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1944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几个住宿生到大街去玩。一抬头看见伪满洲兴隆县公署门前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摆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这时想退步折回已经晚了，便低着头恐惧地走过去。日伪当局声称这是八路军的人头。学生们听说过八路军打仗非常英勇，曾杀死很多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十分敬佩。

"像这样的会常开才好呢"

日本投降前，日本和伪满洲国讨伐队经常到山区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每次日伪军出发扫荡

都要带回数量不拘的日伪军骨灰包。各机关、团体停止工作，学校师生停课到大街上列队迎接“亡灵”。1944 年夏季驻兴隆县的日本和伪满讨伐队约千余人到平谷县熊耳寨、土门一带扫荡，被冀东十四分区十三团击毙日伪军三、四百人。各机关、团体人员和学校师生到兴隆县西十四顷村接“亡灵”。残余的日伪军手捧白布骨灰包一个接一个地从西方向走过来。人们低着头脖子都酸了，再偷偷往西看白布骨灰包还多着呢！三天以后在后苗圃东侧搭起了白布棚，骨灰包一层层地码着足有一丈多高。他们还从承德请来和尚、喇嘛为死去的日本兵和效忠日本的民族败类超度。在烈日炎炎下这会整整开了三个小时。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说：挨了半天晒，课也没上成。一向沉默寡言的侯老师悄悄地说：“像这样的会常开才好呢！”当时我们学生都不理解这话的含义。

拨云见太阳

1945 年旧历七月初九日（公历八月十六日），早晨上学看到街上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谈论：“日本投降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了……”抬头一看，日本兵营内旗杆上的“膏药旗”也不见了。我便急促地走到学校，同学们都在奔走相告这消息。

九点多钟，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等候开会（日本副校长未到）。重新听到了用中国话喊的立正、稍息、敬礼等口令。年过 50 岁的校长以激昂的心情，高亢的声音向学生们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学生们的掌声不断。随后他含着泪向学生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自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侵略中国的罪恶史，这是我们学生第一次听到的。

下午全校学生不约而同地脱掉了日本式的黄色制服，扔掉了日本军帽，换上了家做的布衣裳来到学校。校长让我们把日伪课本、刊物、图书室有关日本历史的所有藏书全部搬到操场火焚了。至此受日本奴化、摧残的时代才告结束。

一个在日寇屠刀下活过来的人

冯庆和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盘踞在古北口至曹家路长城内外的日寇，推行惨无人道的“强化治安”，划“无人区”、建“部落”，并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清剿”、“扫荡”，实行法西斯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扼杀我抗日军民的救国运动。仅一九四四年，驻扎在曹家路据点的日寇就屠杀我抗日军民近百人，烧毁房屋无计其数。敌人的血腥镇压和残酷暴行，越发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愤慨。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组建了义勇军，建立了民主村政权，群众纷纷起来组织了爆炸组、除奸组、反特组等抗日组织，利用各种办法抗击日寇，不断给予日寇沉重打击。但是凶狠的敌人，疯狂地进行反扑，经常突袭我抗日根据地的村庄，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肆杀戮，对牲畜财物进行抢掠。抗日斗争形势，日趋严重。

座落在雾灵山脚下的遥桥峪村（为了便于抗日活动、传递消息、迷惑敌人，抗日组织内部称之为“长春村”），这个不足二十亩地的小古城内，集中住着附近四个小村的几百口人。这个村处在抗日前沿，是抗日政府干部和义勇军经常活动的地方。在这里废除了日伪的保甲制，建立了抗日民主村政权，而且不给敌人送粮、送草。一九四四年五月，遥桥峪村的抗日组织，配合义勇军在“二郎庙”埋设地雷，炸死一个日本兵，抓获两个特务，因此日寇更加仇视这个村，不断对这个村进行“清剿”。就在这年的八月二日拂晓，驻扎在曹家路的日寇，突然包围了遥桥峪村。全村几百口人和村干部被困在内，村干部想组织群众突围，但手无寸铁的群众怎么能对

付得了手持刺刀的凶狠敌人呢！村干部们只好冒着枪林弹雨突围了！大部分干部拚着命冲出去了！少数村干部和群众被残暴的日军用枪逼着，用棍子打着集中到小古城外。日寇在周围架起机枪，端着刺刀，举着大刀把群众围在中间。威逼群众说出谁是八路，谁是村干部？但是不管敌人怎样凶狠，始终无一人说出真情。这时敌人又换了个招术，把几十名少年儿童集中在一起，企图用哄骗手段得到真情，但仍然一无所获。敌人见用软的不成，又施毒计，单个进行威逼拷打。其中一个叫李大群的少年，被汉奸金翻译从人群中拉出来，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又用枪口对着他的头威逼他说出谁是“八路”，谁是村干部？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宁死不屈，咬紧牙关，总在回答着一句话：“不知道！”正在金翻译无计可施之际，宪兵队长冈奇对李大群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李大群毫无畏惧地回答：“我就是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冈奇，左手揪住李大群一只耳朵，右手拔出刺刀，把他拉到人群面前按跪在地，又用刺刀抵在他喉咙上，继续逼迫李大群说出谁是“八路”，谁是村干部？李大群以及群众都回答说不知道。这时冈奇更加凶相毕露，用刺刀猛刺李大群的喉咙，将李大群捅倒在地上，抓住李大群的一只脚拉到人群中，用刺刀挑开李大群的衣襟，冈奇一只脚踩在李大群的腿上，把刺刀抵在李大群的胸膛上，继续威逼，李大群仍然坚定的回答着一句话——不知道！就在冈奇将刺刀刺入李大群的胸膛的一刹那，一位大义凛然的中年汉子从人群中走出来了，大喊一声：“放开这个孩子！你问什么我都知道。”冈奇象得到宝贝一样对着这位高大的汉子说：“你的什么的干活？”大汉凛然正气地答道：“我叫张景荣。”冈奇又道：“你的大大的好，你的说出来皇军有赏。”张景荣说道：“你们要先放了这个孩子！”冈奇说可以。李大群被群众拥回人群中间掩护起来。张景荣见孩子被救出，就嘲弄地对冈奇说：“你只能知道我是八路军，你可以杀了我，别的你们什么也甭想得到！”冈奇面目狰狞凶狠地扑向张景荣，将他按倒在地，用刺刀向

他的胸部、颈部刺去，他连中七刀躺在血泊之中！……这时义勇军冲到南山，吹起了冲锋号！日寇狼狈地逃窜了！

张景荣这位英勇的斗士，用自己的生命，在日寇的屠刀下救出了少年李大群，他的壮烈牺牲更加唤醒了群众，那位少年李大群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永生难忘的惨苦日

陈汉文

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日子里，我回忆桩桩惨苦的往事。1942年日伪在北庄村设置了据点。1943年2月。即农历腊月初五这一天，冀东八路军三支队二营李满盈部队用引蛇出洞办法，把一部分敌人引出据点，在白毛峪将十五名日伪军歼灭。随后部队包围了北庄据点，拔掉了北庄炮楼。八路军打了一个漂亮仗。石匣日伪军得知消息后，立即增援来北庄据点和八路军打起来，由于敌众我寡，我们部队撤退了。

日伪军又重新占领了北庄据点。从太师屯和太师庄村抓来老百姓，重新修了炮楼。据点建立后，开始整治北庄村百姓。农历腊月初八这天早六点钟，日本鬼子跑出据点到各家各户搜查，把每户男人都赶到伪军据点操场上，约有七八十人。周围全是持枪的日本兵，还架着机关枪。日本军官大发脾气，逼问老百姓："八路军打皇军据点，为什么不靠拢皇军？有谁抢皇军东西？"在场的没一个人答声。鬼子又咕噜几句，还没人言声。就开始对人们连骂带打。首先打乡长康兆坦，随后打老百姓。我们在场的无人说话。敌人过来踢我脚和腿，然后又打我头部和肩膀。头被打了个口子鲜血直流。挨打的人不少，都咬紧牙关没人吭声。日本军官气极败坏地说："把老百姓衣裳全扒光，冻起来！"我们全脱了个上下精光，一丝不挂，在这天寒地冻、冰冷刺骨的北风里，从早六点钟一直冻到下午五点钟，我们的手脚全冻僵了。日本嘴里还在咕噜着，看来这不能算完。人们谁也不说话，日本没有办法啦！让一个人一个人地出去穿衣服。晚上回家时，多数人都冻病了，还有的人冻坏了身

体，干不了农活啦。

这个惨苦的日子，到任何时候也忘不了，忘不了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

依稀的记忆

杜长德

1940 年腊月，我那年才五岁。一天早上，我由借宿的邻家回家一看，我家低矮的小草房门敞着，一扇破门躺在地上，盛饭的瓦盆打碎了，稀饭流淌一地，屋里东西本来不多，也都乱七八遭地抛在了地上。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都不见了，只有年迈的外祖母一边抖抖瑟瑟地收拾着乱七八遭的东西，一边擦着眼泪，她告诉我："今天夜里镇罗营据点日本来抓你爸爸，没抓到，把你妈和你妹抓走了！"

家里只剩一个老人，我和姐姐便过上了流浪生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天的下午，我刚进我家的破杂院，就见到母亲盘腿坐在石块墁地的院子里，小妹在妈妈身边爬来爬去，周围有几位乡亲。

妈妈面色腊黄，头发散乱，上身一丝不挂，前胸、腹部和乳房上下全是像炸元宵一样大小的泡，有的泡往外冒血水，有的冒黄油。

妈妈把我拉到她身旁，抚摸着我的头，泣不成声地说："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见到你呀……！"

在以后的岁月中，听妈妈断断续续地诉说，我才了解了事件发生的原委。

那时候，家乡闹土匪，有一伙土匪抓一个姓王的老百姓，据说这个姓王的与我家有远亲。土匪为了要钱，把姓王的折磨得死去活来。父亲看到姓王的实在可怜，便出面说情，土匪才放了人。

姓王的逃走以后，投靠了镇罗营日本。他恩将仇报，反诬我父

亲通“八路”。

日本人接到密报，便来抓人。一个朋友给父亲报了信，父亲藏进庄稼地才躲过了这一难。

妈妈当夜被抓到了镇罗营，敌人硬说我家私通“八路”，还暗藏了枪支。妈妈抱定必死的决心，无论如何拷打，只回答一句话：“不知道！”敌人把妈妈的上身衣服剥去，仰面绑在长凳上，灌凉水，用成排的子弹头刮肋骨，点着了整箍香烧乳房、前胸和腹部，不管敌人用什么酷刑，妈妈始终是一句话：“不知道！”

妈妈被折磨得早没了奶水，八个月的小妹眼看就要饿死。因为母亲没供出任何事情，全村才免遭一次劫难。最后，村里凑了些钱，把母亲赎了回来。

往后，每当妈妈诉说完这段悲惨的往事时，总要长叹一声：“唉，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呀！”

妈妈的这声长叹，饱含着民族的辛酸和血泪，同时也是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

妈妈的这声长叹，也是民族抗争的动员令，这些国恨家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上了永不磨灭的痕迹，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一直促使我成长，激励我奋进！

不忘屈辱志更坚

赵品芝

我十六岁时，曾受过一次常人难以忍受的“洋罪”。我感到莫大的屈辱，致使我终生难忘。

事情发生在1941年冬，当时日寇侵华正在疯狂时期，抗战形势还是敌强我弱。密云潮河东一带，敌人活动猖狂，据点林立。除在石匣大据点驻有日寇、伪治安军、警备队、特务等敌人外，太师屯、北庄都有临时据点，敌人为保护自己，扩大势力，在据点附近村庄，都要组织棍团，给他们提供粮款、情报等，并把据点十里以内划为“爱护村”，十里以外划为“匪区”。每当敌人外出讨伐，“扫荡”我根据地时，就让棍团走在前面，给他们助威蹚路。

我家住在流河沟村，和东田各庄是一乡一会，离太师屯据点四华里，属于“爱护村”的范围之内。敌人多次催促东田各庄乡成立棍团，要粮，要款。此时，我抗日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抗日热情很高，棍团始终没成立起来。

这年腊月初三，太师屯据点的日本鬼子通知东田各庄乡，叫十六至五十五岁的群众都去开会。上午由保长带领一百五十多名群众到据点大院内（其中有我和我老叔），直到下午四点也没开会。只见日本队长加腾和翻译官唐某，出来进去观看人群。大约五点来钟，敌人突然把在窗根晒暖的刘绍红、赵林之二人拉出来，拳打脚踢、摔来摔去，之后又将他们拉到屋里，用烧红的炉通条烫肚子，说他俩在墙根下听声啦。那惨叫声阵阵刺耳，叫人听了心如火燎，急切万分。当时我想：下一个又会轮到谁呢？我们这么多人被几个鬼子和警备队管得服服贴贴，没人敢反抗，这是为什么呢？只恨当

时我们老百姓人心不齐，又没有武器，就只能任人宰割了。真是心散没枪活受罪，只盼有人来解围呀！

就在这同时，鬼子又下令：叫我们这一百多人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跪在地上。四周有警备队围着。由太阳没落一直跪到太阳出来。本来腊月天气就寒风刺骨，又光着膀子，敌人还不断向人群里泼凉水，真可说是雪上加霜，叫人难以忍受。次日天亮互相观看，各个都冻得不像人样了。脸是紫青的，嘴肿得大老高，两腿麻木，有的人都站不起来了。最后边的一些人，口袋里有钱的趁天黑塞给看管的警备队一点钱，从篱笆缝里跑走了约廿多人。

早晨以后，敌人又向太师屯、太师庄两村要水缸，不知他们又要怎样摧残这些人。为了营救这一百多名群众，保长设法向唐翻译手里塞了钱，我们这些人才结束了这场灾难。广大群众吃了苦、受了罪，对敌人是切齿痛恨。我心里想：不赶走日本鬼子是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啊！此后我懂得一个道理，过去因为我们贫穷落后，就挨外人欺侮；只有民族独立，团结统一，民富国强，才有力量，受屈辱的历史才不会重演。

国恨家仇不能忘

周全祥

我的家，祖居山东，早年逃荒到河北的密云，先后在清水潭、燕落定居，后来又迁到燕落庄北的塔沟，开荒种地直到1948年解放。解放前的几十年间，几辈老人勤劳耕种，有时也能达到不愁吃穿的地步。但是，不断的天灾人祸，使我家几次陷入困境。特别是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在三十二岁逝世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又多，千斤重担落在我妈妈的肩上。可是，妈妈却经常说："人是创业之本，有了人，就能重新治家。"他正是用这种精神来辛勤劳作，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而她这种以人为本，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家最大的灾难，是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家乡制造的。

我十五岁那年，即1941年10月的一天，天亮前大批日本鬼子和"讨伐队"把我们村包围了。枪声大作，我出门一看，北面的山上满是鬼子。我想挑起水桶去挑水，敌人已经凶恶地窜到我家的院内院外。他们用枪把我围在当中，说我是"八路"，追问："你这里住着的八路上哪去了？粮食鞋袜藏在哪儿了？"我说："我们这里没住过八路，也没有存过粮食。"敌人先用刺刀捅我的前后背，又从屋里拿出一个板凳，把我按在板凳上，四个鬼子按着我的四肢，一个按着我的头，一个用凉水往我的嘴里鼻子里灌。我昏迷过去了。醒过来后，敌人继续逼问。这时敌人吹哨集合了，才把我放开，又叫我带路。我说我没去过远处，不认识路，一个敌人举手打了我两个嘴吧。他们滚蛋了。

另一次遭毒打是1942年，那时日军为阻断我山区与平原的联

系，要沿着山的边缘突击挖沟。沟长达180华里，宽3丈，深1丈6。敌人强迫老百姓去挖沟，村里派我去了。那年冬初，在燕落村东挖沟，那监工的鬼子嫌我干活儿慢，便用土块砸我的后背，一下子我就晕了过去。缓过气之后，抬头一看，有个鬼子正在沟的上坎叫我。我忍着疼痛爬到沟上走到鬼子跟前。他又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嘴巴，然后叫我回村去给他拿水果。

1942年10月的一天早晨，鬼子又一次将我们村包围。这天正巧区助理老郑同志住在我家。他警惕性高，起得早，到外边观察情况，发现南山和东山上都有敌人，敌人也看见了他。因为他地形熟，跑进北沟，敌人边打枪边追，老郑跑出了包围圈。我们家乘鬼子追老郑的机会，把猪、鸡轰出院外，大人孩子躲进屋里。凶恶的敌人返回之后，把大人轰出屋子说："你们这里住八路，不准在这里住了。"有的鬼子拿来柴草，点上火把房子就给烧了。大人跑进屋里把小孩和被褥等物品抱出来。敌人看着房屋烧完了才走。我家的房子衣物全部被烧毁，只好搬到村里投亲靠友来安身。

1945年，我19岁那年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到县大队三连当战士。我们决心消灭侵略者，以报国仇和家恨。当时正是日军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们会同地方汉奸反动武装，频繁地向我根据地袭扰。我地方武装与正规军配合，主动出击，消灭即将灭亡的日伪军。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投降。这一年9月，全连调到顺义县扩编，我分到一连当战士。当时顺义仍被日本占领，日伪的残敌还经常出来骚扰。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我们连每天深入敌占区，频繁与敌交战。我每次战斗都冲锋在前，多次受到连首长的表扬。

我妈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支援前线每年按时按质交公粮，赶做鞋袜，并经常教育我们兄弟姐妹要节约用粮，支援前线。他还多次无偿地给区干部村干部做饭。妈妈和广大乡亲一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尽了力。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可是今天日本的上层人物中，一些右翼人物仍然矢口否认其血淋淋的侵略罪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日本鬼子的死灰复然。

第十四专区密东办事处抗战期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调查表

1946 年　　月　　日报

项别／数目／村别	村庄受损失数	总户受损失数	烧毁房屋		死亡人民		破坏土地				掠夺资财粮食			损失牲畜					损失生产工具		
			间数	估价	死亡数	残伤数	沟壕	汽路	无人区	减少粮食收入数	钱财数	什物估价	粮食数	损失数				估价	损失数	破坏数	估价
														骡马	牛	猪羊	共计				
一区	37	11202	3898	20533610	221	33		591		1446338	1556600	22825800	932410	169	95	3551	3795	14984650	12117	5462	4613495
二区	32	324	1494	285086000	103	39	112	386		195140	1513500	40738000	5076	89	29	920	1038	39895000	370	369	163000
三区	28	1289	250	2500000	111	14		59		6700	1300200	1366200	420020	32	18	259	295	123130	232	130	108600
四区	20	96300	5017	10235843	200	35		10		3715940	11234	8720100	819400	262	115	2922	3081	10222550	3953	3410	1489650
五区	23	1586	3176	6771600	114	14	52	183	1616	2934890	11763300	20101100	428210	139	70	3946	3955	1810950	1884		445770
六区																					
七区	15		1542	2707200	54	13					300	16375	28005	118	10	282	410	989300			
八区																					

备考：

其他损失折款：一区
二区　3643000 元
三区
四区　1262200 元
五区　658400 元
六区
七区　9724765 元

编者注：按当时抗日政府活动区域：
一区为大城子镇苍术会一带；
二区为北庄镇大岭、北庄及太师屯镇黄各庄一带；
三区为新城子镇新城子一带；
四区在兴隆县境内；
五区为新城子镇大树洼、遥桥峪一带；
七区为巨各庄镇塘子一带。

填表说明：1. 粮食以斤计算，2. 土地以自然亩计算，3. 估价应按损失时的物价按米价计算折成款数，
4. 此表要详细填报，数字要确实。

密云县日伪合作社联合会简介

曹佩章

一、组织及目的：密云县伪新民会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人民财物，以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于1941年春，由伪新民会内分出一个“县合联会筹备会”，由日本人泉泽末治、中国人周兴武主办。首先召集各村镇一部分青壮年集训，学习合作条章，毕业后分遣回乡，组织各村镇基层社。同时县里组成伪合作社联合会，设有总务、事业两科，总务科分人事、庶务、会计三系，事业科辖有县城两所粮食交易场及石匣办事处两所交易场（牲畜、粮食），古北口办事处一所交易场，另组塘子、溪翁庄两办事处（不久即撤销），以上组织完成后，即与伪新民会分开，迁到县城南街路西广增益布庄，直属于伪河北省燕京道公署。

二、人事安排及调动：县合联理事会名誉理事长由历任伪县长兼任，前后有张鸿宾、杨香涛、韩宗琦、丁广誉等，理事有那元钧、冯广志、信佐臣、傅乃臣。日本人泉泽为专职常务理事，总务科长那元钧（东北人），人事系长唐德厚（东北人），庶务系长姓常（东北人），会计系长安仲琪，事业科长周兴武（北京市人），继任宋贵祥，最后是马振邦。县城交易场主任前后有张仲贵、王子章，曹庆勋。石匣、古北口、塘子、溪翁庄都设有办事处。1943年县合联会常务理事改为中国人，前后有那元钧、唐德厚。日本人改任顾问，先后有泉泽、粟仓、竹本等。

三、职员待遇，计分四等：一等为役员，多为日本人（待遇不详）；二等为会务员科长级，月薪50元（伪联币）以上；三等为雇员月薪35元；四等为见习雇员及博役月薪20元。后因通货膨涨物价飞长，每月配给实物，以维持生活，计有面粉、食粮、食油、火

柴、纸烟等。

四、主要任务及活动情况：该会开始成立，以改制便民兴利除弊为标榜，而实际愚弄乡民。初步在县城和各办事处成立交易市场以控制税收及斗户，交易员等佣金额外不得敲取。手续是物资成交后，由经手人开一小票，由买方持票纳税，凭小票开给正式票据，验票出场。票据每本百页，加盖钢印编号使用，采取用复写两份，一份交给纳税人，一份核算报表（斗税 2.5%，科 1%）。在 1943 年春曾籴进一部食粮（玉米），平价贷给各村社社员，秋后无息偿还（只办过一次）。此外每月事业科及各办事处配给社员一部紧缺日用品（煤油、火柴、肥皂、纸烟等）。综上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关心民瘼，但实际上未认真办理，甚至为一些不法分子蒙蔽操纵，便民成了害民，而合联会不过问，只注意数字调查，经常有日伪宪特人员到总会及各交易场查询。运输物资出入，均需经县合联会日本人常务理事签字盖章发给许可证，否则没收严惩。

1944 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撕去掩饰，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一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勒令各伪机关，集中一切力量，按期完成征收任务。伪新民会负责宣传动员，伪县政府负责催收监收，伪警队严格催缴，武装抢夺，伪合联会停止其它工作，负责收纳，筹设仓库，专人看管，逐日呈报，直至出库结算，如有违误，直接交日宪严惩。会后伪县政府随即紧急召开各伪乡保长会议，分配数字并宣布，如逾期不交者，即派伪警队强征，重则采取“三光”政策。此时正是城市居民配给 54 种混合面时期，乡间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幸有共产党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保住一些粮食和物资。虽然如此，也让日伪掠夺去一部分物资。仅石匣地区就强征杂粮 120 余万斤，花生三万余斤，棉花千余斤。1945 年春以后，陆续由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运往日本国。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还余一小部份杂粮，为国民党政府接收。

日寇掠夺沙厂钨矿

曹宗安

一、满山遍野钨矿石，被日本低价收购

1933年3月11日，日军进攻古北口，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开始，5月5日，日军侵占密云县城，8月侵占密云全境。日本人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到处寻觅调查，发现沙厂村附近山野有钨，1938年在久远庄村挂出“日本高周坡株式会社”的牌子，开价收购钨矿石。当时属沙厂村的南山、龙门山，属久远庄的马家坡、北科子峪等五、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满山遍野都是钨矿石。钨矿石是在洁白的石头（当地人管这种石头叫白马牙）上，一道子一道子漆黑铮亮的物质就是钨，十里八村的农民到山上和河沟里人挑驴驮，到收购点立即过磅出卖，含钨极为丰富的矿石，很快即被捡拾一空，以极低的价格，被“高周坡株式会社”收走。甚至把梯田坝坎墙的矿石也挖出来卖掉。地表的钨矿石没有了，手撸锄杠的农民，即三五人自由结合，置买铁锤、钢钎、雷管、火药，开山凿石，顺着矿脉把钨矿石挖出来卖。由于这些人没有受过训练，缺乏经验，只顾向前掘进，没有任何支柱保护措施，经常冒顶，造成伤亡事故。久远庄村曹宗信就是受害人之一。

大约到了1939年后半年，为了扩大采矿规模，即禁止私人采矿，统一由公司控制和垄断。

二、机械化流水线选矿

原来选矿厂准备建在久远庄村东，已经把北坡一座小山削成一

块平地，准备建厂房，山前河沟处已挖了一眼大井，考虑到这地方还小，缺少水源，不能满足扩大掠夺规模的需要，最后把选矿厂定在了沙厂村南山。由于规模扩大了，改由“新新钨矿”进行开采掠夺。

沙厂村南有一条红门川河流过，这条河源于兴隆县黄门子，流域面积145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3600万立方米，选矿厂用水绰绰有余。

选矿厂要用动力电，为了安全，把发电厂建在了密云火车站沙河村，通过高压线输往矿区和选矿厂。

为了扩大掠夺规模，坑道掘进都是机械化的，开始是电钻，后改进为风钻。选矿厂从沙厂南山顶直到山脚，各采矿井经过初选，把有一定含量的矿石集中装上小轨道车（工人们称之轱辘马）顺缓坡而下，直达选矿厂西山根，然后用两个卷扬机一上一下，把装矿石的车拉上山顶。自动翻斗把矿石卸到一个有坡度的大厂房里，用机械破成小块进入下一道工序电辗子轧碎，然后顺流而下，进入电磨粉碎成细末，然后用水冲向下一个工序。这道工序规模较大，有20多张十几米长，两三米宽的床子，床子上铺着厚厚的亚麻布，用电动机带动，不停的按固定方向抖动，废砂和水泄向山下，钨砂则落到每张床子一角的铁桶里，然后把乌黑铮亮的钨滩到水泥地面上晒去水分，由雇佣的男女童工每人手拿一块大磁铁，吸去矿砂中的铁。提纯以后，装在厚厚的亚麻袋子里，用汽车运走，掠往日本本土。由选矿厂山上流下来的黄沙黄水，像瀑布一样返还到红门川河里。

三、兰吉庆劳工部

钨矿的工人，大部分是十里八乡的农民，他们大多都有少量的土地，上夜班或白班都可以抽空照顾一下自己土地上的农作物，这叫两头不耽误。尽管工资少得可怜，为了生计，只能上班出卖自己

的劳动力，但多数人干活不出力，磨洋工。当时，工人中流传着：“磨洋工、磨洋工，拉泡屎一点钟”、“打不着偷懒的，专打不长眼的”。当时沙厂钨矿所属沙厂南山、龙门山、马家坡、北科子峪诸矿白班、夜班需要大量的工人，当地招工难以满足。从北京过来一个叫兰吉庆的人，他从良乡、房山等地招收大批工人，送到沙厂钨矿干活，住在沙厂村取名叫“劳工部”。工人通过劳动挣得的微薄工资，还要被“劳工部”剥去一层皮。“劳工部”内设有赌局，工人们除去矿上干活，晚上进赌场赌博，几天就把有限的工资输得精光，只能向“劳工部”借债维持生活，“劳工部”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工人，坐收不义之财！

四、白薯干、豆饼、混合面

钨矿雇佣工人每天考勤，半月发一次工资。工资发的是“准备联合”伪钞，数量极少，每半月发一点面粉，大约二十多斤。时间不长就发生了变化，只能发些白薯干和出了油的豆饼，这些东西，虽然营养价值不高，还能够填饱肚子。后来连这些也没有了，每半月发些“混合面”，人们也不知这种混合面是用什么做的，蒸出饼子是黑红色的，工人们吃了以后，肚子发胀，不舒服，因为没有别的可吃，只能咬紧牙关，用以充饥。工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五、收集情报。破坏抗日，杀害抗日战士

沙厂钨矿从表面上看，是日本疯狂掠夺中国钨矿资源的企业，实际上它也是日寇的一个军事据点。在沙厂，驻有日军中队，在龙门山、马家坡矿区场建有炮楼子据点。各矿区办公地均有在侵华战争前线退伍下来的日寇伤残人员当职员，严密监视工人。各矿区每天下班的工人数，都要以村庄为单位填表，汇总起来分析，哪些村可能有八路军活动的异常情况。再就是通过矿山上的日本职员，拉

拢、策反抗日力量。大岭附近的杂牌武装果玉春部，被八路军三支队收编为二营。钨矿日籍职员山口千方百计拉拢果玉春部下的连长曹文田，他俩竟成为拜把子兄弟。山口多次策反其带队伍投降，被曹文田拒绝而恼羞成怒。一次，日本武装人员拂晓把曹文田围在家里，曹不慌不忙开门就是一梭子，竟跑掉了。一次日本人探知他和另外两名战士住在沙厂，五六车日军将其团团包围。这时山口进院作最后的劝降，一掀门帘，曹文田扣动板机，一枪把他打死，日本鬼子急了眼往院子里冲，曹文田一枪打死一个，一时打死两三个，日本鬼子不敢进屋，最后上房用于草泼上汽油把房子点着，要把曹文田烧死在墙角里。曹文田把两把手枪子弹打光，把枪拆成零件扔掉，用棉袍蒙上脸被烧死了。日本人山口千方百计拉拢策反，曹文田与其拜把子，无论怎么说，绝对是错误的，但最后不听劝降，打死山口和两三个日本鬼子，还算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反抗侵略者的天理良心。

与曹文田同住在沙厂的另外两名战士，先后从包围圈里往外冲，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

网罗汉奸特务，杀害抗日战士。1944 年 12 月 26 日，在公安助理刘存生同志带领四名公安战士到达岩村与村民商讨除奸任务时，驻沙厂矿山日军头目名禾接到达岩伪保长杨玉文派齐生伦送的情报，出动 80 多名日伪军把达岩村包围。公安战士齐殿儒、赵玉忠、赵玉堂三同志在突围战斗中牺牲，赵士起被俘。为此，日酋名禾还赏给杨、齐面粉各一袋、白糖 20 斤。沙厂钨矿不仅是掠夺钨矿金属的据点，也是日本人搜集抗日情报，围剿杀害我抗日军民的据点。后来杨、齐二人被我逮捕，处死了杨玉文，重判了齐生伦，为在达岩牺牲的同志报了仇，雪了恨。

人们可能要问，日本到底从沙厂钨矿掠夺走多少钨砂，这个问题是不好回答的，这个数字是绝密的，全由日本人控制，中国人是无法知晓的。但从 20 多台选矿床黑天白日在那里哆嗦，选矿车间从

半山腰泄下的黄水黄沙像瀑布，大卡车每周运往县城三四趟，可以看出其劫掠的一斑。

1945年7月23日左右，沙厂钨矿的日本人（包括职员和家属）夹着尾巴狼狈逃回县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里成了国共拉锯的地区（距离县城38华里），国民党军队经常出动奔袭。抗日军民怕这里被国民党军队安上据点，有意把能住人的地方进行了一些处置。一次国民党军队突袭到沙厂钨矿，可拿可动的统统洗劫一空，连写字台上的大玻璃板也都运走，这里成了没人管的所在。周围十里八村老百姓眼见国民党军队抢劫，也都动起手来，所有的机器都砸成铁块，人挑驴驮运走，很快被夷为平地。当然，抗日政府也把能搬动的对修理机械有用的车床等运走一些。

建国以后，于1950年1月，沙厂钨矿恢复生产，隶属河北省矿务局，到1950年底产钨精矿粉41.65吨，后每年产20吨。由于富矿全被日本人掠夺，以致矿源枯竭，至1962年沙厂钨矿停产。

和沙厂钨矿同时被日本人掠夺开采的还有墙子路、货郎峪矿。

日本投降，欠发上千名职工半个月的工资，希望有心人手里有充足证据的人站出来向日本索赔。

日本统治时期的墙子路钨矿

张守太　蔡德茂口述　蔡世龙整理

墙子路的钨矿蕴藏量丰富，西从苍术会北山的璃玉沟，东至墙子路东的老庙沟，长达二十华里，矿线长，矿石含钨量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地方掘开地表层不足一米即可挖到矿石，当地人们说墙子路的钨矿“顶皮红”。1938 年日本在墙子路设据点后，第二年夏季，日本矿业商人陆续在这里设立了收购钨矿石的机构。当时有高周波、九洲、新新、兴亚株式会社下属的矿山矿业所。高周波矿业所隶属密云县沙河矿山事务所，所址在墙子路东大街蔡德茂院里。兴亚矿业所在现在的卫生所院内。南关有九洲、新新矿业所，分别在王玉有、贺庆贵院内。这四家矿业所唯有高周波矿业所的实力雄厚，是日本人长田伯玉经营的，工作人员有经理、会计、保管、验质、过磅、庶务各一人，都是中国人，其余三个矿业所各只有两名中国工作人员，负责收购、外运业务。

因为钨矿线埋藏深浅度不一，因此按地势开采的矿井有立井、平坑、明槽三种。采矿工人都是当地群众自愿结合的小组，每组四至五人，生产方式是靠手工钎钻镐刨。工人从井下用筐背出来混矿石，再进行挑选，然后肩挑、牲畜驮，卖给矿业所。矿石按质分为四等，依等论价。从 1939 年到 1941 年的两年中，高周波矿业所的日收购量可达一至二吨，九洲、新新、兴亚矿业所的日收购量可达二至三吨。高周波矿业所有载重两吨的福特专用车一辆，平均每天往密云沙河火车站运送一次。

1941 年秋，新新矿业所与塘子矿山矿业所合并，九洲、兴亚矿业所辙走，高周波矿业所被华北重工业公司接管经营，改名华北重

工业公司墙子路矿山矿业所，其主管人是日本的西田，翻译是朝鲜人金森，工作人员与以前的编制相同。1942年春，他们就地收购矿石，就地提选，并在墙子路城内东南角占地1500平方米，建起了选矿厂，设备有立式发电机组一台，粉碎机一台，电碾子六盘，洗池四个，淘汰盘五部，技术人员都是从外地雇用的。1944年西田和金森调去密云后，该厂就由一个孙经理维持经营，直至1945年旧历七月初七日日寇投降。

日本投降时，驻墙子路的日本兵偷跑到兴隆，只有伪警察、自卫团驻守，我地方武装歼灭了这伙武装后，为防止敌人卷土重来，将这个小工厂砸毁。

亚细亚金矿

康兆祥、白凤岐口述 陈庚明整理

日寇侵华期间，除在密云沙厂建立钨矿外，于1939年又在古北口建立亚细亚金矿。矿址在古北口河西西桃园里边王家沟，矿伕有150多人。矿伕长是张振清（古北口河西人），另一个是张振义（口外小白旗人），矿伕都称他们为把头。张振义是副把头，他的任务是派工、记工、安排活茬，监督并带领矿伕干活。

亚细亚金矿公司设在古北口河东大街石桥南路东。在开矿期间，先后更换过两次经理，开始是白井、中泽铄矿，以后是近正冲雄，都是日本人。具体工作人员，除日本人外，还有朝鲜人，翻译是康兆祥。

矿伕中，除20多人是副把头张振义从口外小白旗带来的之外，其他120多人都是古北口的当地人。每天上两班，白班上午八点开始干活，下午五点收工。夜班下午六点上班，夜里两点下班。工地设有伙房，中午可以在工地吃。但古北口人大都是自带干粮，主要是窝头、小米饭。矿伕的工资，每人每月30－40元不等，主要是根据本人的技术条件而定。会看线追线，会号炮眼，出矿砂多，挣钱就多。不懂技术，就干扛矿砂、打炮眼的累活，挣钱就少。虽是月工资，但也按出勤天数计发，误工多少要扣发多少工资。负责修路的工人挣钱更少，月工资只给10元。工地设有工具保管库，施工需用的尖镐、铁锨、锤撬、口袋等由工地领取，下工时收回，使坏了可以换，无故丢失要赔偿。现场有医务所，一般工伤可以到所里去上药，不用花钱，但其它疾病工地不管。

公司还规定，每天中午为放炮时间。因此天天接近中午时分，

由公司经理或副经理带着炮工和爆炸物品来到工地，一方面检查工地的施工情况，另方面监督使用爆炸物品并向矿伕长交待任务，放完炮又把剩下的爆炸物品带回。

工地没有提选设备，开采的矿石大都装火车运往东北去提选。到 1941 年秋，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停止运输，矿石也停止开采，矿伕相继解散，剩下部分矿石也不要了。这是日寇侵占古北口期间，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一个铁证。

日寇掠走古北口长城砖

孙义口述　蒙冠贤整理

1938年秋（农历八九月间），我被抓去给日军当劳工。有一天上午，我看许多日本关东军和抓来的中国劳工，正在拆古北口长城。将完整的城砖，有长方砖，还有三角形砖都装上了火车。拆城地段大都在蟠龙山上，东从第一座五眼楼起西到古北口关门，直到水门洞崔家地，长约有五华里。城砖装上火车，向长城外所谓满洲国方向开去。共运走三车皮，是我亲眼所见。

日本军人船生退助谈无人区

佟顶力译　李运亨供稿

按语：本文译自日文《侵略》一书。此文作者系侵华日军驻密云县白马关的日军战犯。他把制造无人区的亲身经历及杀害白马关附近群众的心态先写进日记，后又写成此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我们中队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从河北省密云县西驼古村转移到该县白马关，在这个村庄里整整驻扎了一年。白马关在密云县和热河省司营子村交界。这里，背靠长城，山峰连着山峰，地势极其险要，是个四、五十户的村庄。周围有五米高的坚固城墙围着。在距离约百米的东面高地上，有几百年前用砖修建的一个大瞭望楼，瞭望着四周，象个大望远镜似的，是一个重要的据点。这里群山环抱，壁垒森严，对防备八路军的袭击来说，和以前在西驼古相比简直是安全的场所了。因为我们把城圈里的中国人一个不剩地赶到城外，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心地睡觉。为了执行新的任务，这里又是中心地点，所以，我们修了汽车路，交通也很方便了。

我们改修宿舍和对附近村庄的治安工作告一段落后，就已经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一天，中队长大野中尉，把中队仅有的十四名下士官（班长）集合在中队事务室。当时，我睡意正浓。

“咚、咚！”我被敲门声惊醒了。

“谁？进来！”我在被窝里大声叫嚷。

“分队长，队长叫你！”

“什么事情？”

“不知道，让你到事务室去！”传令的中村一等兵说完就回去了。

我把军毯踢开站起来，从背包里抽出铅笔和信纸，朝事务室走去。快十点钟了，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无云的晴空，天气已经有些暖和了，东面高地班哨的哨兵，已经换上战斗帽了。

走进事务室，三波中士和武田分队长正在看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好象有什么重大新闻似的，我也站到了他们旁边去看。只见图上是：以长城线为中心，两侧用粗红线分别画出几个圆圈，再用细线把其中的圆圈斜引出来；在上角印着两个红色大字："机密"，下边写着“西南防司令作战命令（关东军西南防御司令部作战命令）第×号副图第×号”。指挥班长间濑准尉进来说：“队长有话，从现在开始，今后的作战行动……”。他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队长叫我和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开始有些茫然了。

先任军官北里少尉，看到大家都来了，对刚提升的见习军官若僧生硬地说：

“喂，让间濑向队长报告去！”

间濑也没有回答就进了队长室。间濑从队长室回来，好象挟着作战命令和各种治安规定。大野抚摸着胡子也出来了。边坐下边点烟……。

“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对中队来说是非常有干头的！”大野这些话既象是他很有抱负的自言自语，又象对我们嘱咐的口气。此时此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所说的这个新任务，是共匪超过长城线侵入滦平县，治安情况非常不好。为了使共产匪徒不能进行军事行动，消灭敌人的根据地，所以把这个地域搞成完整的无人区；同时还要对共产匪区的居民防止赤化，要完全切断他们和共产党、八路军的联系。办法就是，长城以北这个地域的零散房屋，一间也不留，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指定地点，周围修起高墙，组织训练自卫团，发枪，防止八路军进村。关于这些任务，是根据满洲国

政府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对司营子警察署直接下达的命令制定的。协和会也要为这个任务进行宣传，我中队有指导这个任务的责任。长城线以南和这个地域一样，一间房子也不留，全部烧掉。不允许种任何庄稼，就是一个中国人也不准住。如果发现情况，当作敌人枪毙……。这个方法叫清室空野。这样做让共匪得不到粮食和无法宿营，我们可以建立起完整的治安。这是西南防御司令长官安藤忠一阁下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阁下的命令交给我大队、中队的一个新的任务。

大野把墙上挂的无人区构成图，用桌上的尺量着说："从明天开始，中队执行这个作战命令规定的方针：为了建立无人区，我们要进行扫荡讨伐，把所有房屋统统烧掉，追赶射击中国人。"

"布告：严禁从这里进入南边无人区，进入者不问任何理由枪毙!"这是司营子警察署立的牌子，已经过了半年，写着字的木牌都黑了，可是布告的内容还是清清楚楚的。已是九月下旬了，各分队长站在长城线上，冒着晚秋刺骨的晨风，围着这个布告牌在山上休息，等待着中队长的前进命令。

这是在白马关西南十公里处，是附近最高的山。山下处处露出浅黄色的岩石。山下几条水流从长城线向东南淌去。这些大小水流，通过几道山谷，经过白马关到密云，在一个大山谷里汇合。我们中队总是以这里的一个山谷为中心分三队前进。我们把这一带峡谷叫西白莲峪。当然所说的西白莲峪是一个村庄的名子，可是从清室空野以来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什么西白莲峪，连一个村庄的痕迹也没有了。要不是因为只剩下烧塌的残墙断壁，更无法辨认了。我是机枪分队长，和中队的指挥班一起下到这个峡谷。

"喂！那不是人嘛!"中队长指着南面说着。全班骑上马立刻前进。他拿着望远镜，盯着南边山上。我也停住脚拿起望远镜看，距离约三百米处，有个留辫子的大男孩，在前面稍高的山顶上，利用杂乱东西掩藏身体，只露出头向四外张望着。他像老百姓模样，清

清楚楚的映在望远镜里。“队长！是老百姓吧？可是有些奇怪，也许是八路军的瞭望哨！”我这么一说，大野命令：“开枪！”我平时以名射手自居，这时正是在部下跟前露一手的好机会，就拿起勤务兵的步枪，准备射击。这个老百姓好象发觉了什么似的，急忙向侧翼山谷逃去，一下子看不见影儿了。

“喂！畜生，看你还是怕死，逃跑啦！”我失望地把枪还给了勤务兵。

“喂！指挥班，下面谷里有间房子！和左侧高地的第二小队联络。”大野命令着。

“喂！吉泽少尉，和第二小队取得联络，命令卫生班长立即烧房子。”大野又说：“中队在那边地里休息！”

小队长吉泽少尉接受了命令，给我们作了指示。我带着斋藤上等兵及松田新兵，和第二小队联络，下到沟里一百米处，我们见到有用丁字形围着的一间农屋，按照那个作战命令开始行动以来，我们中队不断地到过这一带，附近连个小猫仔儿也看不到了，只有这间房子原样不动地剩下来，感到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又感到这里违背司令官的命令的。虽说到这里来过几次，也许因为地形复杂没有发现。但到底是队长作战有方，一眼就看见了这里还有房子。前天本部的松原中士来说，第一中队在全大队是成绩最突出的，现在又是队长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房子，今天把这间房子烧掉，中队又有成绩了，那我们分队……。我边走边想。我对别人有成绩，或者觉得心里不痛快的时候，都怨恨队长，就好象自己部下挨揍，生一肚子气似的。

“分队长，你在外边吧！”斋藤上等兵说着先进去了，在味道难闻的房门口，身体依托着左边的门框，把刺刀伸进院里，一面注意屋里动静一面向我报告。听斋藤那么一说，我怕万一有问题，赶快拿出十四年式手枪，把挎在肩上的背带，转到左手前边，一面作射击的准备，一面跑过去，提心吊胆地走进屋里。

“你——小孩吗？快走！”我拿手枪指着一个孩子大声嚷着。孩子后边炕上有个年龄很大的老人“哼、哼”地躺着。一个大孩子有七岁，估计是哥哥，还有一个孩子是弟弟，恐怕只有四、五岁。小孩一边注视我，一边对老人说话，说些什么，我不明白。两个孩子都是长着红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的衣服呢！只是破烂布挂在肩上，缠来缠去也没遮住一半肚子；脸上露着骨头，从下腭到脖子以及大腿上，覆盖着很厚的泥垢，好象黑漆一样。脸上青肿，没有血色，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脚和膝盖很大，很显然是大骨节病。脚和膝盖咯嗒咯嗒地颤动着，可是眼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你这小子，还很神气呢，快走！”小孩象等着爷爷给指示的样子，又注意看着，不断地向爷爷使眼神儿。在旁边站着的斋藤上等兵到他跟前说：“小孩子，快走！”他害怕地用脚蹭着地面。这时爷爷一使眼神儿，他好象带着爷爷的力量，拨起腿来，摇摇晃晃地躲开我们往外逃跑了。我们走近一看，这个“哼、哼”的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啊！这个老头是孩子的爷爷吧！”我心里估计着。他穿着破烂衣衫，炕上铺着谷草，在上边躺着，腰上扎着一条布带，胡子黑白相间，脸色发青，非常瘦弱，眼睛塌陷，有些慌张，身子不动，只是脑袋伸向这边，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使人感到害怕。他两臂无力地放在胸上，可是手却握得紧紧的。“哼、哼”的声音愈来愈大，震着我的耳根。“这老头，耍花招，喂，有没有八路军？”这是我们抓到中国人时的习惯问法。我用左手的母指和食指作成“八”字形质问，可是老人什么也不回答。

“喂，船生分队长，干什么呢？”吉泽小队长来这里检查情况，在屋前边吆喝起来。

“是！小队长，有个老糊涂躺着不起来！”

“点火，点火他就出来啦！”吉泽一边说一边只是把脸伸进房门看看，立即回到指挥班的位置去了。

“唉，我们是同年兵，给你点面子，何必这么啰嗦！这不是用

手比划比划那么容易的。”我这样嘟哝着。“这个犟老头，快走，这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在这里干什么？若是不听日本军的命令，我们会不辞辛苦地每天都要来的！喂，斋藤、松田，把那边堆的高粱秸什么的都抱过来，堆好！”我指着站在锅台旁边的两个士兵下达了命令。

“是，斋藤以下两名去抱高粱秸！”斋藤复述着命令带着松田出去了。那时我开始想到老人是否把什么东西都藏起来啦！看看屋里，四壁徒空，没有任何一件家具，只是锅上有个用高粱秸编的锅盖，上边有一个白色茶碗，好像锅里有汤，还在冒着热气。打开锅盖一看，煮着半锅树叶和野草，黑乎乎地沉在汤下。“这家伙吃这些东西啊，住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是每天采些树叶晒干后留着冬天吃。那末刚才在山上看到的那个人是这家的男人喽！我肯定这两个小孩和老头做不了什么事情。但从那个男的在山上监视我们的情况来看，还是和八路军有联系的，留下这口锅会给八路军利用，砸碎了事。我一边想，一边把手枪装进套里，门口有块大石头，两手抓起来对准锅灶砸去，一声巨响，锅碎了，汤流进灶坑的火里，发出吱吱的声音，白烟和灰混在一起，冒到上边飞散，我觉得有些恶心。

斋藤和松田把步枪背带挂在肩上，把抱来的高粱秸、谷草和木柴堆好了，恰好堆了有齐胸高。老人觉察到祸事临头了，但仍躺着不动，只是脸朝着这边儿仇恨地注意着我们的行动。

“斋藤，够了！”说着我从上衣兜里拿出火柴。“喳喳”，把点着的火柴放在柴堆下边易燃的谷草里，一面看着老人的态度的变化。可是他还没有起来。烟开始从堆积很厚的草里滚滚升起，一冲到天棚，就突然扩散了。

“喂，在天棚上点火！”我一面命令斋藤和松田，一面用燃烧的谷草照亮，从炕上往天棚点火。几条火柱爬到干透了的天棚，集中到中间梁上钻进屋脊里边。

“喂，出来老头！”我叫着。这里，斋藤和松田脸上出现“老人若是早出来就好啦，可他就是不想从屋里出来。”他俩已退到外边，我的脚却放在门槛上，窥视着里边的情况。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手枪取出来放在身后，上半身仍伸进屋里……。

“哎呀！哎呀！”烟已把老人的身体遮盖住。他嘴里说着：“妈的！”突然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右手支撑着上身坐了起来，他的半个肚子都是灰黑的，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他用支起的右手抓着谷草，紧紧地闭着嘴，抽搐起来，下颏的胡子微微颤动着。

“妈的，叫你们杀吧！”看出来是对我们强烈的反抗。老人拼命地挣扎起来，半个身子离开炕面，“咚”的一声两手扑到坍塌的锅台上，滚落到燃烧着的大火旁，火几乎把他的全身盖上啦。浓烟在翻滚，烈火在燃烧，可是却听不到老人的动静了。“弄成这个样子，叫你出去你为什么不出去！”可是我心跳、头晕，想克制自己，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火已经把这个屋子完全吞噬了。

我跑了出去。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藏着的两个小孩，也跑出来了。

“着火啦……爷爷！”他们叫着，大声喊着，像乞求神仙帮助他们似的，两眼朝天哭喊着。他们跑进屋里，想解救老人，但是火从天棚上落下来把老人和孩子隔开了，火把孩子的身体完全盖住。

“哎呀，畜生，要烧死的，快到屋外来！”可是两个孩子谁也不听，哥哥进去了，弟弟也进去了。两个人轮换着进进出出。“唉，把那个老头杀了，小孩子留下不合适。”我又想起刚才在山上逃跑的男人来。“不，为了确立治安，应该搞得更彻底些，为了中队的成绩……，我们今天是有功绩的。”这些想法给了我决心。“喂，斋藤，给我打！”“班长！打吗？”

“喂！队长说过，在无人区的人都要枪毙！”我又那样命令着。斋藤无法反问。也许他在想：“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眼前又有新兵松田，执行命令就是了。”于是他把枪架在土墙角上瞄准

小孩。是哥哥的那个小孩走到锅灶前又往回走去……。

“哨”的一声，小孩躺在了灶旁，用右手抓住锅台。

“松田，这回该你啦!”松田有些动摇不定。也许他提心吊胆地想：不叫自己干多好。可是，我训斥他：“快干!”他慌忙端起步枪，连保险也没有打开，枪栓咯嗒咯嗒地左右转了两三遍，就是拉不开。

“混蛋，往左扭，快干!”象是弟弟的那个小孩看见哥哥倒下，要跨过门槛跑过去。我想：“那个小孩不知道害怕吗?”他靠近哥哥身边，刚刚弯下腰的时候，房梁突然掉下来，把他掀了个脚朝天，正当他拼命挣扎的时候，“哨”的一声，就倒在哥哥的身旁……。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船生分队的成绩：“消灭山里农民一个，烧毁房屋一间，遗弃通匪嫌疑者尸体三具。”这是由户田中士亲手记载在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第十七大队第十中队的军中日记里的。

审讯“八路”战士纪实

原田左中（日）
（作者为日本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备部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宪兵军曹）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一书，作者是日本投降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拘留的战犯，原文在1955年前后写成，较系统地描述了日军侵略者在密云地区犯下的罪行。本文题目为编者所拟。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们虐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其手段之残忍凶狠，实在令人发指。这些血淋淋的罪行，由当年的侵略者自己如实交待，读后更会激起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希望本文的刊出，能够使大家重新回顾当年密云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野蛮罪行，了解中国昨天的历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不忘过去，珍惜今天，建设未来。

这里是河北省密云县曹家路村。村子被一道残破的土墙围着。村里大约住有150户人家，800多人，大部分为农家，另有两三间杂货屋和一间蹄铁屋。村子的中间有一条叉路，村子的南面是一片宽广的麦田，青色的麦苗被军靴和铁蹄践踏过，但它仍然深深地扎根在大地之中。远处连绵起伏的秃山峰像哨兵一样环抱着这个小山村。

土墙外的右角有一座4米多高的岗楼，上面插着一面太阳旗，两名头带钢盔、荷枪实弹的哨兵，像两只寻找猎物的饿狼一般在旗下来回走着，一挺轻机枪的枪口正冲向南面的山口。1941年初，为

了围剿八路军，关东军派出了第二独立守备第七大队的三中队，由中队长中山照次大尉率领 130 人在这个村子驻守，我当时是这个中队里的一名宪兵。

1942 年元月下旬的一个夜晚，100 多名日本兵在村南的广场上吵嚷着集合。我穿着便衣，手提着棒子，副宪兵博士元排在我的前面。中队长中山大尉喝得醉熏熏的，满脸通红，吐着满嘴的酒气，挺着狗熊似的大肚子出现在队伍前面。他一边拿着战刀叩打着地面，一边像发狂似地大声命令道："这次扫荡大概两星期，地点是五龙山（即雾灵山）一带。有人报告八路军将在春节期间在五龙山地区聚集，我们中队要对八路军进行围击，这次扫荡的任务是彻底地消灭他们。你们要见一个杀一个，不许放过一个目标，必须执行！"

士兵们眼里露着凶光，一个个点头称是，"为了再在肩章上加一个星，我会狠狠干的！""终于有机会让我一显身手了……"士兵们个个都下定决心发下誓言。当我听到中山大尉杀人的命令时，感觉浑身的血液倒流，我暗下决心："太好了，我会趁这个机会能多杀就多杀一个，能多抓就多抓一个，展示出宪兵的威风，给那些下级军官们看看，挫挫他们的傲气……"我脸上不禁得意洋洋起来。

几十分钟后，我和博副宪兵、高桥班长及两名士兵一行 5 人离开曹家路，去当先行兵。正值夜深人静，周围一团漆黑，附近的山峦如同被黑布包裹着，偶尔几声犬吠划破夜空。我听着每一步的脚步声，注意着附近的情况。大家一言不发地向前走着。

刚登上通往小山的山路，突然前方传来一些响声，我立刻停了下来，把手枪紧紧地握在手里，全身不觉有些颤抖，腋下也渗出了冷汗。大家一个个地也都举起了枪。只见一只黑乌鸦从路旁的树丛中飞起，"哇"的一声，从头顶掠过。我们心里"咚"的一下，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混蛋，竟敢吓唬我们。"有人生气地骂道。

我们再次悄悄地向前走，穿过大树峪村后，向南又走了两公

里，在前方150米处看见有一个人影在晃动。我想这回可不能输给高桥班长，于是向他打了个手势，在路边的洼地里埋伏下来，观察动静。只见这个人影慢慢向我们走来了。这时时针已过了12时。

“高桥班长，请在这里警戒。”说完我和博站起来，向那个黑影走过去。在离他15米远时，博喊道：“站住！干什么的？”听到问话，这个黑影马上转向朝来时的路逃跑。“他妈的，敢跑？追上他！”追了200米左右，人影跑到了路边的麦地里。“叭叭”我放了两枪，“站住！再跑就打死你！”只见那人迅速伸手摸了摸上衣口袋，这才松了口气，不再逃跑了。我嘿嘿笑着走近他，猛然用棒子朝他打去，接着猛踢一脚，这个男人好像被打昏了似地倒在地上。

“你这混蛋，让你跑。”我说着朝他腰间又狠狠踢了一脚。“啊”那男的低低叫了一声，脸对着地面，肩膀颤抖着。

“站起来！”我命令他，接着又给肩头一棒，那人一动不动。“起来，搜身！一张纸片也不许漏掉。”随后，博凑上前去。这时一个背着枪的士兵也气喘嘘嘘地跑了过来。“去，看看他来的路上，有没有撕碎的纸片之类的东西。”我又命令道。士兵小心翼翼地边看脚下边向来时的方向寻找过去。“起来！”等了一会儿，这个人还是没有一点站起来的意思。

“你这个混蛋，别想装蒜。博！把他揪起来。”博一把抓住那人的脖领，像拎小鸡似地把他给拎起来，可是那男人一动不动像块磁石紧紧吸附着大地。“畜生！”我朝着他的肩头打去，一种被嘲弄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和博一起用力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拽了起来。那人站了起来，两脚沉稳地踏着地，锐利的目光直视着我。他的年纪看上去大概在30岁左右，身着黑色棉衣裤，络腮胡子，头发有两三分长，像个纯朴的农民。

“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逃跑？”我举起棒子怒吼着向他的胸部打去。那男人不由得向后晃了晃，右脚用力踩着地面支撑住身体，“我害怕。”说完，他重又直视着我。

“什么？那你是不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我向男人的肩膀和腰部打去。

“你是送信的吧？”博也跟着怒吼。这个男人全身有点颤抖，两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咬着牙，盯着我，片刻，吐出几句话：“我不是，我是良民。”说完就仰起了头。这是我抓过的许多中国农民被拷问时所说的相同的一句话。当我再次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怒火中烧。

“中国一个良民也没有，你这个混蛋！”我用棒子朝着这个人的臀部猛打下去，“哎哟……”这个男人低低地呻吟着，斜倒在地上。这时，高桥班长气喘嘘嘘地跑了过来。

“原田兵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混蛋一见到我们就逃跑，说不定是个大人物呀，哈哈哈……”我俩的狂笑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在山谷中回响着。

“原田兵长，部队马上就过来了，把这家伙带到下个村子，再好好拷问他吧。”我轻轻点了点头，然后把这男人的两只手倒背着捆绑好，把他拽起来。“走！”我站在那男人的身后突然用力朝他背后又打了一棒子，那男的向前踉跄着，两脚尽力支着地面，稳定住摇摆的身子。他突然转过身来用愤怒的眼光狠狠瞪了我一眼，然后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夜更深了，凛冽的寒风要吹透全身似的。我心里想道：“这个人说不定真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如果他说了实话，我就会受到嘉奖。不过怎样才能使他吐出真话呢？怎么拷打他才能招呢？”我一边考虑着，一边往前走，不知不觉走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连一盏亮着的灯都没有，非常安静。村里的人们因为白天都太疲劳了，所以睡得很沉。当我们走进村子，突然不知哪家狗大叫了起来。这样，全村的狗也都一只一只跟着叫着，我全身感到了一股冷气，立刻紧紧地握枪，环顾四周。这时大步向前走着的中国人，突然停下来，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霎时，远处的山头上

亮起了火光。“啊！这是联络的暗号！畜生！”在我喊叫的同时，“嗖”一个士兵捡起一块石头向狗扔了过去，顿时狗叫声更加厉害。我们像被人追赶着似地仓皇地穿过村子，在靠近村边的一家农舍前停了下来。

“高桥班长，你在这里守着。”我站在这家门口扫视了一周。

“嘭、嘭、嘭，开门，开门！”我用力拍着门叫道。没有任何反应。“嘭、嘭、嘭，开门，开门！”我又使劲砸着门喊道。这时从里面传出一位老人的声音：“谁呀？”“快快开门！”我急不可耐地用脚踢门。

“谁呀？”一个颤巍巍的老太婆的声音又问道。她边问边慢腾腾地来开门。我不等她把门打开就飞起一脚踢开门，冲了进去。

“哎呀！”老太婆看见我右手举着枪冲进来，尖叫一声，转身躲进了里屋。东方已经泛白，天色渐渐亮了。屋子里已经能够隐隐约约地看清了：屋里一贫如洗，右边有台大土炕，看起来像有人刚刚睡过。我伸手摸了摸被子，还留有余温。“噢？”我疑虑顿生。我在右边的炉灶中掏了掏，看见快要烧完的火，亮着微弱的光。炉灶后面还有一间小屋——就是在我冲进来时，老太婆躲进的那间屋子。我向那间屋子扫了一眼，停住了脚。只见两只睁大的眼睛从墙窟窿里向外张望着。我抠住手枪上的扳机，做好随时开枪的准备，走了进去。

屋子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她看着我的脸和手里的枪，一步步往后退缩着，身上贴到了墙上。她看上去大约 70 多岁，满头银发，瘦小的身子颤抖着，深陷下去的两眼，诉说着什么似的。

我在屋子里搜查着，看见两床破被随便地放在老太婆刚睡过的土炕上，看上去像是有两三个人在这里睡过；墙角有个麻袋好像装了什么东西，打开后却什么也没发现。“不错，就在这里拷问啦。”我决定后走出去带上博，又走进老太婆的房间。

我的脑子里异常兴奋，想到刚才抓到的那个联络员，山上的火

光，还有那个老太婆的态度，以及刚才有人睡过的暖被子。我又仿佛看到正在外面警戒的高桥班长那副冰冷的嘴脸。

“出去!”博抓起老太婆的右手往外拽。“我不走!”老太婆死死抱着土炕旁边的房柱子。“你这个老不死的，”我猛地抬起右脚朝她的腰部踢去。“哎哟!”老太婆凄惨地叫了一声，身体向后倒了下去。博抓起她的右手又往外拖，可是老太婆的手又死死地抠住土炕的边缘。“你这个老乞婆，”我又抡起棒子朝她的肩打了过去，老太婆忍受不了肩膀的剧痛，瘫倒在地，大声呼救。

我从被子里掏出棉花，塞进老太婆的嘴里，然后把她的两手反背着捆绑住。“你这混蛋，叫我们费事。博，快把她带走!”我招呼着，就把被抓获的那个男子推搡着带进屋子，博押着老太婆出去的一瞬间，两人的视线碰在了一起，他们的眼神仿佛在交流着什么语言。“唔，这老太婆跟他是一伙的。”我在心里暗叫，博早已把老太婆带了出去。

“喂！怎么样？你认识那个老太婆吗?”

“我不认识。”“你敢胡说!”我举起棍棒戳那男人的下巴。那人仰起脸斜睨着我。“他妈的，”我朝他劈头盖脸地一阵痛打。那人的头被打破了，鲜血往外滴，二道、三道，血顺着脸颊一直流着，滴落在地上。那人咬紧牙关，全身发抖，被捆绑着的两手紧紧攥成了拳头，愤怒的两眼瞪得大大的，流露出憎恨的目光。直到现在，那目光仍然历历在目。“你这混蛋，还想反抗吗?”我手握棍棒，胡乱地在他身上痛打。那男的被打得左躲右闪，遍体鳞伤，终于忍受不住剧痛，摔倒在地。

昨夜阴云密布的天空，到了早晨下起了大雪。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子里。士兵的怒吼声，农民的叫骂声，女人的哀嚎和孩子的哭闹，以及家畜、家禽被人追赶惊恐的嘶鸣，加上战马、人群杂乱的脚步声都乱嘈嘈地交汇在一起。“噢，部队终于到了。”我独自暗暗地笑着。

“这老太婆，真麻烦……”博自言自语着从雪地上走了过来。“博，你去把那边的那扇门砸坏，从上面找两三根大粗钉子来。”博答应了一声，把门弄坏，过会儿拿来了两根五寸长的钉子。我从博的手里接过这五寸长钉，故意在那男人的面前摆弄着。那男人脸色苍白如纸，全身颤慄着，紧闭双唇，像要一口吞下去一样，紧盯着我的手。

“喂，怎么样，你到底是不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我嘿嘿笑着向他走去。那人一步步向后退却。“你这混蛋!”我左手拿起长钉放在他的大腿上，抡起棍棒敲打钉子。撤回左手时钉子已经被牢固地刺进了那人的腿里。“哎呀!”仿佛是从肠胃里吐出来的声音。浑身用力，用脑袋顶开我的手。那钉子在他的皮肉里来回搅动，他感到痛不欲生。鲜血一股股地流淌出来。他抽筋似地摔倒在地。

“嘿！痛不痛，如果痛，就快招!”“畜生……”我猛地又摇动了一下长钉的钉头。顿时，那人的身体痛得缩成了一团。“这还不够吗?”说完，我又拿起另一根钉子。“真够倔强的，博，给我打!”“呼，呼!”博拎起棒子朝那男人又是一顿毒打。

“畜生，这么一个中国人竟这么硬!”一想我就怒火中烧，夺下博手里的棍棒向那男人的身上不由分说地打去。那人已经连动弹的气力都没有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鲜血从条条绽裂的伤口中流出，沿着皮肤淌下来，脉博也比平常跳得快。

不知又过了几个小时，将近中午，高桥班长和右手拿着战刀酒气熏天、满脸通红的中队长中山大尉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正好，我正准备把这个倒绑双手的男人倒吊在房梁上。看到中队长的到来，我顿时来了精神，得意地向他汇报事情的大致经过。

中队长阴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邪的狞笑，向那男的看了看，说道：“哼，这人说不定是个大人物。小心拷问，也许能搞到点情报。中国人杀那么一两个没什么。继续慢慢地拷问。哈！哈！哈……”说着他拍着狗熊似的大肚子，怪笑起来。“好吧，就在中队

长面前看看我的本事吧。”我心里暗自炫耀着，像鹰犬见到了猎物一样，向那男人飞扑过去，将他手上的麻绳死死捆紧，使出浑身的力气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

只听见那男人的双手嘎巴嘎巴直响，在空中咕噜咕噜地转了两三圈后被吊在了房梁上。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紧咬着牙关忍受着疼痛。一会儿，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全身渗出了汗珠。汗水、血水混在了一起，沿着胸膛、腹部一直流到双脚，“叭哒”、“叭哒”地滴落到地上。他手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支撑着全身的重量。“难受吗？难受就快说。”我抡起棒子向男人的腰里打去。那男人被打得左摇右晃，猛然他睁开了两眼。“你打吧，你打吧，即使把我杀了，我也不会说一个字的。”说完后，他用眼睛狠狠地刺向我。

“畜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突然把今天早晨钉人他腿里的长钉拔了出来，又照着原先的地方重又扎了进去，顿时血红浓肿的肉翻了出来。他的两脚痉挛地抖动着。房梁跟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顽固不化的东西。”接着我又扎进一根钉子，血跟着流了出来。“还嫌不够吗？”我用棒子的前端照准钉子头就是一下，那人的身体又抽缩成一团，他极力忍着痛苦，被吊起来的身体来回晃动着。中队长手柱着战刀，望着那男人痛苦的挣扎，露出了满足的神情。“够厉害的你这混蛋。”边说着边迈着八字步凑近那人。在他用刀鞘挑起男人的下颌时，那男子猛然把脸扭了过去。

与此同时，中队长手里举着军刀踉踉跄跄地向前迈了几步。“咚”地撞在了那人的身上。大尉的肩章被那男人身上的血迹染红了。顿时他的脸被气得扭曲了。“你个混蛋。”他发出破锣似的怒吼。举起刀鞘朝那男人的肩膀砸下去。“唔……”那人发出沉闷的呻吟，头垂了下来，肩上被打得皮开肉绽，鲜红的血流了出来。

“哼！这个混蛋真不简单。原田兵长，给我使劲拷问，打死也

没关系。”中队长怒吼着用军刀敲打着地面，气汹汹地走了。

大概过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像死了一样头埋在地上横躺在那里，身上肿起紫色的血包和几十条青黑色的“坨”子，从头到肩，从腰到脚，都流淌着血，那些血沾在身上凝成了黑色的血块。偶尔，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的身体也跟着禁不住痉挛地抽搐。

午后，寒风夹杂着鹅毛大雪越来越大，雪从门缝里吹了进来撒落在这男人身上，和血水泥土混在了一起。我渐渐感觉有些烦了。如果再不能让他吐出句话来，在中队长面前就太丢人了，这也是作为一名宪兵的耻辱。仅仅一个中国人竟让我们如此费尽心思……我这样想着，就对站在旁边的博说：“喂，博，拿水把他浇醒。”博应声舀了一洗脸盆凉水向那男人的脸上泼去。

“啊”那人嘴唇动了动，慢慢抬起头，那双一夜之间深陷下去的布满血丝的双眼微微睁开了一条缝儿。“喂，良民，”就在我举起棒子打向男人后背的一刻，他仰起了脸，睁大了眼睛，双唇紧闭，紧咬牙关，两只手颤抖着。直到现在，他那当时瞪着我的神情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鬼子，快杀死我吧。”他愤然吐出一句话，冲我大叫。我被吓了一跳，身不由己地向后倒退了一步，握紧了手枪。“畜生，”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照着那人的身上一阵痛打，直到筋疲力尽，疲惫地坐在了土炕上。

那人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地上。从肩到后背血肉模糊，流出的血液，把地上的土都染红了。他看上去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渐渐降临，屋子里昏暗的光线拢在我的身上，在墙角映出恶魔般的剪影。一缕光线照着那男人的鼻子、面颊和额头，映出凹凸不平的轮廓。他的眼底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好像一眼射透了我的心脏。一股寒流袭上我的全身。我连动的气力都没有了，就这么在土炕上坐着，考虑着。外面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片吹透了我的全身。这时已经是下午 6 时多了。正在这时，部队指挥班的胜又军曹，满脸通红，酒气熏天地走了进来。

“原田兵长，中队长命令，现在把拷问完的中国人干掉——就这样。因为，部队今晚10时出发……”“是吗?”我问。“怎样，弄出点情报了吗？……”说着，胜又军曹已转身走了出去。

“呸!”我觉得他刚才的话对我是一种侮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由得火冒三丈。“他妈的，再拷问也没用。好吧，毙了他算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和博连踢带打地拖着这个人在雪地里向离村外150多米远的南山坡走去，大雪弥漫，雪片疯狂地在空中狂舞着降落下来。远处传来村子里此起彼伏的犬吠声。那人袒露着上身，两只手倒背着绑在身后，全身被冻得瑟瑟发抖，站在那里。一秒，二秒，一分钟，两分钟，那苍白的缺少血色的脸，睁大的双眼，痴痴地凝视着南方。看起来像是在遐想着幸福的未来，或者是在默默思念着他和平的故乡，慈祥温柔的父母、兄妹、亲朋、好友。尽管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是仍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自豪的神情。我右手握着手枪，站在离他5米左右的地方。”喂，博，你给我好好看着，如果让他逃跑了，我连你也毙了!”

“是!”博大声应道。“混蛋，难道杀一个中国人就是皇军的荣耀和宪兵的自豪吗?”仿佛有人在愤怒地大声斥责着，我顿失勇气，全身哆嗦，膝盖也控制不住地颤抖，眼前的这个男人仿佛巨人一样在我心中耸立着。

“叭”的一声我抠动了板机。子弹穿过了这人的肩膀，血喷溅了出来，把他的脸染成了红色，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顺着胸口流淌着，滴落下来，洒在了脚下的雪地上。“坏了!”我心里暗叫，手又扣在扳机上，准备开第二枪。

他的脸被扭曲了，眉毛倒立，两脚用力地踩着大地，肩膀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鲜血从肩头的伤口里“咕咚”“咕咚”向外涌。他全身愤怒地抖动着，两眼圆睁。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自己那时的感觉：全身发冷，直冒冷汗，身体里像有人在猛击着一样，浑

身瑟缩发抖。“混蛋，见鬼去吧……”“叭!”就在子弹穿过他的心脏的刹那，他“蹬、蹬、蹬”踉踉跄跄地向前迈了几步，挣扎着猛地站住，用足气力喊道：“八路军万岁!”接着，头垂了下来重重地倒在了洁白的雪地上。他手脚抽搐着痉挛着，极力挣扎着想再站起来。顿时，我感到从地底涌上来一股力量挤压着我的全身，我瞄准他的头部又开了一枪。只见他微微抬起的头抽动了一下就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地上。

喷洒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白雪。我梦游似地走下山来，博跟在后面，一起回到村庄。

30分钟后，部队在风雪交加中逃跑似的向下一个村子出发了。我觉得背后有人在追赶似的，提心吊胆地走着。有时突然停下来，紧握手枪向四周张望。

在这里，两边的山顶上，后面的山谷里，眼前的大路上不断闪出那双充满愤怒和憎恨的双眼，直盯着我。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使我仿佛坠入了深深的谷底。渐渐地，那些眼睛越来越多，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队，向我逼近……

华北重石矿业株式会社之沿革及历年营业报告

（1945年10月15日）

编者按：本文摘自《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与统治——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一书，其内容以日本外交史料馆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华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的珍贵档案为依据，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至1945年对密云地区矿产资源疯狂掠夺的内幕，从经济领域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罪恶，读来令人震惊、感慨和沉思，是以史为鉴，教育后人的一份很好教材。

第一章 华北重石矿业株式会社创立经过

第一项 会社创立以前华北的重石开发状况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重要的“钨”产出国登上世界市场以来，每年以世界总产量六成左右向世界进行供给。中国的钨矿主要分布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4省，其次是河北、福建、云南、贵州等省。与前4省相比，后4省的产量甚微

华北在日中事变爆发（指七·七事变）后，从当地居民中取得情报来源，在昭和13年（1938年）初，昭和矿业进入蓟县黄花山一带；新新矿业亦迅速进入密云县东部沙厂村附近的龙门山、沙厂山。由于致力于战时军需必需资源的开发（主要是收买），日本的高周波、大华矿业、三菱矿业等有实力的特殊钢铁业者以及在现场的矿山业者的进入，十分活跃。昭和15年（1940年）11月末，在我公司之前身冀东矿业所建立时，接受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开发命令

者，达11家业者。然而，因治安状况恶化及资金困难，还未真正着手进行，就将矿区放置起来。因而，他们大多只是进行收买矿石，或是只对露头部位的高品位矿进行某种程度的捶掘。积极性的事业进展，尚处在微小状态之中。

昭和16年（1941年）10月末，在华北重石矿业株式会社创立之时，当时从事实质性营业者，仅有日本高周波、大华、大同、兴亚和冀东矿业等5家公司。

第二项 冀东矿业所的设立及其业绩

一、设立经过

在前述状态下，军方及兴亚院强烈要求尽多地产出当时国防上急需的重石矿；业者们的矿区申请，也都集中到密云县东部一带。于是，开发会社对重石矿区的实情有必要进行现场审查，以便采取对策。昭和15年（1940年）3月上旬，对该地区重石矿资源实施现场调查的结果，其报告要项如下：

1. 密云县东部地域一带，花岗岩、片麻岩发达。在多数片麻岩中进入了重石矿，在石英矿脉中，看得见重石矿的发达。其分布地域为：南北方向8（华）里，东西方向7（华）里。

2. 作为重石矿胚胎的片麻岩丘陵，除苍术会、墙子路、吴家峪之外，有几十个区段，每个区段有十几处矿脉。

3. 矿石皆为钨锰重石矿。在石英脉中有细脉，为高品位部分，宽5寸，长达300尺以上。部分性的高品位（40%以上）者，也屡屡可见。

4. 在各个部落均有盗掘品的储矿所，每处有储矿五六吨至10吨。据华人说，东部地区一带日产粗矿可达330吨。

5. 居民们靠盗掘维持生计。当时已有掘下数十尺，因出水崩塌造成山腰耕地全毁的惨剧。因此，需要有凭借技术指导的正式性采掘。

6. 依靠承包制进行矿石收买。因各地竞争，价格逐渐昂腾。因未付货款而引起的争端不断。因此，统一收买价格已成为紧迫问题。

7. 在匪区地带，由于货币价值的不同，矿石有向第三国流出的危险。需要同当地居民密切联系，加以防止。

8. 还有对将来的贫矿处理问题，需要设置机械选矿场。

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同时，兴亚院已确定将该地区之大部分矿区向有实力的特殊钢业者瓜分，以诱导它们进入的方针。作为开发会社，其用意在于，将来需要对收买、采矿实行统制之时，担当起迅速实行的责任。昭和 15 年（1940 年）6 月 28 日，以兴中公司社长山西恒郎名义提出申请，在河北省密云县八里庄（830 万坪）、镇罗营（1450 万坪）一带地区，作为重石矿矿区，进行采掘，同年 11 月 15 日，取得关于八里庄进行采掘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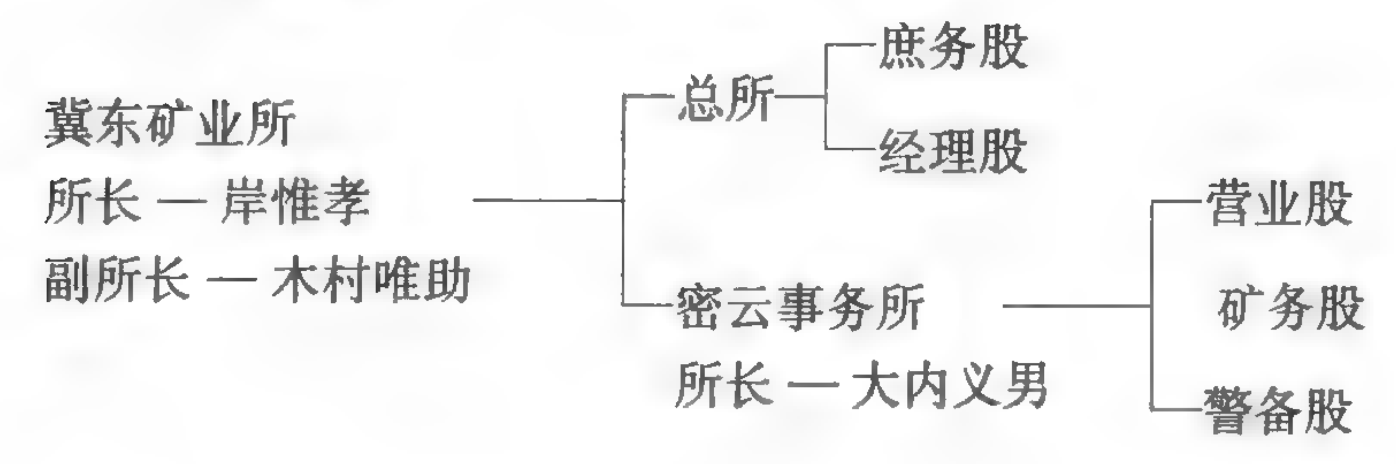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兴中公司以上述申办的矿区为基础，作为逐次将附近邻接矿区进行统合经营，以及开发其他地方重石矿资源的目的，在 10 月 19 日申请增设直属冀东矿业所。11 月 31 日根据认可，在兴中公司内设立冀东矿业所；在密云县城内设立密云事务所。

本矿业所的有关资本金如下：

资本金：兴中公司名义资本金 1000 万元。矿业所所需资金调办，由开发会社融资。（但是，从兴中公司手中持有的资金中支办，不再由开发会社进行新的融资。将来由开发会社向兴中公司从既得的出借金中的相当数额相抵销。）昭和 15 年度（1940 年）所需资金为 30 万元。

二、业务概况

（1）组织



在昭和15年度［1940年］末，日人社员数为北京12名〈其中女4名〉，密云6名。

（2）业绩

①探矿、采矿

目标矿区因所在地的交通不便，且因治安关系，还未实现由日人直接探矿。自昭和16年（1941年）6月继承新新矿业的矿区以来，只进行了小规模的手掘及探矿采矿。

②选矿

从创立至昭和16年（1941年）3月止，没有进行各种工程。从昭和16年（1941年）4月开始，在密云县城内建设15马力石油发动机1台、碾子6台（处理粗矿能力为每日2吨）。

③收买

在墙子路、石匣镇、孝女台、康各庄等4处设立收买据点。在由土著华人承包收买外，另由矿业所雇佣的精通当地情形的华人从事直接收买。

④生产品

昭和15年（1940年）末创立以后至改组为华北重石矿业株式会社止，其生产品为精矿1076.94公斤；粗矿129.795吨。

⑤资金

冀东矿业所使用的事业资金，由华北开发会社融资60万日元之外，根据兴亚院联络部长官的命令，于昭和16年（1941年）6月以对新新矿业统合费的名义，从开发会社紧急融资12万日元。

第三项　冀东矿业所之发展性解体
及华北重石矿业株式会社的创立

当初由锰矿黄金时代呈现出的冀东地区重石矿的开发，进入昭和16年（1941年）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

一、露头部的高品位矿已经采完；

二、在深部探矿采矿机械化所需要的技术员、资材及所需资

金，人手困难；

三、治安状况依然不好；

四、槽矿为当地军方一手收买，作为自家工厂的原料，已经到了不能供给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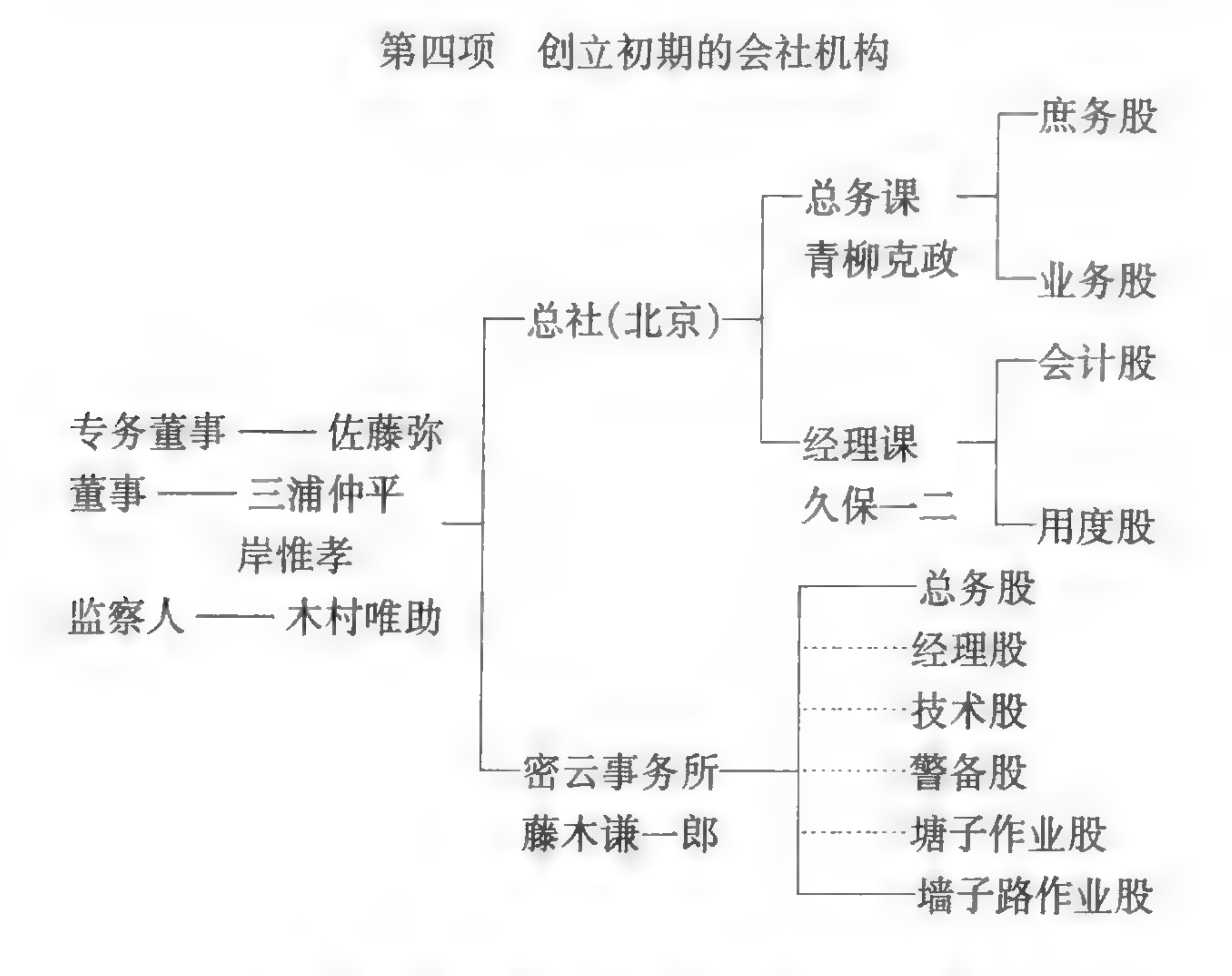
因以上各种原因，经营变得十分困难。于是，昭和矿业首先退出；接着，新新矿业因资金特别困难，转让给冀东矿业所。然而，由于人事费有很多未予支付，放置不管将对现场的治安造成恶劣影响，经兴亚院从中斡旋，采取了暂先支付定金12万日元的紧急措施。于是，统合冀东地区重石业，成了紧迫问题。同时，重石的开发与冶炼未实行一贯作业，这也甚为不利。进行研究的结果，于昭和16年（1941年）4月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与华北开发二者确立了将冀东矿业所改组为新会社的方针。在实施的过程中，对如下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

一、在对华矿业政策上，是否应以受命开发者（不相当于拥有矿业权者）的名义，从事中立实业。

二、在正式开发方面，作为协作会社，对于经营“锰”有经验者的业者日本高周波、小林矿业及三德工业等，究应选择何家？

因种种因素，在确定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兴中公司的解散期已经迫近，它的直属冀东矿业所的改组，也已成为紧急问题。并且，随着战争局势的炽烈，重矿石的增产到了每日必争的境地。于是，在昭和16年（1941年）10月31日，召开发起人大会，办完了设立登记手续，以资本金2500000日元，立即建立了华北重石矿业株式会社。

第四项　创立初期的会社机构



第二章　昭和16年度（1941年）业绩

第一项　事业概况

继承了冀东矿业所的事业，但因治安状况不良，作业并不如意。采矿尚未脱离所谓狸掘的状态，选矿也只依靠土法筛选，不过处在选别粗矿的状态中。本公司创立以来，为对应时局，积极地致力于事业的发展。作为对增产的一点帮助，承诺了对大同、兴亚之游体矿区的开发，12月24日在墙子路设置了作业所。

接着，在3月17日，经兴亚院华北联络长官的许可，于3月25日设置蓟县收买所。在密云矿区正式开发的同时，开始了探矿，以求经济性企业体制的确立。

选矿之初，只有密云第一选矿场（石油发动机，日选2吨）、塘子第二选矿场（蒸汽机，日选5吨）这样的选矿场。为了提高选矿

的效率，收买了距密云县城北2公里位于白河河畔的怀柔金矿山之既设机械选矿场（名义上日选20吨）。

这样，在第一年度（昭和16年11月——－昭和17年3月末），克服了与严寒作战中设施不完备的困难，产出精矿20.956吨。

（中略）

第三项　生产实绩

（1）采矿

矿所别	劳动总工数（人）	掘进（米）	出矿量（吨）
密云矿区	41550.4	606.98	3127.704
墙子路矿区	3761.0	130.20	45.030
合计	45311.4	737.18	3172.734

（2）选矿

矿所别	劳动总工数（人）	处理矿量		生产精矿		选矿实收率
		数量（吨）	平均品位	数量（吨）	平均品位	
第一（密云）	11381.0	595.6656	1.60	8.364	50%	44%
第二（墉子）	9518.0	663.1922	0.90	4.363	55%	40%
第三（白石岭）	6905.2	672.6522	1.60	8.228	50%	48%
合计	27804.2	1931.5096	1.36	20.956	51%	41%

（3）收买

精矿：0.4151吨。

粗矿：特等1.8015吨；一等0.4080吨；二等1.7245吨；三等1.7215吨；四等3.4450吨；五等36.9940吨；等外2.2635吨。合计48.3680吨。

（4）交纳精矿实绩：19.011吨（约58%）。

（下略）

第三章　昭和17年度（1942年）业绩

第一项　事业概况

本年度又增资到3750000日元，达资本金之半额。为了对藤木

密云事务所所长进行技术性辅佐，特从明治矿业派遣永野氏进行大力支援。然而，由于不能进行有排水筒设备的深部采矿，因而粗矿品位低下；密云附近的白石岭所在的第五选矿场，处理低品位矿石的效率又不能提高，故此，生产实绩未能明显好转。

于是，本社已到了必须对历来的计划与经营进行一次根本性研讨的时期了。

……

佐藤专务极力策划了对局面的打开。历来受命开发的业者，由于不放弃用人工进行采矿，因而形成低品位矿。采矿和选矿必须实行机械化，鉴于获取资金及资材的难度很大，实现采矿及选矿的机械化，必须将大量处理低品位粗矿同采矿、选矿、冶炼实行一贯作业。为此：

(1) 在技术方面，从低品位矿选取60%品位的精矿，其困难很大；实行一贯作业的话，以自家冶炼工场的原料，可充分达到45%品位的精矿。因而，选矿效率以及实收率都能提高，核算起来是有利的。

(2) 华北的炼铁事业，只从事生铁冶炼，当然不能满足炼钢业发展的需要。当前，钨铁（合金）是不可缺少的材料。

(3) 为了在华北增产煤炭及发展其他各种矿山事业，必须考虑实现特殊钢工具的现地自给。从这方面考虑，钨铁合金也是不可缺少的。

(4) 将来在华北建立兵器制造工厂的话，首先也必须设立钨铁工厂。

以上所举的各种必要性，加上冶炼所需的辅助原料，例如石墨、煤焦油、萤石、矾土等，全都在华北地区容易取得，从这些角度来看，华北的重石矿开发必须采取冶炼上的一贯作业。

如前所述，本社创立以来的重大使命，是在从事采矿、选矿的机械化以及建设冶炼工厂的同时，还要实现对相邻矿区的统合。其

中，最有希望的矿区，就是实现对日本高周波矿区的统合。这样，可以确保原料矿石的供应，达到本公司的合理化经营。努力奋斗的结果，在9月修改了预算，在着手于新建项目的同时，到10月底以50万元的代价，将日本高周波矿区及其全部设施进行收买的谈判，处理完毕。

这样，为下年度及以后的增产作准备，并且为了整备企业体制，本年度主要的注意力仍然放在了建设方面。其结果，精矿的获取实绩达到51.600吨（占63%）。从而，克服了恶劣条件，取得了显著进步。

第二项 建设状况（略）

第三项 生产实绩

（1）采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掘进（米）	出矿量（吨）
龙门	28628.0	210.40	4369.170
沙场（厂）	24381.9	359.97	1347.067
巨各庄	19496.3	93.51	242.107
墙子路	22859，2	193.25	445.209
马家坡	11711.6	173.33	1996.447
合计	97077.0	1034.46	6400.00

（2）选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处理粗矿		生产精矿		选矿实收率
		数量（吨）	平均品位	数量（吨）	平均品位	
第一、密云	1717.5	108.4190	1.12	1.0115	55%	45%
第二、塘子	12187.7	623.6060	0.70	3.4794	50%	44%
第五、白石岭	48519.8	3497.2590	1.20	32.3381	50%	45%
第六、墙子路	3092.1	116.9935	12.00	8.1126	53%	30%
合计	65517.1	4346.2775	1.40	44.9416	51%	37%

(3) 收买

地点	精矿量	
	数量（吨）	平均品位
蓟县	2.91950	61%
其他	5.00214	60%
合计	7.92164	60%

第四章　昭和18年度（1943年）的业绩

第一项　事业概况

进入本年度以后，原在东交民巷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内的总社，转移到了王府井大街甲89号。4月3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结果，资本金从3750000日元拉资到6500000日元。同时决定，选任上野裕正氏接替木村担任监察职务。

在事业方面，继续完成上年度在密云山麓的采矿、选矿机械化及天津炼钢厂的建设。倾注其全力的结果，11月9日天津工厂竣工；12月下旬沙场选矿场竣工（每日处理矿石能力达100吨）。于是，达到了本公司所期望的实现合理性经营的基础态势。然而，在所有生产部门所预定的设施完成期被推迟，加上粗矿品位低下及劳力的不足、已有的第五选矿场的连续发生故障等等，造成了作业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治安状况也在一天天恶化。在墙子路、沙厂之间于5月29日遭到土匪的袭击，两名日人和五名华人战死之后，联络道路逐渐遭到破坏，最后因交通断绝，该方面的作业被迫全面放弃。这样，在山麓的精矿生产已不再见。

<中略>

第三项　生产实绩

（1）采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掘进（米）	出矿量（吨）
马家坡	34819.5	1009.71	2977.953
沙厂	40409.6	787.96	746.280
龙门	19821.5	324.15	3185.102
火郎峪	8403.6	175.95	25.018
合计	103454.2	2297.77	6934.353

（2）选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处理粗矿		生产精矿		选矿实收率
		数量（吨）	平均品位	数量（吨）	平均品位	
第三（沙厂）	12931.1	702.870	0.8	4.844	50%	43%
第五（白石岭）	14141.3	645.991	2.0	10.554	50%	41%
第六（墙子路）	1050.4	21.568	15.0	2.815	50%	43%
合计	28222.8	1370.429	1.59	18.253	50%	42%

注：第三选矿场，从10月1日特矿处理作业开始；第五选矿场从1月12日停止作业；第六选矿场，12月以后停止作业。

(3) 收买

地点	粗矿		精矿	
	数量（吨）	平均品位	数量（吨）	平均品位
墙子路	28.605	1.0%		
火郎峪	18.499	1.0%		
蓟县			5.174	60%
其他	3028.255	0.5%	2.378	60%
合计	3075.357		7.561	60%

(4) 冶炼

天津冶炼工厂，自11月上旬竣工以来，只限于试验作用，尚未达到正式作业，在试验作业当中，仅生产钨铁750公斤。

(下略)

第五章　昭和19年度（1944年）业绩

第一项　事业概况

密云、天津在上年度中，拒付机器的结果，全都停留在试验作业阶段，未能进行正式作业。本年度在密云山麓，7、8两月出现了发电所事故；11月有关取得选矿场用球磨机问题出了差错；在昭和20年（1945年）1月、2月、3月因发电所用煤的没有存货而停止发电等等，终于没有实现所预期的80吨精矿的产出。另一方面，在天津因获得电极困难等原因，几乎未见什么成绩。太平洋战争局势：在7月塞班失陷后，又于昭和20年（1945年）1月发生吕宋岛登陆，形势日益吃紧。在大陆，驻华美国空军对主要工厂、交通线的破坏，日益活跃，其最大的影响，是造成了前面所述向发电所运输煤炭的困难。

另一方面，随着战局的逼迫，自2月以来连续出现应征入伍者。

无论在物质方面或人力方面，作业的实施全部处在恶劣条件频繁发生的境地之中。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全力以赴。

本公司创立以来的负责人，锐意于指挥迅速建设的专务董事佐藤弥，在实现了山麓的采矿、选矿机械化，完善了天津冶炼所的设备，确立了本公司一贯作业的基础之后．宣布了退任。6月23日临时股东大会，选任古河矿业株式会社参与水野贤治氏继任专务董事。同时，自公司创立以来即担任董事的岸惟孝也辞去职务，选任小林满董事为其后任。

水野专务接受佐藤前专务的意图，为谋求本公司的坚实发展，努力于把握实体。对其运营方针进行研讨的结论是：

（1）天津冶炼所转向钨的冶炼。从其创立之初的目的来看，矿山业作为军队的一个部门来处理，莫如姑且与之分离，另寻发展方略，才是上策。

（2）为对应战局的逼迫，急速推进建设和大致完成建设，深感目前铺设的领域太广。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缩小领域，将生产坚持到底并进行机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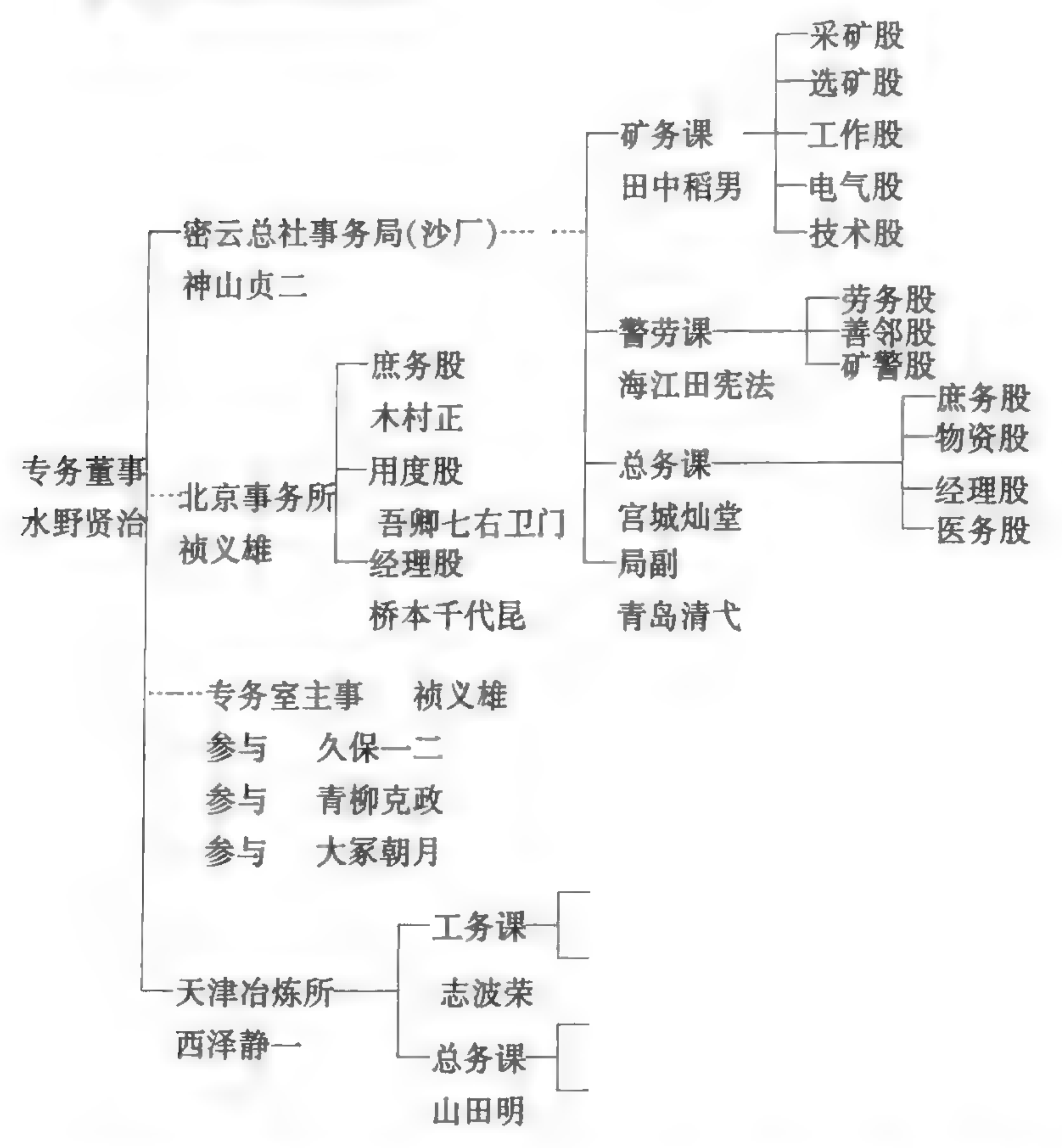
（3）贯穿矿山业的本质，是人员的配置。为了提高效率，必须淘汰冗员。

（4）从大致的机械设备设置来看，采矿、选矿的技术方面，是其弱点，需要迅速强化。

（5）为实现经理处置的迅速，各单位应励行决算。在未实行按月次决算的领域，建立此种方式。

按上述结论，通过会社机构改革，以图现场重点主义的实现。10月1日公布了新机构，专注于向钨矿的精矿生产迈进。

新公布的会社机构如下：



这次改革，将总社迁到沙厂是不合适的。同时，密云、天津的统合事务，确定由专务室进行。本公司本来的任务在于钨精矿的增产，合并体制的确立，其目的说到底是在于节减经费。

其后，水野专务董事，鉴于本公司的性质、规模及创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力主由全额出资者华北开发会社对本公司的经营进行进一步积极的援助。他认为：与其由我作为本公司的经营负责人，不

如由华北开发的现职者兼务更为适当。以此为理由，水野宣布退任。12月19日临时股东大会选任三浦仲平氏就任专务董事，同时选任总社神山事务局长为董事。

一方面，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古河矿业株式会社常务董事技术部长小岛庸一氏，选矿课长西村元三郎氏及田中稻男氏，继续留在山麓，作为来山的现场技术指导。其后．预定由古河矿业株式会社继续派遣的采矿、选矿技术员人选，因战局的紧迫及开支的困难，最终未能实现。

另一方面，在现场附近的延安系统匪军之活动日益极其阴险猖獗。密云——沙厂之间的特务警察的送电线路被频繁切断。并且，山麓本身的警备，只由矿警队进行，已经感受到了威胁。只得依靠密云驻屯军部队长，由皇军进驻山麓。从5月起逐次增强兵力，在兵营完成后，常时分驻有一个中队的皇军。

墙子路作业所，在上一年度中因交通被隔断，匪情日益恶化，采矿作业处于绝望境地。只得由以前收买的粗矿进行选矿。从热河省方面索要的煤炭必须努力争取到手，但有关汇款的联络员必须经由承德，由于交通情况等原因，其进展并不如意。

在蓟县作业所的周边地区，治安日益恶化，沿途经常发生运输物资卡车被袭击等事故。在尽可能大量地运用抵押用粮食，锐意于采矿、收买的结果，大约取得了6吨精矿。

在天津冶炼所，通过小林矿业及有关方面的招聘，冶炼、铸钢技术员的阵容逐次整备。达到了制作内部订货（由密云山麓）及外部订货的水平。一方面，在大使馆当局的怂恿下，在冶炼钨铁用电炉中，留下一基另作锰铁冶炼使用；同时扩充了冶炼锰铁的设备(第二期建设工程)。

在昭和19年（1944年）以来，因大使馆当局的怂恿，为了适应华北对大型铸钢品需要的激增，在原有的设备基础上，增建了3吨电炉。

为了适应需要，这项计划的立案工作．在大使馆及开发会社的指导下进行准备，在昭和20年（1945年）3月15日取得了大东亚大臣的正式认可，着手了此项计划的建设（第三期建设工程）。这项新建设，如前所述，是为了适应确立华北的现地自给体制的要求，实现扩大铸钢生产。以既有的铸钢炉为主，顾及特殊钢生产的同时，另外通过全面而灵活地运用既往设施，向着增产合金铁的方向迈进。当时，华北的特殊钢生产仍处在完全不能生产的状态，仅由本公司的1.5吨炉进行试验，其成绩已达到满意程度。本会社预计作为华北生产钨铁、锰铁、硅铁等特殊钢原料的唯一合金铁工场，希望其能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着特殊钢生产的目标前进。如前所述，一方面因为实行特殊钢连贯作业的愿望未能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时局的要求，对各种铸钢制品的增产寄予希望；而预定要建设的机械工场，物理、化学试验所等，全都与本公司的3吨炉计划有关。因此．本公司作为铁系电力冶炼的综合工场的地位，被牢固地树立起来，终于贯彻了建设该冶炼工厂的最初志向。

第二项　设施概况（略）

第三项　生产实绩

如第一项中所述，生产并不如意。在本年度初的试运转期之后，于9月的增产月期间，通过各方面的通力合作，终于取得产出平均品位约40%的精矿12吨；探矿掘进207米；采掘粗矿2570吨的好成绩。在其他月份，则因停电、球磨机用的衬垫缺少，工人不足等原因，成绩不佳，实在令人遗憾万千。

在本年度中，山麓的按月份成绩如下表：

月别	坑道掘进（米）	采掘粗矿（吨）	选矿、元矿（吨）	处理粗矿（吨）	生产精矿（公斤）	精矿品位%
4	219，80	753.360	502.134	187.065	723.600	50%（约）
5	261.10	2048.615	1406.634	451.600	1510.500	49.70
6	134.80	2214.190	1527.660	1342.995	5474.700	47.10
7	70.75	1158.820	1799.572	1341.470	5189.800	50.96
8	89.25	554.420	382.260	551.020	2805.900	47.11
9	207.35	2572.187	1773.300	2296.020	12032.000	38.63
10	105.55	1774.051	1223.060	1072.430	6188.100	38.60
11	324.15	964.500	665.160	143.800	879.600	40.（约）
12	176.05	835.300	576.150	1394.700	10010.900	22.64
1	191.00	1389.200	958.410	1526.350	3928.700	40.28
2	27.65	272.033	187.680	0	0	—
3	36.90	342.523	235.980	447.990	3077.700	48.07
合计	1844.35	14887.199	10238.000	10755.440	57821.500	平均37.59

在本年度间的采矿、选矿、收买、冶炼等实绩如下：

(1) 采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掘进（米）	出矿量（吨）
马家坡	96618.3	800.5	8719.100
沙厂	38648.3	405.8	1159.223
龙门	57770.0	572.7	5007.900
巨各庄	613.0	4.3	0.251
火郎峪	596.2	2.5	0.725
合计	194245.8	1844.0	14887.199

（2）选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处理矿量		生产精矿		选矿实收率
		数量（吨）	平均品位	数量（公斤）	平均品位	
第三（沙厂）	28468.6	10385.000	0.35	56191.7	40%	62%
第五（白石岭）	1054.9	370.440	0.50	1629.8	50%	44%
合计	29523.5	10755.440	0.36	57821.5	40%	61%

（3）收买

地点	精矿量（吨）	平均品位
蓟县	6.002	60%

（4）天津

天津的工厂，原材料的供应十分困难，至今尚未正式运营。努力进行第二及第三期建设工程的结果，在产量方面出现了急剧增长。外部订货有飞机用的橡胶车轮模型，起重机用铸钢制品等；内部订货有密云山麓选矿场用的钵、衬垫及工场用铸型等。其实绩如下：

品目	数量（吨）
钨铁	10.592
锰铁	52.100
铸钢制品	46.042

第六章　昭和20年度（1945年）业绩

（至8月15日操业停止）

第一项　事业概况

自上年度以来，除了山麓的生产鉴于时局不能紧急停止以外．

其他一切新办事业全部废止。坑内作业中的采矿，实行了在已控制的开发地之良好部位进行发掘的方针。因此，本年度彻底地未能进一步增进效率。

华北重石矿业，自创立以来已阅三年。然而，在山麓地区的操业并不顺利。之所以如此，认真考察大约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当地的锰铁矿，最初是在能够露天采掘的范围内，进行收买。然而，在能容易而广泛地“直接”探矿，以及从事狸掘采矿的范围之外者，采矿自然必须在地下实施。也就是说，需要由开动凿岩机（电力的和空气的两种）迅速而有效率地从事坑道掘进。然而，似这样的劳务者，日人华人全都不足。

2. 在选矿方法方面，熟悉现代化选矿机械的劳务者缺乏。由于不能熟练排除所发生的机械故障，惹出的事故很多。

3. 机械的备件不足。由于山麓必需物资的取得并不理想，没有修理工场。所以，既使从事小修理，也要运到北京进行。

4. 年年治安状况不良，配给的食物品质低劣，一般物价的暴涨不止，难以充分确保优秀工人；另一方面，广泛地探矿和收买，也受到了制约。

5. 密云发电所因发生机械故障及煤炭不足而停电，继之而来的输电线路又被割断等等，供电经常中断运行。

6. 矿业公司的历史尚浅，其发展过程不是按自然的规律进行的，而多半是人为性质的（全都是为了对付战局的急迫，而不能停止）。各种设施及施策并不合乎道理。事业的成功与否，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人的结合，而公司本身在日华浑然结成一体方面，仍存有缺憾。

<中略>

在天津冶炼所，在极力推进从上年度末继续的第三期建设工程之同时，又进行了钨铁、锰铁的冶炼。在铸钢部门的冶炼工作也逐渐出现了进展。本公司的特殊技术，此时渐为有关方面所承认。特

别是受军命试制的枪身钢，由于试制结果良好，命令继续制作。同时，接受汽车厂的命令，又正在从事磁铁钢的冶炼。这样，本公司的优秀技术，正在显现出来。

再者，今后尚有1/2吨锻造工场、自家用小型铸物工场的建设以及冶炼硅酸钙用的单相L—式电炉一座（月产30吨）的建设工作，以及硬质合金（刀片、钻头月产20吨）的制造计划等。但是，在接到8月15日的天皇大诏以后，上述计划未能实现。第三期建设工程大约已进行到60%。在此期间，6月30日西沃所长应召入队，7月1日本工厂接到由军队监理的通告。因之，本工厂制造品中大约80%纳入军方，剩下的20%则与开发会社有关。

<中略>

第三项　生产实绩

本年度至8月15日，其生产实绩如下：

1. 采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掘进（米）	出矿量（吨）	
马家坡	23915.7	142，5	4205	
沙厂	14629.3	129.8	655	
龙门	14242.2	179.7	2486	
合计	52719，2	452.0	7346	

2. 选矿

地点	劳动总工数（人）	处理矿量		生产精矿		选矿实收率
		数量（吨）	平均品位	数量（公斤）	平均品位	
第三（沙厂）	7860.7	6143	0.3%	32966.2	35%	62%
第六（墙子路）	1326.1	17	1.5%	2196.8	60%	51%
合计	9186.8	6159	0.34%	35163.0	36%	61%

3. 收买

蓟县	精矿量 2.036 吨	平均品位 50%

4. 天津工厂本年度至 8 月 15 日，生产实绩如次：（1）冶炼钨铁 2.650 吨；锰铁 70.500 吨。（2）炼钢、铸钢品 47.000 吨。

七、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大事记

1933 年

1月1日　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抗战开始。

3月10日　日军进攻古北口，中国守军基于爱国热忱，奋起抵抗。

3月12日　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又得不到支援，被迫撤出古北口，退守南天门阵地。

5月13日　日军攻陷石匣，中国守军撤离密云县。

5月15日　日军未遇抵抗，侵占密云县城。

5月31日　长城抗战失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密云被分割。长城外地区划入伪“满洲国”；古北口被日军占据；长城内地区与冀东其它21个县一起被划为“非武装区”，属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

本月　密云县驻马庄、白塔及三河县七连庄一带，秘密建立起“穷人会”，总会负责人张任翔。“穷人会”宣传抗日、抗捐、抗债，深得广大穷苦农民拥护。总会址设在驻马庄，活动范围达60多个村庄和两座县城，会员发展到600多人。

8月　党派刘靖来驻马庄领导“穷人会”斗争，在会员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9月　驻马庄“穷人会”会员杨斌等被秘密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建立起密云县第一个党支部驻马庄党支部，杨斌任支部书记。之后在白塔及密云县城等地陆续发展了党员。

本月　“穷人会”建立武装，驻马庄组织起第一支自卫军。

本月底　中共三河中心县委在驻马庄成立，刘靖任中心县委书

记。

10月中旬　“穷人会”召开连庄大会，各分会代表6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抗捐、抗债等问题，并且准备迎接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东进，举行武装暴动，建立游击根据地。

10月20日　密云、三河等县反动政府镇压“穷人会”，密云驻马庄、白塔村9名“穷人会”会员先后被捕，武装暴动计划未能实现，“穷人会”及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1935年

11月25日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成立，汉奸殷汝耕充任行政长官。密云等冀东22县就在“防共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12月13日　日籍行政顾问北垣修来到密云，从此，伪县政府的一切行政大权即操于日本顾问之手。

1937年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8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召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决定在冀热边开展游击战争。

注：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上仍称八路军。

本月　日军侵占密云，并于密云设兵站，变密云为其大规模入侵华北的重要物资转运基地。

1938年

2月9日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指出：**以雾灵山为中**

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干部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要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做充分准备。

4月1日　敌为连接华北与东北而修筑的平古铁路全线通车。密云境内设古北口、下会、石匣、小营、密云五站。

5月　为策应冀东暴动，八路军组建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6月8日　宋、邓率四纵从平西斋堂出发，分两路向冀东挺进。

本月上旬　为控制平西与冀东的联系地带，四纵令邓典龙、钟辉琨率领挺进大队，在密云西部和昌、滦之间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建立昌、滦、密联合县，张书砚为县长，刘国梁为工作委员会主任。

6月12日　邓华率三十一、三十三大队从白马关入密云，先后攻占下营伪警察分驻所和冯家峪伪税务机关；宋时轮率三十四大队和独立营从四合堂进入密云。邓、宋两支部队在密云会合后，从石匣南渡过潮河，进入密云东部地区。

本月下旬　在镇罗营建立密、平、蓟联合县政府，王树梅任县长。同时建立抗日游击队，马维任队长。

6月29日　四纵主力予围攻之敌以打击后，转移到北庄一带，派三十四大队奔袭吉家营、新城子，独立营袭扰石匣、古北口，并以一部兵力破坏古北口、承德、兴隆之公路。

7月6日　冀东抗日大暴动开始，并迅速波及冀东全境。高潮时起义队伍达10万多人。活动于密云县四顶山区的游杂武装果玉春部也打起“抗日救国”旗号，参加到暴动中来。

本月下旬　伍晋南率四纵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由昌平到达昌、滦、密地区与挺进大队会师，并在白河以西密云、滦平、昌平之间开展游击战争。

8月6日　刘少奇电示：宋、邓应在蓟（县）平（谷）密（云）

一带加紧工作创建根据地。

本月底　密、平、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到2000余人。

9月上旬　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遭到敌人的重兵围攻，除两个连仍留在昌、滦、密地区外，伍晋南率主力东渡潮河，进至雾灵山地区。

9月下旬　日本关东军入关。马维駜游击队在程各庄南山被日军打散。队长马维駜回家潜伏，后被密云伪县政府逮捕，转押至锦州杀害。

9月26日　党中央毛泽东电示：不同意主力西撤，“目前主要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10月初　敌围攻昌、滦、密联合县。县政府和留下的部队突围，渡过潮河回归主力。昌、滦、密联合县撤销。

10月中旬　四纵和冀东抗联西撤，留下三个支队在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支队支队长单德贵、政委赵立业率部活动在密云、平谷、兴隆及蓟县山区。

本月　密、平、蓟联合县随四纵西撤而撤销。

12月　对家河、冷风甸、化石峪等村农民在王永丰、孙长志等领导下武装抗税，反抗日伪统治。这支队伍一直坚持到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于1940年8月，编入白河游击队。

1939年

4月　三支队收编果玉春部为二营，果玉春任营长。

8月　三十六大队为接应冀东部队和干部到平西整训，再次进入冀东，从陈各庄过潮河，于八家庄歼灭驻石匣伪警防队近百人。李满盈随队来到密云，任三支队二营教导员。

9月　三支队随三十六大队去平西整训，因果玉春扣押了通知，二营未能同行，继续在密云河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2月　果玉春欲谋害李满盈。为避免二营分裂，李被迫带领40多人在清水河川、木河川等地单独开展游击活动，接连攻克新城子、曹家路、南台伪警察分驻所，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1940年

1月1日　冀东区党分委在葛老湾召开会议，做出开辟蓟、平、密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和部署。

4月15日　蓟、平、密联合县建立，县长张耀东，县委书记李子光。

4月20日　十团参谋长才山、政治部主任吴涛率三营和团直机关部分人员，从平西珠窝出发，向丰、滦、密进军。经延庆、昌平、滦平，于29日到达密云西部水川地区。抽调20余名干部组成以民运股长樊凌玺为主任的地方工作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为主力部队筹办粮食，准备迎接主力。地方工作团分成两个组，以白河为界，河西组由李昨非负责，河东组由江卓负责。

5月20日　十团团长白乙化率一营及团直机关离开平西，向平北丰、滦、密挺进。月底到达密云地区和三营在石塘路、赶河厂会师。

本月　蓟、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及中共蓟、平、密西北办事处工作委员会成立，刘云峰任办事处主任，江东任工委书记。办事处四、五分区即是密云潮河以东的镇罗营、大华山一带村庄。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和中共丰、滦、密工作委员会成立，县长王森，工委书记马力。同时建起四个区：一区区长茹克，区委书记吴作先；二区区长李昨非，区委书记李昌；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江卓；四区区长李伯元（向阳），区委书记成克。

本月　平西整训结束，单德贵、新任政委刘德彪率三支队一、三大队返抵密云河东地区。

本月　三支队已发展到600多人。一大队队长谭云海，教导员

杨思路；二大队（二营）队长（营长）果玉春，教导员李满盈；三大队队长周佳美，教导员王公民。

7月　十团开始在河西组建区游击队。其中：一区白河游击队，队长任永海；二区白马关游击队，队长张万福；四区四海游击队，队长张立生。

本月　丰、滦、密工委为培养村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在王庄、水堡子等地举办第一期“救国会干部训练班”。白乙化为训练班题词：“勇敢工作，坚（艰）苦学习，领导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7月24日　单德贵支队在密云上庄头峪设伏，歼日伪军20多人。

本月　密云河东的鱼子山、土门、白羊、南水峪等村发展了第一批党员。

8月　丰、滦、密发展第一批党员，西湾子村孟成志等入党。

本月　果玉春因叛变被三支队处决。原二营编入三大队，李满盈改任三大队教导员。

本月　为配合“百团大战”，十团两次出击平古路，克小营车站，焚潮河木桥，并在芹菜岭设伏重创日军一个小队。

9月11日　日伪集中4000多兵力，对丰、滦、密地区开始发动78天大“扫荡”。才山、吴涛率十团三营坚持内线反“扫荡”，白乙化率十团一营转移外线作战。

本月底　王亢率十团一营两个连在达峪与日伪军激战，毙敌指挥官石井少佐以下20余人。

10月　蓟、平、密联合县扩建为蓟、宝、三，平、密、兴两个联合县。平、密、兴县长李光汉，县委书记李子光，辖三个区。镇罗营以北之密云河东地区为第三区。

11月　丰、滦、密在反“扫荡”中，开辟了长城外的贾峪、对大峪、黄峪口和白河以东的半城子、不老屯等大片地区，丰、滦、

密联合县由四个区扩大到八个区。

12月15日　王亢率十团一营在冯家峪南湾子设伏，歼日军哲田中队90余人，取得了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以来空前重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战斗以后，丰、滦、密掀起参军热潮，400多名青壮年踊跃参军。

本月底　以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四海游击队为基础编成丰、滦、密游击大队，师军任大队长，刘力生任教导员，辖三个中队，共350多人。

1941年

2月4日　十团与伪满道田讨伐大队激战于马营西山，毙俘敌117人。团长白乙化不幸中弹牺牲。

春　平、密、兴三区区长王裕民带领区干部和基干队来到密云河东地区，在木河川以南，镇罗营以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基层政权。

丰、滦、密张家坟、西湾子等中心村，建立起第一批党支部。

3月30日　日伪在华北实施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强征大批民夫修筑白马关至密云县城的公路，妄图分割丰、滦、密抗日根据地。

4月　十团和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石城为白乙化团长召开追悼会，3000多军民参加。会后于马营西山为白乙化立碑以作纪念。

本月　十团在水堡子西大梁建立炸弹厂。

5月11日　十团一营在东白莲峪沟门设伏，10分钟全歼下营掩护修路的日军23名，敌筑路活动被迫中止。

6月6日　日伪发起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加强警备力量和“夏季防共”攻势。

本月　丰、滦、密游击大队升编为十团二营，赵立业任营长，刘力生任教导员。十团扩大为3个营共1500多人。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已发展成方圆近100余华里的大县，所各区也由8个区发展为16个区。

本月　滦、昌、怀办事处成立。办事处负责管理丰、滦、密西部的一、四、九、十四、十五区，主任张庚生、工委书记樊凌玺。

7月初　敌抽调6个伪满讨伐大队共1500多人进驻密云、滦平交界之长城内外，再次“扫荡”丰、滦、密中心区。在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至月底即狼狈撤走。

本月　平、密、兴联合县成立县基干队（又名第五大队），大队长张凤生，指导员刘向道。

本月底　驻董各庄的伪满程斌讨伐大队一部百余人，携械向十团投降。

8月　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委成立。书记黄叶，副书记马力，组织部长胡毅，宣传部长樊凌玺。

本月　中共平、密、兴联合县三区区委成立。书记李守善，组织委员林彬，宣传委员王凌阁。区委成立后即着手在木河川、清水河川发展党的组织。

8月29日　密云伪警备队张博中队70余人反正。

9月　丰、滦、密重新组建县大队，番号为“平北游击总队第四大队”，王振东任大队长。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已有70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达700人。

9月23日　驻西驼骨日军朱狩中队56人，在“一撮毛”（驼骨梁）被十团包围歼灭。“一撮毛”战斗是十团在丰、滦、密地区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

10月4日　敌纠集日伪军万余人开始对丰、滦、密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丰、滦、密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时期。

10月30日　日军将抓来的33名群众在下营村集体杀害。后又两次将“扫荡”中抓到的47名群众在下营杀害。

本月　敌将东起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至白道峪，北至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 60 公里的丰、滦、密广大地区划为“无人区”。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在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大搞集家并村，修建“人圈”。

11 月 1 日　日伪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重点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出入城镇的物资必须持有伪警察局发给的“输出入物资搬运证”。为检查物资出入，密云县伪警察局专门成立了“经济班”。

本月 2 日　丰、滦、密联合县委书记黄叶去平北地委汇报工作，途中被捕（后跳车逃回）。十团政委吴涛兼任县委书记。

本月上旬　日军将孟思郎峪村 36 名无辜群众集体杀害，并焚尸毁迹，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孟思郎峪惨案。

12 月 13 日　万人大“扫荡”结束。前后 60 天，日军杀害抗日干部、群众 300 余人，抓捕 500 人，90 余村的抗日工作基础遭到破坏，抗日工作人员被迫退出十二、十三、十六区的全部和十四、十五区的部分地区。

本月底　平、密、兴联合县党支部发展到 54 个，党员达到 644 人。

1942 年

年初　日伪以 6000 多兵力在河西长城各口和山地广设据点，敌据点由 18 处骤增到 37 处。河东地区增设了十几个据点，河东的重要村镇和交通要道全被敌人严密控制起来。

3 月 30 日　日伪开始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沟壕、碉堡分割计划。在河西，强迫老百姓沿山挖“治安沟”，西自康各庄，东至辛庄，全长 40 公里。“治安沟”以北至长城广大地区，也划为“无人区”。河东从大华山经水峪进入怀柔也挖了一条长 10 多公里的“治安沟”。

本月　日伪在密云河东实施“无人区”计划，花园、大角峪、坡头、干峪沟、大岭等20多个村庄被划为“无人区”。

4月8日　敌奔袭包围十团团部和丰、滦、密联合县政府隐蔽地臭水坑。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30人牺牲，县政府财粮科长李昨非等干部、战士45人被俘。这一事件使群众斗争情绪受到严重挫伤。丰、滦、密游击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抗日工作人员被迫撤出六、十区全部和二、三、四、九区部分地区。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政府秘书江卓，化名刘振华，代行县长职务。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委作出“瓦解部落”的决定。号召变“无人区”为有人区，变少人区为多人区，粉碎敌人制造“无人区”的图谋。

本月　张家坟中心村任宗玉、任宗芳等七名党员和自卫军队员，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被日军捕去。虽遭敌严刑拷打，终未暴露抗日斗争情况，最后惨遭杀害。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将张家坟命名为“七烈营”，并立“不屈不挠”之碑以志纪念。

7月　敌人为了破坏根据地的粮食生产，开始“割青”，河西五、七区青苗被割掉1/3。抗日军民开展“护青”斗争。25日十团于大梁伏击割青之敌，予敌严重杀伤。28日又夜袭到莲花瓣割青的敌人，毙敌数十人。

8月　十团和游击队有计划地连续攻打燕落、北白岩、康各庄据点，伏击溪翁庄出扰之敌，奠定了丰、滦、密山地边缘区恢复工作的基础。同时由党政工作人员组成突击队，在武装力量保护下，深入山边、平原开展恢复工作。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委组织各种合作社加强贩运活动，将大量生活物资运进根据地，从而缓解了山地经济困难。

10月12日　承、滦、兴基干队三中队（原平、密、兴三区基

干队)，在指导员李耀庭率领下，护送13名冀东学生到平西受训，在苍术会西山被日伪军包围，48人全部罹难。

11月　平、密、兴联合县改名平、三、密联合县，县长李光汉，县委书记李越之。同时成立平、三、密游击总队，李满盈任总队长。

12月　王亢率十团一部将窜到古石峪烧房、抢粮的驻石匣日军南岛中队包围，毙敌南岛中队长以下80余人，截回粮食70驮。

本月　经过整顿，党组织又有新的发展。到年底，丰、滦、密三区除重新登记的64名党员外，新发展党员32名，恢复和新建了石炮沟、保育岭等17个党支部。

1943年

年初　十三团越过敌人封锁沟，驱散大辛庄等地联庄“大刀会”，镇压反动保甲长和特务，平原地区的抗日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2月26日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撤销平北地委。丰、滦、密联合县划归冀东领导。

3月初　冀东第二区队成立，简称二区队，区队长李满盈，政委谭志成，下辖三个连队，主要活动于密云和蓟、平、兴等地区。

5月　丰、滦、密区队成立。区队长师军，政委王波，参谋长王振东。

7月7日　丰、滦、密区队在香水峪附近设伏，击溃伪满军三十三团一个营，毙俘敌59名，缴获重迫击炮一门，轻机枪2挺，步枪130支。

本月　平、三、密联合县三区扩建为承、兴、密联合县，工委书记江东，县长王慕林。

8月－10月　丰、滦、密和承、兴、密同时对伪军职员开展“良心大检查”的政治攻势，效果甚佳。驻承、兴、密境内的伪警察70余人，在警长张汉臣的率领下携械反正。驻丰、滦、密的伪

军，在“良心大检查”的震感召下，有109人先后逃跑回家。

11月11日　在南香峪北山，丰、滦、密二区队二连与伪满军激战，区队政委王波牺牲。

本月底　冀东正式接收丰、滦、密。丰、滦、密区队改称冀东第五区队。

12月初　五区队在密云赶河厂村阻击伪满刘翰讨伐大队，毙100余人，俘70余人，缴轻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

12月19日　承、兴、密县委在密云大岭召开扩大会议，因发现敌情向四顶山主峰四竿顶转移，拂晓被千余日伪军包围。县义勇队、公安队与敌激战一日，58名战士壮烈牺牲。县委、县政府机关安全转移。

1944年

1月　五区队和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赶河厂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王波等烈士。会后为王波建立了“救国救民”纪念碑。

本月　河东、河西自卫军同时开展“破交月”活动。是月共剪回电线2195公斤，锯电杆798根，破坏桥梁17座，挖垒拦路壕坝406道，并多次破坏平古铁路，使平古铁路长期不能通车。

本月　河西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已明显好转。敌据点由1942年底的42个减少到23个，敌伪兵力由4000余人，减少到2000余人。

3月18日　十三团一部于葡萄园、陡子峪伏击北庄押送投敌分子孟昭信去石匣的日军，毙敌70余名。

4月6日　十三团一部攻克北白岩村敌火药库。次日，又在荞麦峪伏击敌人，俘敌中队长以下35人。

4月9日　十四专署武装部长单德贵只身逃往三河县投敌。

5月　河东地区游击队和自卫军围困敌据点，迫敌先后撤出土门、落洼、镇罗营、北庄等据点。

6月3日　十三团强袭进入承、兴、密地区“扫荡”夜宿土门、

熊耳寨的日伪军，毙伤敌500多名。自此河东抗日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许多村庄与敌断绝关系，成为抗日一面村。

本月　在密云木河川建立“北进敌后武工队”，共50多人，一直活动在雾灵山周围。到1945年已发展成拥有500多人的10个分队。

7月14日　师军率五区队追歼日籍顾问犬养毅亲自率领的抢麦之敌于清水潭，毙日伪军50余人，俘26人，内有密、怀、顺三县日籍顾问、伪督察长、伪民政科长、伪警备队长、伪新民会事务部长等。缴重机枪、掷弹筒各1，长短枪37支，电台1部，粉碎了日伪抢粮计划。

9月　河东、河西同时开展“减租增资”运动。河东各区，河西一、二区和三区部分地区，程度不等地减少了地租，增加了工资，农民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1月27日　后山铺伪警察包围抓捕坚持“无人区”斗争，藏身于深山密林中的小西天群众37人，28人惨遭杀害，制造了“小西天惨案”。

本月　承、兴、密联合县支队成立，陶永忠任支队长，县委书记李守善兼政委。

1945年

1月1日　丰、滦、密联合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胡毅，于西庄子被混入抗日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杀害。冯东接任县委书记。

本月　二区队与五区队合编为十六团，团长师军，政委李满盈。

本月　丰、滦、密联合县支队成立，县长江卓兼支队长，县委书记冯东兼政委。

3月　十六团在小杨各庄伏击伪满军三十四团二营四连，仅30分钟，即毙敌连长（代营长）以下20余人，俘敌34人，受到军分

区嘉奖。

5月31日 十二地委成立热西分委和热西支队。丰、滦、密从冀东划回平北，作为热西支队挺进热河的前进基地。

6月27日 挺北第一支队在队长师军、政委李越之、副政委王文率领下，从司马台小关门附近出长城，进入热河，执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

8月9日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举行对日大反攻。

8月14日 苏、蒙联军进抵古北口，日军放下武器投降。

8月15日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本月 承、兴、密支队配合十三团，接收兴隆县城，改编伪满军千余人。

本月 丰、滦、密二区队和县支队二连攻占司营子、白马关、长哨营、汤河口等据点，伪满军一部投降。

本月 丰、滦、密特区游击队攻克琉璃庙据点，日伪军一部逃窜，大部被俘。

9月2日 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承、兴、密联合县在北庄南河套，丰、滦、密联合县在庄窠分别召开庆祝大会。

9月19日 承、兴、密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李守善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接管古北口。古北口人民从此结束了长达12年的亡国奴屈辱生活。

抗日战争中密云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7600多人被杀害；3.08亿多公斤粮食被抢掠；17460间房屋被烧；90600多头（只）牲畜被掠走；3589名群众被抓去当劳工。

后记

为全面记述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实，本书所收录的文稿，除摘选自本县刊印的《潮白风云》、政协《文史资料》、《足迹》、《密云四史选编》，以及有关同志根据历史档案和个人经历所撰写的文章外，还转摘了《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五辑、《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巍巍海坨山》和《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一、二集的部分文章。因本书系内部资料，不在社会发行，故在此，谨向上述出版单位及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是抗日战争中发生在密云地区的一次重要战役。因在200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70周年之际，已出版了《古北口抗战文集》，故本书有关古北口长城抗战的史料，只选编了上述《文集》没有收录的几篇文稿，其他均从略。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根据内容需要，在不违背作者原意的前提下，曾对部分文章作了适当删节或文字上的个别修改。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恐有不当或疏漏之处，敬请读者及原作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

2005年4月

